

陈独秀

年谱

· 唐宝林
林茂生

卷一

陈独秀

1879—1942

CHENDU XIUNIANPU



唐宝林 林茂生

陈独秀年谱



上海人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77602

1177602

责任编辑 郝盛潮
封面装帧 范一辛

陈独秀年谱

唐宝林 林茂生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本书在上海发行所经销 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25 插页 2 字数 397,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7—208—00088—3/K·14

定价 7.05 元

前 言

陈独秀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多方面的学者感兴趣的问题。我们这部《陈独秀年谱》是想为对此有兴趣的学者提供一点资料。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人物。说他重要，因为从本世纪初到二十年代末，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都有他参加，其中有的他还起着积极的作用。说他复杂，首先表现在他的经历方面，在二十世纪初至四十年代初，陈独秀前后参加或组织的政党与团体在十个以上，如岳王会、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中国共产党、托派等；参加或主办的报纸、刊物有九种之多，如《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每周评论》、《无产者》、《火花》、《热潮》等；他担任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员；他曾与社会最低层的戏子、黄包车夫、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宗教教徒、和尚道士，直到省都督、内阁部长、各式学者、各种政派的头头，都有过较广泛的联系，甚至有的还是他的至交。其次，从他所从事的学术探索与著作方面看，陈独秀研究和发表过历史、政治、哲学、新闻、文学、人口、戏曲、文字方面的著述，甚至还写过小说、大量的诗歌等。这些著述中，有的已成为重要历史资料。第三，从他的思想发展来看，陈独秀从崇信儒术到力行改良；从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与科学到马克思主义“直接行动”，

再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都留下了十分曲折的轨迹。总之，陈独秀在政治思想上或者说在政治信仰上“抛弃”得很快，“接受”也很快；抛弃并未全抛弃，接受也未全接受。他曾宣布要与儒家思想决裂，并且成为“打倒孔家店”的有力号召者与组织者，但他一生也未能摆脱封建等级思想的绊羁；他曾批判过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反动和过时，但他临死前又陷入这种虚伪反动的泥沼。陈独秀的一生确是够复杂的了。

陈独秀已经去世四十多年了。我们认为，陈独秀问题之所以至今还能引起国内外多方面学者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当前许多学科在进行历史探索时都涉及到他。如中共党史、“五四”以来新文学史，以及报刊史、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政党史、教育史、戏曲史、文字学等方面，都必然谈到陈独秀。因此，陈独秀问题的研究，对这些学科的建设有着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陈独秀死后第三年，对他的一生有过一个总结，他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觉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象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七大”工作方针》，《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今天，

随着人们对国际共运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要求重新评价陈独秀的呼声越来越高。

本年谱 1982 年 11 月初稿，1983 年 12 月第一次修改，1984 年 6 月第二次修改，1985 年 7 月第三次修改，1987 年 4 月定稿，力求真实地反映陈独秀一生的主要经历，但限于客观条件和编写者的功力不尼，错误之处一定不少，期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1879年(清光绪五年 己卯) 生	1
1881年(清光绪七年 辛巳) 三岁	4
1884年(清光绪十年 甲申) 六岁	5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 己丑) 十一岁	6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 庚寅) 十二岁	7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 十八岁	8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 十九岁	9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 二十岁	12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 二十一岁	14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 二十二岁	15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 二十三岁	17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 二十四岁	20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 二十五岁	23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 甲辰) 二十六岁	30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 二十七岁	37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 二十八岁	41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 二十九岁	43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三十岁	45
1909年(清宣统元年 己酉) 三十一岁	48

1910年(清宣统二年 庚戌)	三十二岁	50
1911年(清宣统三年 辛亥)	三十三岁	52
1912年(民国元年 壬子)	三十四岁	54
1913年(民国二年 癸丑)	三十五岁	58
1914年(民国三年 甲寅)	三十六岁	61
1915年(民国四年 乙卯)	三十七岁	66
1916年(民国五年 丙辰)	三十八岁	71
1917年(民国六年 丁巳)	三十九岁	77
1918年(民国七年 戊午)	四十岁	84
1919年(民国八年 己未)	四十一岁	91
1920年(民国九年 庚申)	四十二岁	110
1921年(民国十年 辛酉)	四十三岁	137
1922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四十四岁	161
1923年(民国十二年 癸亥)	四十五岁	181
1924年(民国十三年 甲子)	四十六岁	201
1925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四十七岁	222
1926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	四十八岁	241
1927年(民国十六年 丁卯)	四十九岁	280
1928年(民国十七年 戊辰)	五十岁	342
1929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	五十一岁	351
1930年(民国十九年 庚午)	五十二岁	370
1931年(民国二十年 辛未)	五十三岁	394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五十四岁	414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五十五岁	435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五十六岁	449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五十七岁	459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	五十八岁	467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五十九岁	474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	六十岁	493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	六十一岁	510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	六十二岁	519
1941年(民国三十年 辛巳)	六十三岁	526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	六十四岁	535

1879年(清光绪五年 己卯)

生

陈独秀, 谱名庆同, 官名乾生, 字仲甫^①。

10月9日(八月二十四日) 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城^②北门外营一个“小户人家”^③ 当时家中成员有:

- ① 后来由他的姓名的谐音或衍变, 出现过许多笔名、别名、化名等, 计有: 陈仲、仲甫、陈众甫、众甫、陈重甫、重甫、陈重辅、程仲甫、程仲华、陈仲子、仲、仲子、熙洲仲子、熙洲仲子居士、陈仲居士、陈独秀、独秀、秀、独秀山民、山民、陈由己、由己、只眼、程志孟、志孟、实庵、实、撒翁、顽石、三爱、三户、盛唐山民、乾儿、孔甲、明夷、明宜、季丹、记者、CC生、致中、雪衣、陈铎生、方恒甫、T. S. CHEN、D. S. 等。有些著述中提到的一些陈独秀的笔名、化名, 尚待考证, 如实同、春水、水、诚斋等; 还有把“巨缘”(瞿秋白的笔名)、“张次南”(彭述之的化名)错当成陈的; “常乃惠”也实有其人, 非陈独秀。
- ② 《江州义门陈氏宗谱》(怀宁在北齐时属江州郡), 安庆图书馆藏。有材料说陈生于1880年, 不确。怀宁县城, 又名安庆。自1260年起, 安庆既是安徽省府, 又是安庆府治和怀宁县治的所在地, 所以说陈生于安徽怀宁县或安庆均可以。在历史上, 怀宁称县, 始于晋代义熙中期, 而又称安庆始于宋代绍兴十年, 属安庆军(“军”是古代一个行政建制, 比县大)。
- ③ 《实庵自传》, 《宇宙风》第51期。查1879年前后, 陈家收入有三部份: (1) 祖宅及基地少量租地; (2) 独秀祖父、父亲当塾师的收入; (3) 其叔任誊录吏的年俸。几项收入都不多。陈独秀姐姐曾回忆, 有时他们靠捡白菜帮为食, 在饭锅里蒸热水洗脸, 过着贫寒的生活(李帆群: 《陈独秀故居》, 安徽《文史资料选辑》, 1980年第1辑)。有人说他出身于“大世家”(胡适: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 北平东亚书局1933年出版)和家资丰厚的官僚地主家庭(赤光: 《陈独秀的生平及其政治主张》1932年11月15日出版), 都不确, 那是1904年陈衍席在东北升官发财以后的事。

祖父，陈章旭，字太占，又字晓峰，生于1819年，廪生，教私塾。曾得过“以盐提举衔候补知县”的空头衔，给人作幕僚。有一定的学识、才干和修养，家谱中称他“精明强干，迥不犹人；上恢先绪，下启后昆；学问极其深醇，周济极其慷慨。居城廓而恶奢华，老成足羨；入公门而操笔墨，官长咸称”。《实庵自传》中称他“白胡爹爹”，“一个严厉的祖父”。

父亲，陈衍中，字象五，生于1848年，优廪贡生，以教书为业。家谱上称他忠厚慷慨，孝悌两全。

母亲，查氏，生于1852年，对陈独秀十分疼爱，给陈的性格以很大的影响。《实庵自传》称她是“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

叔父，陈衍庶，字昔凡，生于1851年，自小受教于陈衍中，23岁中举，先考入誊录馆，议叙后补知县，因在山东治理黄河有功，由山东巡抚张曜保举以直隶州用，后又调往盛京（今沈阳）办理文案，又得将军裕禄奏留奉天（今辽宁），历任奉天府军粮同知、怀德及柳河等地知县；旋又授任辽阳州，升凤凰厅，以知府赏戴花翎，权新民府擢道员。他颇有才力，《怀宁县志》载：“在官惠政，以柳河最著。柳河固新设治，凡创建一出其手，念柳民苦，转输为筹巨款，并蠲廉设局以贷，行十余年无弊。尝从钦使某公放荒产，随轅司案牒，一昼夜理讼卷三百余件，悉得民隐。”^①他还擅长书画，收藏真迹古玩，自称“石门湖叟”。他不仅为官，还经商，在东北、北京、杭州、安庆等地开商店，置产，聚资几万元。由于陈独秀后来过继给他，就出现了关于陈独秀家庭出身及父亲情况的种种误解。陈独秀参加革命后，陈衍庶怕受连累，不认陈独秀为子（暗中仍接济陈独秀）；陈独秀也从不提起“过继”的事，

^① 舒景衡编《怀宁县志》第18卷，第65—66页，（1915年12月印）。

屡称自己是从小“没有父亲的孩子”，也不愿继承其遗产，过着窘困的日子。

婶，谢氏，陈衍庶的第二位妻子，浙江人，1862年生，陈氏宗谱称赞她：“居巾幗而识大义，能继公未了之愿，慷慨捐资，重建祠宇，族人怀德。”据陈永年（陈庆元之子）的妻子郎兰芳回忆，她十分能干，是当家的；当时陈家五世同堂，是个大家庭。她是最高当权者。

胞兄，陈庆元，官名健生，字孟吉，生于1872年，府学廩贡生，曾以同知候补沈阳；为人厚道，与陈独秀感情极深，《实庵自传》中称他是“阿弥陀佛的大哥”。

此外，还有两个姐姐，一嫁富商吴向荣，一嫁画家姜超。

1881年(清光绪七年 辛巳)

三 岁

10月7日 父陈衍中得传染病，死于苏州怀宁会馆^①。逝世前，他在苏州窰军门家中任塾师。

^① 《江州义门陈氏家谱》、《实庵自传》中说“我出世几个月，我的父亲便死了”，不确。

1884年(清光绪十年 甲申)

六岁

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说：“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祖父教我读书”。祖父企望甚高，管教极严，“恨不得我一年之内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诗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

陈独秀在读私塾阶段，即少年时期，很顽皮，又很聪明。感情容易冲动，常为感情所趋使；不怕鬼神，不畏强暴而又同情弱者等，这些性格特征，这时已有表露。如他捉弄“阴阳先生”；经常因不服管教而使“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而他却“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因此祖父“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而母亲的眼泪，对他却是“强有力的命令”。他说：“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他对母亲很尊敬，但对母亲没有借钱给淠水乡的族长以救济那儿被淹的乡民，却表示不满说：“我们家里虽然穷，总比淹水的人家好些，何以一个钱不借给他呢？”^①

^① 《实庵自传》。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 己丑)

十一岁

7月10日(六月十三日) 祖父陈晓峰病死^①。

^① 《江州义门陈氏宗谱》。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 庚寅)

十二岁

开始在大哥指导下读书,直到1895年。他在《实庵自传》中说:“自从祖父死后,经过好几个塾师,我都不大满意,到了十二三岁,由大哥教我读书。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除温习经书外,新教我读《昭明文选》。初读时,我也有点头痛,后来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这件事使我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考试,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

十八岁

参加县、府、院试，中秀才。他在《实庵自传》中说：院试时，宗师(即考官)出的题目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捷报传来，母亲乐得几乎掉下眼泪，……我们这门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现在看见我们兄弟又都是年轻的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许多神话，……母亲快乐，我自然很高兴”。于是“几家富户，竟看中了我这个没有父亲的穷孩子，争先恐后的托人向我母亲问我可曾定亲”。在母亲及其叔父的慎重选择下，陈独秀与曾任安庆副将高登科之女高大众订婚，并过继给叔父陈昔凡(衍庶)为嗣子。高登科与陈昔凡是同科举人，且有军功，清廷赏赐他黄马褂，并给以世爵。家有四千多亩土地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

十九岁

8月 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未中。乡试期间，结识汪希颜^①，他在《实庵自传》中说：在考场上，一个考生的怪状，“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步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

① 汪希颜(1873—1902)，安徽绩溪人，少年习八股，中秀才，后从师名宦生胡子承(晋接)读新学，崇维新。1897年离家进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陆师读书。1900年入江南陆师，1902年暑期暴疾卒于该校。汪原放回忆其父汪希颜曾有一信说“今日皖域名士陈仲辅来访”，时陈“十八岁”(《回忆亚东图书馆》第5页)。但他又说汪希颜1898年去南京，先入江南高等学堂，1900年入江南陆师；还说陈独秀到陆师认识汪希颜(《安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1辑)。这些都有矛盾和误忆之处。另外，汪原放说这次陈独秀通过汪希颜的介绍，也认识了章士钊，不确，此时章还未到南京读书。陈独秀虽与汪希颜交往甚密，或书信，或到陆师拜访，但陈并未曾就读于南京陆师。吴稚晖在《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一文中说章士钊与陈独秀是同学，不确；汪孟邹在《亚东简史》一文中说，他哥哥汪希颜在南京陆师读书时，“认识了许多朋友，章士钊、赵声是同学；陈仲甫是朋友”(《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

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

回皖后，又与皖省维新人士汪孟邹^①、李光炯^②、邓艺荪^③、江讳等人密切交往，阅《时务报》，“谈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④；并与“一辈后生小子”，对康有为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扬”，遂亦被乡里耆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⑤。如此，陈独秀的思想，就由“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梁派”，并以此改良主义思想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撰写了《扬子江形势论略》。

9月 回安庆与高大众结婚。高是旧式女子，与陈“思想相隔距离不止一世纪。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独秀留洋，欲借其夫人十两重金镯为游资，高坚决不肯”^⑥。

① 汪孟邹(1878—1953)，希颜胞弟，秀才，从师胡子承，倾向维新，1901年也入南京陆师，下半年因老父去世，停业留家，后来成为有名的出版商，与陈独秀成为莫逆之交，在事业和生活上给陈以很多帮助。除本谱中提到的外，还有如五四时期，陈因收入不多，汪主持的“亚东图书馆”经常接济其生活费用。延年、乔年两人在上海的读书费用，按月在亚东的《独秀文存》版税内拨付。1932年陈独秀入狱后，汪氏叔侄曾介绍上海黄钟医生到南京狱中为陈治病，所需药物、书籍等，由汪家为之经办（朱联得：《漫谈上海亚东图书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3辑）。

② 李光炯，名德育，桐城举人，后来随同乡清末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吴汝纶去日本考察，从日本强盛和清朝腐败中受到刺激，回国后决心从教育入手，进行革命活动，与陈独秀关系密切。

③ 邓艺荪(1858—1913)，字绳侯，与陈独秀同乡（怀宁人），是办新学、图救国的教育家，安徽新学的主要奠基人。

④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2卷第1号。

⑤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

⑥ 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庆市档案馆藏。

冬 以石印竖排本形式刊印出版《扬子江形势论略》，署名“怀宁陈乾生众甫撰”，向清政府献策，望注重长江的整治，加强军事设施，以防内乱，御外欺^①。

^① 现藏安庆市图书馆，仅存孤本，无出版者名，大概是陈独秀私人印发。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

二十岁

6月11日(四月二十三) 清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决定变法维新。是为“百日维新”开始。从6月到9月颁布了一批除旧、布新的诏书、谕令,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一些改革。

9月21日 戊戌政变,慈禧再度听政,幽禁光绪于瀛台,罢一切新法,杀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康、梁逃亡日本。

是年 入杭州求是书院。该书院是戊戌前一年(1897)由杭州知府林启(迪臣)创办,程度相当于高中,是一所新式书院,置有新书报,传授新知识,并根据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协定,最早选送公费留学生去日本。据说陈独秀在此受到新式教育,学习了英文、法文、天文学、造船学等^①。不久,陈因有反清活动,

^① 关于陈独秀这次入杭州求是书院,国内外许多著作都有记载,如日本多波野乾一的《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成)》、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研究指南》、美国科·托马斯的《陈独秀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郑玉汝的《陈独秀年谱》(以下简称郑编年谱,香港龙门书庄,1974年出版)等,但根据何在,均无考证,本谱暂列入,存疑。多波野乾一及郑玉汝以陈独秀与沈尹默是该校同学为据,但沈自述与陈始识在光绪末叶陈由东北到杭的时候,那应是1909年(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

受警察追捕，逃到南京；后去东北继父陈昔凡处。陈昔凡长于诗赋、书法和绘画，并酷爱收藏书画古玩，陈独秀受到熏陶，文化修养进一步提高^①。

陈延年生于安庆大南门培德巷东口。

^① 孙雨航：《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安徽文选》（季刊）第一、二期合刊，台北，1973年7月。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

二十一岁

是年 在沈阳获知母亲病重，与兄孟吉匆匆南返^①，抵家，其母已故。居家未久，又与孟吉北上，“弟就辽东道，兄航燕海边”^②，兄弟分别，从此再未见面。

① 陈独秀后来回忆：“南奔历艰险，意图骨肉全。”据说陈独秀“南奔”途中曾遇“红胡子”，劫财，要杀。后来，知他是陈衍庶之子，归还其财物，还护送他入关。传说陈衍庶为奉天省新民府知府时，红胡子张作霖曾被捕判死罪，陈予以相救，并招安。（孙伯醇的回忆，即《ある中国人の回想》，东京美术社，昭和四十四年，东京）。

② 见陈仲：《述哀》（诗），《甲寅》第1卷，第5期，1915年5月10日出版。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

二十二岁

春 义和团由山东直隶转移,随后入津、京。在义和团转入津、京后,东北地区义和团由营口、锦州、朝阳地区向沈阳发展。六月中旬,英、法、德、美、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正式组成联军(通称“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爱国反侵略运动。6月21日清政府对外“宣战”。8月中旬侵略军攻陷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西太后挟光绪帝于北京失陷前逃往西安。

7月9日—9月初 沙皇俄国一面派兵参加联军对北京天津烧杀抢掠,一面又出动十万侵略军,以“护路”为名分五路,侵占我国东北,所到之处,奸淫掳掠,制造骇人听闻的惨案。如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大屠杀及火烧瑷珲城,中国居民被杀害者二十余万人。

8月 唐才常等人在上海发动的拥立光绪当政的“勤王”起义失败。

是年 陈独秀在东北目睹八国联军侵略我国时,沙俄帝国主义首先出兵强占我国东北三省的流血祸乱。1903年,他回忆说:“夫俄人虐待我中国人已非一日。仆游东三省时,曾目睹此情形。……前年金州有俄兵奸淫妇女而且杀之,地方老绅率村

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论，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将二百人全行击毙。俄官设验疫所于牛庄，纳多金者则免，否则虽无病者亦置黑狱中，非纳贿不效。其无钱而囚死狱中者，时有所闻。”^①

长女玉莹(筱秀)生。

^① 《安徽爱国会演说》，《苏报》1903年5月26日。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

二十三岁

5月10日 秦力山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办《国民报》，倡革命排满之说。

9月7日 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日、意、荷、俄十一国公使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

是年 陈独秀受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刺激，开始考虑国家问题。他后来回忆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那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我越想越悲，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

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①

10月 赴日留学，入“东京学校”，即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②

年底，参加留学生组织的“励志会”。该会成立于1900年，以勉励学业、联络感情为宗旨。但很快因政见不同而分裂。陈独秀加入时，该会已分裂成稳健派（其中有曹汝霖、章宗祥等）和激烈派。前者接近官场，被后者视为走狗，两派势不两立。所以陈与张继等^③人“后参加而先脱会”。

唐才常“勤王”起义的失败，励志会的分裂，与激进派张继等人的接触，以及留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国民报》等宣传西方

① 三爱：《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5期，1904年6月14日出版。

②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书》。此报告中学生情况，系本人自填。陈自填留日时间1901年10月，学校是“东京学校”。过去许多中外学者都说他首次东渡是1902年，不确。关于学校有三说：1. 宏文学院（实藤惠秀（日）：《中国留日学生史》。另外，李书华的《吴稚晖先生从维新派成为革命党的经过》、《胡汉民自传》，中岛长文的《陈独秀年谱长编》等都特此说）。该校为接待中国留学生的预备学校，创设于1902年。陈独秀在1902年转入该校，是可能的。2. 早稻田大学，由于东京学校在1902年才设大学部，并改名为早稻田大学，所以有人误认为陈独秀一开始入的是该大学。随着学校改名，聂莲瑛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三八年陈独秀思想的发展》论文中说其“后转早稻田大学”，似有可能。3.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速成科（持此说的有日本的波多野乾一：《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成）》和《毛泽东与中国的红星》，丸山松幸：《亚细亚历史事典》，增田涉：《中国文学史研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民国名人传辞典》；石峻：《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该校当时的确承担了给中国留学生补习功课的任务，故有陈独秀“就读于东京（专门）学校，补习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说，如果东京学校不能既学日语又补习普通课程的话，似有可能。我们认为实藤惠秀说的“先在东京学校学习一段，后进入高等师范”，可能性较大。

③ 张继（1882—1947），原名溥，字溥泉，直隶沧州（今属河北）人。早年随父读书，1899年赴日留学，先学于东京善邻书院，后入东京专门学校（与陈独秀同校）。此时，他目睹清政腐败，受法国卢梭《民约论》的影响，产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有人说陈独秀这时还认识了章士钊和苏曼殊，甚至说“三人合租一屋居住”，不确。此时章还在国内，苏则在横滨大同学校读书。

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书刊的影响，使陈独秀的思想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由“康党”转为“乱党”。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

二十四岁

2月8日 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刊《新民丛报》，继续鼓吹改良主义、君主立宪。

4月26日 秦力山、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反对清朝统治，孙中山、梁启超列名赞助，但因会议受到日政府与清驻日公使干涉，孙中山便邀请发起人到横滨，以酒楼宴会形式补开了纪念会。

3月 上旬回国，在南京拜访汪希颜，由汪介绍，认识在陆师的章士钊和赵声。谈及教育时，陈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尤注重德育：“蒙学莫急于德育，而体育次之；若智育，则成童以后未晚也。诚以德为人道之本，无德无以立，智必不醇。”^①旋至安徽，与何春台、潘赞化、葛温仲、张伯寅、柏文蔚等青年于安庆创

① 汪希颜致汪孟邹的两封信(1902年3月25、26日，4月23、24日)。前信说“兄自二月初四日(1902年3月13日)到堂”(陆师学堂)，后信说“善乎皖城志士程仲辅氏有言曰：(此君现游日本，兄未到堂时，蒙见来访)‘蒙学……’”。程仲辅即陈独秀。由此可见，陈在3月上旬回国，13日前到南京汪的住处，与汪等谈了上述一段教育主张。陈独秀始识章士钊和赵声，应在这时。

设藏书楼，组织“励志学社”，传播新知，牖启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①

9月 陈因安庆藏书楼的活动被通缉，与潘赞化再次赴日，进成城学校陆军科^②。

冬 陈与张继、蒋百里^③、潘赞化、苏曼殊^④等人另行发起组织，仿意大利独立前马志尼创立的革命团体“少年意大利”取名“青年会”。会约规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乃“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会后合影留念^⑤。始识邹容、章大炎、刘季平^⑥、汤尔和^⑦。

-
- ① 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382页。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未刊稿）。据朱说，陈独秀此时就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
- ②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书》；《苏报》1903年5月26日载《安徽省大学堂第一次冲突之原因》中说：“有一游学日本陆军队（科）退回之学生陈某……”。
- ③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浙江宁海人，1901年赴日留学，入成城学校，升士官学校。
- ④ 苏曼殊（1884—1918），名戡，字子戡，后改名元（玄）瑛，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生于日本横滨，母是日本人。6岁随嫡母黄氏（中国人）回归原籍，15岁东渡横滨入大同学校。翌年削发为僧，因不谙僧家生活，又回大同学校。1902年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第二年又入成城学校习陆军。据柳亚子访问陈独秀的记录说，陈、苏初识是1903年《国民日报》时期，似不确。我们认为，1902年冬二人同时参加发起青年会时就认识了。
- ⑤ 《壬寅东京青年会成立摄影》，《逸经》第1卷第31期。
- ⑥ 刘季平（1890—1938）原名钟麟，上海人，1902年留学日本，入成城学校陆军骑科（与陈同校），善诗书，尤精汉隶，与陈独秀爱好同，故二人交谊甚深。1903年，上海《苏报》案发，邹容被捕。1905年4月邹容因不堪虐待死于狱中，遗体初置入“化人滩”的荒冢中。刘季平闻讯后，星夜前往收尸，葬于其住宅华泾黄叶楼旁，侠骨义行，为人传颂，称“义士刘三”。
- ⑦ 汤尔和（1871—1940）即汤禔，浙江杭州人，1902年入日本成城学校。1903年，在留学生拒俄运动大会上，被推选为议长。后又与钮永建共同被推为特派员，回国与袁世凯谈判。武昌起义后，在杭州参加独立活动，后被推为浙江省代表，赴武昌商议，组织临时政府。民国成立后，退出政界，从事医学，创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校长。三十年代堕落成汉奸。

是年 编辑出版《小学万国地理新编》^①。陈乔年生于安庆南水关“道院”公房。

^① 石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皖怀陈乾生重辅编辑。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

二十五岁

3月31日 鉴于当时清政府委派管理中国湖北留日学生的学监姚煜协助清驻日使馆官员阻碍中国留日学生的正当利益和要求，借姚作风卑劣事，陈独秀约同张继、邹容等闯入姚宅，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发抒割发代首之恨^①，以使其威信扫地。陈、张、邹等因此被日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4月 沙俄背约，拒从我国东北撤兵，并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新要求，企图永远霸占我国东北地区。东京、上海留日学生掀起“拒俄运动”。陈独秀赴安徽活动^②。

4月中 约同志潘璿华、潘璇华^③等筹组“安徽爱国会”。

① 章士钊：《疏〈黄帝魂〉》，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29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有人说陈独秀参加了东京留学生的拒俄运动，并加入他们组织的拒俄义勇队，似不确。此时陈已回国。

③ 潘璿华，名世琛，桐城人，1902年留学日本警察厅警察科。毕业后回国，清政府予花翎知府衔，分省试用同知。1905年曾在家乡创办“崇实学会”秘密组织，与安徽公学互为声援，进行革命活动。后曾任江苏巡警总局总务科长，安徽巡警总局副提调，民国成立后，任安徽全省警察总厅厅长等职。潘璇华是其弟。

5月17日 下午一时，为响应上海、东京留学生发起的拒俄运动，与潘璠华等人发起，在安庆藏书楼召开演说会。参加大会的有高等学堂、武备学堂、桐怀公学等校学生及社会爱国人士三百余人。演说会在大雨中进行。首先由陈独秀演讲，痛斥沙俄侵华七条要求，指出当今“外患日亟，瓜分立至，吾辈恐有不足为牛马奴隶之一日”。在此情形之下，“非提倡军人精神，断不足以立国”^①，等等。演说毕，由陈独秀正式宣布组织“安徽爱国会”，得全体与会者赞同，并经会议公举“陈独秀、潘璠华，大学二君、武备二君，桐城学堂体操教习杨君”，共七人为爱国会负责人。爱国会内分设演说、体操等部，并议决创办《爱国新报》；再议决安徽爱国会与上海爱国学社^②及东南各省志士通成一气，倡议组织“国民同盟会”等。会议议定《安徽爱国会章程》二十条。其宗旨说：“本社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恢复国权基础”^③。

6月 因在筹组安徽爱国会的过程中，明确表示要“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袭”^④等反清革命言论，受到清统治者的忌恨。安庆知府桂某一面布告，一面呈报江督端方。安庆府布告说：“访闻近有东洋游学

① 《苏报》1903年5月26日。

② 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第五班学生五十余人，因抗议校方压制言论自由而退学，要求中国教育会（1902年4月发起，蔡元培会长）办学。该会遂于是年11月16日设立爱国学社，蔡元培任总理，吴敬恒为学监，章炳麟、黄炎培等人执教。次年南京陆师退学的青年也来加入。该社编刊《学生世界》，在张园开演说会，为革命刊物《苏报》撰稿，组织国民教育会，增设军训课等，进行一系列革命活动。1903年6月《苏报》案发，章炳麟、邹容入狱，报社被封，爱国学社亦被解散。

③ 《苏报》1903年6月7日。

④ 《大公报》1903年6月12日。

回国之人，在该处(指安庆藏书楼——引者)私设会社，演说悖谬之词，摇惑人心，实属荒谬，有违国家法律。现奉抚面谕，不准演说，私设会社，如违拿办”^①。端方在得知安庆知府桂某呈报后，即电饬皖统领韩大武：“皖省之‘励志学社’与东京拒俄义勇队互通声息，名为抗俄，实为排满，且密布党羽，希图大举，务将何春台、陈仲甫等一体缉获”^②。端方再谕请外务部饬各省缉拿。

6月27日《清外务部发沿海各省督抚缉拿查办参加爱国会成员电》载：“似此猖狂悖谬，形同叛逆”，“着沿海沿江各省，务将此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③。

在安徽统领韩大武接得端方电令逮捕陈独秀等人之前，该韩统领之文案吴汝澄，连夜即将电令内容通告陈独秀及爱国会有关人员，于是陈等星夜逃走。次日韩大武令吴将电文译出，再派人缉拿陈独秀一千人等，陈等早已逃走上海^④。

8月7日 与章士钊等于上海新马路梅福里创办《国民日报》。^⑤该报是由浙江人谢晓石出资，外国人高茂个(J. Somoll)

①②③ 阙名：《安庆藏书楼革命演说会》。

④ 另有一说：陈独秀被抓后，安庆知府“桂某”与衍庶同僚，知犯人是庶子，未判罪，也不放，软禁在衙门后花园，迫其读书思过，好久才放出；还有的说陈被抓后，即潜逃。

⑤ 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双桠记》，《甲寅》第1卷第4号。章说陈“东游不得意，返于沪，与愚及沧州张溥泉、南康谢晓石共立《国民日报》。吾两人蜚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髻。……”张继也说该报是“行严、由己及余皆任事”（《回忆录》，《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2号）。足见陈是该报创办人之一。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35页）只把陈列为撰稿人之一，显为故意贬低。

担任经理，章士钊、陈独秀、张继等人任主编，何梅士^①、陈去病^②、苏曼殊、金天翮、林獬、谢无量^③等担任撰述。陈大复^④襄理笔政。《国民日日报》主编们鉴于《苏报》被封的教训，文章“论调较舒缓”，且多不具真名，但其“宗旨在于排满革命，和《苏报》相同，而规模尤大”。发行未久，风行一时，时人咸称此报为“《苏报》第二”。此时期，陈独秀结识何梅士，并与章士钊“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谈，意气至相得”；陈与章二人总理编辑事，甚至负责全部文字校对，每天工作至凌晨，习以为常。章曾作诗曰：“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⑤

8月9日 写《哭汪希颜君》，内云：“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等，表示了对三千年封建制度的彻底否定和誓为新制度而战斗

-
- ① 何梅士，章士钊在《双桻记》中称他是何廉施，福建人。1903年拟东渡日本习陆军未就，暂住章士钊处，得识陈独秀，一见如故，陈“得廉施恨晚”。
 - ② 陈去病(1874—1933)，字佩忍，号巢南，江苏吴江人，早年主张维新变法，后加入同盟会，与柳亚子等筹办南社，成为著名的诗人，诗作对国事颇多悲愤。
 - ③ 谢无量(1885—1964)，原名蒙，号希范，四川梓潼人，生于安徽芜湖，自幼能诗擅文，1902年入上海南洋公学。并与马君武、马一浮同办《翻译世界》，介绍西洋文学。历任中华书局编辑、北伐军大本营秘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解放后任成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
 - ④ 陈大复(1881—1912)，原名诗志，字士辛，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官宦之家，母贤且熟诗琴，陈少承母训，秉性聪颖。甲午战争后，慷慨国事，萌生救国大志。1897年寓沪，但不入学校，闭门读书，手不释卷，数年如一日，学问大进。1902年加入爱国学社，更加勤学苦练。《国民日日报》被封后，曾在多处中学任教，辛亥革命时参加松郡起义，奋身入府署，取松府印信。
 - ⑤ 章士钊：《初出湘》，《文史杂志》第1卷第5期。

的精神。

8月17日《题西乡南州游猎图》：“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表现了对“勤王”改良运动的彻底决裂，和不怕艰难困苦、献身革命、义无反顾的战斗意志。

是月 会晤回家度假转道上海的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学生吴樾^①等人，对吴等影响颇深^②；又结识“由扬州以政嫌遁沪”而处于困苦中的刘申叔^③。

10月7日 上海知县出告示不准商民购买或寄售《国民日日报》。8日，魏光寿分谕沿江省抚，查禁《国民日日报》，并谕请外务部行文总税务司，转知邮政局“毋得代寄《国民日日报》，杜其销路，绝其来源”^④。

10月8日—12月1日，《国民日日报》连载法国雨果著《悲惨世界》译文前十一回。译者署名“中国苏子谷”。题为《惨社

① 吴樾(1876—1905)，安徽桐城人。1901年入保定师范学堂，与陈独秀少年时的好朋友张嘏岑同窗，因此而与陈独秀建立了联系。此次谋面以后，吴反清情绪更加激昂。后来发生的吴樾谋炸清朝五大臣事件，也与陈独秀有关。

② 马鸿亮：《吴樾烈士传略》，《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编，第13册，第581页。

③ 刘申叔(1884—1919)名师培，江苏仪征人。出身书香门第，12岁就读完四书五经，14岁丧父，家境衰落，仍醉心仕途。1901年考取秀才，第二年中举。1903年到北京会试，未中。经扬州，因某案涉嫌，避到上海停留，想以教员谋生，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爱国学社”成员，因此也与陈独秀来往。这时他受到民族革命思想影响，改名“光汉”，赞成反清革命。可是后来他又热衷于无政府主义，并被清廷收买，成为同盟会中的坐探。1915年，他又拥袁复辟。新文化运动中，参加“国粹派”，总编《国故月刊》与《新青年》对抗，大肆攻击陈独秀。

④ 戈公振：《中国报业史》第155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

会》。陈独秀说：“《惨世界》是苏曼殊译的，取材于露俄的哀史而加以穿插，我曾经润饰一下。曼殊此书的译笔，乱添乱造，对原著很不忠实，而我的润饰，更是马虎到一塌糊涂”^①。12月初，《国民日日报》停刊后，甘肃人陈兢全在上海办镜今书局，他对陈独秀说：“你们的小说没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然你们愿意出单行本，我可以担任印行”。于是陈独秀便答应了陈兢全。所以在《国民日日报》停刊后的一段时间，陈独秀就留在上海整理《惨社会》译稿。1904年《惨社会》以“镜今书局”的单行本发行时，易名《惨世界》。“又因为我（指陈独秀——引者）在原书上润饰一下，所以陈君（指陈兢全——引者）又添上我的名子，作为两人合译”^②。

12月初《国民日日报》终因外绝销路，内生诉讼，再加经费短缺而停刊。

冬 汪孟邹在芜湖开办新书店“科学图书社”，贩卖新书报、教科书等。其墙上曾挂过陈独秀写的一副对子：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

①② 柳亚子：《记陈仲甫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第279—286页，北新书局，1928年版。事实上，“镜今书局”1904年所刊行的单行本《惨世界》与1903年《国民日日报》上连载的《惨社会》，不仅是改《惨社会》为《惨世界》，内容上也有了增加。连载《国民日日报》的《惨社会》只有十一回，而《惨世界》已是十四回了，而且前十一回的文字又重新润饰过。所以“镜今书局”主人陈兢全把1903年发表时仅署“中国苏子谷译”改为苏子谷陈由己合译”是符合实际的。可是，1921年，上海泰东图书局翻印此书时，书名再为《悲惨世界》，译者中删去了“陈由己”，只保留苏子谷。

此书翻译文字，正如陈独秀所说，不甚忠于原著，很多借题发挥，这些发挥处，正反映苏曼殊和陈独秀当时的思想，可以作为研究陈独秀政治思想一个重要材料。此书在当时曾作为宣传革命思想有影响的著作流传。

年底 抵安庆，与友人房秩五、吴守一^①一起筹办《安徽俗话报》，同时又写信给当时安徽知名人士胡子承等商议。胡便写信商之于当时在安徽芜湖经办“科学图书社”的汪孟邹，要汪与图书社中同人“妥商”。信说“陈君重甫（即仲辅、独秀）拟办《安徽俗话报》，其仁爱其群，至为可敬、可仰……此事应如何应付，本社诸同志与栋老（栋臣）会面时当可妥商也”。经汪与该图书社同人议妥，欢迎陈独秀到芜湖，以图书社作为《安徽俗话报》的发行机关^②。

① 房秩五，名宗岳，安徽枞阳人；吴守一即吴汝澄。房秩五在《浮渡山房诗存》之回忆《俗话报》一诗中说：“忆余在清光绪庚子前后，作童子师于安庆，结交仲甫。仲甫少余两岁，意气甚豪。壬寅秋，先师吴挚甫先生自日本考察学制回安庆，创办桐城学堂，自任堂长，命余与吴守一诸人任学长。仲甫几无日不来校，纵谈时事，极嘻笑怒骂之雄。一日约共办安徽俗话报，……迨暑假时，桐城学堂改名桐城中学，移回县城，余赴日本学师范，守一亦回桐城授课，仲甫乃将俗话报全部迁至芜湖。……维时，仲甫间亦在各校（安徽公学、安徽公立速成师范等——引者）授课，俗话报出版如故也。”（《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所以蔡元培后来说：“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

② 汪孟邹：《亚东简史》，《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谭彼岸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中说陈独秀接办过《芜湖白话报》，陈万雄在《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0页）一书中推测“《安徽俗话报》或是接办该报后更名”，似无根据。因为当事人回忆，并未提及《芜湖白话报》，谭彼岸和陈万雄在列举当时报刊时，唯独未标该报刊行时间，说明他们未见到该报。由此推断，谭彼岸可能把《安徽俗话报》当成《芜湖白话报》了。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 甲辰)

二十六岁

2月8日 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东北)爆发,清政府竟宣布“中立”。11月“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为会长。

年初 陈独秀背了一个包袱,拿了一把雨伞,来到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商定由房秩五负责教育栏,吴守一负责小说栏,其余各栏均由陈独秀一人负责。陈还负责全部排版、校核等^①。因汪孟邹的芜湖科学图书社无印刷设备,所以由陈独秀将稿件汇齐后,寄上海章士钊创办的大陆印刷局承印。每期出版,都由陈独秀亲自动手分发,卷封,付邮^②。陈后来回忆道:“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③该报发行半年,即达数千份。全国各大城市如南京、上海、镇江、扬州、武昌、长沙、南昌等,均设有代

① 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

② 汪原放:《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③ 《在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上的题词》,转引自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200页。

派所，“一时几与当时驰名全国之杭州白话报相埒”^①。

2月16日 何梅士因脚气病死于东京，章士钊为之痛哭，并驰书告陈独秀，时陈正卧病淮南，复信附诗《哭何梅士》，信曰：“梅士之变，使我病益加剧。人生朝露，如欢几何，对此能弗自悲。”诗曰：“海上一为别，沧桑已万重，落花浮世劫，流水故人踪，星界微尘里，吾生弹指中。……”^②5月7日，又在《警钟日报》上发表《夜梦亡友何梅士觉而赋此》。

3月31日 《安徽俗话报》第1期出版。陈独秀在办报“缘故”中宣布办报“两个主义”。“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大家也好有个防备”；“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

在这一期《安徽俗话报》上，陈独秀以“三爱”^③笔名发表了两篇文章：《醉东江——愤时俗也》、《瓜分中国》。前者勾画了清朝统治者的卖国奴才面目：“眼见得几千年故国将亡，四万万同胞坐困。……拍马屁，手段高，办公事，天良尽。怕不怕他们洋人逞洋势，恨只恨我们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奴才本性。”后者揭露了俄、英、德、法、日、意等国瓜分中国的罪恶和清政府无力御侮的腐败，惊呼中国将“国亡家破”，号召“大家赶紧振作起来，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或是办团练，或是练兵，或是开学堂学些武备、枪炮、机器、开矿各样有用的学问。我们中国地大人众，大家要肯齐心竭力办起事来，马上就能国富兵

① 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

② 《警钟日报》1904年4月15日，署名由己。该报初名《俄事警闻》，1904年2月创刊，蔡元培主编，刘师培、陈去病等执笔，以“抵御外侮，恢复国权”为宗旨，1905年3月被封禁。

③ 《安徽俗话报》共存一年半，陈独秀以“三爱”笔名发表文章48篇，另还有4篇未署名，但内容是“三爱”文章的续篇。

强，那还有怕外洋人欺负的道理呢？”

4月30日 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论安徽的矿务》，论述了保护矿山的重要：“矿山是地下的宝贝，全国的精华”；阐明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军事侵略互用的道理，启发国人对于保护矿山的自觉，克服“只知道恨洋人，杀教士，到是洋人把我们中国人的命脉弄著去了……还是不在意”的愚昧状态。同时谴责统治者出卖矿山的勾当，提出“各省的矿山，自己开采”，“不让洋人开采”的主张，但又提出人民捐钱，从洋人手中买回矿山的空想。同时发表《安徽的煤矿》。

5月15日 在《安徽俗话报》第三期上发表《恶俗篇》第一篇：《婚姻(上)》、《中国历代的大事》第一章：《开国源流》、《地理略》第一篇：《世界大略》、《国语教育》。《恶俗篇》后来一共写了五篇，批判了婚姻、敬菩萨、妇女问题上的种种封建迷信的习俗。特别诉说了妇女在这些压迫下的苦难，指出了这些坏习俗与人民愚昧、国家贫弱的关系，“象这样坏风俗，真是大有害于世道人心呀！”——陈在五四时期掀起的“打倒孔家店”，批判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从这时就开始萌芽了。

5月29日 在《安徽俗话报》第四期上发表《恶俗篇》第二篇：《婚姻(中)》、《中国历代的大事》第二章：《汉苗之争》。

6月14日 在《安徽俗话报》第五期上发表《说国家》和《中国历代的大事》第三章：《大禹治水》、《地理略》第二篇：《本国大略(上)》。

7月13日 在《安徽俗话报》第七期上发表《恶俗篇》第四篇：《敬菩萨》、《中国历代的大事》第五章：《周初之隆盛》、第六章：《十四年共和》和《地理略》第四篇：《本国大略(下)》。

7月27日 发表《亡国篇——亡国的解说》、《中国历代的大事》第七章：《王政复兴》、《东海兵魂录》。《亡国篇》后来一共

写了三篇，与第五期的《说国家》联系起来，反映了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如卢梭的民约论）的严重影响，具有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他宣称：“我敢下一断语，道：‘当今世界各国，人人都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强。人人都不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亡。’”“怎样才算得是个国家”：“第一国家要有土地。……所以这土地是建立国家第一件要紧的事。你看现在东西各强国，尺土寸地，都不肯让人，就是这个道理了”；“第二国家要有一定的人民。国家是人民建立的”；“第三国家要有一定的主权。凡是一国，总要有自己做主的权柄，这就叫做‘主权’。这主权原来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但是行使这主权的，乃归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一国之中，只有主权居于至高极尊的地位，再没有别的什么能加乎其上了。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外国不能丝毫干预，……以上三样，缺少一样，都不能算是一个国。”在《亡国的解说》中，陈着重阐述了君民平等的思想，揭示了皇帝与国家的关系，批判了几千年“朕即国家”的封建的“国家观”，指出“这国原来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皇帝也是这国里的一个人。……我们中国人，不懂得国家和朝廷的分别，历代换了一姓做皇帝，就称做亡国，殊不知……这只能称做‘换朝’，不可称做‘亡国’。必定这国让外国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权，被外国占去，这才算是‘亡国’”。接着，他列举中国土地被瓜分、铁路、矿产、货物三样顶要紧的利权被侵夺，主权被干涉的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实际已亡，“事到如今，若说还没有灭种，还没有亡国，真是不害羞的话了。”最后，他认为亡国的关键在于民，“依我看起来，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第一桩，只知道有家，不知道

有国。第二桩，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

8月11日 在《安徽俗话报》第九期上发表《亡国篇（承前）》、《中国历代的大事》第八章：《犬戎之祸》和《东海兵魂录》。

8月25日^① 在《安徽俗话报》第十期上发表《亡国篇》、《中国历代的大事》第九章：《春秋时代之五霸》。

9月10日 在《安徽俗话报》第十一期上发表《论戏曲》、章回小说《黑天国》（第一回：《犯朝纲身陷黑天国，受奇辱拳击巡警官》）。同日^②出版的该报第十二期上，刊登了未署名的《恶俗篇》第五篇：《妇女的装扮》。

夏 桐城潘璠华以考察北洋警察名义，到保定会晤吴榭、张啸岑，交换对时局看法，商讨革命工作如何进行。潘转达陈独秀的意见：“要努力唤醒广大群众，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须推翻清室的腐败统治。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气而不急躁。”^③

9月14日 在《警钟日报》上发表《赠王微伯东游》诗一首，笔名：由己。

9月24日 在《安徽俗话报》再版第六期上发表《中国历代的大事》第四章：《汤武革命》、《地理略》第三篇：《本国大略（中）》，同期还刊登未署名的《恶俗篇》第三篇：《婚姻（下）》。

10月9日 在《安徽俗话报》第十三期上发表《亡国篇》（接第十期）、《中国史略》（原名《中国历代的大事》）、《春秋时代之五霸》（接第十期）、《黑天国》（第二回：《惊奇遇众犯问根由，愤穷

① 本期漏标出版日期，“8月25日”是根据第9、11期的出版时间推算而得。

② 该报第12期出版时间标为“甲辰八月初一”，即9月10日，与第11期重复。有人以为出版者搞错了，将其改为“甲辰八月十五日”，即9月24日。其实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按时出版，或提前，或延期是常有的事。该报第16期以后的几期就是如此。

③ 张啸岑：《吴榭烈士事迹》，《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途荣豪寻短见》)。

10月23日^① 在《安徽俗话报》第十四期上发表《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该文与第三期的《国语教育》等文章，对改良中国教育，提出了不少见解。同时发表《枪法问答》、《黑天国》(第三回：《遇救星绝境庆重生，感前缘风尘怀知己》)。

11月7日^② 在《安徽俗话报》第十五期上发表《亡国篇》(接第十三期)、《枪法问答》(接上期)、《黑天国》(第四回：《黑夜寻人荣豪情切切，天涯遇旧能智意绵绵》)。

11月21日 在《安徽俗话报》第十六期上发表《中国史略》第十章：《吴越争雄》、《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接第十四期)、《枪法问答》(接上期)。

秋 得章士钊函请，到上海，由杨笃生监盟，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天天从杨等试验炸药，并与蔡元培相识。此时蔡也是“暗杀团”的成员，“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③。在沪月余，即回皖。

12月7日^④ 在《安徽俗话报》第十七期上发表《中国兵魂

① 本期封面未标出版日期，“10月23日”是根据第13、15期出版日期推算而得。

②④ 据该报第19期“本告白”，第16期到1905年3月、第17、18期到1905年4、5月间才出版。

③ 陈独秀：《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此“暗杀团”起源于1903年东京拒俄运动中成立的“拒俄义勇队”(后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教育会”改组方案中，分“鼓吹，暗杀，起义”三步进行。当时主持者即为杨笃生、何海樵等人，并有黄兴、陈天华、张继等人参加，其目标是“欲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暗杀团是教育会中的秘密组织。不久，暗杀团在沪成立分会，为了与黄兴等人领导的华兴会拟在1904年10月10日发动的长沙起义相呼应，又以上海暗杀团为基础，吸收各省重要同志，组成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他们以暗杀为主，杨笃生、章士钊分任正副会长，陈独秀正是在此时加入的。有的材料说此事发生在1905年秋，不确，因这时章士钊和杨笃生皆不在上海。

录》，同期还刊登未署名的《亡国篇——亡国的原因》(一)。

12月21日 在《安徽俗话报》第十八期上发表《中国史略》：《战国七雄》(接第十六期)、《西洋各国小学堂的情形(一)俄国》，同期还刊登未署名的《中国兵魂录》。

冬 推动李光炯、卢仲农在湖南的“安徽旅湘公学”迁回芜湖，并答应赴校任教。该校迁芜湖后，宣传革命，联系同志，成为安徽革命运动的主要策源地^①。

① 政协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377页。高语罕说：“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陈独秀氏”(《百花亭畔》第35页)。

“安徽公学”创办于1904年春。1902年李光炯随吴汝纶考察日本教育后，1903年应聘湖南高等学堂任历史教习，翌年春，他与数学教习卢仲农创办“安徽旅湘公学”于长沙，聘革命党人黄兴、赵声执教，以培养革命骨干、散布革命种子为宗旨，指导学生阅读革命书刊(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764页)。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

二十七岁

1月22日 俄国发生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8月20日 孙中山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在日本东京组成中国同盟会,并创办《民报》,宣传革命。

9月5日 日俄战争结束,俄败。日俄双方在美国的朴资茅斯(Portsmouth)签订“和约”,日本从沙俄取得原俄国在我国南满的所有特权。

年初 与芜湖安徽公学的体操教员柏文蔚、该校师范班学生常恒芳共同发起组织“岳王会”,效忠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反对清廷统治及外国侵略。后来柏文蔚去南京新军中当队官,联络了一批人,设立岳王会南京分会。^①常恒芳则去安庆尚志学堂(邓绳侯创办)当教导主任,也发展组织,成立岳王会安庆分会。柏、常分别任此二分会会长,陈在芜湖为总会会长^②。

春 吴懋利用假期,草拟了万言“意见书”,并交张啸岑一

① 柏文蔚:《五十年大事记》,毛笔抄件,存安徽省博物馆。

② 常恒芳:《记安庆岳王会》,《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438页。

份，嘱事后若离开人世，设法交给可以发表的人，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之后，吴即拟定了刺杀清朝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的计划，并到南方安排家中后事，路过芜湖时，拜访了陈独秀，并巧遇赵声，于是三人在科学图书社楼上进一步秘密策划^①。

6月3日 在《安徽俗话报》第十九期上发表《亡国篇》(二)。

6月17日 在《安徽俗话报》第二十期上刊登未署名的《中国兵魂录》。

9月13日 《安徽俗话报》出至第二十二期后停办。因该报“登载外交消息”触犯洋人，“为驻芜英领事要求中国官厅勒令停办”^②。又因该报出至6月17日二十期后，陈独秀访游淮上，无暇再兼顾报业，致使《俗话报》失去栋梁，无法维持(最后的21—22期合刊，拖至9月13日出版，已无陈独秀的文章)。另一个原因是陈独秀不愿改良该报。胡子承在1904年写给科学图书社的一封信说：“至《俗话报》出版以来，同人皆颇欢迎，而局外则多訾议。如‘自由结婚’等语，尤贻人口实。……鄙人甚敬此报，甚爱此报，而又不肯随声附和此报，意欲更图改良，立定宗旨，可乎？请与重翁(陈重辅，即陈独秀)等商之。”据汪原放说，胡的主张是“辞旨务取平和，万勿激烈”。因为“现在民智低下，胆子甚小，毋令伊惊破也”。胡在另一封给科学图书社同人的信中又说：“重辅兄血性过人，于社事尤为关照，凡事请与酌行也。”汪孟邹谈到与陈“商酌”的情况时说“仲甫的脾气真古怪哩。《安徽俗话

① 参见张啸岑：《吴稚烈士事迹》(《文史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孙传媛：《安徽革命纪略》(《学风》第4卷第6期，1934年7月1日出版)；李宗邱：《吴稚》，(《革命人物志》第2集第269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

② 房秩五：《浮渡山房诗存》，《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

报》再出一期，就是二十四期，就是一足年。无论怎么和他商量，说好说歹，只再办一期，他始终不答应，一定要教书去了。”^①

9月24日 吴樾狙击清廷出洋五大臣。清政府为缓和和消弭革命，企图以“立宪”伪装来延缓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便派载泽、端方、绍英、载鸿慈、徐世昌五大臣在这天分赴东西各国考察宪政。于是，吴樾改变原行刺铁良的计划，在北京车站投掷炸弹狙击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因炸弹受震自爆，吴樾身亡。事后，陈独秀函问张啸岑：“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张即遵吴嘱，将吴交存“意见书”原稿，寄陈独秀^②。后来陈又将烈士遗物寄上海。蔡元培在吴烈士追悼大会上说：烈士“死难后，有陈君寄一皮包至上海，内有西式外套一件，此系烈士之遗物。当时系赠杨君（即笃生——引者），以为纪念”^③。

暑假 为发展“岳王会”势力，“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江淮南北，到处去物色革命同志”^④。他和柏文蔚、宋少侠、王静山、方健飞等，联络“淮上豪杰的皖北之行”，先到怀远、蚌埠，然后经蒙城、涡阳、亳州、太和、阜阳、正阳关到达寿县。陈独秀在寿县住了半个月，遍访江湖侠义之士，始识孙毓筠（少侯）^⑤、张澍侯（之屏）、郑赞丞、石敬五（竟武）、宋健侯等，然后经合肥返芜

①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6—17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文史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③ 《追悼吴烈士大会纪念册》。

④ 淮南病叟（高语罕）遗稿：《陈独秀入川后》，1947年11月29日南京《新民报》（晚刊）。

⑤ 孙毓筠，出身满清贵族，本人纳资捐官达三品道台，这次与陈独秀等人交往后，深受影响，倾向革命，东渡日本。1906年，参加同盟会，被孙中山派回长江流域各地运动新军起义，不幸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判处终身监禁。南京光复后，恢复自由，并任皖督，聘陈独秀为秘书长。卸任后定居北京，袁世凯任其为公府顾问，后来与杨度等成为寿安“六君子”，为袁世凯复辟效劳。

湖。后来安庆、南京两地的“岳王会”分会成立，势力已相当可观，“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而且多数是坚贞革命、至死不屈的领导骨干（如熊成基、倪映典、方刚、吴旻谷等），为日后同盟会在江皖地区的发展及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是年 陈独秀除担任安徽公学国文教师外，还经常到安庆尚志学堂演讲。陈独秀还邀荐刘申叔（化名金少甫）到安徽公学、皖江中学教书。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

二十八岁

9月1日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

12月16日 张謇、汤寿潜等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

3月 与徽州旅芜同乡会共创“徽州公学”(即“徽州初级师范学堂”),并任该校“监学”及教育、地理、东语课程教员^①。

6月17至21日 太平府署理汪昌麟到芜湖视察各中小学,并以安徽公学、徽州初级师范和皖江中学为重点;在向省学务处的视察报告中说:“三学堂教科,经学最少”;“课本亦多用东洋,……重外轻内”,“不以学堂为修业之地,转持学堂为护身之符”,“似有背奏定章程”。报告表示要对三学堂进行整顿,“申明定章,严加约束,令修身经学教员择集经书要言,切于正心行事、尊君爱众者实力宣讲”;并要求授权“本道随时督察该三堂,循名核实,遵守定章,保存国粹”^②。

夏 苏曼殊应刘师培之邀来皖江中学任教,暑假,陈独秀与

①② 《署太平府汪昌麟申学务处前奉委查卑属学堂原禀表格文》,《安徽官报》1906年第14期。安徽太平府《履勘调查表》,《安徽官报》1906年第15期。

苏曼殊东游日本。假满，二人一起回国^①。陈独秀亦担任芜湖皖江中学教员，同事中还有章士钊等。据说陈在此时还与《安徽白话报》发生关系^②。

-
- ① 苏曼殊致刘三信（1906年9月13日），信中说：“申江别后，弟即偕仲甫东游，至处暑后始抵皖江”（柳亚子编《曼殊全集》第1册第331页）。苏回国后一度到皖江中学任教。
- ② 郑玉汝：《陈独秀年谱》说陈“创办”该报，时间短暂；吴相湘则说：“清季《安徽白话报》刊行时，胡（适）陈（独秀）都是撰述人”，并认为陈、胡初识，应在这时（《民国人物传》第1册第136页）。但迄今未发现陈发表在该报上的文章，也没有当事人忆及，二说存疑。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

二十九岁

春 因陈独秀利用汪孟邹的科学图书社联络革命党人进行活动,“奸民候补道汪云浦告密于恩铭,恩铭大怒,欲穷治之,羽书连下”,陈独秀又离皖赴日,进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①;与苏曼殊、邓仲纯同住“一间小房”。陈教苏学文写诗,向苏学英文、梵文^②;陈为苏译的《梵文典》题诗,还与在东京的同盟会成员章太炎、张继、刘师培过从甚密,切磋中西学问,议建梵文书藏,但不参加同盟会,而参加由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陶冶公及日本人幸德秋水、印度人钵罗罕·保什等发起的“亚洲和亲会”^③。该

① 许承尧:《民元前徽州革命党人之活动》,《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有人说陈这次赴日是由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案件牵连的结果,不确。查徐案发生在7月6日,而此时陈已在日。另外,过去一些著作中曾说1907—1909年陈独秀到法国留学去了,此说似无确切依据。1902—1909年一直在法国的李石曾在其给李书华的信中说:陈独秀“未到过法国”(邓玉汝:《陈独秀年谱》)。

② 《何之瑜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261页。

③ 《亚洲和亲会约章》是章太炎起草的,据参加该会成立大会者陶冶公所藏之《约章》之中文抄本“附识”记载:“此会成立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春,首由中印两国革命志士发起于日本之东京……其后陆续参加者有越南、缅甸、菲律宾、朝鲜诸邦,形成亚洲民族统一战线,以余记忆所及,中国方面入会者有……陈仲甫……及余等十余人”。

会宗旨明确宣布：“（一）本会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因此，“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皆得入会”。

6月 为苏曼殊完成《梵文典》数卷作诗《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将次西游命题数语爰奉一什》。

6—7月 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清廷巡抚大臣恩铭，自己被捕牺牲；他与秋瑾共同划策的浙江起义也失败，秋瑾被害。至11月，孙中山领导的潮州、惠州起义先后失败。这些都对陈独秀思想有较大的影响。

9月1日 在《天义报》上，以“熙州仲子”笔名发表诗：《题曼上人〈梵文典〉》^①。

^① 怀宁县隋初属熙州，故陈自称“熙州仲子”。《天义报》由刘申叔、何震夫妇主编，上有《梵文典》成书广告，但未见该书刊行。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三十岁

11月14日 清光绪帝载湉死，次日，西太后那拉氏亦死。溥仪继帝位，载沣以摄政王监国，决定明年改元“宣统”。

秋 回国度假。

10月15日 安徽教育总会开秋季大会，陈独秀应邀参加，并在闭幕式上讲话，主张改良教育^①；然后去浙江杭州探亲访友，年底重返日本，住东京“神田猿乐町二丁目一番地清寿馆”^②。

是年 游日本日光山名胜蓬瀛华严瀑布，作《华严瀑布》诗十四章，被人赞为“词况丽贍”^③，“思想绝高”^④，后寄给《民立报》，被王无生^⑤刊于《小奢摩室诗话》的有八首，改名《华严泷》。

① 《皖教育总会大会纪事》，《安徽白话报》，1908年10月25日。

② 《苏曼殊与刘三书》（戊申十二月十一日），柳亚子编《曼殊全集》第1卷。

③ 苏曼殊：《画跋》，《曼殊全集》第1卷，第146页。

④ 《小奢摩室诗话》，《民立报》第4册，第853页。

⑤ 王无生，（1880—1914），名钟麟，安徽歙县人，历主《神州日报》、《民吁报》、《天铎报》笔政。1907年，洋人在上海租界创办电车，他在《神州日报》上撰写社论，痛骂洋人搜刮金钱，断绝人力车夫的生计。洋人即派出警探四出捉拿他，逼得他逃亡扬州。1908年，陈独秀由日回国度假期间，曾在扬州拜访他，“相得甚欢”。

诗中有如下诗句：

列峰颯修眉，湖水漾横波；
时垂百丈泪，敢问意如何？

死者浴中流，吊者来九州；
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

日拥千人观，不解与君语；
空谷秘幽泉，知音复几许。

我欲图君归，虚室生颜色；
画形难为声，置笔泪沾臆。

另外，翌年陈与苏曼殊唱和的《本事》诗中也有如下诗句：

湘娥鼓瑟灵均泣，才子佳人共一魂；
誓忍悲酸争万劫，青衫不见有啼痕。

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
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与谁^①

① 文芷：《曼殊上人诗册》（《艺林丛录》第五编第74—75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此诗是文芷从苏曼殊好友蔡哲夫家收得的曼殊手抄诗稿，上有陈与苏唱和诗各十首，署“仲”即陈独秀，“曼”即苏曼殊。但柳亚子在编《曼殊全集》时，将其中陈的两首诗（包括“丹顿裴伦是我师”）列为曼殊诗作，这与曼殊手迹注明“仲”作不符，而且诗稿自蔡家收得后又经章士钊鉴定，确认是陈作。但后人仍有附和柳亚子观点的，认为苏曼殊更接近“丹顿裴伦是我师”的意境。可能的情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诗词唱和时，互相补充，互相修改是常有的。

等等，这些诗句，表现了自己几年奋斗迭遭失败及目睹孙中山领导的多次起义惨遭镇压后的徬徨心理，和以屈原拜伦自喻，孤愤抑郁、忧国忧民的情思。

译拜伦诗《留别雅典女郎》^①。

某日，在东京《民报》馆拜访章太炎时，钱玄同^②、黄季刚^③在隔壁房间，因陈与章谈话中语及清朝汉学家多出于皖苏，渺视湖北，黄季刚大声答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闻之扫兴而别。十年后，陈、黄在北大新文化运动中各为垒主，陈是“毁孔子庙罢其祀”，黄则“八部书外皆狗屁”。^④

-
- ① 署名“盛唐山人”。《拜伦诗选》东京1909年出版。此诗选系苏曼殊所编，收录了苏、陈二人翻译的诗。怀宁在唐至清初年属盛唐郡，且境内有一小山名“盛唐山”，故陈自称“盛唐山人”或“盛唐山民”。
- ② 钱玄同(1887—1939)，原名夏，浙江吴兴人。1905年赴日，从章太炎专治国故，精文字音韵学，并与革命党人往来。1911年回国执教浙江中学。1913年以后，赴北京，执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大学等，曾参加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工作，后在教育部任职，专心从事中国语言及文字改革的研究工作。
- ③ 黄季刚(1886—1935)，名侃，湖北蕲春人，少时从父学说文解字，扎下音韵、训诂根底。1903年考入湖北文普通中学堂，因倡言革命被开除，遂东渡日本。后加入同盟会。1906年常投稿《民报》，得主笔章太炎之赏识，收为弟子。
- ④ 《周作人回忆录》第455—45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909年(清宣统元年 己酉)

三十一岁

3月 迁居江户，与苏曼殊、邓庆初、邓以哲等“常相聚首”，并与苏唱和《本事诗》十首。苏在1月初与陈同居于东京清寿馆，3月同迁江户，5月又返东京，曾作诗赠陈——《游不忍池示仲兄》、《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9—10月间 陈独秀去沈阳，将其在沈病逝的大哥孟吉的棺木护送返里。为悼念其兄，作《述哀》诗，忆及兄与母早年抚育之恩，悲怀痛悼：“……见兄不见母，今兄亦亡焉。兄亡归母侧，孑身苦迢邰。地下语老母，儿命青丝县。老母喜兄至，泪落如流泉。同根复相爱，怎不双来还。”

① 程演生(1888—1955)，安徽怀宁县人，曾游学欧洲，留学法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兼教授、安徽学院院长，并先后出使阿富汗、波斯(伊朗)、土耳其、暹罗(泰国)，还在上海主持过安徽丛书编印发行处的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学校长和上海文史馆馆员。他是陈独秀的同乡和挚友，是五四时期陈独秀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与合作者。1917年初，陈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后不久，他即致函支持陈对文科教学的改革，冀陈“万望鼓勇而前，勿为俗见所阻”。后来，他受聘到北大文科任教，在国学与国文的教学活动中，更与陈朝夕切磋，密切合作。他还经常应陈之求，为《新青年》撰稿、组稿并筹措出版经费等，不遗余力。直至陈于1932—1937年陷身于国民党南京监狱期间，他还是陈在狱中得以博览群书的主要供应者(参见吴文质《程演生》一稿)。

年底 与胡渊如一起去程演生^①家拜访，从此与程结为好友，旋即赴杭州^②，与妻高大众之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③正式同居，相处甚欢；任杭州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通过在该校任教的刘季平，认识沈尹默^④。在杭期间，他与刘、沈以及马一浮、谢无量等常在一起，以诗酒自娱。陈还“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的篆字”，从马一浮处借到文字学著作《铁云藏龟》，研究甲骨文^⑤。

① 程演生手稿：《陈独秀家世及其他》，未刊稿。

② 高君曼（1886—1931），又名君梅，其母元氏是高登科的“续娶”。君曼自小得宠，受教于家庭教师，后到北京女子师范读书，有文学修养，思想新颖，与独秀颇相得，以至恋爱结婚（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小英雄故事-略述》）。陈高结合，受到家庭和社会舆论的讥讽，但他们并不顾及，因此与家中断了关系。延年兄弟曾对二人结合不满，君曼却并不对他们不好。1930年8月陈的原配高大众去世时，她还带领子和年和女儿子美到安庆奔丧。汪孟邹曾夸她“女中之杰”。

③ 柳亚子编《曼殊全集》第5册第283页。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陈独秀的信中说：“去年岁暮，再来杭州，晤刘三、沈君默，……仲别公后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不少。今仅将哭兄丧诗及与公有关系绝句奉上。……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佳人即指高君曼，哭兄诗即《述哀》，与公有关系绝句即《存歿六绝句》。此信和诗未注年月，沈尹默回忆说是“光绪末叶”即1908年，而郅玉汝《陈独秀年谱》则根据陈在《双桤记序》中所说修改《存歿六绝句》的时间，断定信和诗写于1911年春，从而把陈到杭州陆小执教的时间也推迟整整一年——1910年岁末。沈、郅二说似都不确。上引程演生的回忆，则说是“宣统元年”（即1909）年底，陈与胡到他家，然后赴杭。同时，章士钊在《民立报》1912年3月9日刊登《秋桐杂记》披露《存歿六绝句》时说，当时与陈相见沪，陈“录庚戌旧作存歿六首见示”，可见诗作于1910年（庚戌），信也就写于这年，那么“去年岁暮”，自然是1909年底，恰与程演生之说吻合。而且，从沈尹默回忆情节看，“陈独秀从东北到杭州陆军小学教书”；“我和刘三、陈独秀夫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只能是1909年以后的事。

④ 《何之瑜致胡适》（1947年11月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260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1910年(清宣统二年 庚戌)

三十二岁

7—8月 以“陈仲”笔名连续发表《说文引申义考》^①。

是年 作诗《存歿六绝句》，怀念亡友吴孟侠、何梅士、汪仲尹、熊子政、章谷士、葛循叔和存友赵伯先、章行严、孙少侯、郑赞承、江彤侯、苏曼殊，并随信抄寄给苏^②。

冬 作诗《感怀二十首》^③，并抄寄友人王先生（大哀）。王时任《民立报》编辑，将其中两首（第17、19首）发表，并附言说陈诗“皆忧时感世之作，说者谓有陈伯玉、阮嗣宗之遗”，给予很高评价。诗抒发了九年奋斗中的苦闷、寂寞、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期待等各种复杂的情怀，如其第4、16、17、19、20首曰：

美哉武灵王，梦登黄华颠。女娃挟赵瑟，歌诗流眇妍。
变服习胡射，宗族害其贤。奇计竟不就，美人空弃捐。

魂魂昆仑气，洛洛清溪流。琅玕出西极，光采粲九州。

① 《国粹学报》第68、69期，未见续完。该报1905年创刊，邓实总编，以国学为阵地，宣传爱国、保种、存学。前期在资产阶级革命鼓动中，批判改良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有一定进步作用，同时由于其复古保守，一概反对西学，反动倾向日趋严重，1913年停刊。

② 陈独秀致苏曼殊的信（1910年）。

③ 《丙辰》杂志第3期，1917年5月出版。

鸾凤一朝去，宫馆颓山邱。嵒岷不可望，望之令人愁。

女娃为精卫，衔石堙东海。东海水未堙，女娃心已改。
夸父走虞渊，白日终相待。奈何金石心，坐视生吝悔。

天路绝泥滓，人世终苦辛。一念脱尘网，双足生青云。
云中发箫管，悦耳何缤纷。回瞰所来地，泣下为人群。

百川深自回，警焰坐相失。饮羽及不梁，九载甘肃瑟。
八表同阴霾，虚白自盈室。十日丽芜皋，光明冀来日。

1911年(清宣统三年 辛亥)

三十三岁

4月27日 革命党人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死难烈士七十二人葬黄花岗。

10月10日 武昌起义成功。

春 修改《存歿六绝句》(对照1910年陈独秀致苏曼殊信中的《存歿六绝句》诗与发表在1912年3月9日《民立报》上的《存歿六绝句》诗,有几处不同)。

10月 得知武昌起义消息后,陈独秀于杭州陆军小学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起草“革命檄文多篇”,使人到处张贴,其中一篇交革命党人光复会干部周亚卫(当时任杭州陆军小学准备起义的二个队长之一)和商文蔚(当时任杭州陆军小学排长)贴于杭州鼓楼的门房,使“省垣官吏闻之悚然”^①。11月5日,杭州光复。同时,陈独秀与安徽的同盟会管鹏、吴旻谷、韩衍^②、金维系、顾景文、李乾玉、万兴安、靳少斋、龚克定、葛瑞芝等,督促新军响应,初败;后来,陈独秀与韩衍、陶寿铭等人劝说朱家宝,荣为形势所迫,惧而求降。11月11日,安徽宣布独立。不久,安徽临时参事会选举孙毓筠为安徽都督,并派员赍印到沪迎孙,陈独秀即离杭赴沪与孙会合返皖^③。

12月中旬,应孙毓筠邀请,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与高君曼一起住安庆宣家花园,并与韩衍、孙养邈、杨尘因等人在怀宁驿口创办《安徽船报》,任总编辑,韩任社长。该报是辛亥革命后安徽第一张革命报纸④。

-
- ① 周亚卫《光复会见闻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24页。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浙江省通志馆馆刊》创刊号。当时杭州陆小是革命党人的一个通讯联络机关。褚回忆陈使人贴“革命檄文”事,发生在1908年冬西太后和光绪帝同时死去的时候,似不确,那年陈回国至皖,再到杭州探亲访友,时间短暂,冬已去日,也未到杭州陆小任教。据陈独秀在《铁云藏龟》一书上的签字:“无量赠乃在宣统元二年,实,时客杭州”,及亲手借该书给陈的马一浮说,“那时仲甫先生在杭州陆军小学教史地,差不多每天都和沈君默、刘三几个人到他那里去谈天。他们在一起,时常做诗,互相观摩;约莫也有一二年”(《何之瑜致胡适》,1947年11月5日)。由此可见,陈独秀任陆小教员及贴“革命檄文”事,不可能发生在1908年。至于有的说此事发生在1908年春,就更不着边际了。
- ② 韩衍(1875—1913),字善伯,江苏海门人,少从师张謇,有文学修养。甲午战争后,国势日颓,韩思想奋发,主张组织武装,发动起义,以挽救民族危亡。1906年到安徽,即着手军事活动,辛亥年冬组织“青年军”,自任总军监,招收18至25岁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入伍,是孙毓筠督皖时期主要支柱。但时人对韩毁誉不一,张啸岑说他说话杂乱无章,骂人不讲分寸,说好可称他“革命志士”,说不好则是“文化流氓”。陈独秀眼光很高,对他是不瞧不起的(张啸岑:《陈仲甫在都督府》)。韩后来与欲统制“青年军”的柏文蔚闹翻,最后被企图夺取“青年军”领导权的白汝浩刺死。
- ③ 参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6册,第1608—1609页);王孝楚:《组织革命青年军的韩衍》(《安徽文史资料》第5辑)。我们认为陈独秀此时尚在杭州或转经上海回皖的途中,陈是否参与这些安徽独立的事及怎样参与,尚未查到可靠资料,写于此,暂存疑。
- ④ 王孝楚:《组织革命“青年军”的韩衍》。因至今未见留存的《安徽船报》,别人也未忆及陈任该报总编的事,此事存疑。

1912年(民国元年 壬子)

三十四岁

1月1日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2月17日 清帝宣统宣布退位。

2月23日 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

3月10日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8月25日 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

1月初 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后，大力推行行政改革。据在孙毓筠任皖督时为都督府掌管文书及收发的科长张啸岑回忆说：孙为少爷出生，又因贩食鸦片，不理政事，都督府问事最多的是秘书长陈仲甫。陈想在行政上作一番改革，惟其性情过于急躁，想一下子就把政治改革好，常常为了改革而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个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孙毓筠也无可奈何，还不得不从。陈提出的改革意见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人民生活需要提高；二、旧官僚不能敬克任用，不能靠他们的旧经验；三、对那些对革命事业有阻碍，违背革命利益的事，应大刀阔斧地将它除掉。陈任都督府秘书长时间不长，就

由李光炯接替了。陈把秘书长职务交出后，就在原安徽高等学堂的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校，自任教务主任，聘安徽桐城马通伯^①任校长。

1月30日 签名于为保护刘光汉致大总统书。书谓：

“大总统钧鉴：仪征刘光汉累世传经。髫年岷嶷，热血喷溢，鼓吹文明。早从事于爱国学校、《警钟日报》、《民报》等处，青年学子读其所著书报，多为感动。今之共和事业得已不日观成者，光汉未始无尺寸功，特惜神经过敏，毅力不坚，被诱金任，坠节末路，今闻留系资州，行将议罚，论其终始，实乖大法，衡其功罪，或可相偿，可否恳请赐予矜全，曲为宽宥，当玄黄再造之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得以余生，著书赎罪，某等不啻身受大法矣。谨此布闻，伏待后命。

皖都督府秘书科：

邓艺孙、洪海闾、汪津本、李德膏、陈仲、卢光浩、马汝简、吕嘉德、李中一、龙炳等谨叩”。^②

3月 陈独秀作为安徽省代表，赴上海参加“吴烈士”追悼会，^③并与阔别六年刚从英国归来的章士钊见面，录《存殁六绝

① 马通伯(1855—1930)，名其昶，安徽桐城人，少时习古文、诗经，颇有功底，但数应乡试不举，乃办学为业，曾长庐江潜川书院、桐城中学师范学堂，后进京授学部主事。这次主安徽高等学校，翌年又入京，掌法政学校教务及参议院备员，曾反对袁世凯复辟。

② 《临时政府公报》第2号，1912年1月30日。由于刘师培曾做清廷密探，当时有些革命党人要求惩处他。于是陈独秀等人就上书孙中山临时大总统，以求保护。

③ 孙毓筠致汤化龙电，《民立报》1912年3月12日。此“吴烈士”，即指吴禄贞。(见《民立报》1912年2月27日和3月15日的报道)辛亥革命时，吴是燕晋联军大都督，1911年11月16日被旗兵刺死于石家庄，不久其遗族捧其遗像由天津到上海，黄兴、汤化龙等70余人发起开“吴禄贞追悼会”，定于3月14日在张园举行，并登报请“中外伟人热心志士愿表同情者届时同临”。3月15日《民立报》报道了“张园之大追悼会”盛况，在此前后，还连续发表了吴烈士遗诗《西征草》。有人说“吴烈士”是指“吴榘”，不确。

句》见示，发表在《民立报》上。与苏曼殊等约定前往拜访刘季平，“苦不识路”^①。

4月 由于军人割据及袁世凯覬觐安徽，迫使孙毓筠提出申请病假，要柏文蔚代理都督；柏不允，请陈独秀、管昆南等人研究，决定首先整顿安徽内部，均以皖军总司令名义整肃驻皖各军，使安庆秩序安定下来^②。

6月 由安庆到浦口与柏文蔚密商皖事。此时因袁世凯用威逼利诱的手段，使革命内部分化，南方留守府取消（4月1日南北议和时达成协议，孙中山辞总统，袁世凯任总统，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编者），各军涣散，军事重心已不在南京，浦口无久居必要，且孙毓筠在安徽处境甚难，陈要柏回皖，以保存一部分革命力量。柏答应，即回安庆任皖都督及民政长职，并任命陈独秀为秘书长，徐子俊为参谋长，机要秘书王曙笙，高级参谋徐唯一，“一切施政方针皆由四人代为规划，将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整顿”^③。陈与管昆南、卢仲农等结成一派，主张积极扩充军备，以防袁氏，与亲袁派胡万泰等进行斗争。陈与柏决定当时方针是：以中山先生的意志为转移，由陈负责与上海陈英士随时接洽掌握，决不能违背革命的宗旨，无论何种建议主张，皆不为动^④。后来，都督府秘书长先后由徐唯一、查秉钧接任，陈独秀改任都督府顾问，仍兼安徽高等学校教务主任职^⑤，但不久，因与校长马通伯教育主张上的矛盾，被守旧派学生赶走，便专任都督府的

① 苏曼殊致刘三的两封信（1912年3月），柳亚子编：《曼殊全集》第1册第245、341页。邱玉汝：《陈独秀年谱》据此断定陈直至1912年3月还在上海，4月才回皖任柏督秘书长，而忽略了此前陈任孙督秘书长的经历。

②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江苏文史资料》1981年第6辑。

③ 柏文蔚：《五十年大事记》。

④ 柏文蔚：《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讨袁》。

⑤ 《安徽公报》第4期，1912年10月17日。

工作①。

10月 嗣父陈衍庶破产。1909年陈衍庶在杭州创办“益大”公司，与英国在上海的“怡德”洋行订立合同，陈衍庶为其在东北收购大豆。后来英人违约，致陈衍庶大亏本，酿成诉讼。因英国驻华使节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陈衍庶诉败，以益大公司不动产数万元相抵，从此，陈家逐渐破产②。

11月 会见来安徽拜访的苏曼殊，并聘其在安徽高等学校任教③。

是年 女陈子美生（高君曼所生）。

① 周越然：《六十回忆》（1943年7月15日），太平书局1944年12月版。

② 安徽都督府《咨复外交部据陈衍庶呈复亲赴上海与英商怡德洋行理结经手案项由》，《安徽公报》第16期，1912年9月18日。

③ 杨无忌：《苏曼殊及其友人》，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5卷，1929年版。

1913年(民国二年 癸丑)

三十五岁

3月2日 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之后，柏文蔚积极准备抗袁，再次复任陈仲甫为安徽都督府秘书^①。

4月12日 柏文蔚以赴宁省亲为由，密赴上海，与孙中山等人共谋讨袁大计。临行前委参谋长徐唯一代行军事，秘书陈仲甫代行民政，徐、陈分主皖政^②。

春 芜湖科学图书社的汪孟邹，接受陈仲甫的建议，到上海四马路惠福里筹办“亚东图书馆”。

5月10日 嗣父陈衍庶去世。

6月14日 柏文蔚被袁世凯免职后，陈仲甫因鄙视继任孙多森，“呈请辞职，未待批准，留书迳去，书中有旧病复发，迫不及待等语，盖指旧官僚政治复活，不可一日与居之义”^③。7月7日，袁政府国务院代总理段祺瑞呈报，批准安徽都督府秘书陈独秀免职^④。陈即偕高君曼随柏文蔚同迁南京，两家同院而寓，闭

① 《民立报》，1913年3月28日。

② 《安庆来电》，《民立报》1913年4月13日。皖省从这年4月1日起，决定军民分治，并对都督府与行政公署进行改组，以澄清吏治，缩减编制。

③ 《民立报》，1913年7月8日。

④ 《临时政府之尾声》，《民立报》1913年7月7日。

门谢客，不问世事，借以休息。柏与陈等人还每日黎明乘舟至府城桥下纳凉，夜深始归。

7月初 孙中山兴师讨袁，派黄兴请柏文蔚出山，并委柏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接任后与陈仲甫等人会商组织安徽讨袁军总司令部问题。陈即携家至沪^①，安排后随即与柏返皖。

7月17日 安徽宣布独立，公推柏文蔚为讨袁军总司令，胡万泰暂行代理都督事宜，孙多森担任民政长事宜（孙多森于25日逃遁上海，宣布“凡有安徽民政长印信……无效”）。陈独秀协助制订讨袁大计，并起草独立宣言：“临时总统袁世凯凶残狡诈，帝制自为，戕贼勋良，灭绝人道，恶贯满盈，人民发指。近日更无故派兵蹂躏苏赣，东南各省同深义愤，声罪致讨，吾皖岂能独后。兹特邀集军商绅界会议决定，即日宣布独立”^②。不久，柏文蔚被胡万泰逐出安徽，“二次革命”在皖失败。

8月27日 陈独秀逃离安庆抵达芜湖，被芜湖驻防军人龚振鹏逮捕入狱，遇救后亡命上海。据高语罕说：“这位军人本是柏公（文蔚）同立在反袁旗帜之下的，不知因何事与柏不谐，而迁怒先生（指陈独秀——引者），已经出了布告，要枪决先生。先生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旋经刘叔雅、范鸿仙、张子刚三先生极力营救得免。”^③程演生则说：民二安徽独立反袁，芜湖有军政分府的组织，是合肥龚振鹏主持的。省政府命他（即陈独秀）到芜湖说龚取消分府，言语冲突起来，龚即叫卫兵将仲甫绑起枪毙，但龚此时又叫他的秘书写仲甫的罪状，在此一

① 苏曼殊致刘三信（1913年六月初五），柳亚子编《曼殊全集》第1卷，第272页。

② 《癸丑战事汇录》，《民立报》，1913年7月22、24日。

③ 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晚报》1947年11月29日。范鸿仙当时对龚说：“陈独秀是社会上颇有影响的名流，杀不得”（胡渭清：《我陪同陈独秀去寿春》）。

刹那间，寿州张孟起（安徽旅长）得了信，连忙带了手枪卫士，将仲甫救去。同去的人说，当时仲甫被绑时并无屈服表示，但面色亦不能无变了。柏文蔚回忆说：龚振鹏者富有革命性也，惟头脑简单。龚原是他手下的一个旅长，7月间反袁将领在正阳关召开军事会议，因权位之事，对柏文蔚产生误会，回芜湖以来，态度大变，惨杀无度，每日枪决民众，不可胜数。都督府秘书长陈仲甫，因其残暴，痛斥其非；袁师长家声亦以良心不许，委婉讽劝，均招（遭）绳绑，正拟枪决时，而以张旅长永正，迫以兵力，稍敛淫威，未下毒手，而陈袁已饱受惊吓矣。

10月21日 袁系安徽都督倪嗣冲通告缉拿陈独秀，并派兵查抄陈独秀在安庆的家；延年、乔年逃往乡下，侄永年被抓。通告中指陈为“柏逆文蔚、龚逆振鹏死党，蓄志谋叛之犯”^①。

冬至翌年春 陈独秀一直“闲居”上海，打算“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②，帮助汪孟邹经办“亚东图书馆”，起草《亚东图书馆开幕宣言》^③；除完成《字义类例》一书外，还为汪孟邹编了一部《新华英文教科书》，署名“CC生”^④；但因此书销路不畅，原订出版四册，只出了第一、二册。《字义类例》也拖到1925年才出版。

是年 四子陈和年（鹤年、哲民）生。

① 《陆军上将衔陆军中将安徽都督民政长勋二位倪令》，《安徽通缉党人案毛笔原件》，藏台湾草屯党史会。转引自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第107页。

② CC生：《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第1卷，第2期。

③ 郑君：《陈独秀传》。

④ “CC生”，是“陈乾生”之“陈乾”二字英文字首C.C.再加上“生”。

1914年(民国三年 甲寅)

三十六岁

6月10日 章士钊在《甲寅》^①杂志上发表陈独秀给他的私函。函叹“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又称：“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仆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足下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②章士钊在公布此信后附按语，推崇此函“了了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足下无意书之，故愿宁负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读者。呜呼！使今有贾生而能哭，郑侠而能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为何如！”但章氏对陈之“国人唯一之希望在外人之分割”不以为然，答曰“又何言之急激一至

① 此杂志是1914年5月由章士钊创办于东京，是政论性月刊，宣传反对袁世凯专政。但主张“有容”、“不好同恶异”、“调和立国”等。前四号在东京出版，第五号后移上海，按月出至第十号，中间因易地耽搁数月。它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之后，陈独秀的《新青年》以前影响最大的杂志，不仅它的政论文章倾动一时，而且其文体亦成风气。胡适称之为“甲寅派”或“政论文学”（胡适：《五十年来中国文学》）。《新青年》也称该杂志“多输入政治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学理”；“说理精辟，其真直当为当世独一无二”（《新青年》第2卷第2号，《通信》）。

② CC生：《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第1卷第2期。

于斯也”。这里已见陈、章日后政治分野之端倪。因为章氏一贯注意的是上层政制的改革，主张民主制，反对君主制；主张内阁制，反对总统制；主张联邦制，反对统一制；主张多党制，反对一党制等，相信只要执政者能“有容”，能“用才”，实行如此改革，中国就能长治久安。陈独秀则不然，他认为中国不能依靠执政者的觉悟来救国，但出路何在，他还在摸索。希望“外人分割”是何意，陈在后来《自觉心与爱国心》一文中有详尽的发挥。所以陈之写尽的“社会状态”，自然是当时“执笔终日的头号政论家”章士钊所不能言的。为此，章士钊后来叹道：陈独秀是“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①之一。

7月7日 为苏曼殊带来的章士钊著《双桧记》作序^②。

7月 应章士钊之邀，去日本协助章编辑《甲寅》杂志。同时入“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语^③。始识助章编辑《甲寅》的高一涵，以文会友识李大钊、易白沙^④。

8月10日 发表诗七首：《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游韬光》、《游虎跑》（二首）、《灵隐寺前》、《咏鹤》、《雪中偕友人登吴

① 《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第149页。

② 《甲寅》第1卷第4期。

③ 木田实：《坂口安吾待过的雅典娜法语学院》，转引自中岛长文《陈独秀年谱长编初稿》。雅典娜法语学院是木田实的母校，他在文章中回忆说“陈独秀也在雅典娜法语学院学了法语”。这是别人没有说过的新材料。由于地震和战争，该校迁移了地址，该校档案资料没有保存下来，因此无法查实，暂且存此一说。

④ 易白沙（1886—1921），名坤，字越邨，又称月村，湖南长沙人。自幼聪颖，16岁就主持安徽永绥师范学校，后又主持怀宁中学，任旅皖湖南中学校长。辛亥革命时，助韩衍组织“青年军”，韩任总军监，易与王肖山分任两个分监；初设三个队，韩、易、王分任队长。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1914年5月到《甲寅》杂志社工作，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翌年，与陈一起回国，曾助陈创办《青年》杂志。1917年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后去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执教。1919年返湖南。1921年端午节那天，乘轮船往陈村途中投海自杀。

山》^①。

8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李根源等在日本东京成立“欧事研究会”，陈独秀参加了该会。该研究会主要成员有黄兴、李烈钧、熊克武、钮永建、冷遯、程潜、殷汝耕、陈炯明、邹鲁、李书诚、谷钟秀、沈钧儒、李明杨等一百多人^②。对于该会的评论，诋誉均有。有人说这些人都因不同意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而从同盟会中分裂出来自成一派，未必尽然，陈独秀在该会中没有什么活动。后来，他评论“欧事研究会”时，称它是右派，以后又演变成为支持北洋政府段祺瑞的“政学会”^③。

9月 在日本江户，以“独秀山民”署名，为《双坪记》作第二篇序，忆亡友赵声、杨笃生、吴樾、陈天华、何梅士等，叹十年前中国国民党之零丁孤苦更甚于今日，赞颂赵等亡友“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精神，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不惜自戕以励薄俗”；“自感吾辈迂儒之隐忧得未少减，……坠落不堪，愧对亡友”。《序》还说“作者称此书为不祥之书，予亦云然。今以予不祥之人，叙此不祥之书，献于不祥之社会。书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作者及社会不祥之痛苦，予不获尽情痛哭道之者也，呜呼！”宣称同情章的观点，即“对国家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对社会主张个人之自由权利”；认为“团体（指国家——引者）之成立乃以维持及发达个体（指人民——引者）权利耳。个体权利不存在，则团体遂无存在之必要”^④。

11月10日 第一次用“独秀”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批

① 《甲寅》第1卷第3期。从这些诗的内容来看，都与杭州有关，显然是辛亥前陈在杭州教书时的旧作。

② 李根源：《雪生年录》第65页，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③ 陈独秀：《什么是国民党的左右派》，《向导》第137期。

④ 《甲寅》第1卷第4期。因怀宁境内有一“独秀山”，故用“独秀”、“独秀山民”笔名。

判传统的“国家观”，认为“土地人民主权者，成立国家之形式耳”；近世国家是指“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之中国，“民无建国之力”，即没有建设这种近世国家的自觉心；袁世凯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所以，文章在列数袁政府的罪恶后，惊呼“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保存恶政府”；“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文章是作者十几年为救国为革命奔波又不断遭到挫折后的总结，反映了无出路的苦闷，同时也标志着对新道路的探索（即中国的出路不在于“建设共和”、“君主立宪”的改革，而在于提高国民的“自觉心”。如何提高？还不清楚，以后创办《新青年》才逐渐明确起来。如胡适所说：“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①）。但是，陈在文章中表现的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急切盼望出现一个“为国人谋幸福”的国家的的心情，由于采用了“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及“正言若反”的表达方法（如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物，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引起不少人的误解。当时就有十余封信投向《甲寅》，诘问斥责，“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②。但是，数月以后，当章士钊发表文章^③来回答那些抗议信，为陈独秀辩护时，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了：由于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事件的发生，惊醒了国人；许多人对于陈的观点，由原来的

①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陈独秀评论选编》第29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③ 章士钊：《国家与我》，《甲寅》第1卷第6期。

责骂、抗议，转变为接受和推崇了，爱国心“渐次为自觉心所排而去”。梁启超就是一个。他说，如今“举国人眈眈作此想者，盖十人而八九也，特不敢质言耳”^①。李大钊说：有一友人，初批陈文“伤感过甚”而不以为然，后经燕京之行，再“悟其（陈独秀——引者）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所以章士钊盛赞陈独秀是“汝南晨鸡先登坛唤”。鉴于此，陈独秀对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②这大概就是次年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的萌芽了。

① 章士钊：《国家与我》，《甲寅》第1卷第6期。

② 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杂志》（未刊稿）。据郑说，陈独秀此话是对汪孟邹说的，汪又告诉了郑。汪在《亚东简史》中则回忆道：“他（即陈独秀）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1915年(民国四年 乙卯)

三十七岁

1月18日 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独占中国。

12月12日 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反对，悍然下令称帝，宣布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宣布云南独立，组织讨袁护国军，“护国战争”开始。

5月 《甲寅》自第一卷第五期起，移至上海出版。陈独秀为其选录四川吴虞的《辛亥杂诗》，并加注释^①，从此这两位“打倒孔家店”的名将发生关系。

6月20日 陈独秀参加汪孟邹等举行的“洗尘”宴会。因高君曼咯血、病重，汪孟邹写信催返，陈独秀于6月中自日回国^②，住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21号，与妻君曼、子延年、乔年、松年及女玉莹聚居。延年因不满父与君曼同居，常闹纠纷^③。陈独秀在上海组织安徽的革命者，积极进行倒袁活动，

① 《甲寅》第1卷第7期。陈独秀答吴虞的信，《新青年》第2卷第5号。吴虞(1871—1949)，字又陵，四川新繁人，1906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成都府中学堂教习。

② 《梦舟日记》第一本(1915.3.20—7.30)，上海历史博物馆藏。

③ 石原皋：《陈独秀生平点滴》，《安徽文史资料》1980年第1辑。

被人称“鲁肃”。柏文蔚从南洋捐了款汇来作活动经费，先后有十余万。吴稚晖回忆说：“黎元洪由副总统代任大总统时代的内阁，即定于上海霞飞路章(士钊)先生的宅内。陈(仲甫)先生却象演赤壁之战：章先生充做诸葛亮，他充做鲁肃，客散之前，客散之后，只有他徘徊屏际。”^①但是，倒袁以后的陈独秀，不再是“鲁肃”(别人的助手和秘书)，而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了。

7月10日 发表《远游》、《夜雨狂歌答沈二》诗及为晏鸾(苏曼殊)著的《绛纱记》作的序。自叙“予性懒惰，每日醜面进食，且以为多事，视执笔为文，宁担大粪”。叹曰：死与爱是“人生最难解之问题”。佛教之“十二因缘”说“不可说其究竟”，而耶稣之解释比佛教“妥帖而易施”^②。读者梁漱溟写了一封长信抗议此《序》“讥难佛理”。几年以后，梁又以一篇论佛理的文章，毛遂自荐于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得聘为教授，在北大讲“印度哲学”。不久，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名^③。

8月10日 《甲寅》发表李大钊的《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批评陈独秀《自觉心与爱国心》一文“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人心所蒙之影响“甚钜”。认为方今政象阴霾，众生厌倦，“作者之责在于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激吾民之觉悟”。又说陈独秀之文的言外之意，“未为牢骚抑郁之辞所尽也”，“欲寻自觉之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所以世人“赞可与否，似皆误解”。文章“申独秀君言外之旨”，认为：“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

① 吴稚晖：《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

② 《甲寅》第1卷第7期。

③ 梁漱溟，1892年生，广西桂林人，直隸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任司法部秘书，后来曾任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广东省立一中校长。

遂乃自暴自弃以倖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文章不同意陈的“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的观点，认为“国之存亡，其于吾人，亦犹身之生死”；“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灭”。主张“吾民今日之责：一面宜自觉近世国家之真意义，而改进其本质，使之确足福民而不损民。民之于国，斯为甘心之爱，不为违情之爱。一面宜自觉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谓所逢情势，绝无可为，乐利之境，陈于吾前，苟有为者，当能立致，惟奋其精诚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①。

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陈独秀自日返国后即积极筹备自办杂志，先找汪孟邹，因汪力量不足以承担印刷发行等事项，旋经汪介绍去找当时开办“群益书店”的陈子佩、陈子寿兄弟。后者乐意承担《青年杂志》的印刷和发行工作；双方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

发表《敬告青年》（《青年杂志》发刊词），继《自觉心与爱国心》之后，进一步论述国家兴亡决定于国民的觉悟和智能，即“自觉心”，希望则寄于青年身上：“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并且提出了衡量这种“敢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的六条标准，表明作者创办《青年杂志》的目的，在于为造就这种“新青年”——新型的国民，从根本上探求拯救中国之道而奋斗。自然，这时作者心目中的“新青年”的形象，犹如梁启超的“新民”一样，似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即“以个人为本位”（个人主义、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同时，文章在论述六条标准时指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表明《青年》一开始

^① 《甲寅》第1卷第7期。

就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文明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同时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译文《现代文明史》、《妇人观》及通讯《答王庸工(关于国体问题)》^①。

10月6日 汪孟邹致函胡适，介绍陈独秀与《青年杂志》：“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指汪自己——引者)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种。炼亦知兄校课甚忙，但陈君之意甚诚，务希拨冗为之所感幸。”^②

10月15日 发表论文《今日之教育方针》，提出建设“人民为主人，以执政者为公仆”的民主国家。同时发表译文《赞歌》、《亚美利加》(美国之歌)；与读者李平敬讨论学习法文问题^③。

11月15日 发表论文《抵抗力》，探讨了国民无“自觉心”的原因。同时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欧洲七女杰》；与读者李大槐、吕君等人讨论佛教等问题；为谢无量长律诗作按语；又

① 《青年》第1卷第1号。

② 胡适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存。此函说明陈独秀与胡适到此时才真正认识，前注吴相湘提出1906年《安徽白话报》时，陈、胡初识，似无足证。1914年章士钊在东京创办《甲寅》时，胡曾投稿，但稿件遗失，致章的信却刊了出来。信中提出了对中外文明如何结合的主张，认为输入之文明，需“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此意怀之有年，甚愿得明达君子之赞助”。这时陈独秀虽在襄助《甲寅》，但无证据证明弥与胡直接认识。然胡适其人及其主张，看来陈是知晓了。因此，他一办《青年》杂志就想约胡适的稿件。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5岁丧父，由寡母抚育，学家乡蒙馆。14岁到上海就学，入中国公学，接触新思想，加入竞业学会，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参与发行白话《竞业旬报》。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生赴美，曾入康乃尔大学习农科，后又转入文理学院，学哲学史等课程。1915年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从杜威学哲学，从此成为实用主义哲学的信徒。

③ 《青年》第1卷第2号。

编《汉译英文选》^①。

12月13日 汪孟邹复函胡适,谈到《青年杂志》二、三亦已寄呈,“陈君(独秀——引者)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将穷于应付也”。^②

12月15日 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与读者张永言讨论文艺问题^③。

在上述《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抵抗力》及答吕君信中,陈独秀反复强调了“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欧美日本之所以文化日进,不外竞起研求四字,岂有奇谋异术哉”。“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这表明陈此时在政治上接受以科学与民主为中心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同时,在理论上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① 《青年》第1卷第3号。

② 胡适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存。

③ 《青年》第1卷第4号。

1916年(民国五年 丙辰)

三十八岁

1月—5月中旬 黔、桂、浙、川、湘等省，先后宣布脱离袁政府独立；滇、黔、桂、粤四省护国军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抚军兼政务委员长。

袁世凯见各省反对帝制激烈，下令撤销“承认帝制案”，仍称大总统。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毙命。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请以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11月，梁启超附和康有为尊孔主张。

1月15日 发表《一九一六年》，号召国人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从一九一六年开始，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号召青年为三个目标而奋斗：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①。

2月3日 在美留学的胡适致函陈独秀：“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②

① 《青年》第1卷第5号。

② 《胡适：留学日记》(三)，商务印书馆1946年8月第3版。

2月15日 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继续宣传进化论思想，并强调政治制度的变革，要以国民觉悟为根本，“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指出国民觉悟为“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而以“伦理觉悟”为“最后觉悟”，即彻底破坏“儒者三纲”的等级制度，实行近世西洋之道德，自由平等独立。同时发表通信《答张永言（文学及人口）》^①。

《青年杂志》出至本号——第一卷第六号，因护法战争爆发停刊。

3月3日 赞同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会一封信，说《青年杂志》与他们的《上海青年》的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为此群益书社经理陈子寿赴陈独秀住宅商量，拟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商量时汪孟邹在座，汪也赞成改名^②。

3月10日 汪孟邹复胡适上月12日及25日来函：“青年杂志已出至五期，六期不日即出。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来函云新年中当有见赐，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务请吾兄陆续撰寄。”^③

5月21日 柳亚子致函徐梦鸥（南社成员），主张倒孔，推崇陈独秀说：“《新青年》杂志中陈独秀君巨著，宜写万本，读万遍也”^④。

① 《青年》第1卷第6号。

② 《孟邹日记》（1916年3月3日），引自：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2页。

③ 胡适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存。

④ 柳亚子：《南社》第20集，1917年7月。

柳亚子（1887—1958），名慰高，江苏吴江人，清末秀才，早年入上海爱国学社，后入同盟会。1909年与陈去病等创立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主持社务多年。

8月13日 复函胡适，告《青年》“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为《新青年》”；“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①。

9月1日 《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出版。陈独秀发表《新青年》，号召青年做“新青年”；“新青年”的标准是：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是“斩尽杀绝”“做官发财思想”，而“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以自力创造幸福，而“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同时发表通信《答王叔潜（政党政治）》^②。

9月18日 到汪孟邹处，赞助“亚东”与“群益”两书店合并改组，并愿为此北上，收集资本^③。

10月1日 发表《我之爱国主义》，进一步发挥《自觉心与爱国心》一文的主题思想，认为“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文章总结了作者早年革命活动的经验，指出：“为国捐躯之烈士，固吾人所服膺，所崇拜，会当其时，愿诸君决然为之，无所审顾；然此种爱国行为，乃一时的而非持续的，乃治标的而非治本的。”这种“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需具备“勤”、“俭”、“廉”、“洁”、“诚”、“信”数德；认为此数德才是使国立于不亡之地的“真正爱国之行为”。同时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批判康有为要求政府“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的主张。自此，作者高举打倒孔家店旗帜，发表了一系列反孔文章，其武器乃是“西洋文明”，“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同时还发表《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译文《现代文明史》及通信《答胡适（文学革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页。

② 《新青年》第2卷第1号。

③ 《孟邹日记》（1916年9月18日），引自汪厥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4页。

命)》、《答毕云程(反对悲观主义)》。还为发表吴稚晖《青年与工具》加按语,称吴“诚国民之模范,吾辈之师资。……全文无一语非药石”。^①

10月5日 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说:“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望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登之下期《青年》”^②。

11月1日 发表《宪法与孔教》论文一篇;与毕云程、莫英卿、一民、T. M. Cheng等通信讨论人生观、独身主义及禁止恶劣分子结婚、法兰西之文明及世界语等问题;为苏曼殊著《碎簪记》作“后记”^③。在答毕云程信中,解说了自己过去对国势悲观的原因及今后的决心,指出:“欧美之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然多教国人犹在梦中,而自以为是……。虽有极少数开明之士,其何救于灭亡之运命……。惟既生斯土,聊尽我心。一息尚存,寸心不懈。此可告于爱我责我之良友者也。”

11月2日 上午,与汪孟邹、陈子佩、陈子寿等人继续商议亚东与群益合并扩充事,认为首即资本问题,次即人材问题,然后方及内部如何组织之法。晚上,为苏曼殊饯行。

11月3日 晚间,与汪孟邹、陈子佩、陈子寿等人开会两次,拟二书店合并的“意见书”和“招股章程”。

11月5日 晚间,与汪孟邹、陈子佩、陈子寿等人同饮并开会三次,决定二书店合并的各种文稿。

① 《新青年》第2卷第2号。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5页。

③ 《新青年》第2卷第3号。

11月7日 晚间，与章士钊、汪孟邹、陈子佩、陈子寿等人同饮，并与章译商书店合并事。10日又为此事，与柏烈武、章士钊同饮共商。

11月23日 汪孟邹来访，决定26日北上。

11月26日 为“群益”与“亚东”两书社打算合并改公司之事，陈独秀与汪孟邹同车赴北京。27日，下榻天津大安旅社。28日，抵北京下榻前门中西旅馆。

12月1日 发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袁世凯复活》、《西文译音私议》论文三篇；与读者毕云程、萧山、孔昭铭、常乃惠等讨论进化、西学、古文和孔教等问题^①。

某日 走访北京大学，在校园内路遇沈尹默。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正好缺人，沈便把陈独秀正在北京的事告诉蔡元培^②。

12月26日 蔡元培来寓所拜访。汪孟邹说，这几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③。此时，蔡刚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次年1月4日到校视事），他力约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起初回绝说：“不干，因为正在办杂志，……”蔡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蔡后来回忆说：“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他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我对于陈君，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现听汤君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

① 《新青年》第2卷第4号。

② 引自沈鹏年：《鲁迅与〈新青年〉关系的两个史实》，《文汇报》1962年4月22日。

③ 《孟邹日记》，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6页。

探知陈君寓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①。

陈独秀回沪后对邻居岳相如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约定，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②后来，三个月后，接高君曼、陈松年和子美住北大，延年、乔年仍在上海。

①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

② 访岳丹秋(岳相如之子)记录，引自《陈独秀生平点滴》，《文史资料选辑》(安徽)1980年第1辑。

岳相如，农民出身，“岳王会”成员。1908年参加熊成基起义，任班长。辛亥革命时，参与策划皖北重镇寿县起义，率一路淮上军攻破北门。反袁斗争失败后流亡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甯里20号，与21号的陈独秀家相邻。陈赴北大就职时，岳还为他饯行。

1917年(民国六年 丁巳)

三十九岁

3月12日 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推翻沙皇专制政权，出现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两重政权并存局面。11月7日 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推翻临时政府，两种政权局面结束，建立苏维埃政府的统治。

6月12日 张勋拥戴废帝溥仪复辟，十天后失败。

8月4日 段祺瑞政府发布“对德宣战”。

1月1日 陈独秀发表《再论孔教问题》论文一篇，与读者吴又陵、褚葆衡、孔昭铭、T.M.Cheng 等讨论孔教问题，社会主义问题，独身主义问题，世界语问题的通信^①。

1月11日 蔡元培以北京大学名义，致函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函附陈独秀履历一纸^②。

1月13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以函字第十三号达北京大学，批准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贵校函开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文科学长之任，……当经本部核准在

① 《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1月1日。

② 原件存北京大学。

案，除令行外，相应函复”^①。随此复函附教育部长范源廉令乙件：

“教育部令第三号

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②

1月13日 汪孟邹复胡适上月1日来函，告独秀代胡适谋职等事：“炼于11月28号与仲甫一同抵京。……此间所招之股已达十余万元，尚可望有进步。此均烈武、秋桐、仲甫之力，合办之事决可成立矣……兄事已转达仲甫，已便代为谋就。子民先生望兄回国甚急，嘱仲甫代达，如能从速回国，尤所深企。关于此事，仲甫讯^③中已详，不多述也……”^④

1月×日 写信给仍在美留学的胡适，谓读《文学改良刍议》“快慰无似”，求胡“月赐一文，作或译均可”。还说：“蔡子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即北大校长——引者）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子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⑤

1月15日 蔡元培以校长名义发布第三号布告：

“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部令派陈独秀为本校文科学长。”^⑥

是月 到北京接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社随之迁到北京箭杆胡同9号，编辑室即住宅。不久吸收钱玄同、刘半农、沈

① 原件存北京大学。

② 原件存北京大学。

③ 即以下陈致胡适的信。

④ 胡适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存。

⑤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6页。

⑥ 原件存北京大学。

尹默等人参加编辑工作①。

1月19日 鲁迅寄给在绍兴的周作人十本《青年杂志》，从此，鲁迅与《新青年》及陈独秀发生关系②。

2月1日 发表《文学革命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举革命大旗的第一人，宣称：“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呼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并表示：“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③ 同时发表与陈丹崖、钱玄同、常乃惠、程演生讨论新文学、古文与孔教、国学与国文等问题，与叶挺讨论道德与科学问题的通信④。

春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罗致刘半农等人改革北大预科课程，实行白话文教学⑤。

3月1日 发表《对德外交》，在直皖两系围绕对德参战问题而发生的所谓“府院之争”中，采取拥护段祺瑞的对德宣战立

① 鲁迅在《呐喊》自序》讲到在他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前钱玄同（即金心异）约他写稿时说：“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

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幼从父读，13岁入翰墨林小学，17岁进常州府中学，辛亥革命时辍学，后任《中华新报》特约编辑员、中华书局编辑员等，1916年开始投稿于《新青年》，1917年在国立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后，因无学历，常受胡适奚落，于是在1920年留学英法，获法兰西国家文学博士学位，被推为巴黎语言学会会员，受法兰西学院伏尔内语言学专奖。回国后返北大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的导师，研究院文史部主任。

② 《鲁迅日记》（1917年1月19日）。据沈鹏年：《鲁迅和〈新青年〉关系的两个史实》（《文汇报》1962年4月22日）中分析，这十本《青年》可能是蔡元培或陈独秀赠鲁迅的。

③④ 《新青年》第2卷，第6号。

⑤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稿。

场,错误地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自由正义与军国主义的战争,即所谓公理与强权的战争;中国参加对德宣战,就是站在公理一边,中国参战一方面可以得到协约国的帮助,使中国国内能够“肃军纪、理财政、兴学奖业”,另一方面,还因“南北军人”共同参战会使双方“患难相依,混其畛域”。同时发表与读者钱玄同、蔡元培、佩剑青年、傅桂馨、常乃惠、淮山逸民、俞颂华、莫芙卿等讨论文学革命、宗教、孔教、儒教与家庭、时局、道德、青年修养、宗教与孔教等问题的通信^①。

3月17日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德育部举行的演讲会上发表演说,讲道德之概念及其学说与派别^②。

4月1日 发表《俄罗斯革命与我国国民之觉悟》及与读者方孝岳、常乃惠、曾毅讨论白话文、孔教、文学革命问题的通信^③。

《新青年》发表毛泽东署名“二十八划生”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也是毛、陈发生联系的开始。

4月9日 胡适致函陈独秀,谈文学革命问题,说:“适所主张八事及足下所主张之三主义”,“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陈独秀答复胡适,不同意与复古派“讨论”文学革命问题,说:“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

① 《新青年》第3卷,第1号。

② 同上,第3号。

③ 同上,第2号。

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①二者比较，胡适提出的“八事”是不成熟的具体意见，陈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是文学革命的纲领；胡适要求进行的是一般的“学术研究”“学术讨论”，陈独秀上升为一场伟大而深刻的革命。从两封信看态度，陈独秀比胡适更坚决，表明陈是文学革命真正的旗手和领袖。后来胡适也承认，“他（指陈独秀——引者）这种革命的精神，与我们留学生的消极态度，相差不知多少。他那时所主张的不仅是政治革命，而是道德艺术一切文化的革命！”“他这篇文章（指《文学革命论》——引者）有可注意的两点：（一）改我的主张进而为文学革命；（二）成为由北京大学学长领导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变成整个思想革命！”“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②

5月1日 发表与胡子承的通信。胡函盛赞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及其“思想革新”的主张，称“屡读大志，深佩卓识。此时吾国凡百事业，靡不失败，其大原因，皆由思想未曾革新致然”；“今先生所主张之救国主义，独从改革青年思想入手，此诚教育之真精神所寄。”“自来学说之力，足以左右世界；以先生之大雄无畏，推翻数千年来盘踞人人脑筋中之旧思想，而独辟町畦，以再造新中国，仆深信大志《新青年》出版之日，乃真正新中国之新纪元也。”同时发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在北京神州学会的讲演词）一篇；为刘半农著《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作后记；与读者刘竞夫、余元濬、俞颂华、钱玄同、李享嘉、胡子承、张护

① 《新青年》第3卷，第3号。

②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292—29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兰、李杰等讨论文学革命、孔教、青年杂志、译音、对德宣战、思想革命、国语研究、庄、墨、许的评价等问题的通信①。

是月 在《丙辰》杂志第三期上发表庚戌《感怀》二十首（诗）。

6月1日 发表《时局杂感》论文一篇，与钱玄同、胡适讨论世界语与古典文学问题的通信②。

7月4日 发表在南开大学的演讲稿——《近代西洋教育》问题；与读者李寅恭、新青年爱读者、吴又陵、顾克刚、卓鲁、钱玄同等讨论林园、孔教、政治思想、革命、改良等问题③。陈独秀在答顾克刚关于政治思想问题通信中说：“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④。

8月1日 发表《政局之根本解决》⑤及《复辟与孔教》论文二篇；与陶孟和、钱玄同、冯维钧讨论世界语、《新青年》改用横行印刷，读书等问题的信⑥。

8月9日 钱玄同拜访鲁迅，为《新青年》约稿。鲁迅应允。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回忆说：“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自此，鲁迅便与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关系，日益密切，约在翌年1月初，他参加了编辑部工作⑦。

① 见《新青年》第3卷第3号。

② 《新青年》第3卷第4号。

③④ 《新青年》第3卷第5号。

⑤ 《中华新报》1917年7月4日。

⑥ 《新青年》第3卷第6号。

⑦ 刘半农：《除夕》一诗及其注（2），《新青年》第4卷第3号。沈鹏年在《鲁迅和《新青年》关系的两个史实》一文中认为，鲁迅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应在1917年秋编辑部改组和扩大时。

9月17日 周作人将译稿《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交钱玄同,开始向《新青年》投稿。24日,在北京大学,周作人初识陈独秀^①,翌年1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

11月 李大钊由章士钊推荐来北大任图书馆主任。胡适进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

11月21日 约请胡适、沈尹默、黄振生、陶履恭、章士钊、陈大齐、钱玄同等开会,讨论改变文科课程。^②

年底 《新青年》因发行不广,书社企图“中止”;陈独秀等人与之交涉,才允续刊。^③

① 《周作人日记》1917年9月17日和24日,《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周作人的这篇译稿译自《北美评论》第717号,作者(英)W·B·特里脱,载《新青年》第4卷第1号。

② 《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1日。

③ 鲁迅致许寿裳的信(1918年1月4日)。

1918年(民国七年 戊午)

四十岁

2月 苏俄政府公告废除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

11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月初 召集《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决定改为同人刊物，宣布“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①；“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②。鲁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在会上第一次认识刚刚加入编辑部的李大钊。约从7月(第5卷第1号)开始，《新青年》采取轮流编辑办法，但陈独秀仍是总负责。这个办法为以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利用《新青年》这块阵地，举起“打倒孔家店”旗帜，宣传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

1月15日 发表与读者刘延陵讨论“自由恋爱”问题的信^③。

1月19日 加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的“进德会”。该会规定入会标准：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

① 《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4卷第3号。

② 《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71页。

③ 《新青年》第4卷第1号。

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

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六月三日《北京大学日刊》报导“进德会”选举评议员、纠察员事。报载陈独秀以 152 票、蔡元培 212 票、章士钊 111 票、王宠惠 81 票、沈尹默、刘师培 31 票被选为“进德会”评议员；李大钊以 61 票被选为“进德会”纠察员。

1 月 16 日 与沈尹默、周作人、王星拱、朱家骅等人向校评议会提议：1. 组织大学俱乐部；2. 划分大学区域；3. 制定教员制服等议案^①。

2 月 15 日 发表《人生真义》一文^②。

2 月 25 日 为胡适、郑阳和在北大发起的“成美学会”助款壹百贰拾元^③。该会宣布其目的是“协助德智优秀，身体健壮，自费无力的国立大学生”，为国家增进人材。

3 月 15 日 发表《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一文，《丁巳除夕歌》（一名《他与我》）诗一篇。同时，《新青年》上还发表了钱玄同与刘半农写的“双簧信”——《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和《复王敬轩》。

4 月 15 日 发表随感录三则：《学术与国粹》、《国会》、《元典》、又发表与钱玄同讨论中国今后文学的通信^④。

5 月 15 日 发表《有鬼论质疑》一文及答汤尔和关于学术思想问题的通信^⑤。同时，《新青年》还发表了鲁迅（周树人第一次使用这个笔名）短篇小说《狂人日记》。

6 月 12 日 担任北京大学入学试验委员会副主任，主任蔡

① 《新青年》第 4 卷第 2 号。

② 《北京大学日刊》1918 年 2 月 25 日。

③ 《新青年》第 4 卷第 4 号。

④ 《新青年》第 4 卷第 5 号。

元培。

6月15日 发表与张謇子、基督徒及崇拜王敬轩者讨论新文学与中国旧戏、讨论学理之自由权等问题的信^①。

7月15日 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提出三点国人彻底觉悟、急谋改革的主张：“排斥武力政治”；“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决定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强调改革旧思想旧文化的重要，指出：“国家现象，往往随学说为转移。我们中国已经被历代悖谬的学说败坏得不成样子了。目下政治上社会上种种暗云密布，也都有几种悖谬学说在那里作祟。”猛烈抨击康有为等人既想采用立宪共和政体，又提倡尊君的孔教等等守旧改良的思潮。同时发表随感录《韩世昌》、《自由正义与和平》、《科学与神圣》、《学术独立》、《阴阳家》。^②

8月15日 发表《偶像破坏论》呼吁“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同时发表《对 Esperanto 在学术的价值的意见》及随感录五则：《圣言与学术》、《基督教与迷信鬼神》、《社会制裁力》、《伪善者的基督教国民》、《信神保存国粹》；与孙国璋讨论有关世界语问题的信^③。

9月15日 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斥诘并批驳辜鸿铭（北大教授、前清遗老，长辫至死未剪）等人维护中国旧文化，抵制“西洋文明”的谬论^④。

9月25日 参加北京大学编译处会议，议定由陈独秀、胡适代表该处办理加入“法文学社”筹划法文名著翻译事项。

① 《新青年》第4卷第6号。

② 《新青年》第5卷第1号。

③ 《新青年》第5卷第2号。

④ 《新青年》第5卷第3号。

9月 毛泽东为联系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赴京，由杨昌济教授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当助理员，直到1919年初离京。在京期间，他拜访了陈独秀，胡适等人。毛泽东后来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①。

10月5日 汪孟邹复函胡适：“廿九号复书已悉一是，仲甫仍未来讯，盼念之至。……《新青年》过期太久，炼亦深不以为然。但上海印业，商务、中华不愿代印，其余民友各家尚属幼稚，对于《新青年》以好花头太多，略较费事，均表示不愿。目前是托华丰，尚不如前之民友。炼今日代群益向民友相商，子寿之意如可如期，决不惜费，奈民友竟一意拒绝，使人闷闷，拟明日更至别印所接洽。”^②。

10月15日 发表与胡适联名复易宗夔的信，不同意易所谓的文学革命只限于提倡“言文一致”而不必推翻孔学、改革伦理、破坏古文的主张。提出：“旧文学，旧政治，旧理论，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牵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③

秋 支持创办《新潮》杂志。当时傅斯年等北大学生为创办《新潮》缺乏经费事找陈独秀，陈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费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④。傅斯年原是北大

① 《西行漫记》第130页。

② 胡适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存。

③ 《新青年》第5卷第4号。

④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新潮》杂志在“五四”前是反对封建伦理和封建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刊物，“五四”后，随着其主任编辑傅斯年、罗家伦追随胡适，分化新文化统一战线，刊物也向右转。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913年入北大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即中文系)。五四运动后出国留学，1926年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总干事、北大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

保守派黄季刚派的中坚，这次转向时，陈独秀曾有怀疑，向周作人说：“他们可不是派来做奸细的么？”^①

11月14、15、16日 北大放假三天，在天安门外举行演讲大会，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28、29、30日又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演讲大会。发表演讲的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②。

11月15日 发表《克林德碑》，夸大义和团运动的落后面，称“义和拳”是“保存国粹、三教合一”；说这“造成了义和拳大乱；以义和拳大乱，造成了一块国耻的克林德碑”；“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但文章的出发点，乃在于批判导致中国遭耻的“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鼓吹“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③。对于本文中对义和团的错误观念，直到1925年写的《我们对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文时，才予以纠正。

11月27日 下午在文科学长办公室，召集《每周评论》创刊会议。参加者有李大钊、高一涵、高承元、张申府、周作人等。会议公推陈独秀为书记及编辑，其他人为撰述。后来胡适、彭一湖、张慰慈等人参加。发行所在骡马市米市胡同七十九号，编辑所在沙滩北京大学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④。张申府则回忆说：“为了发行比它（指《新青年》——引者）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就在五四的前一年（民国七年）十二月间，就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即所谓红楼的第一层的东南端），由李大钊与我与陈

① 《周作人回忆录》第256页。周评论说：“结果仲甫的怀疑到底是对的，他们并不是做细作，却实在是投机。”

② 《北京大学校史》第5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③ 《新青年》第5卷第5期。

④ 周作人日记（1918年11月27日）。高承元：《1912—1915年宣传民主革命之报刊》，《广东文史资料》第24辑。

仲甫三人共同商定，再办一个《每周评论》。这样，就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号编好，当夜就由李大钊与我，回到宣外大街印刷地点（即北京《晨报》所在地），从事校对。直到深夜四点，校完印好，……十二月二十二日，一张的《每周评论》的第一号，在北京街上出售了”^①。

12月14日 给周作人写信，告知《每周评论》已获准组办，已决定本月21日出版，要求他和鲁迅向该刊文艺时评栏投稿^②。

12月22日 《每周评论》创刊。《发刊词》为陈独秀所写。发刊词说：“《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还说：美国总统（威尔逊——编者）主张公理，反对强权，“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③。

12月22日 发表随感录四则：《两团政治》、《义和拳征服了洋人》、《战争的责任者》、《公仆变了家长》^④。

12月29日 发表《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提出，对外要求“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对内要求“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同时发表随感录四则：《大红顶子红缨帽》、《异哉搭现问题》、《野心》、《倒军阀》^⑤。

12月 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附设国史馆编纂处编纂股主任，编纂股的任务是编纂辑要中国通史，拟定纂辑条例，审定稿件等事项，又出任《北京大学日刊》编辑^⑥。

① 张申府：《五四运动的今昔》，《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张回忆的这次创刊会议，或许是上述周、高说的会议之后的另一次会议；或许是同一次会议，张记错了时间地点。

② 《周作人回忆录》第33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④ 《每周评论》第1号。

⑤ 《每周评论》第2号。

⑥ 见《国立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

年底 林琴南在《新申报》与《公言报》上发表文章，诋毁新文化运动。其中顶有名的《新申报》“蠡叟丛谈”栏上有林之《荆生》和《妖梦》两篇小说，专门攻击陈独秀为首的一班人。《荆生》中，说有个田必美、狄莫与金心异（影射陈独秀、胡适与钱玄同）三人，放言高论，诋毁前贤，被荆生听见，把这班人痛加殴打。荆生暗指徐树铮。《妖梦》中，说某人梦见这班非圣非贤的人，都给一个怪物拿去吃了，里边有一个叫元绪公的（暗指蔡元培）。林琴南攻击陈独秀等人，言语污秽，用心险恶。

1919年(民国八年 己未)

四十一岁

1月18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4月29日决定由日本接替德国在我国的特权。

3月4日 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列宁作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

7月25日 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放弃沙俄时期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2月20日 南北“和平会议”在沪开始。5月21日，“和议”破裂。

3月18日 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书》，对新文学运动和主张新文化的人公开挑战。蔡元培复信批驳。

4月 胡适发表《实验主义》，宣扬杜威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

5月4日 北京学生几千人游行示威，一致要求严惩亲日卖国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北洋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三十多人。史称此次学生游行示威为“五四”运动。这个运动由北京开始，很快发展到全国。

6月28日 巴黎和会闭幕。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10月 孙中山在日本宣布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

年初 亚东图书馆按照陈独秀的提议，从弄堂里搬到马路上——上海五马路（今广东路）棋盘街。陈对汪孟邹说：“你要死，只管还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上马路！”并且答应推荐亚东经理北京大学出版部的书籍^①。

1月5日 发表《国防军问题》（告四国银行团）一文；随感录五则：《又要制造民意了》、《军民分治》、《到底是那一团利害》、《得众养民》、《谁是匪》^②。

1月12日 发表随感录五则：《国防军》、《军人与官僚》、《武治与文治》、《尊孔与复辟》、《安徽小鬼》^③。

1月15日 负责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出版。轮流编辑的办法公布于众，本年度（第六卷）各期轮流编辑的名单是：第一号陈独秀、第二号钱玄同、第三号高一涵、第四号胡适、第五号李大钊、第六号沈尹默^④。

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和《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两文；与王喻雪、黄介石、吕激讨论摆脱奴性、修辞学、美术革命

①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7页。

② 《每周评论》第3号。

③ 《每周评论》第4号。

④ 《本杂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新青年》第6卷第1号。当时编辑部成员除上述六人外，还有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十人，自然都有参与轮流编辑的资格。因为本年只出六期，故只列了六人名单，有人就据此断定只此六人参与轮流编辑，似不确。周作人1918年10月21日日记，说钱玄同告诉他，参加明年分期编辑的有十二人：陈独秀、胡适、陶孟和、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刘半农、周懋慈、陈百年、傅××。有的可能在

等问题通信^⑤。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他坚定的表示：要拥护“德赛”（即“科学”与“民主”——引者）二先生，便不得不主张“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又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在《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一文中，借梁自杀一事宣传一个人为了忠于自己信仰去死是可敬可佩的。

1月19日 发表《除三害》，指出：中国若不除军人、官僚、政客三害，政治无清宁的日子；主张“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同时发表随感录《国民大会》、《鸦片与纸票》^⑥。

1月26日 发表《烧烟土》和《请问蒋观云先生》^⑦。

2月2日 发表随感录四则：《呜呼特别国情》、《公理战胜强权》、《揭开假面》、《谁的罪恶》^⑧。同时从本日起到4月20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我对国内和平的意见》，谈废督、裁

1918年已编辑过，有的则计划安排在以后。沈尹默在《鲁迅生活中的一节》一文（《文艺月报》1956年第10期）中也讲到，参加轮流编辑的有“鲁迅兄弟”。周作人讲的轮流名单中，虽无他自己，却有刘半农。原定沈尹默编的第6号，沈请刘半农、钱玄同代编。

⑤ 《新青年》第6卷第1号。

⑥ 《每周评论》，第5号。

⑦ 《每周评论》，第6号。

⑧ 《每周评论》，第7号。

兵、国会、国防军、宪法等问题，对国内政局充满幻想，要求上海“和平会议”“把解决国家的重要根本问题，造成比较的永久和平为目的”；宣称：“照我们的理想，是反对战争，是完全去兵主义。”奉劝各督军“自动放弃权位”，五年内把兵“裁尽”，取消国防军。甚至说：“若是我们国民没有自救的力量，就用最后手段来请外国干涉，也未始不可。”^①这表明他这时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在政治上却是十分糟糕的。

2月5日 发表《汉译英文选》，由上海益群书社出版。

2月9日 发表随感录四则：《威大炮》、《公理何在》、《光明与黑暗》、《特别国情》。他在《威大炮》和《公理何在》的两则随感录中，改变1918年12月《每周评论》发刊词中欢呼“公理战胜强权”，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观点，愤怒地质问巴黎和会：“公理何在？”同时把威尔逊斥为只以“好话”骗人，实际并不实行的“威大炮”。

2月15日 发表《再问东方杂志记者》^②。

《新青年》编辑部发表启事：“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③

2月23日 发表随感录五则：《司令部土多》、《信实通商》、《理想家那里去了》、《第一次警告》、《不准百姓点灯》^④。

3月2日 发表随感录四则：《旧党的罪恶》、《中日亲善》、

① 《每周评论》第7号至11号，第18号。

②③ 《新青年》第6卷第2号。

④ 《每周评论》第10号。

《亡国与卖国》、《铁道管理问题》^①。

3月9日 发表《人种差别待遇问题》一文；随感录七则：《亡国与亲善》、《欢迎英美舰队》、《陕西问题》、《不忘日本的大恩》、《日本人的信用》、《日本人与曹汝霖》、《国际管理与日本管理》^②，一面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一面对英美帝国主义怀抱幻想，宣称英美舰队来东洋，“是东洋一线光明的希望。因为我们东洋各国的国民，都被本国的军阀压迫得无路可走，不得不希望有别的救星”。联系到此前他主张“请外国干涉”来救中国的主张，说明他用优胜劣败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社会政治，作了极端荒谬的结论。

3月10日 胡适致函《北大日刊》辟谣：“这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一种谣言，说文科陈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并说陈学长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愈传愈远，竟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③

3月16日 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指出国政党因为反对《新青年》，便对北京大学造谣，因为《新青年》反对孔教和旧文学，抨击林琴南及《神州日报》通讯记者张厚载，“决不拿出自己的知识本领来正堂堂的争辩，总喜欢用‘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同时发表随感录四则：《东局千零十三号》、《参战军》、《亚洲的德意志》、《爱尔兰与朝鲜》^④。

参加北京大学学余俱乐部成立大会，并成为会员^⑤。

① 《每周评论》第11号。

② 《每周评论》第12号。

③ 《北大日刊》第328号。

④ 《每周评论》第13号。

⑤ 《北大日刊》第334号。

3月19日 蔡元培发表《致神州日报函》，为陈独秀“辞职”等事辟谣：“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座），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非“下学期之说”^①。但是，七天以后，即三月二十六日，蔡便召集“关系诸君”到北京医专汤尔和处，商讨学校事。开始，蔡颇不愿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汤则以所传陈嫖妓之流言，猛烈攻击陈“私德太坏”。蔡因是“进德会”的倡导者，遂为汤议所动，决定撤陈。此事很快传到社会上，许多报纸刊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已辞职”之消息。于是，四月八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决定提前实行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这样，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无形取消。汤尔和在这件事情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四月十一日，汤尔和回寓途中遇陈独秀，见陈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胡适评论此事时，也诧怪道：“小报所犯，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他还疑心是沈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陈独秀的局面，汤尔和不察，做了他们的“代言人”。后来胡适致函汤尔和说：“当时外人借私行攻击陈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坠奸人术中了。”胡适在评论这夜撤陈会议时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

^① 《北大日刊》第348号。

然子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汤尔和——引者),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汤复函不以为然,说“陈君当然为不羁之才,岂能安于教授生活,即非八年之事,亦必脱鞴而去”。胡适又复函反驳说:“独秀终须去北大,也许是事实。但若无三月廿六日夜的事,独秀尽管仍须因五月十一夜的事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①

3月23日 发表《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和《为什么要南北分立》两文,又发表随感录七则:《你护的什么法》、《和平的根本障碍》、《中国的李完用宋秉峻是谁》、《希望各国干涉》、《莫做傀儡》、《何人的命令》、《停止纳税》^②。

3月30日 发表随感录三则:《更加肉麻》、《林纾的留声机器》、《日本人可以在中国随便拿人吗?》^③

4月6日 发表随感录八则:《冤哉洪述祖》、《南北一致》、《纲常名教》、《中国和平的障碍》、《太监与缠足》、《安徽省议会的笑话》、《婢学夫人》、《倪嗣冲的儿子》^④。在《纲常名教》短文中,声称:“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

4月7日 汪孟邹致函胡适:“仲甫去职,已得他来讯。旧党当然以为得势,务望兄等继续进行,奋身苦战,不胜盼念之至。”“《新青年》四号起决就北京印订,与子沛函亦已阅悉,子沛

① 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1—283、289—291、294页。

② 《每周评论》第14号。

③ 《每周评论》第15号。

④ 《每周评论》第16号。

今日已函复矣。”^①

4月13日 发表随感录十一则：《衍圣公和张天师同声一哭》、《不可思议的新旧思潮》、《林琴南很可佩服》、《关门会议》、《国民参预政治外交的资格》、《文治主义原来如此》、《美国也有军械借款吗？》、《形式的教育》、《议长串通卖矿》、《怪哉插径班！》、《预定的计画》^②。

4月15日 发表《我们应该怎样？》（录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③。

4月20日 发表随感录八则：《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多谢倪嗣冲张作霖》、《伤寒病和杨梅毒》、《土匪世界》、《却没有了自己》、《四大金刚》、《世界第一恶人》、《毕竟南方军人有良心》^④。在本年一月份，陈独秀曾反对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⑤。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开始改变对十月革命的看法，认为它“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又在《各国农劳界的势力》一文中说：“自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后，欧洲劳农两界，忽生最大的觉悟，人人出力和资本家决斗，他们的势力已经征服了好几国”。“这种革命，在政治史上算得顶有价值的事体”^⑥。

4月27日 发表《贫民的哭声》^⑦，说自己充满感情的听到了那受压迫和饥饿煎熬的《贫民的哭声》，并且坚定预见现在

① 胡适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存。

② 《每周评论》第17号。

③ 《新青年》第6卷第4期。

④ 《每周评论》第18号。

⑤ 《每周评论》第4号《国外大事述评》。

⑥ 《每周评论》第18号。

⑦ 《每周评论》第19号。

哭着的贫民，有一天会起来，叫那些让他受压迫和贫困的统治者“发出同样的哭声”。同期《每周评论》又发表随感录九则：《苦了章宗祥的夫人》、《怎么商团又要“骂曹”？》、《陆宗輿到底是那国的人？》、《再看江庸的戏》、《法律是什么东西？》、《干政的军人反对军人干政》、《破坏约法的人拥护约法》、《克伦斯基与列宁》、《南北代表有什么用处？》^①。

5月4日 发表《孔教研究》及随感录八则：《护法？丑！套狗索！》、《护法吗？要钱！》、《发财的机会又到了！国民怎么了？》、《共同管理》、《我国》、《两个和会都无用》、《何苦瞎打通电！》、《梅兰芳》^②。自本年一月，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反击反动势力对新文化运动及此一运动的主要成员攻击以来，北洋政府、反动议员、腐朽卫道文人更加猖狂攻击《新青年》和陈独秀本人。这一时期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这两个姐妹刊物，曾以“通信”和“特别附录”，“这是什么话”等专栏形式，对反动势力组织声势浩大的反击，大量摘要转载全国有影响的报纸发表的谴责北京军阀政府和林琴南、声援陈独秀的文章。所有这些，包括这时期陈独秀自己写的战斗檄文，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做了思想、舆论等方面的准备。“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从1919年5月11日起，他和李大钊一起，在《每周评论》上组织舆论支援学生的斗争，开辟“山东问题”专栏，报道和评论山东问题交涉经过，及时总结运动的情况和经验，指导运动的发展。

5月7日 致函胡适，通报北京“五四”情形及各方面的反映^③，“五四”运动后期，胡适料理母丧后回京，他反对罢课，要

① 《每周评论》第19号。

② 《每周评论》第20号。

③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41—42页。

求学生复课，继之，又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征求签名者。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陈独秀知道后，把傅、罗叫去训了一顿，此事遂告寝^①。

5月11日 发表《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指出国民斗争的矛头应该指向卖国政府，而不要仅仅局限于曹章陆等几个卖国贼^②。

5月18日 发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指出：“万万不能把山东问题当做山东一省人的存亡问题”；号召全体国民起来救亡，“无论是学界、政界、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同时发表《山东问题与上海商会》^③。

5月26日 发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呼吁“国民因为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不能单纯依赖公理；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主张以强力拥护公理，依平民征服政府。同时发表随感录：《卖国都有凭据吗？》、《对外圆满，对内统一》、《只有叹气！》、《自家人不及外国人》^④。

6月1日 发表《对于日使照会及段督办通电的感言》一文，又随感录七则：《冤哉〈益世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盟会与无政府党》、《日本人那有这种斗胆！》、《日本参谋部与谢米诺夫》、《别得罪亲日派》、《北京十大特色》^⑤。

6月8日 发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又随感录十四则：《立宪政治与政党》、《六月三日的北京》、《吃饭问题》、《爱情与痛苦》、《护法总裁的名誉》、《南北一致》、《象煞有介事的

① 许德珩：《我和陈独秀》，《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

② 《每周评论》，第21号。

③ 《每周评论》，第22号。

④ 《每周评论》，第23号。

⑤ 《每周评论》，第24号。

钮永建》、《到底还是伍老头子有良心》、《研究室与监狱》、《章宗祥还不算顶坏的人》、《可怜大折其本》、《政学会与桂系》、《西南简直是反叛》、《丑学生丑教育界》^①。鉴于“六·三”以后，北京政府加紧迫害爱国学生，陈独秀撰写了《研究室与监狱》，鼓舞人们在与反动政府斗争中要有不怕坐牢杀头的大无畏气概^②。“出研究室就入监狱，出监狱就入研究室”成了当时有志青年的座右铭。

6月9日 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并到北京大学一个平时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付印^③。《宣言》宣称：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 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及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 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 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
4. 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 市民需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④。

6月10日 拿着《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到中央公园（即今北京中山公园）等地散发。

① 《每周评论》，第25号。

② 《每周评论》，第25号。

③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文史资料选集》，第61期。

④ 京师警察厅档案。

6月 京师警察厅密令各区署严密监视陈独秀：“据探报陈独秀等以印刷物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等情，并在大沟头十八号设立印刷机关实属妨害治安，立即按照所开地址，分别按名严密监视，并将该印刷机关派员检查，以遏乱萌，除分行外合亟令仰该署、队遵照立即办理。”下开列“陈独秀 闻住中一区界内未知确否”；“李大钊 北大图书馆主任”，以及邓康、陈为人等名单和住址①。

6月11日晚，在散发传单时被捕。这次，他又约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邓初到香厂新世界去散发。陈独秀爬上新世界屋顶花园，向下一层露台上看电影者散发时，守在屋顶花园里的一伙暗探把他抓住②。

陈独秀被捕，引起全国震惊，对政府之反动更引起全国各界爱国人士愤怒，纷纷发电、致函北京政府各有关方面，要求释放。在陈被捕后的两周内，有北京学生会、上海工业协会、江苏教育会、学商界及和平联合会各省公会、国民大会上海干事会、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纷纷致电致函北京政府有关部门，强烈要求释放陈独秀。章太炎、章士钊等人都致电营救。

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等刘师培、马裕藻、马叙伦、程演生、王星拱、马寅初等几十位教授，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查陈独秀此次行动果如报纸所载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愚悃〔惘〕，夙仰钧厅维持地方向主息事宁人，商学各界钦感同深，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以示国家爱

① 京师警察厅档案。

② 京师警察厅档案：《外右五区警察署送案表》法字第12号。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申报》，1919年6月15日。

护士类曲予裁成……俯准将陈独秀交保省释。”^①

安徽省长吕调元亦致电警备司令部段香帅警察总监吴总监：“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绝与过激无涉。闻在京被捕，此间人士爱护学者，群请解救。学潮初定，似不宜又兴文字之狱。两公容纳众流，夙所钦仰，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以慰士望。”^②

6月14日“京师警察厅”，以《公告》形式公布陈独秀被捕情形及陈被捕后并未“遭辱”，以图缓和舆论，公告说：“为布告事，照得国家多事之秋，舆论最关紧要，值此时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人心动摇，已达极点，若无正当舆论维持，其间则略加蛊惑之词，前途亦不堪设想。本厅负责维持地方之责，治安二字，刻不能忘，是以迭次布告，各报馆对于一切言论，均宜以正当确实为主。乃阅本月十三号该报（指《国民公报》——引者）新闻栏内，登陈独秀被捕一段，事实既多不符，言语又近鼓吹，殊属令人不解。查十一日晚，有人在新世界散布市民宣言传单，系被侦缉队便衣侦探及步军统领衙门密探当场拿获，交由警察厅，彼时在场各界人士，共见共闻，并不知其为何如人，亦不知其系何名姓，迨再三请问，始说出姓陈，在北河沿箭厂（原文为此——引者）胡同居住，当即速派厅员带同巡官长警数名前往该宅。会同步军统领衙门官员，慎重检察，对陈之眷属仆役人等，极其文明和平，陈之妻业已具结，并未受何等惊扰，此当日实在经过情形。该报馆谅早闻知。乃是日报所载一则曰：‘近日外界发布之市民宣言传单，政府疑为陈氏所发；再则曰：政府认为此次学生风潮发难于北京大学，皆陈君鼓吹新思想所致，故有拘捕之举’。既云外界传说，未敢悬断，而又以陈君为新思想界负有盛名之人，因遭忌

^{①②} 京师警察厅档案：《陈独秀被捕卷》。

而遭辱，故作此依稀惆怅之语炫惑众听，殊属非是。查市民宣言传单，已为学生界所否认，并据总商会及教育会请求查禁各在案。本厅派人访查缉获，乃出于维持市面之一种正当手续。且派赴陈宅检察人数不过八九人，提署人员仅十余人，而该报竟捏登军警数百余人，并加荷枪包围等字样，似此鼓动人心，殊与治安有碍，除布告各报馆外，合行布告。报馆嗣后对于此等案件，勿得妄加臆语感人听闻。此布。”^①

6—8月 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也避难出京。《新青年》编辑部内部分化加速，胡适乘此接办《每周评论》的编辑工作。第26期竟取消原刊头而代以“杜威演讲录”五个特大号字；并从此起，取消“国内大事述评”、“国外大事述评”专栏，取消反映当前政治斗争的报道和评论文章。接着在第31期《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向正在中国兴起与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发起了攻击，向反动派表示他与陈、李并非一伙。但反动当局仍不放过，迫使《每周评论》于8月31日停刊。8月17日，李大钊发表致胡适公开信《再论问题和主义》，批驳胡适的观点，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②

6月29日 胡适发表随感录《爱情与痛苦》，说陈独秀被捕已有半个多月，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③

① 《民国日报》1919年6月17日。

② 《每周评论》第35号。

③ 《每周评论》第28号。

7月9日 广州军政府总裁之一岑西林(8月21日被推为主席总裁)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和代总理龚心湛,请释陈独秀。因欲与南方谋和,徐主张从速开释陈独秀^①。

7月13日 《每周评论》(第30号)发表李辛白的诗:《怀陈独秀》: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同期还发表署名“赤”的随感录《入狱——革新》,称“陈独秀在中国现在的革新事业里,要算是一个最乾净的健将。他也被囚了,不知今后中国的革新事业更当何如”。

还发表李大钊写的随感录《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说:“有一位爱读本报的人来信说: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生活,都是瞎子。亏了贵报的‘只眼’,常常给我们点光明。我们实在感谢。现在好久不见‘只眼’了,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②

7月14日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并在创刊号上撰文《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称誉陈是“思想界的明星”,说他被捕“无非是为着‘赛因斯’和‘德莫克拉西’”。

9月1日 胡适为《每周评论》被封事,与虞春汀去见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吴劝胡不要办《每周评论》了,要办报,可以另起报名。胡答应,了事^③。

9月16日 下午四时出狱。因“被警厅拘禁已历三月有

① 《神州日报》1919年7月9日。《申报》1919年7月15日。

② 《每周评论》第35号。

③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8页。

余，近者警厅侦查结果，终不见陈氏有何等犯法之事，而陈氏近日在厅因久失自由，因而发生胃病”，遂由安徽同乡保释^①；但行动仍受限制，重大行动须得政府批准。

北大校内评议会乘蔡元培出走，正式批准陈独秀辞去文科学长之职^②。陈转而被聘为国史馆编纂。

9月21日 李大钊发表白话诗《欢迎仲甫出狱》，赞扬陈“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欢呼“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象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③

10月5日 下午，在胡适寓所召集《新青年》编辑部会议。由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号”集中刊登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引起胡适的恐慌和不满。胡在会前对沈尹默等人说：“《新青年》由我一个人来编”，反对大家轮流编辑，再度想独揽编辑权。鲁迅对沈尹默说：“你对适之讲，‘也不要你一人编。《新青年》是仲甫带来的，现在仍旧还给仲甫，让仲甫一人去编吧’”于是会议决定，《新青年》自第七卷第一号起，由陈独秀一人来编^④。

10月12日 参加欧美同学会成立周年纪念会并致词^⑤，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然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欢迎许德珩、陈宝铎赴欧勤工俭学的茶话会^⑥。

11月1日 《新青年》第6卷第6号因陈独秀被捕拖延四个月后出版，重新发表李大钊《欢迎独秀出狱》及刘半农《D—1》

① 《陈独秀恢复自由》，《晨报》，1919年9月17日。

② 《周作人回忆录》第137页。

③ 《新生活》第6期。后来在《新青年》上发表时，改题为《欢迎独秀出狱》。

④ 《周作人日记》（1919年10月5日），《周作人回忆录》第338页。《访问沈尹默谈话记录》（未刊稿）。

⑤ 《国民》第2卷第1期。

⑥ 许德珩：《我和陈独秀》。

诗,赞扬陈独秀(即“D”)对权威的反抗。

11月2日 撰《实行民治的基础》,主张中国的民治,以“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宣称:“我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①。

11月10日 刘申叔病逝。陈独秀主持丧事,在参加葬礼时对陈钟凡^②说:“校中现已形成派别,我的改组计划已经实现,我要离开北大了。”自从辞去文科学长之后,又拒绝蔡元培叫他任史学系教授的邀请,开始专心从事社会运动^③。

11月15日 作《答半农的D—!诗》,感激大家在自己入狱期间对自己的支持和称道,认为生死苦难都不足道,“重大问题”在于“创造”^④。

11月22日 发表《论“的”底用法》^⑤。

11月30日 北京学界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召开李超女士追悼大会,陈独秀发表演说^⑥。

是月 与瞿秋白一起创办《新社会》旬刊的郑振铎等人,到箭杆胡同拜访陈独秀,请教办刊物的方向和社会改革运动。陈提出希望《新社会》办成给劳动界灌输新思潮的通俗报纸;社会改造运动要做切实的工作,不要说空话等等。

① 《新青年》第7卷第1期。

② 陈钟凡(1883—1982),江苏建湖人,1913年入北大哲学系,1917年任北大预科国文教员,后一直在高校任教,精通文学和文字学,常与陈独秀切磋,关系密切。

③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稿)。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16页,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陈、杨当时都是陈独秀的学友,帮助陈独秀料理刘的丧事。

④ 《新青年》第7卷第2期。

⑤ 《晨报》1919年11月22日。

⑥ 《晨报》1919年12月1日。

12月1日 发表《新青年》宣言，宣布《新青年》同人“公共意见”：“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辗转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同时为潘力山著《论新旧》写附识，发表随感录《“笼统”与“以耳代目”》、《法律与言论自由》、《过激派与世界和平》、《调和论与旧道德》、《留学生》、《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①及《告北京劳动界》^②。

12月4日晚，在东兴楼饭庄，与沈尹默兄弟、马寅初、周作人等人，为刘半农、潘力山饯行^③。

12月11日 发表《对于国民大会的感想》^④。

12月17日晚，与李达、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参加“新潮社”在香厂浣花春举行的聚会^⑤。

12月31日 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与支那未知的友人》一文作附记^⑥。

冬 支持恽代英在武昌创办的“利群书社”和翌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分别为这两个书社向亚东图书馆作了三百元营业额的担保。

12月 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通过陈炯明的倡议，拨关余一

① 《新青年》第7卷第1期。

② 《晨报》，1919年12月1日。

③ 《周作人日记》（1919年12月4日）。

④ 《晨报》，1919年12月11日。

⑤ 《周作人日记》（1919年12月17日）。

⑥ 《新青年》第7卷第3期。

百万元创办西南大学，委托章士钊、汪精卫为筹备员。章、汪又邀蔡元培、吴稚晖、陈独秀加入，章电陈独秀，请其来粤共同担任，并又函托蔡元培促陈上道。陈复电章士钊，答应担任，约先行至沪，然后转轮赴粤。章拟不日赴沪，与陈会见^①。

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翌年一月，在《新青年》上又与蔡等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②。

① 《民国日报》1919年12月23日。

② 《新青年》第7卷第2号，《民国日报》1920年3月25日。

1920年(民国九年 庚申)

四十二岁

2月7日 苏俄在伊尔库茨克处死高尔察克，日、英、美等国干涉军纷纷撤出西伯利亚，中俄边界交通正式打开，为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7月19日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草案)》起草的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支持民族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

9月27日 苏俄发布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第一次宣言的立场，深惜中国政府延搁两国的接近，促早日缔结中苏友好条约。

2月 《改造》杂志出《社会主义研究》特辑，引起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论战。

3—4月 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在中国发表，引起巨大反响，全国三十一个社会团体发表谢电。

4月13日 苏俄政府代表来华，北京政府不予接待，但因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影响，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8月 孙中山令粤军陈炯明讨伐桂系，并将其赶出广州，重组军政府。

1月1日 发表《自杀论》及随感录十则：《〈浙江新潮〉——〈少年〉》、《新出版物》、《保守主义与侵略主义》、《裁兵？发财？》、《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阔处办》、《青年体育问题》、《约法底罪恶》、《男系制与遗产制》、《解放》^①及《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的功课》^②。

1月4日 发表《祝窝窝头会》^③。

1月5日 发表《欢迎湖南人的精神》^④。

1月18日 与蔡元培一起到北大三院参加北大学生所组织的平民夜校开幕式，并发表演说，阐明平民主义及互助博爱主义。此夜校已有六百二十余人。校址在北大二院^⑤。

1月28日 陈延年和陈乔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月29日 应西南大学筹办员汪精卫、章行严之邀，抵达上海，亦任西南大学筹办员^⑥，住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原柏文蔚的住宅。

2月1日 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主张对基督教一分为二，“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即“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培养在我们的血里”，补救“中国文化的缺点”——“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同时发表与虞杏村、臧玉海、明慧讨论教育、林纾与育德中学、妇女选举权等问题^⑦。

2月2日 乘“大通”轮由沪去汉，四日下午抵汉口，住文华

① 《新青年》，第7卷，第2号。

② 《星期评论》，第31号。

③ 《新生活》，第20期。

④ 《独秀文存》，卷一，第651页。

⑤ 《申报》1920年1月22日。

⑥ 《民国日报》，1921年1月31日。

⑦ 《新青年》第7卷，第3号。

书院。与陈同时抵汉的还有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顾文华（奉天凤城人）、刘大渠（安徽合肥人）。北京学联代表赴汉任务是“为京津沪联合同学齐集北京开国民自觉大会，促政府根本觉悟”^①。

2月5日 应武汉学联文华学生协进会之邀，在文华学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主张社会改造方法是：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二、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信仰是：平等，劳动^②。

2月6日 应文华书院（又称文华大学）孟校长邀请，参加该校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说：“学校教育多属于智识之教育，而情感教育则不多。情感云者，即牺牲自己帮助他人之谓也”；贵校系基督教徒所设立，耶稣基督惟其能牺牲自己一切，所以为世界之模范^③。

2月7日 应汉口青年会会长彭厚斋邀请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的精神》，主张教育要用新方法：一、教育要趋重社会；二、要注重启发的教育；三、要讲究实际运用。参加听讲者有各界人士和议会议员^④。

会议毕，接见参加会议的议会议员刘俊夫等五人，交换教育方面的意见，主张“吾国欲图教育事业发展，须行强迫教育之制，东西各国行之既久，足以富强我国”；“观于欧战之所见，每以国民识之多少影响于战斗力”^⑤。“湖北官吏对于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去武汉”^⑥。陈独秀“深愤湖北

① 《国民新报》，1920年2月7日。

② 《国民新报》，1920年2月12日。

③ 《汉口新闻报》，1920年2月9日。

④ 《国民新报》，1920年2月7日。

⑤ 《国民新报》，1920年2月12日。

⑥ 《汉口新闻报》，1920年2月9日。

当局压迫言论自由”^①。

下午三时，应邀参加堤口下段保安会召开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讲，希望武汉国民“尊重国家”，“考求生计”；“提倡国货而对于外交取一致行动”，“扩充实业以裕民生”。会后，又参加该保安会小范围的讨论会，谈及自治问题，主张武汉市参考美国城市的自治办法实行自治。散会时已七点钟。随后应武昌学界周春煦、李慕琪、吴国干等宴请于普海楼，席间畅谈文字问题，主张中国文字实行“注音字母”。宴会毕，直去大智门乘车北上^②。

2月中旬 返京时为避北京政府再次拘捕，由李大钊、高一涵至车站接送至王星拱家暂避，然后由李护送至津去沪。

据高一涵回忆：陈独秀九月十六日被释放出狱后，并无真正的行动自由。但陈却未经许可去上海、武汉。当北京当局从武汉《国民新报》发现陈的演讲时，才知道他已不在北京。此时，北京政府派了警察在陈寓所北池子站岗，企图等陈一回到家再将他逮捕，但陈在返京抵西车站时，就有李大钊、高一涵把他接到王星拱家暂避。后有李大钊护送天津，由天津乘船前往上海。“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同志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同志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③。

① 《汉口新闻报》，1920年2月9日。

② 《国民新报》，1920年2月13日。

③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

2月11日 发表《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①。

2月12日 发表《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②、《强迫教育谈》^③。

2月13日 发表《国语谈》^④。

2月14日 致函京师警察厅吴总监：“夏间备受优待，至为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仄，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为面谢，敬请勋安。”^⑤

2月×日 陈炯明专电：“西南派陈独秀襄办学务，请查释保护出京”^⑥。27日，国务院致函京师警察厅：“迳启者，准漳州陈炯明电开，此次提议西南创办大学，经函约陈独秀来与议，顷闻陈君在京被羁，殊与筹办大学有所障碍，希迅飭保护出京赴沪并往惠覆等语，查陈独秀是否被羁在京，暨所称是否托词，相应录原文函达，贵厅查酌见复可也。”^⑦

2月19日 到达上海，并趁候船赴粤之际，发表谈话，称“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之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悬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对于汪精卫、章士钊、吴稚晖提出的西南大学设址上海租界及在巴黎办中国大学的主张，陈独秀表示绝对反对，认为若此即“失其独立根性，办成以后，有何

① 《晨报》，1920年2月11日。

② 《晨报》，1920年2月12日。

③ 《国民新报》，1920年2月12日。

④ 《国民新报》，1920年2月13日。

⑤ 京师警察厅档案：《陈独秀被捕卷》。

⑥ 《时报》，1920年2月23日。

⑦ 京师警察厅档案：《国务院秘书厅台函第75号》。

价值”^①。

2月 因为要想一个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的法子,陈独秀、王光祈、毛泽东等人发起组织上海工读互助团,并向各界募捐筹备费一千元^②。27日,陈独秀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召开的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到会的发起人还有王光祈、汪孟邹、张国焘、刘清扬、戴季陶、沈玄庐、彭璜等二十余人,首先由彭璜报告开会宗旨,接着,陈独秀发言,指出先要认定工读互助团宗旨,然后方定得章程。工作种类,陈提出印刷装订;彭璜、肖子璋提出开饭店、洗衣两种普通工作;陈又提出种菜工作。众赞成通过。读的问题,或复旦旁听,或请人教授法文等课^③。

2—4月 在上海亚东图书馆暂居处,多次会见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人,宣传马克思主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彻底推翻军阀主义^④。

3月1日 发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⑤。承认马克思主义“在鼓吹一种理想实际运用的时候,……很有力量、价值”,“有一方面的真理”,它对于社会是“一种救济的学说”。同时,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包医百病的学说”,它“在

① 《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

② 《申报》1920年3月5日。

王光祈(1892—1936),字润珩,四川温江人,1914年到北京入中国大学读法律,1918年6月毕业后,先后任成都《群报》和《川报》驻京记者,受到北京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潮的影响,尤其崇信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1919年7月1日,他与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并任执行部主任。年底,又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支持下,参与发起组织北京工读互助团。1920年3月,赴上海参加各界联合会联席会议,并在会上参与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

③ 《申报》1920年2月29日。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82页。

⑤ 《新青年》第7卷第4号。

我们学术思想进步上，在我们讨论社会问题上却有很大的阻碍”。

3月5日 接广州章士钊来电，谓西南大学大纲已经政务会议通过，校址设沪，日内章与汪精卫来沪，嘱陈不必去粤。陈对校址设沪“极不满意”^①。

3月8日 发表谈话，批驳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关于西南大学校址设沪及在法国里昂设立西南大学外国部的决定的理由^②。

3月11日 致函周作人，告“《新青年》七卷六号的出版日期是5月1日，正逢 May day 佳节，故决计做一本纪念号，请先生或译或述一篇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如何？”还极力敦促鲁迅从事小说写作：“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许他。”8月22日，又致函周作人：“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9月28日再函：“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③后来鲁迅回忆自己怎样做起小说来时说：“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④

3月20日 在青年会征求会员大会闭幕典礼上发表题为《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演讲，说“新文化运动是创造的，不是因袭的”，“一日无创造之精神，即一日不能继续发展新文化”^⑤。

① 《民国日报》，1920年3月5日。

② 《民国日报》，1920年3月11日。

③ 三封信皆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

④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⑤ 《民国日报》，1920年3月21日。

3月22日 章行严、吴稚晖偕李石曾到沪会见陈独秀，最后商定西南大学校址设在上海。因为粤局多变，章行严断言粤中非十年不能安静。陈独秀表示，已征求孙中山的意见，“以为粤中办学，非先去蛮野粤人不可”，故“亦不拘执意见”，表示互相容纳，遂决定西南大学校址设上海同济原址^①。

3月28日 发表《工读互助团失败的原因在那里？》，认为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完全是因为缺乏坚强的意志、劳动习惯和生产技能三件事；这都是人的问题，不是组织的问题”。^②

3月29日 在江苏教育会演讲《教育的缺点》即《现在教育的弊病》^③，认为：教育的缺点主要表现在，主观主义的教育；形式主义的教育。他认为，主观主义的教育是“先生教学生的，不是学生教先生的……吾们要晓得用怎样的方法，拿教材到学生身上去，学生怎样的反映，观察学生的反映，要象试验化学一般”。不看学生的反映就是不问效果的主观主义的教育。形式主义的教育主要表现是“工校没有工厂的，农校没有农村的，不应有的学科偏偏要；要有的学科偏偏没有”。一切都是“遵部章如此的”，不知道教育部是“形式主义教育的发源地”。陈独秀还认为考试“完全是形式主义教育的不良制度”，它的罪恶，就是“生理大受亏损；发生不道德的行为；长虚荣心”。“考得分数多便得意洋洋，分数少便垂头丧气”。因此，他主张废弃考试，用“种种练习”即可。

4月2日 在上海船务棧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演讲《劳动者的觉悟》，“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社会

① 《民国日报》，1920年3月24日。

② 《新青年》，第7卷第5号。

③ 发表在3月30日、4月1日的《时报》、《新青年》第7卷第5号及《新晚》第2期上。

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人是台柱子”。指出劳动者的觉悟分二步：第一步“要求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①。

4月18日 午后一时，参加由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业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代表发起的“世界劳动纪念大会”筹备会，提议当天大会定名为“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劳工旨要》指出：当前劳工运动“应当从减少时间，增加工资等切身问题入手，然后才能图谋解决其他问题”。最后，筹备会推陈独秀、汤松为筹备会的顾问^②。

4月21日 在中国公学演讲《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称“五四运动”不同于过去爱国运动的“特有精神”有二：（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的精神。“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③

4月26日 写信给在北京的李大钊、胡适等十二人，告知他们《新青年》七卷六号到五月一日即可出版。今后怎么办？他提出：

1. 是否接续出版？2. 倘续出，对发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有无应与交涉的事？3. 编辑人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④。

4月29日 发表《训卢永祥的秘书》，驳斥反动当局“硬说

① 《民国日报》，1920年4月3日；《新青年》第7卷第6号。

② 《时报》，1920年4月20日。

③ 《民国日报》及《时事新报》，1920年4月22日。

④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90页。

五月一日是俄国劳动纪念日”的愚昧无知的说法^①。

是月 会见由北京到上海的毛泽东，讨论马克思主义及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

邀请陈望道参加《新青年》编辑部。

5月1日 与施存统、陈望道等人一起，参加上海澄衷中学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是日 负责主编《新青年》“劳动节专号”，发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主张中国工业的发展不应“走欧美日本人的道路”，而应采用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发表《劳动者的觉悟》，与知耻、章积和关于工人的劳动时间、工资、教育等问题的通信。^②

5月24日 发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的方针》。^③

5月29日 与李石曾、汪精卫联名致函伍庭芳及章行严，催将关余中西南大学经费提出拨付，以便按时开办预科。章复函，允关余中西南大学经费取消停付，将八十五万元一次交足^④。

5月 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接受由北京李大钊介绍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建议，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草拟了《党纲》，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酝酿时有戴季陶、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陈望道、俞

① 《民国日报》，1920年4月29日。

② 《新青年》第7卷第6号。

③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0年5月24日。

④ 《民国日报》，1920年5月30日。广东军政府成立后，西方各国驻华使团曾答应将一部分广东关余归广东政府使用。军政府决定筹备西南大学时决定经费由广东关余中出，由军政府财长伍庭芳管理。后来岑春煊、莫新荣主张将关余移作军政费，伍即拒绝拨付；岑、莫就指使章行严向租界法庭提出诉讼，判为“冻结”。后来帝国主义各国为了打击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干脆将广东关余移拨北洋政府。

秀松、李达、沈玄庐、赵世炎、刘知白等人参加。戴季陶不久退出。酝酿到八月份，组织才臻于完备，成立了临时中央局，推陈独秀为书记。由于他在当时的声誉和交际较广，决定由他函约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于是，他约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通过王乐平约王尽美和邓恩铭在济南组织，约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武汉组织除陈独秀派刘伯垂去外，李汉俊也去做了工作^①。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了一个总部，各地组织是支部。组织名称开始叫“社会党”^②，后来，陈独秀致函李大钊和张申府，询问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李和张商量后明确回答：叫共产党^③。随即（大约在九月）定名“中国共产党”，决定以《新青年》为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外，另创办理论月刊《共产党》，作为秘密机关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报道国际工运和苏俄消息。此外，还决定成立“青年团”，筹备上海机器工会和纺织工会等^④。

5月9日 赵世炎赴法勤工俭学，行前在上海与陈独秀详细交谈了建党意见。赴法后，赵与陈、李（大钊）保持着通信联系。8月上海党的发起组成立后，陈即通知赵，嘱其在法进行建党工作^⑤。

5月下旬 上海织袜女工因反对厂家施行苛刻的新章程全体罢工。工人们认识到“厂家所以肆行无忌压迫我们，其原因虽

①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以及陈望道、施复亮、沈雁冰等人对党成立时期情况的回忆，均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

② 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该文阐述“吾党”政见时宣称：“希望法律随替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

③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

④ 李达、施复亮、陈公培等人的回忆，《“一大”前后》（二）。

⑤ 《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上册）第110页。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不是一样，但第一要紧的，因为我们素未有团结”。所以女工吴莲溪等发起成立了织袜工会，在法租界设立会所。5月30日，吴莲溪等人拜会陈独秀，请予助力，指示进行。陈询问甚详，表示极赞其举动之正当，允尽力协助^①。

上半年 在上海小沙渡及码头工人的罢工斗争中作调查，发现“工业协会”虽有五千至一万人，却为大政客黄介民拉拢工头所控制，于是与李达等人商定，在小沙渡设立一个工人补习学校，进行革命教育。

6月1日 发表《在今日而言劳动的问题》^②。

6月3日 参加日本纱厂与码头工人的罢工集会。

是月 为陈公培赴法勤工俭学写介绍信，介绍给陈延年和陈乔年。

6月21日 发表《潜著〈戏拟劳动家致资本家书〉》^③。

7月4日 在上海船栈工会年会上发表讲演^④。

7月7日 撰《〈水浒〉新叙》。

暑假 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时的文科学生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毕业，回到广东，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仍与陈独秀保持通信联系。8月，上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时，谭等也在广东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⑤。他们创办《广东群报》时，写信给陈独秀请求帮助和支持。陈独秀回信给予热情的鼓励，指出：“广东和广州是我国重要的省城，在历史上是革命的策源地，曾多次

① 《申报》1920年5月29日及31日。

② 《工界》第5期。

③ 《工界》第6期。

④ 《船栈工会年会予志》载《民国日报》，1920年7月3日。

⑤ 谭平山：《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的答词》（1922年3月14日），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编《“一大”前后广东的党组织》。

起过先驱作用，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而今更应顺应历史潮流，发挥更大作用。”10月20日，《广东群报》出版时，陈独秀又致书祝贺，希望他们继承历史传统，激流勇进，以为民先驱的精神，肩负开启民智的重任，扫除旧社会一切陈规陋俗，决不随波逐流，做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资本家之应声虫^①。《群报》创刊号宣称办报宗旨是“专为宣传新文化的机关”，目的“就是主张改造社会”。陈独秀在该日《广东群报》上发表10月2日写的《敬告广州青年》，写道：“我希望诸君讲求社会需要的科学，勿空废光阴于无用的浮夸的古典文学”；“我希望诸君多多结合读书会或科学实验所，勿多发言论”；“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营造遁逃藪安乐窝”；“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

7月 到沈雁冰处，约请沈参加创建共产党的活动，并请沈为《新青年》写点有关苏联的稿件，当场送给沈英文版《国际通讯》，上有苏联情况的资料，作为参考^②。

8月1日 李大钊与胡适、蒋梦麟、高一涵等在《晨报》上发表《争自由宣言》，强烈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书信秘密等自由，立即实行“人身保护法”，组织“公民选举监督团”等。

8月2日 致函胡适，谓：“我近来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义——原有的老子说、印度空观，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的总汇，世界无比，《新青年》以后应该对此病根下总攻击。”请胡适担任“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学的司令”^③。

① 谭天度：《回首往事话当年》，《广东文史资料》第1期。

② 沈雁冰：《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二）。

③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07页。

8月7日 鲁迅将其小说《风波》手稿寄交上海陈独秀。^①陈接信后当即复函,并望鲁迅与周作人“再做一篇在二号报上发表”,还说:“玄同兄总是无信来,他何以如此无兴致?无兴致是我们不应该取的态度,我无论如何挫折,总觉得很有兴致”。^②

8月8日 与来沪的胡适在“一品香”饭馆邀请各界领袖举行茶话会,商议胡适提出的“争自由”“进行方法”^③。

8月15日 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创刊,撰《两个工人的疑问》,宣传“劳工神圣”:
“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总而言之,我们吃的粮食,住的房子,穿的衣裳,都全是人工做出来的。”

8月16日 与孙希文、潘赞化、常恒芳等十五人共同发起成立旅沪皖事改进会,并致函旅京皖事改进会,以为援应,提出三条办法:“一废除督军。在废督尚未实现之前,则合力驱除倪嗣冲,并拒绝复辟派张勋、姜桂题等作倪的后继。二解散省城及各县公益维持会,该会会员一律剥夺公权。三整顿教育。”^④

8月22日 在《劳动界》第2期上发表《真的工人团体》,号召觉悟的工人,赶快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同时发表《霍乱与痢疾》、《老爷们的卫生》。

8月22日 在陈独秀的倡议下,俞秀松、罗亦农、叶天底、金家凤等八人,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租渔阳里六号楼房一幢,

① 《鲁迅日记》上卷,第343页。

② 转引自沈鹏年:《鲁迅和〈新青年〉关系的两个史实》。此信表明《新青年》阵营开始分裂,钱玄同转向隐退。

③ 《民国日报》,1920年8月9日。

④ 《民国日报》,1920年8月20日。

设团中央机关，外挂“外国语学社”牌子，俞秀松主持团务。陈独秀等党的上海发起组成员，都参加了团组织。一九二二年五月召开团的“一大”，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团组织，选举了团中央，施存统任书记。陈独秀经常参加青年团领导机关会议，与各种假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是月 陈望道应陈独秀约请，译完《共产党宣言》，陈独秀、李汉俊校，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9月1日 新青年社成立，并出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由于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的页数比平时多得多，群益书社决定加价，引起陈独秀不满，决定《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起脱离群益书社，独立出版。汪孟邹对双方调解无效。群益曾为此“提起诉讼”。同时，陈独秀还邀陈望道参加编辑，编辑部复归上海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寓所）。《新青年》从此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发表《谈政治》，批驳胡适等人“不谈政治”的主张，改变了过去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指出：“只有被压迫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去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我敢说：若经过阶级战争，若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还指出，无产阶级在征服资产阶级以后，“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们的懒惰、掠夺，矫正他们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同时发表《对于时局的我见》，认为“各

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在这之前，“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前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还发表与费哲民等四人的通信，在给费哲民的复函中，指出“妇女、青年、劳动”等问题的解决，“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在复高锴的信中，说当初对于西南大学有“重要的希望”，“可是为了无名义的私利的政争，把经费破坏了。我们这些希望，都等于一场好梦，几时想起几时便令人心痛。”^①

9月3日 上海杨树浦路电灯厂工人致函陈独秀，说：“我们苦恼的工人，……从前受资本家的压逼，不晓得有多少年了！……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愤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啊！”^②

9月5日 发表《此时中国劳动运动的意思》，^③指出“此时中国劳动运动的意思，一不是跟着外国的新思潮凑热闹，二不是高谈什么社会主义，不过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的同情心和对于同胞的感情，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同时发表《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较》、《怕劳动》、《贫民窟》。

9月中旬 张申府因迎接英国学者罗素来华讲学，由北京

① 《新青年》第8卷第1号。

② 《劳动界》，第5册。

③ 《劳动界》，第4册。

到沪，住陈独秀处，双方谈论建党事，一致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取到党内来”。下旬，张回京，把这意见告诉李大钊，旋即发展张国焘为北京支部的第三个党员^①。

9月19日 发表《为什么不吃牛肉》、《无理的要求》^②。

9月26日 在《劳动界》(第七册)上，与俞秀松、李汉俊共同刊登特别启事，邀约“工商友谊会”^③诸先生于31日在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社”开会，面商《店员周刊》进行事宜。

是月 与李声澍等人一起，筹备组织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④，并拟订“章程”^⑤。

10月1日 发表随感录《学说与装饰品》，批驳有人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几十年前百年前底旧学说”，“此时已经不流行不时髦”的观点；指出：“本来没有推之万世而皆准的真理，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输入学说若不以需要为标准，……以新为标准，是把学说弄成了装饰品”。又说：“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之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格

①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

② 《劳动界》第6册。

③ 该会7月20日发起，10月10日正式成立，宣称“以研究工商常识、实行自由平等博爱互助，提倡自治、改良社会为宗旨”。

④ 见毛泽东致罗荣熙的信(1920年11月26日)，《新民学会通信集》(一)；文焕致李中的信(1920年9月18日)，《劳动界》第7册。毛泽东的信中说：“李君声澍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居然一两个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他现寓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二号，帮助陈仲甫等组织机器工会。”

⑤ “章程”宣称本会目的：“以公共的理想，训练德性，发展知识，促起阶级的互助观念”；“以公共的力量，着实的方法，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减轻痛苦”；“谋相互的亲睦，相互的扶助事业”。(《民国日报》1920年10月7日)。

斯(克思)社会主义底的需要。”同时还发表随感录《再论上海社会》、《懒惰的心理》及与社人、赵仁铸、知耻讨论男女同校、大学教授、工人教育问题通信^①。

10月2日 续写《敬告广州青年》。

10月3日 上午,与徐谦等人参加旅沪皖事改进会等筹组举行的旅沪皖团体联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言,同与会代表一起,主张废督裁兵,筹划自治、整顿教育。决定联络旅京旅津旅宁同乡,协助皖中各界奋力驱逐张文生督皖。无论何人督皖,一概拒绝,并议定罢工罢市罢学罢税为最后之办法^②。

下午,参加在“外国语学社”举行的“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并发表演说,说矿工、铁道工、机器工工会,是现在世界三个“很有势力”的团体,“要是彻底联络了,那就社会上一切物体,都要受他底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会议由李中任主席,推选了陈独秀为该工会“经募处主任”及“名誉会员”^③。

是日 《劳动者》创刊,公告:“《劳动者》是我们劳动界同人组织的,专门发表劳动界的意见及状况的。”

10月10日 在《民国日报》“双十节增刊”上发表《国庆纪念的价值》,指出西方的“共和政治”实际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

① 《新青年》第8卷第2号。

② 《民国日报》1920年10月4日。

徐谦(1871—1940),字季龙,安徽歙县人,生于江西南昌。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北京高等检察厅检察长等职,1910年倡组“国民共进会”。1912年任唐绍仪内阁司法部次长,后任国民党本部参谋。反袁失败后,历任律师、段祺瑞内阁司法部次长(1916)、天津《益世报》总编(1919)、孙中山南方军政府司法部长、大理院院长(1920—1921)、北洋政府王宠惠内阁司法总长(1922)、大元帅驻沪办理和平统一代表,并在沪创办政法大学、《平议日报》(1923—1924)。

③ 《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劳动界》第9期。

和底自由幸福多数人是沒有份的。主張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新陈代谢底公例，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的一定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而且中国由封建而社会主义，不必象“西欧共和政治经过长久的岁月”。为此，在“政治革命”同时，“必须经济革命”，创设社会的工业。

是日 参加“工商友谊会”成立会，并发表演说，为该会机关报《上海伙友》创刊写《发刊词》^①。

10月16日 《申报》刊登“何(丰林)使专电”，称：“社会党陈独秀，勾结俄党及刘鹤林等，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等。”17日，上海机器工会理事会发表决议，批驳《申报》载“何使专电”，“一字一句，不得实际”；称“据本会章程，非机器工人不得入会……陈独秀实非工人，何能组织俄党”；“更何能加入组织”。“本会与社会党、俄党，实无丝毫关系”^②。

10月17日 为《上海伙友》发表上海杨树浦工厂女工陈亲爱的信《女工为什么不入会？》写按语，指出：“上海工人苦，女工尤其苦，……我希望陈女士挺身而出为女同胞奋斗！”

10月23日 发表《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③，说：“我也不敢希望我们中国的工人们马上就有外国的这样大大的运动，说句极没出息的话，中国工人但能结起团体来要求得到外国工人已经得着的各样好处，那便算是大大快意的事了；再说得可怜一点，眼前只求得‘星期日休息’，‘每天只做八点钟工’，‘每月

① 《民国日报》，1920年10月11日。

② 《民国日报》，1920年10月20日。或者是陈独秀改上海党发起组名字叫“共产党”事还不为外界所知，或者是此时尚未改名，所以仍被称为“社会党陈独秀”。

③ 《劳动界》第11册。

工钱加上三元五元，这三样好处，也可使工人们牛马似苦恼减少一点”。

10月25日 为汪原放写的《〈儒林外史〉新叙》修改了几个字，并署上“陈独秀”。此序原是汪孟邹请陈写的，陈则要汪原放写，意在提携后进，培养汪原放的写作能力^①。

10月27日 “湖南劳工会”负责人黄爱致函陈独秀，报告该会简章内容^②。

10月28日 北洋政府陆军部密电上海何(丰林)镇守使，“据探报，俄过激党陈独秀等，在每星期出浅易小说煽惑工商各界劳动之人，并鼓动军学界，扩张过激主义。……应由贵使设法严禁，如认为违犯刑法，即行缉拿惩办，以遏乱源。”^③30日，又电称：“探报：法界贝勒路三八九号开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提议联络机器工人罢工’以制政府之命，……并发行《劳动界》及《资本论》小说等情。特电贵使核禁。”^④

是月 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给长沙毛泽东，湖南开始建团^⑤。

11月1日 发表致柯庆施的复信，指出：“现在有许多人拿‘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等口头禅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劳动专政，我要问问他们的是，(一)经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的无产阶级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于‘德谟克拉西’？(二)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谟克拉西’？”同

①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63页。

② 《劳动界》第13册。

③④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641—6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

⑤ 易礼容：《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1979年9月11日）《“一大”前辰》（二）。

时发表《国庆纪念底价值》及随感录三则；《社会的工业及有良心的学者》、《劳动者底知识从哪里来》、《三论上海社会》，通信：《答郑贤宗（国家、政治、法律）》^①。

秋 恽代英受陈独秀的委托，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书，并在一九二一年一月由新青年社出版。这本书对当时一些革命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影响很大^②。

11月初 接陈炯明电，请去粤主持教育，提倡新思想，发展新文化^③。陈独秀提出三条件：“（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趋势。”陈炯明表示同意，陈独秀遂允赴粤。^④

11月7日 创刊中共上海发起组秘密的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并写发刊词《短言》，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底制度，拥护劳动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该刊物共出了六期，1921年7月中共“一大”前停刊。

11月9日 鲁迅将其小说《故乡》手稿寄给上海的陈

① 《新青年》第8卷第3号。

② 田子瑜：《关于恽代英早期思想转变的时间》，《江汉论坛》1982年第10期。

③ 《民国日报》1920年11月13日。

④ 《时事新闻》1920年12月31日。

独秀 ①

11月中旬 维经斯基接受陈独秀建议，在上海拜会孙中山。孙表示了要把中国南方(广州)的斗争与俄国联系起来的急切愿望②。

11月19日 新近组织的安徽省教育改进团发表宣言，一致主张陈独秀为正会长，常藩侯为副会长；非此二人，誓不承认③。

11月21日 发表《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④，认为中国的劳动运动“已经发生”；应以“生活改良”为宗旨，不要用什么政治的罢工来运动工人，“带了政治的臭味，不但劳动者不能够了解，而且恐怕政客利用”。

是月 在上海公学举行的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上被聘为“名誉会员”并发表演说，谓工人团体须完全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还说：“我希望这个工会到了明年今天，就是几千或几万的会员，建设一个大力量的工会。”孙中山也在会上作了“三民主义”的演说⑤。

《伙友》第7册出版，此后陈独秀及其领导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与童理璋操纵的“工商友谊会”及其《伙友》断绝关系⑥。

11月22日 蔡子民出国考察教育，途经上海，北大教授张

① 《鲁迅日记》上卷第347页。

② 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期。

③ 《申报》1920年11月23日。

④ 《劳动界》第15册。

⑤ 《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2日。

⑥ 《伙友》第8册《通讯》。该刊从1920年12月26日第8册开始，不再有革命的色彩而专门宣传劳资调和，为资本家辩护，反对革命，反对阶级斗争。童理璋后来加入国民党并成为右派，与其他黄色工会头子勾结破坏上海工运。

崧年(张申府)因赴法任教,随同^①。在沪期间,陈独秀接见张崧年,给张写介绍信,邀其去法国任教时与赵世炎联系,在中国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建党^②。

11月23日 与马寅初等人联名发出通告,定于今晚八时,北京大学旅沪同人在一品香饭馆举行欢送蔡子民校长的宴会。是晚,欢送会上任主席,致欢送词,谓自蔡任北大校长,有二事为同人亲见:(一)学说独立。(二)思想自由。今后仍希望保持此精神,一面弥补缺点。24日,送蔡子民赴法,由码头乘拖轮直送至吴淞外轮上^③。

11月28日 汪孟邹致函胡适:“广州聘仲甫为教育厅长,炼前日见他久谈一切,他意似拟前去,不知兄已有所闻否。”^④

是月 主持上海共产党发起组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内容包括(一)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二)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三)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明了无产阶级要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党的最高纲领。第二部分阐明了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按照上述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此,要引导无产阶级去向资产阶级斗争,并获得政权,象俄国1917年革命那样。第三部分阐明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这个带有纲领性的文件,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开始建立起就严格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个《宣言》当时没有对外发表,只是作为内部收纳党

① 《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3日。

② 张申府谈话记录(1961年1月27日),《赵世炎烈士革命资料汇编》。

③ 《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3、24、25日。

④ 胡适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存。

员的标准^①。

北京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五人，因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集中领导，组织纪律等，退出共产党。青年团员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等人先后加入共产党。北京党组织扩大到十五人，被上海临时中央局正式命名为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组织（主持职工运动），罗章龙宣传。陈独秀致函李大钊，对北京党组织九月以来的工作表示赞成，并及时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共产党》月刊及其他小册子寄北京。双方通信中都表示要尽早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②。

12月1日 辑《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批判罗素及研究系张东荪、梁启超宣扬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指出：“中国的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同时发表随感录九则：《华工》、《四论上海社会》、《劳动神圣与罢工》、《主义与努力》、《革命与作乱》、《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民主党与共产党》、《提高与普及》、《无意识的举动》^③。

12月2日 毛泽东嘱告在长沙第一师范进行建团任务的张文亮：“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注意研究和实行”，“多找

① 《“一大”前后》（一）。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和施复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文章中，都提到陈独秀和他们酝酿起草党纲、党章的问题。11月7日出版的《共产党》第1号《短言》，据当时毛泽东致蔡和森的信说，“即仲甫所为”。对照李、施的回忆和《短言》的内容，与《宣言》基本一致，似可断定此宣言是陈独秀主持下起草的。

② 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108、109、121页。

③ 《新青年》第8卷第4号。

真同志”^①。

12月12日 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拟废教育厅,设大学委员,主办全省教育,电促陈独秀来粤主持,保证决以全省岁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无论如何,决不短发^②。

12月中旬 致函《新青年》北京同人李大钊、胡适等九人:“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以后来稿请寄编辑部陈望道先生收不误。”^③从此开始了胡适与陈独秀及《新青年》同人进一步分裂的争论。胡适接信后要每人传阅并提示《新青年》已不准邮寄。陶孟和提议既如此“就此停版如何?最好日内开会讨论一番”^④。

12月16日 陈独秀致函胡适、高一涵:“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还说:“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⑤

12月17日 晨,乘轮船去粤,袁振英^⑥随同。决定前曾致

① 《张文亮日记》,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4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7月版。

② 《民国日报》1920年12月12、18日。

③ 《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第116页。

④ 《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第116页。

⑤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版。

⑥ 袁振英,广东人,早年就读于香港香红书院,后入北京大学。信奉无政府主义,在校与黄凌霜等人组织“实社”,研究无政府主义,出版“实社自由录”。曾翻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高一曼女士的《婚姻与恋爱》和撰《易卜生传》,发表在《新青年》上。五四时期,曾组织“广东游东记者团,到日本、朝鲜、菲律

函各地党支部，征求意见。李大钊等人复函支持赴粤：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行前把党的书记职务交给李汉俊，（1921年2月后由李达代理书记），《共产党》主编任务交给李达，《新青年》交由陈望道主编^⑦。

12月下旬 陈独秀所搭轮船中途停泊香港，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三人慕名特意到船上会见陈独秀，并携带《真善美》刊物给陈独秀看，陈看后倍加赞许，鼓励三人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三人听后回到李义宝家中即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后来，他们成为香港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⑧。

12月29日 抵广州，住大东酒店，提出改革教育计划三大纲：（一）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等，虽分期使其绝对普及。（二）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及社会教育。凡补修学校、图书馆、博物院、剧场、影戏、音乐、一般宣传、特殊宣传皆属之。（三）专门教育——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及大学工科而外，以设甲种工业学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强调“刷新教育，必先收罗人才，大学所在即人才所在，故须先行建设

宾活动，宣传反对二十一条，并在菲组织“全菲律宾华侨工党”，出版《平民日报》（该党机关报），鼓吹无政府工团主义。回国后路经上海，被陈独秀聘请到《新青年》出版社，担任“苏维埃俄罗斯研究”一栏的主编工作，常以“震寰”笔名发表文章。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1920年底随陈独秀到广东，不久，被委任为省立一中校长。1921年，中共“一大”后，因反对陈独秀而退党，同年秋赴法国留学。1924年9月，应孙中山邀请，回国任广东大学教授。1926年，国民革命军打下武汉后，应邓演达之邀，到武汉中央军校任政治教官。

⑦ 《民国日报》1920年12月18日。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27页。

⑧ 梁复然：《广东党的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446、447页。

大学”，先办广东大学^①。

是月 任广东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的老同盟会员林伯渠，到上海，经李大钊介绍，在渔阳里会见陈独秀，并多次交谈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理论问题。不久，由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加入共产党^②。

① 《民国日报》1920年12月24日及1921年1月1日。

② 《林伯渠自传》，《人物》1982年第2期。

1921年(民国十年 辛酉)

四十三岁

6月22日—7月12日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共代表张太雷参加，并在7月12日会议上发言，呼吁“共产国际和西方各国共产党更加关切远东的运动，并给予更大的支持”。

5月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撤销军政府，组织正式政府。

8月28日 孙中山复函苏俄人民外交委员齐契林，向列宁及莫斯科表示敬意，并希望与苏联政府建立联系。

1月1日 发表《欢迎新军人》，认为军人有新旧之别，新军人与旧军人根本不同的是有两大信条：“一是要做社会公有的军人，不做个人私有的军人”；“二是要做生产力的军人，不做单纯消费的军人”。声称：“我心中对于广东充满了我的希望，我更希望广东新军人能为中国军界开一新纪元”，“实行新军人两大信条，宣传新军人两大信条，好做全中华民国的新军人的模范”。^①

1月2日 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说，《新教育是什么》^②。

① 《广东群报》1921年1月1日增刊。

② 《新青年》第8卷第6号。

胡适复函陈独秀，提议解决《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的办法有三：1. 听《新青年》流为一种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2. 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已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一个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3. 停办^①。

此信发出后，胡适又根据鲁迅和周作人、陶孟和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的意见，第二次致函陈独秀，强调“1. 移回北京；2. 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②。

陈独秀接信后很生气，立即给李大钊等八人复信，对胡适主张《新青年》“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极为不满；认为胡提出的“另办一杂志”的主张是“反对他个人”；声明胡如另起炉灶，“此事与《新青年》无关”^③。

钱玄同见陈信后感叹，“初不料陈、胡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并认为胡适“所主张者较为近是。……至于仲甫疑心适之受了贤人系（研究系一引者）的运动，甚至谓北大已入贤掌之中，这是他神经过敏之”^④。

李大钊致函胡适，报告他本人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都赞成胡适提的第一种办法；并说，“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我们要共

①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 1954 年 12 月版。此信未署日期，根据内容及鲁迅 1 月 3 日的日记，可定为 1 月 2 日。

②③ 根据 1921 年 1 月 22 日胡适致李大钊等人的信转述。

④ 钱玄同致鲁迅、周作人信，《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 5 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年版。

同给仲甫写一信，去辩明此事。”^①

月初 提出刷新教育三种法案：《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全省学校系统图》、《每年教育经费概算表》，被孙(中山)总裁、陈(炯明)省长等完全通过。^②

维经斯基到广州，由陈独秀陪同会见孙中山，以便“就近仔细观察”陈炯明^③。

1月11日 发表《答冯菊波先生》。^④

1月中旬 广东省长公署设立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陈独秀任委员长，主持一切教育行政事宜。陈独秀、汪精卫、戴传贤、许崇清被委任为“政务委员”。教育委员会举行会议，决议筹备编译局、宣传员养成所、贫民教养院、劳动补习学校等社会教育组织。^⑤

1月15日 陈望道给胡适一明信片，告“大作已载在新青年八卷五号了。新青年内容问题，我不愿意多说话，因为八卷四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者，五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思进行。”^⑥

1月16日 在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社会主义批评》，大要分三个问题：一、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二、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三、应该讲何种社会主义。指出“社会主义”有五派：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只有俄国底共产主义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克思)主义”。认为“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

①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

② 《民国日报》1921年1月3日。

③ 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期。

④ 《广东群报》，1921年1月11日。

⑤ 见《民国日报》，1921年1月16日。

⑥ 胡适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存。

主义底必要”；中国应该采用共产主义的主张，阶级斗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除该校全体学生听讲外，各界参加者亦甚踊跃。^①

1月21日 毛泽东复函在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告：“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②。

1月21、22、24日 连续在《广东群报》上发表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讲《教育与社会》。

1月22日 上午，陈独秀应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校长袁振英的延请，到该校演讲《中学生之将来》。下午，应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校长高钊文的邀请，到校演讲《工学生与劳动运动》，指出：“今日的世界，不是资本家创造出来的，乃是数千年来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所以工学生，要和体力劳动者结合团体，共同进行，把资本家推倒，以做社会上种种改造事业”。^③

是日 胡适致函李大钊等八人，认为“独秀答书颇多误解”，“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因陈生气，他表示很愿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取消“另办一杂志”的主张，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和独秀商量。信中抱怨《新青年》“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差不多成了《Soviet Ruissia》^④的汉译本”。

1月23日 应广东省女子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邀请，演讲《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说：“我的意思，以为物质上的生活，能够做到平等自由，便是正当的人生”；“正当的人生，就是不施

① 《广东群报》1921年1月17日；《新青年》第9卷第3号。

② 《新民学会通信集》（第三集）。

③ 《广东群报》，1921年1月28日。

④ 即《苏维埃俄罗斯》周刊，当时在美国纽约出版。《新青年》第8卷第1号起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大量刊载袁振英等译自该刊的文章。

(压)于人,亦不受所(压)”^①。

1月26日 胡适整理《新青年》北京同人表决结果;

赞成移北京编辑者:慰慈、一涵、守常、

赞成北京编辑,但不必强求,可任他分裂成两个杂志,也不必争《新青年》这个名目;豫才、启明、玄同。

赞成移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办,万不可分为两个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抚和、孟和。^②

1月27日 发表《讨论无政府主义——给区声白的三封信》,批判不要国家、不要法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维持社会的秩序全靠信约”的无政府主义思潮。^③

1月29日 应邀在广东省女界联合会作题为《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的演讲,论证了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指出妇女的解放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而且“社会主义不止解决妇女的问题,且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必须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④

是月 委派袁振英任广东省立一中校长,并支持袁振英首创中学男女同校,遭广东教育会会长汪精卫及守旧派人士强烈攻击。陈独秀指使袁向汪“据理论争”,得胜利。全国中学男女同校自广州始,而广州自省立一中始。同时,国民党邓家彦等人,因与陈独秀争夺广东的教育权,唆使少数无聊学生办了一个《广州批评号》,任意诬蔑陈独秀的私德,独秀如此“迭遭民党之忌”^⑤。

上海党的经费发生困难,李汉俊致函陈独秀,提议“新青年

① 《广东群报》1921年1月24日。

②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

③ 《新青年》第9卷第4号。

④ 《广东群报》1921年1月31日。

⑤ 《晨报》1921年2月7日;《袁振英的回忆》,《“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

书社”按月支二百元做党的经费，陈不答应。《共产党》月刊因经费困难，第2期后停刊。《新青年》因不能按月编出，书社也拒付编辑费。“李汉俊认定陈独秀私有欲太重，大不满意”。至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李汉俊看后“甚不满意”，说陈“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李复函陈，并起草了另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复函“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①。

2月初 《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付排时，稿件被租界巡捕房包探所搜，罚洋五十元，不准在上海印刷^②。

2月6日 胡适致函陈独秀，辩明与研究系关系问题，说陈“卤莽”，“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并说：“我究竟不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③

2月8日 孙中山致函易白沙，称颂易著“《帝王春秋》从历史事实唤起知识阶级，以诛锄独夫民贼，可谓严于斧钺”。又说广州局势，百度未举，望易白沙来相助：“弟甚欲得一能文者，与共昕夕，以素所怀抱主义、政策，见之文章，勤为条教”；而陈独秀等“俱在此间，不患无侣”^④。

2月10日 应邀参加广州理发工会成立会，并发表演讲，希望该会联络同业，务要全体同业结合成一个大工会；提议将来人数增加时，修改章程，设立评议部，与执行部相独立；还建议设立劳动补习学校，使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⑤。

① 见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② 《新青年》第9卷第1号《编辑室杂记》；陈望道致周作人的信（1921年2月11日）。

③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

④ 易白沙于6月南下，但终因志切报国一时难酬而蹈海自尽。

⑤ 《广东群报》1921年2月13日。

2月11日 蔡和森从法国巴黎致函陈独秀，说：“闻公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欢迎资本主义，两方驳论未得而见，殊以为憾。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①。

2月13日 陈望道致函周作人，对胡适分裂《新青年》、排斥上海编辑部事表明态度：“我也并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敢断定说，不能信任。”“这便因为他的态度使人怀疑。怀疑的重要资料：《改造》上梁先生某序文、《中学国文教授》、《少谈主义》、《争自由》”（即指胡适口头上宣称不谈政治，实际上颇热衷于政治——引者）。信还指出胡适不做文章，又企图支配《新青年》；表示与胡适等人“早已分裂，不能弥缝”。信中说：“上海广大同人及一般读者”对周氏兄弟支持《新青年》——“病中也替《新青年》做文章”——表示感谢。在另一封陈望道致鲁迅的信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当时胡适还曾给陈望道寄了一张明信片，表示：“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新青年》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②

是日 谭平山、沈玄庐等人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创办《劳动与妇女》周报，陈还经常为其撰稿，宣传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是一致的，批驳守旧势力攻击社会主义主张公妻的谬论。

2月14—19日 在《广东群报》上连载《讨论广州社会实际

^① 《新青年》第9卷第4号。

^② 邓明以：《五四时期的陈望道》，《百科知识》第1辑。

问题》；人口、小学教育、马路撒水问题、影画戏院问题。

2月15日 陈独秀复函胡适：“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①。

是日 陈独秀又致函鲁迅和周作人：“《新青年》风浪想必先生已知道了，此时除移粤出版，无他法。北京间人料无人肯做文章，唯有求助于你们两位。”^②

2月20日 发表《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③。

是月 致函赵世炎，嘱其与张申府联系，在巴黎组织共产党支部^④。

2月23日 自广州致函北京程演生，告“本月以内我还在此，你若出洋的事成功，路过广州，望稍聚几天”^⑤。实际上，他第二天就离开广州返回上海了。

2月26日 自上海致函北京程演生，嘱“白话文选事望从速进行”^⑥。

3月8日 发表《我的妇女解放观》^⑦。

3月中旬 广东高等师范守旧派教职员集会，反对该校由国立改为省立，并由省教育委员会管辖，通过呈文，要求陈炯明省长收回成命。呈文称：“陈(独秀)委员为人，其道德学问已为

① 即1922年胡适等主办的《努力》周报(后改为半月刊、月刊)，胡适标榜“不谈政治”而脱离《新青年》，但他在改为半月刊的信里曾说：“《努力》专从文艺思想方面着力，但亦不放弃政治”。他在《努力》周报第22期上曾发表一篇《国际与中国》的文章，竭力美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②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

③ 《劳动与妇女》第2期。

④ 《文史资料》第58辑。

⑤⑥ 《陈独秀书简》，安徽省博物馆存。

⑦ 《劳动与妇女》第4期。

职教员等所熟知，若任令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现在广东教育虽属破产，但陈委员操柄，恐较捣乱，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陈炯明、古应芬（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接此呈文后，坚持原议，强调“广东现为自立时期”，“所有省中各校当然受其管辖”，一面则增选委员，扩大教育委员会，“而免反对者成集矢于一人”^①。

3月18日 发表《辟谣一告政学会诸人》，指出攻击陈独秀“废德仇孝”、“禽兽学说”是政学会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所造之谣言，又有温宗尧氏所支配的广肇公所以同样的论调的电报给政府当局。奉劝政学会“不必如此倒行逆施”，应取“磊落光明的态度”^②。前此，袁振英曾发表声明，批驳《晨报》夏重民关于“陈独秀对待《晨报》的计划”的谣言。该谣言说，陈独秀企图驱逐记者石龙出《晨报》社，改组编辑部，利用官力来收取《晨报》社“归陈独秀个人主持”^③。陈公博也正告夏重民，指出石龙因在广东谋第二小学校长遭陈独秀“严重拒绝”而反对陈独秀^④。17日，《广东群报》还发表署名文章，指出：现在广东的空气，都充满着反对陈独秀的声音。反对陈独秀大概有八派：一、省议会；二、教育界一部分人物；三、一班政客；四、资本家；五、孔教徒；六、基督教徒；七、一般守旧派；八、少数自号无政府党者。

3月20日 《劳动与妇女》发表短评，综述陈入粤以来反陈运动：“第一次《晨报》的攻击，第二次破坏关余之传单，都是国民党与少数无政府党联合运动；第三次省议会和上海《中华新报》

① 《广东教育界新旧两派之争斗》，《晨报》1921年3月24日。

② 《广东群报》1921年3月18日。

③ 《广东群报》1921年3月3日。

④ 《广东群报》1921年3月4日。

广肇公所的攻击,是保皇党与政学会联合运动;第四次高师的攻击,是无政府党与政学会联合运动”。21日,《广东群报》发表署名文章《陈独秀与康有为的今昔观》,批驳省议会某议员关于驱逐陈独秀出境的议案,指出驱陈的“唯一张本”中,“讨父”、“仇孝”是北京顽固派故意造出来攻击北京大学的谣言;“公妻”、“妇女国有”是英日两国的顽固派,故意造出来攻击俄国劳农政府的谣言,“想不到现在又添上了‘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这两个旧调翻新的名词,来攻击陈独秀”。《民国日报》发表《广州特约通信——辟诬蔑陈独秀主张讨父公妻的谣言》,指出“省议会攻击陈独秀,说他主张‘讨父’、‘公妻’,并到处说‘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的话……先发生于上海,等上海报纸所载的消息传到广州,然后广州轰动起来”;抨击此谣言“完全不合情理”,“凭假电报骂人”;并指出还有借高师改为省立一事攻击陈独秀,“挑拨高师学生反对陈君”。文末附“黎明社”记者访问(陈独秀)记,陈辩明高师改为省立乃省长训令,并非陈之主张;对“讨父”“公妻”谣言,“又好气,又好笑”,“稍有常识的人,必不相信”。

3月27日 与汪精卫、吴稚晖联合,以“西南大学筹备员”名义,致电驻京法国公使,指责“不交关余,是阻碍大学进行”,并请李石曾向各国使节说明理由^①。前此,外国驻华使团一致承认北京政府的商请,将自去年三月份以后截留不交南方政府之关余二百四十万两拨付北京政府。

3、4月 陈独秀与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酝酿创建广东共产党。陈独秀说:“现在孙中山、陈炯明在广州已建立了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最好机会。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的领导是比不上组织的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负不起领导

^① 谭天度:《回首往事话当年》,《广州党史资料》第1辑。

民众运动的历史重任，为使广东民众运动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①。

广东共产党组织就此成立，初由陈独秀任书记，后由谭平山继任，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织委员；确定以《广东群报》为机关报，并着手重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青年团作外围组织，吸收了刘尔崧、阮啸仙、杨匏安等人入团、入党。陈独秀还利用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权，进行党的工作，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任命陈公博为所长。^②陈独秀说办校目的是为了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未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当时广东共产党给中央的报告也说：“这个学校是广东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机关，很多教员都是我们的好同志”。陈独秀有时也到该校讲课。还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陈独秀指定张毅汉为主任，训练广州在职的中小学教师；陈独秀也曾去宣传社会主义。另外，还办有“俄语学校”，由维经斯基手下的工作人员米诺尔及其夫人担任教授，引导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所有这些设施，为在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创建广东党团组织培养干部，起了重大的作用，直到一九二二年秋，陈炯明叛变后才停办。

与谭平山等人为一方，同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等人数次举行磋商，谈判组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广东统一的青年团问题。陈独秀在会议上把自己起草的一份章程拿出来讨

① 谭天度：《回首往事话当年》。

② 梁复然：《广东党的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第446页；《广东共产党的报告》（1921年），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与广东省档案馆编《“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

论,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组织上实行民主集中制,区声白等人反对。陈独秀就提出大家主义不同,始终是要分的,联合起来,会因活动手段、策略不同,引起争论,不如现在分,各走各的路。“议遂中止”。无政府主义者都退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①,于是陈独秀与谭平山等人,重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团组织,直接受党组织的领导。

4月1日 《新青年》社迁至广州昌兴路26号,出版第八卷第六号,实际编辑部仍留上海。^②

月初 广肇人张景威等人致函“广肇公所”列位董事,反对利用公所名义,盲从无稽之谈,打电报给广州当局,攻击陈独秀演说“百善以淫为首,万恶以孝为先”。指出“这话虽小孩子也不相信,怎么你们都要盲从呢?”^③

是月 接见由李汉俊派来广州的包惠僧。包转述李要陈回上海主持党务或把党的机关搬到广州来的提议。陈表示广州到处是无政府主义,地理上不适中,不同意党的机关搬广州;主张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要第三国际的钱。拿人家

^① 据《广东共产党的报告》,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辩论是在“共产党”内进行的,最后是“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但据区声白致黄凌霜的信说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本地多数同志第一着之意见,应与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络一气,本互助之精神,以期合力推翻现政府及一切恶制度。乃吾人在粤曾为一度之联席会议,并数次直接或间接与青年团之首领陈独秀磋商,不料陈独秀野心专横,谓吾辈联合须听其指挥,悉依青年团之集权主义进行,如吾党被其降服,立约之加入者。然同人闻之,不胜愤懑,议遂中止”。《广东共产党的报告》中提到的七个无政府主义者,两个在世者至今一再声明,他们未曾加入过共产党,与两个俄国人只是搞过一些工人运动。而查青年团,当时的确因思想、组织不纯,难以开展活动,于1921年春解散,然后重建。这种情况反映了党、团创建初期复杂的关系,因为当时党是秘密的,团是半公开的,党的一般活动,都通过团的组织形式进行的。

^② 《新青年》第8卷第6号《本社特别启事》;陈望道致周作人的信(1921年2月11日)。

^③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1月4日。

的钱，就要跟人家走。还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①

在广州看云楼撰《〈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新叙》。

5月1日 发表随感录二则：《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②

5月2日 在广东高师主持杜威演讲会，介绍杜威略历。^③

5月中旬 因李汉俊急电催返和粤省教育经费延拨及省署屡次干涉教育事务等原因，提出辞呈，准备返沪。陈炯明“亲到慰勉，说明经费延拨之原因，并表示自己兴学之决心，声明无论经费如何困难，总之对于已批准之预算案，刻日飭厅拨交”，并限省署于十日内筹八十万元以为开办编译局、宣讲所及第一师范之用，过两个月后，仍须陆续拨交二十万元，作为筹备西南大学之经费。^④

6月1日 发表随感录《反抗舆论的勇气》，指出：“社会的进步或救出社会的危险，都需要有大胆反抗舆论的人，因为盲目的舆论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时中国的社会里正缺乏有公然大胆反抗舆论的勇气之人！”同时发表随感录《下品的无政府党》、《青年的误会》，通信《答皆平(广东——科学思想)》。^⑤

6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来华，到达上海，催促召开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6月16日 胡适为《吴虞文录》作序，称“吴先生和我的朋友陈独秀是近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独秀攻击孔丘的许多文章，专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的一个主要观

①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3期。

② 《新青年》第9卷第1号。

③ 《民国日报》1921年5月9日。

④ 《广东群报》1921年5月16日；《晨报》1921年5月24日。

⑤ 《新青年》第9卷第2号。

念。”^①

6月×日 主持广东全省第五次教育大会，并发表演说，称：“兄弟以为进化，教育运动固不可少，军事行动也不可少”。“若要进步，最好是两方并重”^②。

6月23日 致函易培基，报告其弟易白沙南下言行及蹈海经过：白沙先生日前到此，自述北游石家庄以至京师，……谈时力言决计以戎杀贼，当时弟明知其所言难行，因其心意烦闷，不欲重违其旨，漫应而已。次日往见中山先生，自陈欲往北京运动开国民大会倒徐^③。中山先生因其体弱，亦劝其暂留广州著文，不必他往。与弟不见数日，即传其蹈海矣。

6月24日 与李大钊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以及一些进步人士联名登报发起组织新时代丛书社，该书社于1922年1月出书。

6月26日 《晨报》刊登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署名的启事《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新时代丛书是以增进国人普通知识为宗旨”，普及新文化运动；为有志去研究高深一些学问的人供给下手的途径；节省读书界的时间与经济。

是月 李汉俊等函电交驰，屡催陈独秀及广东代表赴沪参加“一大”。陈在谭植棠家召集广东党员开会，表示自己不能去沪，因兼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一大”，并要包“一大”后回湖北工作。包到沪，还携带陈独秀致各代表的信及向大会提出的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1.党员的发展与

① 《吴虞文录》，亚东图书馆1922年12月再版。

② 《广东群报》，1921年6月22日。

③ 即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

教育；2.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3. 党的纪律；4. 群众的路线。^①

《民治周报》发表无政府主义者觉虚致陈独秀书，攻击陈“狂嫖滥赌”，“主张开明专政”等。包惠僧发表《讨论主义与攻击个人》，批驳觉虚的信，并指出：“中国只有陈独秀对于这个主义（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引者）认得较切研究较真”^②。

复函张崧年：“我因为说实话，惹了几个精神病患者大惊小怪”。“在这种邪恶的社会里，要想处处事事拿出良心来说实话办实事，也都非有以生命来换的精神不可”。要求张“月赐一信”，报道欧洲近状，在《新青年》发表。^③

7月1日 发表随感录，《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认为“政党是政治的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同时发表随感录《革命与制度》，指出：“社会的进步，不单是空发高论可以收效的，必须有一部分人真能指出现在社会制度的弊病，用力量把旧制度推翻，同时用力量把新制度建设起来，社会才有进步。力量用得最剧烈的就是革命。革命不是别的，只是新旧制度交替的一种手段……”还发表《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政治学校的演讲）》，随感录《卑之无甚高论》及与张崧年、朱谦之通信谈中国改造、开明专制等问题^④。

7月2日、19日 鲁迅两次致函陈独秀并寄文稿（由李季代收）。鲁迅在日本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的译后附记中，高度赞赏菊地宽敢于讽刺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的创作态度，对中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136页；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

② 《广东群报》，1921年6月20日。

③ 《新青年》第9卷第3号。

④ 《新青年》第9卷第3号。

国文化思想界的禁锢状态表示极大的愤慨。^①

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推选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会上，代表们讨论了陈独秀所拟的《党纲》，对于“党的当前问题还不是夺取政权，这是将来的问题；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进行许多准备工作”的条文，有些代表仍嫌过激。有的代表主张党根本不需要什么固定的纲领。在争论南北政府有什么不同时，有的说，我们的领袖陈独秀还在广州做教育厅长，可见南方政府比北方政府进步一些。^②

7月27日 旅沪粤人之“广肇公所”领衔致电广东，激烈攻击陈独秀在广东的教育革新。^③ 28日《民国日报》总编叶楚伦在该报第三版（第一、二版全是广告——笔者）头条发表重要言论——《告反对陈独秀的旅沪粤人》，称：“陈独秀在广东，是教育行政委员会里的一个委员；他所做的事，是全体委员所决定要做的事。平心而论，广东教育无论发展到怎样，不应归功于陈独秀一人。因为这是陈省长和教育行政委员会及一般热心教育家合做出来的成绩，不许陈独秀据为己有的。”“陈独秀不配做偶像，然而反对他的所说的话，更全没影子。广东是孔教保皇党等最多的，还有许多学棍，将学校霸占着做自己产业的。广东教育的整顿和革新，都是和他们的旧头脑老饭碗有关，他们恨的人不止一个，却又只借陈独秀做由头。”前此，叶楚伦曾发表文章，称广东教育事业“极有希望”，却只推崇汪精卫、胡汉民和市教育局局长许崇清。^④

① 《鲁迅日记》第365—366页。

② 周佛海：《我的奋斗》，载《古今》第2期。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③ 《民国日报》1921年7月28日。

④ 《民国日报》1921年5月22日。

8月1日 发表通信《答何谦生(同善社)》、《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① 答蔡信中指出：“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

8月17日 致电陈炯明，请辞教育委员长职。陈炯明(当时在广西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24日复电：“教育委员会陈委员长鉴。被电悉，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会扫除之。炯明敬。”并在其辞呈上批示：“该委员长贞固有为，夙深倚重，所请辞职，应毋庸议云。”^②

8月27日 致函胡适，建议胡回皖任教育厅长，说旅沪皖事改进会同人“主张专力在教育上用功夫”^③。

是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成立宣言，称书记部是上海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人们的密切关系”^④。

8月30日 鲁迅致函陈独秀并寄周建人和刘半农的文稿。^⑤

9月1日 发表《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批评中国

① 《新青年》第9卷第4号。8月1日是该号杂志既定的出版日期，实际出版是在9月中下旬。因为陈在复信中说：“我前几天回到上海才见着你的信，所以久未答复，实在抱歉之至。”而陈是9月中旬由粤回沪的(见9月9日、13日条目)，有人根据《新青年》上刊登的这封信，断定陈是7月底8月初回沪的，不确。

② 《广东群报》1921年9月13日。

③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31页。

④ 《共产党》第6号。该号标明7月7日出版，实际9月中旬出版。

⑤ 《鲁迅日记》第368页。

人对华盛顿会议的迷梦，指出美国决不会主张正义人道帮助中国抵抗日本；列强间的妥协，对中国及太平洋沿岸弱小民族“不但没有解放的希望，被压迫的程度将比从前更甚，尤其是中国若不急谋剧烈的反抗，迟早不免要受列强分管或共管的命运”^①。

9月9日 参加广东教育委员会教职员举行的欢送祖饯大会^②。

9月10日 鲁迅寄陈独秀稿二篇。^③

9月11日 偕包惠僧返沪。因陈炯明不同意陈独秀辞职，乃请假离粤。中共“一大”后，马林召集张国焘、李达、周佛海和包惠僧开会，指出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书记，应尽到责任，不能由别人代替。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不能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决定包惠僧到广州接陈独秀。在回沪船上，陈独秀对包说：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做为共产党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④回沪后，专任中共中央书记，得知马林傲蛮作风及不征求中共中央意见，密派张太雷赴日本联络社会主义者参加即将举行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又称“远东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一事，极为不满，声言决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还对张国焘向马林提出的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和预算及给工作人员薪金的规定，十分气愤，斥之为“雇佣革命”，强调：“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⑤

① 《新青年》第9卷第5号。

② 《广东群报》1921年9月10日。

③ 《鲁迅日记》第369页。

④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二），《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5期。

⑤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59—160页。

10月1日 《新青年》出至第九卷第六号后停刊，新青年社解散。

10月4日 在渔阳里2号住宅被法巡捕房搜捕，搜出《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各杂志及印刷品多种。妻高君曼及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同时被捕。在捕房内，嘱咐包惠僧等人，不可说出共产党的真情，一切都推在他（陈独秀）身上，以争取陈一人在狱，其余人先行获释，并望从此应与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0月5日初审，请巴和律师辩护，“奉判陈独秀准交五百元，人洋铺保，候展期两礼拜再讯。其余诸人，均交原保。”19日，再次受审，被控二端：“一、违背公堂本年二月间禁售新青年的堂判。二、违犯新刑律二百二十一条之罪。”巴和律师代辩称：“《新青年》自奉谕禁以后，即移至广州出版，并未在法租界出售。……至《劳动界》亦系以前出版，自奉公堂谕禁，即已停止。《共产党》乃以前二房客留下，现已迁去，非陈所有。”刑律二百二十一条，亦必“公然煽惑他人”方能够构成罪名。“今捕房不能指出陈有煽惑他人犯罪之证据，故所控二端皆不能成立。堂上问陈君，报纸载尔在广东曾倡言仇父公妻，尔是否有此主张。陈答：“此为绝对造谣。”辩证终结，陈仍交原保，候七天后宣布堂谕。其余五人，均判无关系省释。26日，到公堂接受宣判，由法付领事宣读堂谕，谓：“搜获书籍虽多，尚无激烈言论。惟查出新青年有违前次堂谕，判罚洋一百元了案。”^①

10月7日 劝说沈雁冰继续主编《小说月报》，但需改革，“可以放得普通一些”。原来的《小说月报》主要刊登外国小说的译文和评论，国内创作的较少，一般读者反应看不懂，攻击剧烈。

^① 《民国日报》，1921年10月6、20、27日；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64页。张国焘说此次被捕还有李达，不确。

沈向商务印书馆总编辑表示辞职。经各方挽留,决定再试一年。对于陈的改革建议,沈在当时向友人表示:“仲甫先生谓普通一点,乃指程度不妨放低之意,如论文、史传、创作登载标准,不妨用初步的浅显的,以期初学者可以入门;此意弟以为很是。”^①

10月21日 邵力子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评论《社会主义与“公妻”》,再次为“陈独秀主张仇父公妻”辟谣。

10月22—24日 接连三天,在《民国日报》显著地位刊登《陈独秀启事》:“鄙人在粤时,曾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敌,躲在人背后,造下流谣言,中伤我,说我主张‘仇孝’‘讨父’‘公妻’,说我演说万恶孝为首,百善淫最先等语,居然传诸报章。我比即撰《辟谣》一文,登载《民国日报》,辨正此事,不图仍有一二家报章,转载此种无稽之言,以致法租界会审公堂,亦据此项谣言,对于鄙人有所怀疑。兹特声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物公然转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立即诉诸法庭,以儆那僻,决不取从前置之不理态度”。

是月 与李达商定,创办了一个女校,以期培养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李达任校长,陈独秀、高语罕^②、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等当教员,课程有社会科学常识、文化、劳动、学缝纫机等。因经费支绌,办了一年。

① 沈雁冰致周作人的信(1921年8月11日、10月12日、10月22日),《鲁迅研究动态》1981年第3期。

② 高语罕,安徽正阳关人,早年即与陈独秀相识。辛亥革命时,帮助韩衍组织青年军,与陈一起辅佐孙毓筠督皖。后来一直在陈的指导下从事革命活动。他与李光炯、刘希平、朱蕴山,被视为陈独秀在安徽的“代理人”。五四时期,他在安徽省立第五中学执教,后任学监,提倡白话文,反对封建文化,鼓吹民主主义,推动了安徽五四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即受陈独秀影响,入党。1929年随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1932年陈独秀被捕后,他脱离托派,但始终与狱中陈独秀保持着联系。抗战胜利后,在南京《新民报》社工作,后病死。

10—12月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粤汉铁路工人、上海英美烟厂工人、陇海铁路机务工人、汉口人力车工人等，先后举行罢工斗争。

10月底 获释后，正式辞去广东教育长的职务，接受沈雁冰和王云五之请，任商务印书馆名誉编辑。以中共中央书记身份，首次召集中央会议，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和会议的规范，确定工人运动的计划，决定继续出版《共产党》、复刊《新青年》。并筹备“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列宁著作。会后，旋与马林会晤，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陈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

11月初 托张太雷转给陈公博一信，嘱陈立即去上海，因为上海盛传陈公博在粤帮助陈炯明。陈公博见信后大怒，否认支持陈炯明，并拒绝赴上海，声明今后脱离共产党。翌日，中共广州支部开会，同情陈公博，主张广东共产党独立^①。

11月7日 在《民国日报》上发表时评—《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②》(署名“只眼”)，说：“鄙人欢迎此代表团之点有三：第一，欢迎他们定名上海各业工会，不假冒全国，全省等名义，不

①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甲编第191页，地方行政社1944年版。

② “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是11月5日上海12个工会团体，为了反对当时上海资产阶级操纵的“商教联席会议”排斥工人、包办国是而成立的统一战线组织。13日，“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劳动联合会”、“工商友谊会”等组织代表。因反对“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震瀛和李启汉提出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的名称和章程，退出了该组织，另成立所谓“上海各业工团联合总会”。于是，“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就由中共直接领导的真正的工人团体——上海机器工会、上海纺织工会及烟草、印刷等工会所组成。陈独秀为此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

愧‘诚实’二字。第二，欢迎他们限定各业工会，大概无业游民所组织的招牌工会不便加入了。第三，欢迎他们不称总工会而称代表团，可见他们很觉悟总工会的名义不便假冒。”15日，又发表时评——《再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就上海机器工会等团体与招牌工会、黄色工会决裂事件，发表评论，认为“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居然能够离开非工人的招牌工会，居然能够集合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真正工人的工会筹备组织，更加令人不能不欢迎佩服了。”指出：“这次机器工会等退出十团体联席会议，有人以为不幸；我以为因此促进真正工人对于非工人组织的工会之觉悟，更是一桩大大的幸事。这两桩幸事都是上海工人运动日趋进步的现象，在中国劳动史上都有记载的价值。”18日，发表《工人与军人》（署名：只眼）^①，揭露“现在上海有许多工会也是虚张声势的挂起中华中国全国总工会联合会等等好看的招牌，其实……并没有几个真正工人。”“因为这班办工会的人本来在社会上还够不上绅士的资格，现在乘着劳工神圣的潮流，想假借工会的名义来追随绅士们打电报出风头。”19日，发表时评《名实》，揭露“上海各业工团总联合会”及其成员的名称“中华全国”等是“名实不符”^②。

11月20日 发表《过激》^③。

11月23日 蔡和森、李立三等人由法回国。陈独秀与陈公培介绍他们入党，并留蔡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派李去湖南安源煤矿工作，陈公培去海南岛。^④陈独秀还与李立三、陈公培商

①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11月18日。

② 《民国日报》，1921年11月19日。

③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11月20日。

④ 《民国日报》，1921年11月24日；陈公培《回忆党的发起组织和赴法勤工俭学情况》，《“一大”前后》（二），第564页。

量，要把赵世炎召回国内工作。后来赵回信说陈催促其回国的理由“与我现在的情况不合，亦与我现在的意见不合，所以我不能从命”；“我虽然相信在中国实行布党的计划是有一线的曙光，但我现在实不敢自信我能够作事，所以我暂时决定不回来”。还说他因有感于“同志在欧之无基础事业，决计重振旗鼓干起来”，并且能集中一个时期可以有效的读书。^① 赵世炎于是就与周恩来、张申府等人积极进行创建中共旅欧支部的活动。

是月 以中央局书记名义，向各支部发出“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各发展党员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期全国要发展团员二千人及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各区必须有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以及从速建团，开展青、妇运动等。^②

12月5日 应邀参加安徽省教育会代表高语罕及光明甫在上海一品香餐馆宴请记者会，并与高、光一起，发言介绍皖省政情，揭露军阀张文生勾结省议会，挟兵迫召议会，兼欲自为省长，呼吁各界注意并援助皖人。^③

12月21日 撰《〈西游记〉新叙》。

12月23日 马林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向孙提出两点建议：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建立革命

① 赵世炎致李立三的信（1922年4月25日），《“一大”前后》（一），第385页。

② 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第202页。

③ 《民国日报》1921年12月6日。原督皖军阀倪嗣冲病废后，张文生督皖驻蚌埠。省议会约一半倪派议员欲开会掌握政权，商、教、农等团体反对，提出诉讼，不许开会，议员赴蚌埠与张文生政治交易，拥张为省长，张挟兵赴皖迫召会议。

的武装核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孙中山表示赞同。

是月 因找不到去年 11 月陈独秀等人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文原稿，张太雷将英文稿译出，提供给共产国际，望仔细研究，并转出席远东人民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的共产主义者讨论，以便进行修改补充。^①

① 《中国共产党宣言》译者说明。译者署名“Chang”，即“张”。当时参加远东民族会议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中姓张的只有两人，一是张国焘，一是张太雷。后者将此件翻译并提交国际可能性大，因他不仅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而且负责英文翻译。

1922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四十四岁

1月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大会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张国焘、张秋白(孙中山派遣的国民党代表)和邓培(铁路工人),促进国共合作。

2月 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明令北伐,张作霖、段祺瑞先后派代表到粤,与孙中山商议合作讨伐直系。

4月29日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6月,奉军败退东北。直系独霸北京中央政权,并提出“武力统一”的口号。各省地方军阀及胡适派人士,则以“联省自治”相对抗。

6月16日 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炮轰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孙登上永丰舰,亲率海军各舰讨伐叛军,失败后于8月14日,抵达上海;翌日,发表宣言,谴责陈炯明叛变,表示今后当继续奋斗,务期“合法国会自由集合”。

1月1日 根据陈独秀的提议,上海共产党全部党员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等与中国、朝鲜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百余人,工人五十人,上午在上海市内散发“贺年帖”六万张。“贺年帖”一面写“恭贺新禧”,另一面写共产主义内容的口号和

“太平歌”歌词，如“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推翻财主天下悦”，“不做工的不该吃”等。下午又在“新世界”等群众聚会的游戏场所散发了反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的传单二万张。群众见了说：“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了。”①

1月15日 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中国青年团、科学讨论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文化研究社诸团体假宁波同乡会馆召开纪念会，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殉难两周年。与会者五百余人。大会主席李启汉、沈玄庐、陈独秀、陈望道等先后发表演说。②

2—3月 马林由广州经上海到北京，通过苏联公使派克斯，向共产国际和苏联外交事务人民委员会提交中国问题的报告，向共产国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情况，向苏联外交事务人民委员会建议派一位苏联使者到中国南方来。③

2月6日 发表时评《答上海工界》，指出香港海员罢工的胜败，是全中国工人胜败问题，长辛店铁路工人及武汉等地工人支援海员罢工，“是中国劳动阶级觉悟第一声”；揭露上海几个招牌工会不敢支援海员罢工，“在工界便没有出头说话的资格了。”④

2月9日 发表《工人们勿忘了马克思的教训》，号召“世界劳工团结起来啊！”⑤

2月10日 发表《“宁波水手”》，提醒宁波水手勿为资本

① 《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

《陈望道谈话记录》，《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② 《民国日报》1922年1月16日。

③ 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 《民国日报》，1922年2月6日。

⑤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2月9日。

家所利用——“被雇到香港代替那罢工的广东水手”而破坏罢工。^①

3月5日 在《妇女声》“平民女校特刊号”上发表《平民教育》，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重要工具之一”，“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

3月15日 发表《基督教与基督教会》^②。

3月19日 参加在上海公学举行的上海纺织工会东部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号召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讲述了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的意义。指出上海的工厂和工人比广东多，但上海的工会反不及广东发达。“虽说两个地方的政治权力有保护劳工与压制劳工之分，但无论如何工人们总要自己去做的呀！”号召上海工人“热心”做工会运动。^③

是月 听取回国的张国焘关于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及会见列宁情况的汇报，表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和苏俄是不可分割的，须相依为命，互为声援，共同发展；目前中国革命不是什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对侵略和反对军阀。环顾全国，除国民党可以勉强说得上革命外，并无别的可观的革命势力。对列宁强调国共合作，“深表同意”，但“总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④。

3月26日 参加上海为黄爱、庞人铨举行的追悼会，并发表演说，号召“国民全体应共同协力，一体具反抗之精神，与军阀及外力奋斗”^⑤。

①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2月10日。

② 《先驱》第4号。

③ 参见《民国日报》1922年3月20日。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12页。

⑤ 《民国日报》1922年3月27日。

是月 会见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处的成员张太雷、刘仁静^①等,讨论团的“一大”议程和有关组织事项^②。

4月2日 致函周作人、钱玄同等人,指责他们主张“信教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却“不加赞许”。指出基督教势力的强大及政府已禁止非基督教学生开会的事实,揭露他们之“要求自由”,并非“真尊重自由”,劝他们“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赞扬“指斥宗教的举动”“在中国还是萌芽,或者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6日、周作人复函陈独秀,鼓吹“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指责陈信“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认为“这回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③

是日 应上海各学校组织的“星期演讲会”^④之邀,在毓贤高小,就“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及“非宗教大同盟”的斗争问题,发表题为《宗教问题》的演讲,指出:宗教“使劳动者天天为资本家做奴隶,不起来运动反对,大家和和乎乎过去,好使资本家安逸地得利。这层,从事劳动运动的人,哪能不竭力反对呢?劳动者又哪能心愿呢?”“照历史进化观念来研究这个宗教问题,便可以说宗教在现时的世界,已没有成立的必要了。”^⑤

① 刘仁静,湖北应城人,“五四”时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当时很崇拜陈独秀。中共成立后,他从事青年团的工作,并曾一度担任团中央委员长。任党中央委员长的陈独秀十分关心团的工作,因此俩人关系日益密切。后来陈独秀转向托派,刘仁静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② C.A. 达林:《中国回忆录》第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4月7日。

④ 此会是1月22日高君梅即(高君曼)与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王会悟、王剑虹等人一起发起的。

⑤ 《民国日报》,1922年4月2日;4月25日(《觉悟》副刊)。

马林由北京回到上海，分别与中共及国民党中央领导人多次会谈，国民党领导人表示允许中共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一致反对马林提出的“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的建议。^①

4月6日 致函吴廷康(维经斯基，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提出反对马林的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提议的六条理由：“(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望吴向第三国际代陈。^② 6月30日，再函吴廷康，重申上述意见。

4月9日 为芜湖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题词，回忆当年创办《安徽俗话报》时的抱负及艰难，称“这二十年中，孟邹办了个亚东图书馆，我做了几本《新青年》，此外都无所成就。惟彼此未曾做十分无人格的事，还可以对得起死友”^③。

4月12日 应邀于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演讲社会主义与普及教育问题，社会主义与妇女问题，指出平民教育及妇女问题，

^① 《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荷兰驻上海总领事致荷属印地总督阁下的信(1922年4月27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5页。

^③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200页。

除用社会主义解决外,无有其他较妥之办法^①。

4月21日 再函周作人,批评周反对非基督教运动:“倘先生们主张一切思想皆有不许别人反对之自由,若反对他便是侵犯了他的自由,……那末先生们早已犯过这种毛病,因为好象先生们也曾经反对过旧思想、神鬼、孔教……等等。”^②

4月23日 在吴淞中国公学演说,题为《马克思学说》。^③

是月 会见由北京回上海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达林告知他将与孙中山会谈,要求指派中共党员参加,表面上可充任其翻译。陈即派张太雷、瞿秋白参加。他们三人还组成委员会,拟定提交团的“一大”的纲领和章程草案。

4月底 与张国焘一起赴粤,筹划第一次劳动大会与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到达广州后,首先召集中共广州支部会议,并在会上报告召开劳动大会、青年大会的重要意义和国共关系问题^④。

5月1日 发表《告做劳动运动的人》,系统地论述了劳动运动的对象、劳动组织的系统、劳动者与党派、劳动运动的目标和手段等问题,声明:“现在世界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都已经使我们不满足现状不盲从环境的人们觉得非从事劳动运动不可了。”^⑤

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发表演讲——《劳动节的由来与意义》^⑥。

①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4月14日，4月23日。

②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4月23日。

③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4月23日。

④ 《马林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荷兰驻上海总领事致荷属印地总督阁下的信（1922年4月27日），均载《马林在中国的 有关资料》。

⑤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5月1日。

⑥ 《广东群报》，1922年5月3日。

5月5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陈独秀在会上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讲演，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而成立”的，“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刚好这两大精神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现代人说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便是如此”。“我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第二，“实际活动的精神。……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主义革命”^①。

在青年团一大开会期间，陈独秀多次出席会议，为大会起草及修改文件；中旬，应陈炯明之邀，偕陈公博等前往惠州与之晤谈，企图劝说陈炯明与孙中山避免火并，结果因未获成果而率青年团大会代表回上海。^②

5月22日 发表《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③

5月23日 发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④

5月底 召集中共中央会议，讨论时局及李大钊与一些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党外朋友要求中共支持“好人政府”的意

① 《广东群报》1922年5月23日。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30—231页。

③ 《广东群报》，1922年5月22日。

④ 《广东群报》，1922年5月23日。

见①，会议认为华盛顿会议决不能开辟一条改善中国地位的道路，废督裁兵不可能，“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决定不必顾虑到与蔡元培、胡适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谊，即应公开我们的主张，推陈独秀起草宣言。

是月 接待黄凌霜来访于《新青年》社，说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都是今天改造社会之健将，只可联合并进，不可分离排挤。

8月1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启汉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因“煽动邮局职工罢工”，“在《劳动周刊》上发表可能引起骚乱及破坏的文章”，被判刑三个月，期满后又被解给军阀何丰林处监禁二年又四个月（1924年10月13日才出狱）。9日，《劳动周刊》被租界工部局勒令停刊。

6月15日 就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起草并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军阀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恢复国会以维法统”、“联省自治”、“依赖吴佩孚”、“好政府主义”等办法都不能解决问题。提出“我们目前奋斗的目标”是“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等十一项原则，“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

① 张国焘回忆：李大钊当时曾函中共中央，认为“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5月7日，胡适、丁文江等人创办《努力》周刊，提倡政治革新。14日，胡适手撰，蔡元培、王宠惠、李大钊、罗文干等十三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号召“好人”论政参政，实行“好人政治”。

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①这个宣言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讨论，“没有经过很多的修改就通过了”。在七月中共“二大”上通过后，这个文件又送交孙中山的国民党中央，表示了建立（党外）联合战线的愿望。

6月中旬 派张国焘携带《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赴北京，与李大钊等同志谋得政治上的协调，李“毫不迟疑的表示同意”，并与主张好人政府的朋友们聚会，散发宣传中共主张的印刷品；有人说仲甫老爱标新立异，现在又唱反调；有人思考后表示支持。李大钊说明这不是仲甫一人的意见。从此有些人对中共表示同情，有些人与中共分手了。

6月16日 陈炯明叛变，炮轰孙中山总统府，陈独秀就此向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张继表示，陈炯明现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同时，中共中央致函广州支部，指示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但陈公博、谭植棠继续在《广东群报》工作，并发表文章支持陈炯明。在七月中共“二大”期间，中共中央开除了谭植棠，严重警告陈公博（陈因此退党），^②谭平山因优容二人，遭谴责后暂时离职。

6月30日 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名义，向共产国际报告党的“现在状况”和“将来计划”；党员已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人。将在全国各都会增设支部，多收工人党员，务求居全数一半以上，多印行对于农民工人兵士宣传的小册子；集中力量组织全国五个大的产业组合（全国铁路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全国电气工人总工会、全国机器工人总工会、全国纺纱工人总工会），

① 《先驱》第9号，1922年6月20日出版。

② 陈公博后来写回忆录，否认他在陈炯明叛变后还支持陈炯明的指控（参见《我与共产党》。）

组织上海、广东、武汉三个地方总工会等。^①

是月 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张国焘商定，“二大”代表不经各地民主选举，而由“从莫斯科回国的是那省的人就作为那省的代表”^②。

7月1日 发表《马克思学说》及与黄凌霜的通信，黄致陈函说，未去苏以前，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当未表示可否，“现在已确信此种方法，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此后惟有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而已”。陈复函黄，对“精研笃信安其那”（即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为“第一人”的黄凌霜，“今竟翻然有所觉悟，真算是社会改造之大幸，捧读来信，很喜。”说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③。

7月11日 马林到达莫斯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关于中国情况的书面报告，说上海“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但却没有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工人运动”。“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指出国民党领导了省港海员罢工，国民党与罢工工人联系紧密，一万二千名海员加入国民党，而“广州的共产主义团体却不和罢工工人联系，也不支持罢工”。“我曾向我们的同志建议放弃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但我们的同志反对这种意见。只要他们不敢与国民党联合，这些小团体开展宣传工作的前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③ 《新青年》，第9卷第6号。

景是暗淡的”。报告还建议中共中央“迁到广州”。17日，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作中国情况的报告^①。18日，共产国际主席团作出决定，接受马林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及中共中央迁往广州的建议，并由马林回中国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个政党坚持辛亥革命的使命，渴望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机构”，“这个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地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② 鉴于四月间陈独秀曾给维经斯基两函，坚决表示中共反对马林提出的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联合战线，维经斯基便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名义，给了马林一个“训令”，“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七月十八日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和菲力浦同志(马林)紧密联系下进行”^③。

7月16—23日 中共“二大”在上海成都路一所房子里举行。陈独秀在大会上作中央工作及六月十五日“宣言”的报告，并被推举起草大会宣言初稿。初稿由起草委员会(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组成)几次讨论，蔡和森提了许多补充和修改意见，最后通过了起草委员会提出的宣言草案。宣称：“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为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

①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1—21、64—65页。

②③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65、66页。

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王若飞说，“二大”的这个缺点，“产生了在第一个革命中放弃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陈独秀主义此时也就产生了萌芽”^①。在“二大”上，陈独秀被推举为中共中央委员长，蔡和森为宣传，张国焘为组织。

7月16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租界捕房查抄，25日被封闭，中共中央决定将其迁往北京。

7(8)月 会见由川来沪的朱德，对朱德提出的入党申请，回答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认为对于象朱德这样的人来，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感到失望，9月初离华赴欧，10月到达德国柏林，经周恩来介绍入党；申请书寄回国内，被中共中央批准为秘密党员。^②

8月9日 在家中被租界侦探拘捕，住宅被搜查，搜出《新青年》纸版共产党书籍等多件。事后，其夫人高君曼及陈之挚友多人，四出营救。中共中央曾通报各地组织派人到上海来活动，还曾电请孙中山设法营救，孙曾打电报给上海法领事。北京方面，有少年中国学会自治同志会、新中国学会、改造同盟、非宗教大同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十团体，也有所主张，并发表营救宣言。蔡和森、李石曾等亦联名致电法领事，并面访法公使询问，务使嫌疑冰释，恢复陈之自由。蔡元培并在北京面质法国大使，请其转令驻沪领事释放。又，长辛店工会亦通电营救。^③ 18日，会审公堂第二次开审，巴和律师帮办博勒律师称，所搜之物“不能认为充分证据”，“法兰西与中华民国，同为共和国家，言论

①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②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174—1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③ 《时事新报》，1922年8月18日。

自由,思想自由,载诸宪章约法。况陈君为学者,从事社会学之研究,安可不罗致书报”。捕房控陈系共产党,“然被告并无共产党之事,……收藏新青年书籍底稿,并无违犯章程。尚有各种往来信札,亦无鼓吹共产党行为”。最后中法会审官互相商议以后,判决罚洋四百元,交保释放。下午五时后,即有汽车数辆,停于捕房前,陈之挚友多人,握手慰藉,迎之出狱。其中还有两三个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青年团员,“在欢迎陈独秀出来的时候,还曾用俄语唱了国际歌”^①。

8月12日 马林与越飞一起来华抵达北京。然后马林携带共产国际《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训令”赴上海,批评中共中央提出的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孙中山不会赞成,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并提议中共中央再召集一次会议,讨论加入国民党的办法。

8月中旬 李大钊因营救陈独秀及与国民党协商联合事由京抵沪。18日,陈出狱后,即同李与国民党代表张继“商结‘民主的联合战线’……与反动派决战”^②。

8月22日 因马林要求,陈独秀在杭州西湖召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③,讨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问题。马林指出这是共产国际的决定,认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陈独秀反对马林的观

① 《民国日报》,1922年8月19日;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载《“一大”前后》(二),第1页。

② 李大钊致胡适的信,《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该信未署日期,从内容看,是20日左右。信中说:“昨与傅泉(即张继——引者)仲甫商结合‘民主联合战线’……。弟明日赴杭一游。”此“赴杭”自然是去参加“西湖会议”。

③ 这次会议的日期,张国焘说是8月8日,道夫·宾认为是8月17日,都不确。8日,马林未抵华,17日,陈还在狱中。

点和主张,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同时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決定,我们应当服从”,条件是要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宣誓服从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张国焘、蔡和森都反对马林的观点,李大钊赞成陈独秀最后的立场。会议最后通过了陈独秀的意见。但没有形成文字的决议。会议结束后,陈独秀提议李大钊留在上海一些时候,与国民党建立联系,还选派张国焘为中央代表,到北京、武汉、长沙等地传达“二大”及西湖会议精神。^①

8月22—26日 连续在《民国日报》显著位置发表内容相同的《陈独秀启事》,称:“此次法捕房在鄙人寓内检得文件中,有四万元收条一纸,其文如下:‘今收到省长公署交来(古厅长经手)毫洋四万元此据民国十年六月二十四日陈独秀’,此系去年广东教育委员会开办时,由省署交来教育经费四万元,此由鄙人亲出收条交古厅长带回省署存案,……此事有古应芬政务厅长经手可证。此收条已呈公堂,众目共睹,决无私相授受及他项用途之言,特此声明,以免各方面误会。”30日,《民国日报》还发表此四万元临时收条的影印件。

8月25日 马林拜访孙中山,提议不要单靠军事行动去收复广州,而要注重群众运动,并告以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提议。孙中山接受此议,并表示加入国民党可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旧办法。几天以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43—246页;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太雷拜会孙中山，并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国民党。

是日 马林代表正在北京与北洋政府谈判的苏联外交事务委员会代表越飞，与孙接洽，以求苏联政府对孙中山国民党的合作与援助，议订协议。孙鉴于陈炯明叛变，表示愿意与苏联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8月26日 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认为中国政治的状况之一“是政党之萎弱，幼稚的中国无产阶级，眼前还没有代表他的政党出现，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很萎弱。这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壮的表征。孤军奋斗的国民党，我们极尊重他有民主革命的历史，现在他还本着民主革命的精神进行，但党员尚少，运用政党政治来代替军阀的力量还嫌不足”。中国的阶级斗争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斗争，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斗争。因为中国劳苦群众的潜势力，虽然是无限的伟大，但是他们阶级的形成及意识方在萌芽时代，所以他们所表现的，只是组织工会和罢工运动，可以说纯粹为他们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时期还未成熟”。指出民主斗争的目标是“对内倾复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宣称：“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①

是月 撰《独秀文存》自序》，称“我这儿十篇文章，不但不是文学的作品，而且没有什么有系统的论证，不过直述我的种种

① 《民国日报》，1922年8月26日。《民国日报》在刊登此文时加了“附识”，说此文“只称许国民党有民主革命的历史……，那么中国要组织强大的政党，最好的方法是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都来加入国民党”。

直觉罢了；但都是我的直觉，把我自己心里要说的话痛痛快快的说将出来，不曾抄袭人家的说话，也没有无病而呻的说话，在这一点，或者有出版的价值。在这几十篇文章中，有许多不同的论点，就此可以看出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的产物，在这一点，也或者有出版的价值”^①。据汪原放说，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文存》，前后共出了三集（1921年第一集，1924年第二集，1930年第三集），而且多次再版，但是出《独秀文存》时，“实在是战战兢兢”。原因是“虽然这部《文存》里的文章，多数是关于民主与科学的，但后面已经有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了”。所以只出了一集，印了三千部。“到了《独秀文存》二集又由仲翁亲自编定以后，竟就不敢出版了，只有搁下了”^②。

9月4日 与张太雷一起，参加孙中山约集的各省在沪党员座谈会，座谈改进国民党党务^③。

9月6日 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九个成员之一^④。

与汪孟邹商谈出版《向导》周报事。

8日 致函汪原放，告《向导》“周报用最好的报纸印四千份，需款若干，请向各印局询明示知”。旋又派李达到“亚东”，与汪原放商定《向导》排印问题。汪提议照《新青年》十六开为好^⑤。

9月13日 为《向导》创刊撰“发刊词——本报宣言”，宣

① 该书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于民国11年11月出版，12月再版。其中收集了作者1915—1922年的论文、随感录和通信等。

②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75—76页。

③④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编1924年广州版；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06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⑤ 《孟邹日记》（1922年9月6日），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79—80页。

称：“本报同人依据……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

发表《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批判胡适等人鼓吹“联省自治”的主张^①。

9月14日 《民国日报》“本埠新闻”栏发表《国民党主义并无变更》，解释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引起的“种种揣测”和“殊多误会”。称：“中国国民党为民国惟一有主义而又谋进化之政党，入党手续，中山先生已允加变通，……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党纲，则决无所变更。陈独秀君最近曾有《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曾载本报来论栏），其加入中国国民党，于思想上亦似无矛盾也。”

9月17日 发表《答张东荪（联省自治与国家社会主义）》^②。

9月20日 发表《造国论》，认为中国此时算不得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还在‘造国’时代。”“造国”的程序是：“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批判了“恢复法统”、“制宪”、“地方分权”、“国会选举”、“整理财政”等政治主张；认为“资产阶级未壮大，无产阶级也自然不能壮大”，“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已经成熟了”。^③从本文开始，中国共产党“改用‘国民革命’来代替‘民主革命’这个口号”，并且后来“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陈独秀后来说明为什么有这个改变，因为“民主革

① 《向导》第1期。

②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③ 《向导》，第2期。

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①。

发表《国民党是什么》，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他的政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所以这样的原因：一、是国内产业发达的程度，尚未到阶级反抗显然分裂的时期，因此一阶级的政党自然不易发达；二、是国人思想的落后，至今尚在封建时代，而外来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时输入，思想界顿呈复杂的状况，中国国民党正是这种复杂状况具体的表现。”^②

9月24日 李大钊等十四人署名发表《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全文如下：

“启者：陈独秀君为社会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虽了结，而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版费损失在二千元以上。陈君清贫，同人深悉，遭此厄运，其何以堪，凡表同情于社会教育思想自由及与陈君有旧，愿解囊相助者，上海希交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高君曼，北京希交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收转为荷。

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胡适、邓中夏、刘仁静、张国焘、高尚德、李大钊、林素园、范鸿勃、黄日葵、蔡和森、缪伯英同启”^③。

10月1日 胡适发表《国际与中国》，攻击中共“二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是“瞎说的国际形势论”，胡说“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

① 《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向导》，第128期。

② 《向导》第2期。

③ 《晨报》1922年9月24日。

一”；声称“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主义的先决问题”。^①

10月初 与刘仁静一起赴苏，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机构迁移北京，张国焘代理中央书记。

10月4日 发表《英国帝国主义者所谓退回威海卫》、《议员学者跑到美国帝国主义者家里讨论宪法问题吗》、《请看国际帝国主义怎样宰割中东路》。^②

11月5日—12月5日 与刘仁静等人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刘仁静因能讲俄语代表中共在会上报告了中国形势和工人运动，说“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增长了”；“共产党和前几年它还只是一个派别和一个教育组织时的情况相比，今后将会取得很大的发展”。中共“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想要达到两个目的”；争取“国民党内许多有组织的工人”；“把自己的力量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如果我们不加入国民党，我们就会孤立”。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拉狄克在会上发言，批评中共几个月前还“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教训中共“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不要事先夸耀胜利”，“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③大会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提纲，提出：“如果说在西方，在有组织地积蓄革命力量的过渡时期曾经提出过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那么现在在殖民地东方，就必须提出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这种口号之所以适宜，是由于要对世界帝国主义

① 《努力》周报，第22期。

② 《向导》第7期。

③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60—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

进行漫长而持久的斗争，而这种情势要求把一切革命因素动员起来。”^① 提纲要求东方各国共产党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努力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权，坚决支援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参加了对这个提纲的讨论。^②

11月 从莫斯科致函赵世炎，劝赵世炎迅速回国工作，勿留恋于法国的华工运动，指出国内工作同志稀少，而拿国内的工人同旅法华工相比，国内工人运动更需要干部。

12月11日 致函蒋梦麟、胡适，告“中山近日颇有觉悟，已切言专力军事之错误，方努力谋党之改造”^③。

是月 在莫斯科复函“旅欧少年共产党”，答“少共”加入国内青年团的事宜，提议“旅欧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中央执行委员会”应改名为“执行委员会”；同时指示旅欧同志对于共青团纲领的两点误解和在欧行动的方略。此函于1923年1月2日到达巴黎，周恩来等人遂决定不待国内团中央信至^④，即实行少共改组，立即归属国内本团，实行改组的临时代表大会于二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巴黎召开，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遵守国内本团章程上重要原则，依据旅欧特殊任务，议定旅欧支部的章程。

年底 马林离华赴苏。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7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

② 《著名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俄文版第75页，转引自《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

③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76页。

④ 国内团中央的复函于六月份到达巴黎，其内容与陈独秀复函的内容一致。参见周恩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报告第一号》。《“一大”前后》(一)第431页。

1923年(民国十二年 癸亥)

四十五岁

1月10日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中国国共合作情况的报告。12日,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但这不能以取消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

5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强调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工人阶级的政党”,要中共在进行反帝的民族革命同时,“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中山与北洋军阀内战的问题上,我们支持孙中山”,要求尽快地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以发动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①

9月2日 苏联政府代表加拉罕抵北京,翌日,发表第三次

^① 这个“指示”何时及怎样传到中国,有不同说法:道夫·宾根据张国焘等人的回忆(《我的回忆》第1册,第285页),说这次马林回中国时,“口袋里带着这份文件”(《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6页);肖牲、姜华宣则根据《共产国际与东方》一书,说“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才收到这个指示,因此在这之前结束的中共“三大”不可能贯彻这个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第56页)。前一种说法似不确。因为5月1日马林还在广州举行的集会上讲话。

对华宣言，重申前两次宣言的原则。

10月 托洛茨基提出由四十六人签名的给苏共中央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预言“苏联经济危机必不可免”，“苏维埃政权必遭灭亡”，唯一出路是“让各派别组织和集团能自由活动”，建立党内的工人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其矛头指向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从而形成苏共党内的“莫斯科反对派”。全党辩论了“四十六人声明”，托洛茨基的主张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等一些大学支部、机关支部的支持。1924年1月，苏共召开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斯大林作了争论总结，批判托洛茨基反对派，说它是一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

1月1—3日 孙中山先后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党章》，解释“三民主义”，主张中国“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实行普选制度”，资源及大规模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经营管理，并得由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权”，保护工人，增进农人生活等。

1月26日 《孙文越飞宣言》发表，称：“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是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是月 在孙中山的策动下，驻留广西的滇军杨希闵、范石生、朱培德各部及桂军刘震寰部联合进攻陈炯明，并将其逐出广州。

2月21日 孙中山抵广州，任大元帅，发表演说，强调“和平统一”，“先裁兵，后统一”。翌日，谓“与西南之团结”，“张（作霖）段（祺瑞）之三角联盟”进行顺利；“吴佩孚若不从予之主张，

当用联盟之力讨伐之。”

6月13日 北洋政府内讧，曹锟逼走黎元洪。10月5日，在曹锟的利诱和威逼下，国会议员高价贿选曹锟为总统。

10月25日 孙中山召集国民党改组会议，中共代表谭平山、李大钊等人参加。

1月10日 回到北京^①，带回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

1月18日 发表《革命与反革命》，认为：“对于一个革命运动都应该以他的内容及起因或结果是否有进化的意义定功罪，不应该以他的行为者属何阶级何党派定是非。”主张：“对于任何党派甚至于任何军人每个革命的行动，都可以与之联合，这种联合纯然是革命的联合，为推进革命的过程而联合，为克服反革命而联合，决不是妥协的联合。”同时，发表《反动政局与各党派》^②。

1月21日 孙中山以总理名义任命中国国民党本部各部部长。23日，又任命廖仲恺、陈独秀等二十一人参议^③。

1月下旬 在北京与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邓中夏等代表中共中央听取旅欧回来的李维汉报告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情况和要求，当即批准旅欧共青团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个支部，并于29日，将决定函告巴黎。

1月24日 发表《反动政局下两个要案》、《最低问题》、《评蔡校长宣言》^④，评论蔡元培辞职。因为，1月17日，蔡为反对

① 《程志孟(陈独秀)致汪孟邹、汪原放的信》(1923年1月25日)，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89页。

② 《向导》，第16期。

③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12页。

④ 《向导》第17期。

反动政客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请辞北京大学校长。北大师生也掀起一场驱彭运动，李大钊联络蒋梦麟、顾孟余、马叙伦等二十名北大教授，以全体教职员名义上书大总统，请予罢免教育总长彭允彝，并乞慰留北大校长蔡元培以维持教育而弭学潮。陈独秀的评论说：“正告蔡校长及一般国民：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胡适则发表《蔡元培是消极吗？》予以反驳，并对陈独秀进行人身攻击：“自从袁世凯以来，政府专用金钱来收买政客，十年的功夫，遂使猪仔遍于国中，而‘志士’一个名词竟久已不见经传了！新文化，学生运动，安那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不不可作猪仔之敲门砖！今天谈安那其，明天不妨捧为政客；今天谈共产主义，明天又不妨作教育次长（指陈独秀曾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引者）！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不用谈起，组织也不可靠，还应该先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为要做人而有所不为的牺牲精神。”

1月31日 发表《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指出革命的正确主张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组织民众积极革命，反对一切个人的浪漫的消极的行动；创造武装的民众，不赞成个人的暗杀；组织有系统有计划有纪律的暴动，不是一时无组织浪漫的暴动；积极的与民众合作，决不把消极的不合作当做一种主义，当做打倒恶浊政治的方法向民众宣传。”同时发表《教育界能不问政治吗》^①。

2月7日 发表《为自由而战》、《中国之大患——职业兵与

^① 《向导》第18期。

职业议员》，《再论不合作主义——答北京〈晨报〉记者》。^①

直系军阀吴佩孚屠杀京汉铁路工人，酿成“二七惨案”。同时，各地工会也大部分被反动军阀捣毁和封闭，许多工人领袖遭逮捕和杀害。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二七”惨案后，北洋政府发出了对马林和陈独秀的通缉令。

2月中旬 在北京召集中共中央会议，听取张国焘关于“二七”工潮的报告，对工潮失败表示痛惜，探讨事先是否有方法避免这次屠杀。鉴于“二七”后北方白色恐怖严重，根据马林建议，决定中央机构秘密迁回上海，并派张国焘赴共产国际报告“二七”罢工经过。

2月20日 回到上海。

2月下旬 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讨论决议时，张国焘反对共产国际指示及马林对指示的解释——全体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陈独秀主张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但一部分党员可不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尤其是各级领导同志，不应兼任国民党的职务，以免混淆中共的独立面目。同时，为了加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影响，中共应帮助国民党增加工农党员，发展其在工农群众中的组织。马林同意陈的意见。张国焘同意陈的意见的前一部分，不同意他的后一部分。会议无结果而散^②。

2月26日 到达广州。

2月27日 以笔名“致中”发表《统一的国民运动》^③。

① 《向导》第19期。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92页。

③ 《向导》第20期。在1924年向导周报社印的《向导》汇刊第一集目次里，该文作者“独秀”。

3—4月 因“二七”后一部分落后的工人群众受国民党及无政府主义者的挑拨，对中共表示不满，并要挟解决他们的失业、救济问题。陈独秀多次谈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和带有流氓无产阶级的色彩，遭到邓中夏、蔡和森、张国焘等人的反对^①。

4月7日 致函胡适，催早日出版瞿秋白介绍“新俄”的书，告广州局面“尚称巩固”，“孙（中山）公政策以锐意裁兵为天下倡，一时决无向外发展计划，鄙亦以此计良佳”。^②

4月10日 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发布命令，委任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陈与马林共同制订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与其他国民党领导人讨论这一计划后，委托陈独秀更详细地来制定这一计划。此计划，最后为孙中山所接受。^③

4月14日 在广州的广东工会联合会机关报《劳动》周刊创刊。署名“独秀”的发刊词写道：“世界上无论何事何物，都属劳动者之劳力所创造，即可谓无劳动即无世界。而轻视劳动压迫劳动，无论中外古今，却如出一辙。孟子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此即知识者对于劳力者之代表言论也，人类不平之事无过于斯。”近代劳动阶级势力渐壮，而且日渐觉悟，在俄罗斯已变为社会的主人。“中国劳动阶级尚在幼稚时代，观于此次北洋军阀惨杀京汉铁路工人，则中国劳动者在世界各国中乃居最困苦不自由之地位可知；欲脱离此困苦不自由之地位，非联合全国劳动者（工人农民）为一大团体，势不能与横暴之军阀相抗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84—285页。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94页。

③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7号（1923年4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主编《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第30、432页。马林给共产国际的两次报告（1923年5月14、31日），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东方》1969年莫斯科版。

衡。军阀一日不除，劳动者必无自由之一日。”最后宣称本报发刊宗旨，“即在唤醒劳动同胞，为全国劳动阶级统一之大团结，为全国劳动阶级之利益与自由而战，打倒军阀，打倒援助军阀之国际帝国主义，更进而为劳动阶级之最终目的‘劳动者治人’而奋斗！”

在同报“评论”栏内，还发表了署名独秀的《工人之觉悟》和《警告茶居工人》二文。前文指出，中国工人渐有觉悟，而应有何种觉悟，“吾以为第一期之觉悟，曰国家观念”，即工人“必须起而与闻政治，对内则努力打倒军阀之专横，对外则努力反抗强邻之压迫”；“第二期之觉悟，曰阶级观念”，即“全工人阶级之大联合”，不应以行业观念及地方观念破裂全工人阶级之大联合，不应假军阀之势力同类相残，不应贪资本家之金钱受资本家走狗之教唆，脱离工界大联合而独立。“吾希望工界同胞，应有国家之觉悟，更希望进一步而有阶级之觉悟”。后文批评了近来茶居工会发表的声明中所反映的“劳资兼利”、“否认政治”的论调。

4月18日 发表《怎样打倒军阀》，认为国民运动“要成就一个革命的局面，断然不可没有一个势力集中的革命党做中坚，担负破坏及建设的责任”。凡属民主革命分子，“应该集中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若是大家都想别树一帜，这便是游戏，出风头，不是真要革命。”宣称：“我们现在并不是鼓吹劳农革命。”知识阶级、工商阶级……应当竭尽全力以赞助劳动阶级的组织及运动，“方能运用此最有实力之社会阶级来反抗军阀”^①。

4月21日 在《劳动》周刊第二期“评论”栏中发表《收回旅大与廿一条件》及《广东工界之耻辱》，指出“中国对日外交，欲解

^① 《向导》第21期。

决旅顺大连湾问题，必先解决廿一条件问题，因为廿一条件中有旅大租借地展期一项”；而北京政府于一九一六年“接受日本关于廿一条件要求之换文，实属卖国行为，至今遗日本以口实，观此吾人不独应反抗帝国主义之日本，且应早日推倒北洋军阀及其所盘踞之北京政府”。后文认为“全国各条铁路，几乎皆有铁路工会之组织，而广东独无，此广东工界之耻辱也”。又认为工人阶级在广东民主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战争中，应“以实力援助民主政府之军队，使之战胜北方军队，使之完全扫荡北洋军阀之势力。但在北洋军阀指使沈鸿英向民主政府叛乱时，粤汉工人坐视叛军占得运输之便利，运兵南来，“是由于粤汉铁路工人无完全独立铁路工会组织之故，此广东工界耻辱中之大耻辱也”。

4月25日 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宣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同时发表《沈鸿英叛乱与政学会》、《对等会议与孙曹携手》、《海军态度》^①。

5月2日 发表《外交问题与学生运动》^②。

5月5日 在《劳动》周刊评论栏内发表《敬告“五一俱乐部”诸君》，批驳黄色工会“五一俱乐部”主张的“劳动运动须离开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是人类自相残杀”的观点。

5月9日 发表《陈家军及北洋派支配下之粤军团结》、《杨森果为统一而战吗？》、《可怜的伸手派》、《好一个救国的妙计》、《答邓汉琼》。^③

① 《向导》第22期。

② 《向导》第23期。

③ 《向导》第24期。

5月12日 在广东高师发表第一次讲演：《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后来又发表第二次讲演：《我们相信何种社会主义》；6月20日发表第三次讲演：《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① 讲演系统地论述了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证明社会主义是今后必走的路”，而在各种社会主义中，“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最好”；社会主义如何在中国开始进行，“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

5月16日 发表《闽赣局势之新发展》、《段派之活动》、《华、洋人血肉价值的贵贱》、《吴佩孚与康有为》、《国民党与交通安福》、《吴佩孚爪牙、阎锡山第二——杨森》。^②

5月19日 发表《劳动阶级之政治运动》。^③

5月23日 发表《临城掳案中之中国现象》、《军阀统治下之学生运动》、《孙曹果然携手了？》、《洋人势力下之宜昌学生与上海学生》、《国会议员宣布张阁罪状与曹吴态度》。^④

5月26日 在《劳动》周刊评论栏内发表《民主联合战线与劳资妥协》，认为在半殖民地之中国，“压迫劳动阶级掠夺劳动阶级者，乃以外国之资本帝国主义者及本国之军阀为其第一敌人，本国资产阶级犹其次也。此等半殖民地力量幼稚之劳动阶级，欲以革命手段打倒其第一敌人，而且是强大之敌人，固非独

① 《陈独秀先生讲演录》，上海平民书社1924年11月第3版。由于该书初版是1924年5月，所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的《六大以前一党的历史材料》，将这三次讲演，以题《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收录时，误注为“一九二四年五月讲于‘广东高师’”；有的年谱，也将此条列入1924年5月的条目中。皆不确。1924年5月，陈独秀并未到广州讲演；而在《陈独秀先生讲演录》的末尾，明确注明“十二，五，十二于广东高师”，即民国十二年五月十二日。此是第一讲。第三讲是：“十二，六，二十于广东高师。”

② 《向导》，第25期。

③ 《劳动周刊》（广州），第6期。

④ 《向导》，第26期。

力所能胜任，此其所以革命的劳动阶级有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战线之为要”，“此种联合，纯粹是两阶级革命行动之联合，决非两阶级主义之联合，此绝对不容混同者也”。“资产阶级利用劳动阶级之助手获得胜利后，阶级斗争日趋明显而强烈，以阶级利益冲突之故，资产阶级利用政权压迫劳动，此属将来必至之事，两阶级政治之斗争，自此始起。”

5月30日 发表《帝国主义的列强与军阀》、《吴佩孚的“匪力统一政策”》、《黎元洪与曹张》。^①

是月 撰《芜湖科学图书社十周年纪念》。

6月1日 呈报孙中山大元帅，说自己已被推定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委员有谭平山、马超俊），自即日起，组织成立启印视事，8日，孙中山发布指令，批准陈独秀为宣传委员长^②。该委员会，在12月4日，与“大本营党务处”、“广东宣传局”一起，被孙中山命令“裁撤”^③。

6月6日 发表《呜呼！外国政府下之商埠同盟》、《外国土匪也来了》、《美国不是外国？冯玉祥不是军阀？》。^④

6月10—20日 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举行。陈独秀在会上报告中共中央一年来工作的经过和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演变，着重指出“二七”罢工失败及其后的种种情况，都证明无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强调国民革命的重要，承认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心，原则上主张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中共应领导工农群众，成

① 《向导》，第27期。

②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15号（1923年6月15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第79—80页。

③ 同上，第40号。

④ 《向导》，第28期。

为国民革命中的一个强大的左翼。报告指出：“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指1922年8月的西湖会议——引者）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虚构的，而以后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社会当前形势，并参加了当前的运动。”报告自我批评说：“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还很容易激动。”批评张国焘“思想非常狭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①会上，张国焘提出中共独立领导工人运动，不应介绍大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修正案，表决时八票对八票，最后大会主席陈独秀的一票起了决定作用，否决了这个修正案。陈独秀提出的在国民党内组织中共党团，以保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一致的主张和行动的提案，获得一致通过。大会最后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任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张国焘因反对国共合作政策，并因此进行小组织活动、拉拢一些人反对陈独秀而落选中央委员。^②

“三大”期间，陈独秀发表了一些对国共合作政策右倾的言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诞生早了，“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③

中共“三大”通过瞿秋白起草的《党纲》，但会后付印前，有几处由陈独秀作了重要修改：一、“此革命之中，只有无产阶级是唯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93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12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第523页。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95页，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

③ 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5期。

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因为其余的阶级……”，改为“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份，因为其余阶级”，此句之下还加了一句“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二、原文“……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改为“……也很难成功”；三、“无产阶级应竭力参加促进此民族革命，……督促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为“……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上的着重号是瞿秋白后来说明这种修改时加的——引者）。

瞿秋白还说：“当时确有一派同志（指陈独秀等人——引者），无意之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暂时苟且偷安罢了。”^①

“三大”以后，陈独秀与李达、毛泽东、徐梅坤一起两次拜访廖仲恺，商谈国共合作问题。^②

6月13日 发表《日本惨杀长沙同胞》。^③

6月15日 《新青年》改为季刊，仍作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重新在广州出版，并发表《新青年之新宣言》宣称：“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社会崩坏的时候，正是新青年的诞辰。”“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陈独秀在第一期上发表译作《殖民地半殖民地职工运动问题之提要（职工国际第二次大会决议一部分）》。

6月20日 发表《儿戏之北京政府》、《临城事件与长沙事件》、《告上海纳税华人会》。^④

6月下旬 陈独秀与马林共同提议响应上海资产阶级的民

①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② 李成华：《九旬老人的心愿——访出席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人民日报》1983年7月12日。

③ 《向导》第29期。

④ 《向导》，第30期。

治要求委员会提出的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其办法是请求国民党发宣言，而不用共产党名义发宣言，遭蔡和森抗议反对，打消了这个企图。^①

7月1日 中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前锋》月刊创刊。陈独秀为此撰《本报露布》（发刊词），宣称：“我们认定国民运动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是备受压迫过困苦生活的全中国人民之救星；我们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顾当前锋，只顾打头阵。”同时发表《中国农民问题》。

7月11日 发表《北京政变与国民党》，肯定国民党在广东执政期间“未曾压制人民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国家每有大难，如袁氏谋叛、张勋复辟、段氏毁法等，国民党莫不出而肩负巨任，为国牺牲”。指出：“此时国民无论对何派人都绝望了，所希望能救国的只有国民党。在此重大时机（指曹锟的北京政变——引者），国民党就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②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同时发表《北京政变与军人》、《北京政变与学生》。^③

7月18日 发表《我们要何种势力管理中国》。^④

是月 中共中央就曹锟驱逐黎元洪的北京政变，发表对于时局之主张，指出：“拥护黎元洪”、“拥护段祺瑞”、“国会南迁及制宪”、“团结西南联省自治”、“借助列强”这些办法都不能解决时局；提议：“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

① 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5期。

② 即直系、奉系、皖系与西南军阀。

③ 《向导》，第31、32合刊。

④ 《向导》，第33期。

开一国民会议，……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①

8月1日 发表《欢迎〈民治〉周刊》、《呜呼！北京学生联合会》、《答李子芬（乡村共产主义运动）》。^②

8月29日 发表《粤局与革命运动》、《护路提案与美日》、《江浙和平公约与商界》。^③

是月 马林被调回莫斯科。月底，陈独秀派蔡和森与张国焘谈话，正式通知说马林已被调回莫斯科，说明陈独秀一直不赞成马林那种排斥反对者的态度。几天后，陈独秀邀请张国焘参加了一次中共中央会议，派张担任铁路工会的领导工作。^④

9月8日 发表《日本大灾与中国》、《张作霖令驻京东省议员离京》、《章炳麟与民国》。^⑤

9月10日 与毛泽东联名签署《中共中央第五号通告》：“派平山同志驻粤，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央局。又润之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是月，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到上海。

9月16日 发表《黎元洪南来》^⑥。

9月23日 发表《东铁地亩问题》^⑦。

9月30日 发表《曹锟贿选与中国前途》^⑧。

是月 因孙中山要求，加拉罕推荐，鲍罗廷来华，到达上海，会见陈独秀等人。

10月6日 鲍罗廷抵达广州，被聘为国民党特别顾问，并

① 《先驱》，第24号。

② 《向导》，第34期。

③ 《向导》，第38期。

④ 《向导》，第39期；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05页。

⑤ 《向导》，第39期。

⑥ 《向导》，第40期。

⑦ 《向导》，第41期。

⑧ 《向导》，第42期。

指导陈延年、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加伦任军事顾问。另外，11月维经斯基接替马林来华，常驻上海，指导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中共中央的工作。维经斯基表示共产国际并不赞成马林看轻中共，牺牲中共独立的作法，支持中共领导人不兼任国民党职务及积极领导工农运动的主张，并说明加入国民党是联合战线的具体形式^①。加拉罕则在北京指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北方区委的工作。形式上，各地受中央领导，“但许多问题是独立作主的，许多意见中央主张是不能到各地的”^②。

10月17日 发表《贿选后国民所能取的态度》，号召国民努力做“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前者“以承认苏俄为具体的有效的办法”；后者“以扶助及扩大国民党为具体的有效的办法，因为国民党是在过去现在历史上反抗北洋军阀比较有力的团体。国民联合的运动中，非有一个有力的大党做大本营不可”。同时发表《研究系与中国政治》、《临城案与侨日华工被杀案》。^③

10月20日 发表《青年们应该怎样做》^④。

10月27日 发表《我们为什么欢迎泰戈尔》^⑤。

10月28日 孙中山召集国民党改组会议，委任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和邓泽如等九人组成新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委员，进行国民党改组工作。

10月31日 撰《苏俄六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六周年，批驳对“俄罗斯过激党”的种种“疑谤”，赞扬苏联的成就。指出：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07—308页。

②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③ 《向导》第43期。

④ 《中国青年》，第1期。

⑤ 《中国青年》，第2期。

“我们革命十二年，如今越闹越糟；俄罗斯革命才六年，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建设？主要的原因是有一个几十万人的过激党，负了为国家由破坏而建设的大责任同心戮力的干。”反对章士钊所谓“农业国不应该有党”的谬论，主张中国“必须有好党才有好政治”^①。

10月 以中共中央委员长名义与秘书罗章龙共同签署《中央通告第十九号》，指示开展承认苏联运动^②。

11月7—25日 多次与汪孟邹、胡适之聚谈。

11月16日 发表《安徽学界之奋斗》^③。

11月16日 张国焘致函维经斯基，告陈独秀来信表示“现在感到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政治论断，不太切合实际”。张国焘认为：“这很清楚地证明，陈独秀和马林同志的计划遇到了困难，目前不能兑现。”因为从十月起，“上海的一些国民党员中出现了一股反对我们留在国民党内的的情绪。李守常同志还为这件事去了一趟上海。看来，国民党员中对我们加入国民党产生了意见分歧，而且日趋尖锐。”^④

11月24—25日 主持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代表中央局作“三大”后的工作报告，分政治、宣传方面、与国民党关系、劳动运动、农民运动、党务六个部分，指出：因同志中对于“三大”决议案“有多少疑虑”，“同志和国民党党员间的猜疑及政治观念不同”等原因，原拟在最短期间成立北部中部（国民党各重要支部）之计划遂未能实现；“惟北京已有组织；天津、哈尔滨、湖南也在

①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1月7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34页。时间是中央档案馆编者判定的，“十九号”可能是“九号”之误。

③ 《向导》，第46期。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

进行，湖北、南京方与国民党交涉中；山东、四川国民党本有组织，对于我们的同志加入工作者颇信任……。”^①

11月27日 发表《陈炯明与政局》、《外币与主权》、《恢复华人领港权》。^②

11月29日 邓泽如(国民党中央委员)写信给孙中山，攻击国共合作是“陈独秀的共产党利用我党之阴谋”，孙中山逐条予以批驳。^③

11月 以委员长名义与秘书罗章龙共同签署《中央通告第十一号》，指示各地应召集紧急会议，发起反英运动。

11—12月 应汪孟邹的邀请，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并与胡适发生争论。11月13日完成的序，在批判了张君勱、梁任公及丁文江的唯心史观后，点了胡适的名：“适之最近对我说，‘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份的问题’，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最后指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先生和胡适之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象张君勱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

11月29日 胡适也给《科学与人生观》写了序，认为“这一次为科学作战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不曾具体地说明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却去抽象地力争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并在序后附注：《答陈独秀先生》，说对于唯物史观，“独秀自己也不曾说的十分明白”；“独秀终是一个不彻底的唯物论者。他一面说‘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一面又把‘物质的’一个字

①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10页。

② 《向导》，第47页。

③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320页。

解成‘经济的’。……我们治史学的人，知道历史事实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虽然极端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等事也都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所以我个人至今还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的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

12月9日是星期天，亚东的朋友们都去看梅兰芳的戏，陈独秀却到亚东图书馆编辑所继续写《〈科学与人生观〉的序——答适之》，汪孟邹见他“未免寂寞”，陪他到晚上。在《答适之》中，陈批驳了胡二点：(一)“照适之的意见，只须努力具体的说明科学的人生观，不必去力争科学可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象这样缩短战线，只立而不破的辩论法，不是纵敌，便是收兵。……适之只重在我们自己主观的说明，而疏忽了社会一般客观的说明，只说明了科学的人生观自身之美满，未说明科学对于一切人生观之威权，不能证明科学万能，使玄学游魂尚有四出的余地；我则以为，固然在主观上须建设科学的人生观之信仰，而更须在客观上对于一切超科学的人生观加以科学的解释，毕竟证明科学之威权是万能的，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二)“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在人类社会，自然以经济(即生产方法)为骨干”；“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是指物质的本因而言，由物而发生之心的现象，当然不包括在内。……唯物史观的哲学者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是“一元论”，而非“多元论”。“这本是适之和我们争论之

焦点”。对胡讥笑的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事业”，陈“的解答是：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范围内，唯物史观论者本不否认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然其效力只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以内。思想知识言论教育，自然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然不能说他们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和经济立在同地位。”“适之果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象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①

12月1日 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革命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同时发表“寸铁”六则：《亡中国者留学生也》、《中华民国的新法律》、《皇帝与学术》、《辜鸿铭太新了》、《基督徒望基督成佛》、《孔圣人又要走运了》。^②

12月11日 汪孟邹复胡适6日函，告“仲甫做了一篇答适之文，约三千字，即附你答独秀文之后，明日可以排好，即行打样，与你的序清样一并邮呈”^③。

① 《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7年5月第5版。《孟邹日记》（1923年11月21日、12月9日），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87页。

② 《前锋》第2号。

③ 胡适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存。

12月12日 发表《赵恒惕、陈炯明与联省自治派》、《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①

12月19日 发表《联省自治与新西南主义》^②。

12月20日 瞿秋白发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批判“二次革命论”，指出：“平民之革命民权独裁制是民权革命中最切近的目的，……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来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领袖权。劳工阶级的最后目标在社会主义，那么，到国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③

12月25日 以中共中央委员长名义与秘书罗章龙共同签署《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指出“三大”后，本党同志参加国民党的工作“以种种障碍未能见诸实行”；现在国民党之改组已在进行，颇有振作之希望，“中局方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的工作”，望各地方同志切实执行：“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望即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通告要求各省代表对国民党党纲章程“应详加讨论”，过上海时“再集会议决一致的主张”^④。

12月29日 发表《关税主权与资产阶级》、《宾步程与工人》^⑤。

① 《向导》第48期。

② 《向导》第49期。

③ 《新青年》(季刊)第2期。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6)，第165页。

⑤ 《向导》第50期。

1924年（民国十三年 甲子）

四十六岁

1月21日 列宁逝世。

5月 苏共举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共产国际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两会都批准了苏共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反对派政纲的批判。

1月20—30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举行于广州，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决定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李大钊、瞿秋白、林祖涵、毛泽东、谭平山等共产党人当选为中委或候补中委。在大会上，国民党右派分子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竭力反对国共合作，攻击共产党员“跨党”，李大钊据理驳斥。大会经过辩论后，同意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

9月3日 江（齐燮元）浙（卢永祥）战争爆发，引起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重组内阁，邀请孙中山北上。11月24日，段祺瑞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2月6日，段政府发表致外国使团书，声称“外崇国信”。

11月13日 孙中山偕宋庆龄离粤北上，17日到达上海，接

受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宣布召集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政治主张。21日离沪，31日扶病入京。

1月1日 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共产党和青年团在协助国民党改组中的方针问题。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及鲍罗廷等出席了会议。会上，陈独秀讲了话，他“建议所有同志协助国民党改组”。鲍罗廷提出“不提议陈独秀为国民党中央候选人”，陈独秀表示同意^①。

1月6日 孙中山指派柏文蔚、张秋白、陈独秀为安徽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②。

1月8日 给《民国日报》一封信，对国民党改组后的章程提出修改意见，主张吸引党员“固应郑重将来，加以严密的规定，以慎其始也”。^③ 9日，《民国日报》第2版（第一版是广告）头条《言论》栏，发表《介绍一个“党”的意见》，摘录陈独秀信中有关党员资格及入党手续的修改意见，称赞陈独秀的信“很有见解”，“提出了几个有价值的意见”，“其中最有益的一点，就是分子的选择和审查，……没有好分子，断不会有好党。”

1月9日 发表《广东战争之意义》，批驳孙（中山）陈（炯明）之争是所谓“集权制与分权制政见不同之战”，“广东内部”之争的说法，指出是“北洋军阀与南方革命党之争”，因为陈炯明之攻击孙中山是“应援北洋军阀的统一”，“破坏南方革命之进行”。同时发表《商界反对火车加价与和平运动》、《内债与军阀》、《研究系及小孙派》^④。

1月18日 汪孟邹复胡适11日函，告“仲甫常与我谈，云

^① 《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联席会议》（1924年1月1日）。

^② 《民国日报》，1924年1月13日。

^③ 《民国日报》，1924年1月8日。

^④ 《向导》，第51期。

有数讯寄兄均未得复，望吾兄即复他一讯如何”^①。

1月20日 发表《祝上海丝纱女工协会成功》，“希望这个协会能有多数真正工人出来办事；……须为女工们实际的生活所需要而奋斗！”同时发表《日本政友会之分裂》^②。

是月 发表《国民党与共产主义者》，阐明国民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之不同；批驳国民党改组后“是国民党赤化了”，“是共产派利用国民党做共产主义的运动”之论调，声明：“共产主义者加入国民党，乃是因为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在世界革命的重要，决不是因为想赤化国民党利用国民党来做共产主义运动而加入的；因为共产党的目的使命及革命的动机，都截然和国民党不同，是断然利用不来的”^③。

2月1日 发表《一九二三年列强对华之回顾》、《实庵笔记》及“寸铁”四则：《精神生活及东方文化》、《国学》、《圣人也得崇拜商品》、《卖场上的农村立国》^④。

2月2日 发表《列宁之死》^⑤，阐述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个人的主观意志无论如何伟大，决不能创造客观上绝对不可能的东西”；“个人的意志固然不能创造客观上不可能的东西，而在客观上可能的范围以内，却有个人意志回旋的余地，并且必须有此个人的努力及天才的创见，这客观上的可能才能够适当的实现。”

2月20日 发表《陕西农民的困苦》，指出农民的困苦，劣绅之罪恶。“农民自救，只有‘聚众反抗’这一条路”。同时发表

① 胡适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存。

② 《向导》，第52期。

③ 《中国国民党演讲集》，第1集。

④ 《前锋》，第3期。

⑤ 《中国青年》，第16期。3月15日出版的上海大学进步学生社团“孤星社”刊物《孤星》第4期，转载了该文。

《日本之政局》^①。

发表《北洋军阀三种新借款》、《电报电话借款之秘密》，揭露北洋政府出卖全国交通主权，号召“全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反对。”“这件事决不是向北洋政府或地方政府电报抗争能收效，必须有实力对付方法。”同时发表《新疆省之煤油矿》、《法国政党之新趋向》、《印度自治运动》、《卷烟特税问题》及“寸铁”十一则：《马联甲为什么铲烟苗》、《岑春煊派员投北》、《圣道一门的王芝祥夫妇》、《呜呼旧历新年》、《外币祸》、《兵吗还是匪》、《减缩军备吗还是扩张》、《非进口的外货》、《呜呼宪法运动》、《易卜园光与北洋势力》、《列宁碑》。^②

2月27日 发表《国民党之模范的改造》，指出必须具有“服从和牺牲精神”，“才能算是一个革命党员，必须多数党员具有这两种精神才能算是一个革命的党。”同时发表译作《合作社问题》，并写前言《告合作社同志们》，谓：“合作社是阶级斗争中的一种工具，不是一种免除阶级斗争的工具。……近见南京东大附中合作社的宣言，觉得他们或者没有拿合作社运动来免除阶级斗争的妄想与取巧的心理。”另外，还发表《商界反对外人干涉中国内政第二声》、《意械事件》、《土耳其放逐教主》、《荷兰与远东》及“寸铁”五则；《新闻记者与土匪军阀》、《联省自治的下场》、《“我们不问政治”》、《中俄交涉与东交民巷》、《陈炯明、赵恒惕到底为什么反对孙中山》^③。

3月19日 发表《上海织绸厂焚毙女工之责任者》、《工党政府下之英国工人罢工运动》及“寸铁”四则；《统一》、《慎重与上

① 《向导》，第53、54期。

② 《向导》，第55期。

③ 《向导》，第56期。

当》、《恐吓我们的唯一法宝》、《无枪者连拍马也不灵》^①。

3月24日 致函胡适，告《中国青年》将出特号反对泰戈尔，请胡做一篇短文^②。

3月26日 发表《中国工人运动之转机》，称“二七”后“各处的工人运动便随着一落千丈，去年一年中，简直没有工人运动可言”，“今年或者是工人运动转机的时期了”。“我们希望全国工友们及帮助工人运动的知识阶级勿轻轻放过这个转机时期。”同时，在《向导》“寸铁”栏中撰《利用国民党》，表示：“共产革命是劳资两阶级的争斗，国民革命是各阶级合作对于外族及军阀的争斗；所以只有国民党能利用共产党，而共产党决不能利用国民党。”此外，还发表《中俄会议之成败》、《煤油战争》、《菲律宾之独立运动》及“寸铁”：《华官与西人不睦便须更换》、《曹锟的妾舅与洋大人》、《娼优》、《造谣中伤》、《武力统一的榜样》^③。

发表《工界最近之惨剧》、《评中俄协定》及“寸铁”四则：《国故党与复辟党》、《拜寿的吃耳光》、《老马与小犬》、《反动》^④。

4月2日 发表《湖南废省宪运动》及“寸铁”二则：《外交失利》、《呜呼改火》^⑤。

4月16日 发表《上海租界三大问题》及“寸铁”六则：《美国驻华海军》、《部落主义与世界主义》、《读书时代不许干政》、《帝国主义者制驭殖民地的公式》、《谁叫他们不要皇帝》、《三位一体的国故、孔教、帝制》^⑥。

① 《向导》，第57期。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42页。

③ 《向导》，第58期。

④ 《向导》，第59期。

⑤ 《向导》，第60期。

⑥ 《向导》，第61期。

4月18日 发表《泰戈尔与东方文化》^①。

4月23日 发表《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认为目前国民党还“没真的左右派之意见发生”；宣称：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加入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而加入的，不是妄想赤化国民党利用国民党来做社会主义的运动而加入的。”同时发表《导淮问题与政治》、《美国移民案与海军案》及“寸铁”八则：《外人——外交当局——中国报馆》、《冤大头》、《象的民族》、《复辟预言》、《天下没有不吃饭的圣人》、《马蜂党与曹锟》、《反对曹大总统！马蜂桥四号》、《崇拜泰戈尔的主张派兵征服蒙古》^②。

4月30日 发表《丧权辱国之无线电密约》、《投降条件下之中国教育权》及“寸铁”四则：《泰戈尔与梁启超》、《中国土匪军阀之来源》、《洛桑议约与中俄协定》、《好个友爱无争的诗圣》^③。

4月30日、5月1日 发表《苏李诗考证》^④。

是月 发表《评泰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⑤。

5月7日 发表《英、意人殴伤巡士税吏》、《上海租界工部局能在华界行使职权吗》、《欢迎广州上海两学生会》、《欢迎奉天东报复刊》及“寸铁”三则：《泰戈尔与清帝及青年佛化的女居士》、《无聊无赖无意识的中国报界》、《惩罚战争》^⑥。

5月10日左右 与张国焘一起拜访维经斯基（去年底回国，今年4月又来华），维说中共中央的工作方针重点应放在本身组织的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上，对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要积

① 《中国青年》，第27期。

② 《向导》，第62期。

③ 《向导》，第63期。

④ 《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⑤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⑥ 《向导》，第64期。

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使国民党革命化。

5月11日 彭湃给陈独秀写了《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一封信》，陈把该信摘登在六月十八日出版的《向导》第七十期上。

5月14—16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三届三次会议（又称“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总结五个月来国共合作的经验，纠正在发展党的组织、工人运动、在联合中与资产阶级斗争等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以重新决定以后的政策。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作中央局工作报告，总结了党的组织、宣传工作和政治运动、工人运动等情况，分析了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表现，提出对国民党的政策是：一、向目前的左倾分子宣传，使他们左倾观念坚固不至摇动；二、向国民党员中工人学生宣传，使之左化；三、努力介绍革命分子进国民党，以增加左派的势力；四、在一般社会做反帝国主义之广遍的宣传，以迫令国民党全体左倾，此层更是根本政策。^①陈独秀还表示：“三大”后中央决策多取决于他个人^②，难免偏差，要求会议予以检讨^③。会议讨论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指出过去“我们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左翼”；过去对国民党的工作偏重于组织，今后要加强宣传。对工人运动，会议特别规定：“产业工人运动是共产党的基本工作，不应与国民党的工作混合”；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加强工人运动领导的重要性。邓中夏评论：“陈

①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24页。

② “三大”后的中委，有四名常驻地方：京、粤、鄂、湘。在中央局工作的毛泽东，也奔走于沪粤之间，做国民党的工作，多半时间不在中央（1923年9月以后便离开中央局，秘书由罗章龙接任）；蔡和森因对国共合作政策持保留态度，只埋头写作，不多过问政策方面的事，瞿秋白除在广州帮助国民党改组耽擱一个长时期外，又忙于上海大学的工作。因此，陈独秀许多事往往不经过会议而直接决策，形成“家长”作风。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28页。

独秀的中央,对于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共产党的扩大会议上,才纠正过来。”^①

5月17日 到亚东图书馆,与汪原放谈到胡适时说:“思想是不进则退的。”“文学革命不仅要革去文言,提倡提倡白话,便算了事;除此以外,还有许多要紧的事要干的。一二百年前,也有很多的大部大部的书是用白话的。在今天,却不能不把白话写出来的究竟是些什么,仔细的看看,决不能把那用白话写的东西,一概都作为好的了。”^②

5月21日 发表《工界厄运重重》、《汉口之党狱》、《世界的反动政象之转机》及“寸铁”三则:《中国命运已在华盛顿会议决定》、《热心收蒙的先生们哪里去了》、《黎元洪又缩头了》^③。

5月25日 发表《答张君勔及梁任公》^④。

5月28日 发表“寸铁”七则:《泰戈尔与北京》、《康有为的道德》、《巴尔达里尼与太戈尔》、《可怜想吃天鹅肉的中国人》、《军阀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又一证据》、《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卖阶级的工党政府》^⑤。

春 几次会见因在安徽从事革命活动被安徽军阀马联甲通缉逃亡到上海的朱蕴山,并与柏文蔚、常恒芳等一起研究斗争对策,一致认为: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排除外国对中国的侵略,推倒国内南北军阀的统治,实现国家的统一。作为工作的第一步决定由朱蕴山去做山东郑士琦、胡翊儒的工作,争取他们拥护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合作,推翻曹锟、吴佩孚的北洋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孙中山与军阀合流,而是一种权宜之计。后来此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②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92—93页。

③ 《向导》,第66期。

④ 《新青年》季刊第3期。

⑤ 《向导》,第67期。

计划因张作霖的破坏没有实现，改由朱蕴山通过冯玉祥的顾问徐谦做冯的工作，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吴，请孙北上。^①可是那时，陈独秀又认为冯是英美帝国主义的新工具。

6月4日 发表《杨德甫等冤杀与国民党》、《中俄协定签字后之蒙古问题》、《外人对于商标之无理要求》、《厦门大学学生也有今日》及“寸铁”五则：《以伪乱真》、《诗人却不爱谈诗》、《太戈尔与金钱主义》、《大同主义与弱小民族》、《亚洲民族联合与亚洲平民联合》^②。

6月11日 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根据5月21日被捕的张国焘的口供，发出“海捕文书”，密令各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严速拘拿”陈独秀等人：“内务部为密咨事，案准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咨称，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况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三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拘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安，而遏乱萌。”^③

6月11日 发表《德国对华赔款问题》、《无政府工团主义与黑暗势力》及“寸铁”五则：《反对泰戈尔便是过激》、《准印度人的亡国奴何东》、《国民革命与反革命的财阀》、《英政府何不枪毙罢工的铁路工人》、《法捕房何不拘捕过激派》^④。

6月18—25日 发表《法国政潮》^⑤、《上海丝厂女工大罢

①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366、369页。

② 《向导》，第68期。

③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第1001、3499号。

④ 《向导》，第69期。

⑤ 《向导》，第70期。

工》、《国民党与劳动运动》及“寸铁”八则：《研究系之丑表功》、《政客还不及军阀有良心》、《研究系不至如此下流》、《为美国排日》、《还不问政治吗？》、《一个弄错帝国主义之意义的新闻记者》、《石狮子也跑到王氏门前去了》、《仰面事仇的湖南劳工会》。^①

7月2日 发表《智利领判权与中国主权》、《四国银行又供给军阀一百万元》、《法西斯党与中国》、《美国侵略中国之又一形式——三K党》及“寸铁”三则：《世界上竟有要求军民长官提倡的社会党》、《华府会议议决到底有效无效？》、《自由舒服与革命》^②。

7月9日 发表《孙宝琦去职与金佛郎案》、《外人私运军火与中国治安》、《英法两国之对外政策》及“寸铁”十一则：《顾维钧不会不肯》、《奸商与劳工孰重》、《“七一”与“五七”》、《恶人假借好名义》、《沈恩孚、梁启超眼中的平民》、《梁启超勿忘今日之言》、《假革命党》、《玄学家言原来如此》、《外国的文化侵略与国民革命》、《老先生们歇歇罢》、《北京的议员哪里去了》。^③

7月13日 致函维经斯基，就国共关系的新形势，要求共产国际制订对国民党的“新政策”：“根据我们的意见，应当停止过去那种形式的全面支持，我们应该有所选择。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无条件和无限度地支持国民党，只能支持国民党左派所从事的一些方面的活动，否则，我们就支持了自己的敌人。”^④ 陈的这个要求是针对当时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乐观态度而发的。维经斯基在6月实地考察广东形势后，给共产国际的题为《中国南方时局与孙中山政府》的报告中说：“国民党领导核心，既没有强

① 《向导》，第71期。

② 《向导》，第72期。

③ 《向导》，第73期。

④ 格鲁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年），《共产国际与东方》，1969年莫斯科版。B. M. 格鲁宁是苏联历史学博士、苏联远东问题研究所中国历史部主任。本文引用了不少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

烈的愿望，也没有经验使运动建立在劳动阶层的利益的基础上”，但国民党仍然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共产党人应当继续和它共事，而且，“和国民党共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就是把工人、农民和年轻的中国知识界组织起来，通过这些组织开展宣传和演讲，逐步地迫使国民党改变政策，转到中国劳动群众方面来，去反对大商人和封建地主；转到苏维埃共和国方面来，去反对世界帝国主义”^①。7月5日，鲍罗廷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问题上，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和左派，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联合，包括孙中山在内。如果不担心自己的党会被彻底孤立，那么除少数人以外，几乎所有国民党人都会参加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但是，“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象某些同志估计的那样，似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此尖锐，以致必须作好可能分裂的准备”，因为“国民党在基层中并没有对共产党人的工作设置任何障碍”^②。

7月16日 发表《收回教育权》、《上海防盗问题》及“寸铁”二则；《假革命党与反革命党》、《精神生活与金钱》^③。

7月21日 以委员长名义与秘书毛泽东共同签署《中央通告第十五号》，要求各地党组织作好与国民党分裂的组织准备，指示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应采取的策略：“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然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却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

① 《共产国际》，1924年第36期，第187—206页。

② 格鲁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

③ 《向导》，第74期。

讨论。”“今后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此会为社会运动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万不能容留右倾观念的分子在内。”^①

7月23日 发表《美国侵略与蒙古独立》、《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及“寸铁”七则；《学校与监狱》、《无政府党与研究系》、《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当中国船员》、《神童与圣诗》、《收回教育权与中国学校》、《两件不可解的事》、《谁是革命分子》^②。

7月30日 发表《新银团与中国》、《帝国主义者援助军阀之又一证据》、《沙面罢工与民族主义者》^③。

8月6日 发表《再论外人私运军火与中国治安》、《大水灾与赈灾附加捐》、《日本在华侵略之新计划》、《加哇的民族运动》及“寸铁”六则；《光棍平民》、《留美学生》、《不要动气》、《帝国主义者对华一致行动》、《洋人的汽车》、《曹锟的兵》^④。

8月13日 发表《欧战十周年纪念之感想》^⑤。

8月20日 发表《反革命的广东商团军》，说：“我们于广东政府对待商团的优柔政策，老早就表示警告，……革命政府真正心腹之患，不在东江而在广州！我们以为革命政府军事计划：第一步是解散商团军，第二步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说得上北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6)。

② 《向导》，第75期。

③ 《向导》，第76期。

④ 《向导》，第77期。

⑤ 《向导》，第78期。

伐。”同时发表《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之最近表现》、《美国人又以军火给北洋军阀》、《关税协定之外卖国政府又与外商协定纸烟税》、《又一个乐志华》。^①

8月27日 在《向导》“寸铁”栏发表《国民党与中国革命》，宣称：“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民族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应该是中国国民党；民众若不认识国民党和国民党若不认识自己，都是中国革命之最大障碍。”同时发表《江浙战争》，《伦敦会议》及“寸铁”《恶政府碑》、《大学工科及杨杏佛》、《中俄协定与奉张》、《佛化恶人》、《第二犹太》、《革命党怎好希望敌人优容》、《革命党和农民第一次见面》、《亡党》、《猪一变而为狗》^②。

9月3日 在《向导》纪念辛丑条约二十三周年的“九七特刊”上发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说：“义和团，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批评一般人对义和团的两个错误观念——“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以为义和团事件是少数人之罪恶，列强不应因少数人之故惩罚全中国人民以巨额负担。”宣称：“义和团的野蛮，义和团的顽固与迷信，义和团时的恐怖空气，我都亲身经历过，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悲壮的序幕。”^③同时在《政治生活》上也发表颂扬义和团的文章。12日，胡适发表《〈努力〉的问题》，就陈独秀发表颂扬义和团的文章与六年前痛骂义和团的《克林德碑》对比，攻击说：“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凡不知其真实动机而其事有可取者，还应该嘉许其行为，而不当学理学家诛心的苛刻论调。今日那班处处畏资本家的阴谋的人，同时又往往为拳匪曲说巧辩

① 《向导》，第79期。

② 《向导》，第80期。

③ 《向导》，第81期。

——这真是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①

9月7日 致函维经斯基，要求实行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路线^②。

9月10日 中共中央发表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指出江浙战争性质是“直与反直的军阀间全部大战争之开始；同时，也是英美和日法两派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争斗之开始。”号召全国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③

与秘书毛泽东共同签发《中央通告第十七号》，指示各地党组织立即下令所有党员开始活动，借这次军阀战争为现实的材料，更努力的来宣传国民革命。

9月17日 发表《我们的回答》，批驳国民党右派攻击“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以及“取消共产党”、“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等叫嚣。^④

9月24日 发表《西南团结与国民革命》。^⑤

是月 彭述之^⑥、陈延年、周恩来、王一飞、任弼时、尹宽等

①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张静庐辑注），第15—16页。

② 格鲁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

③ 《向导》，第82期。

④ 《向导》，第83期。

⑤ 《向导》，第84期。

⑥ 彭述之（1895—1983），湖南宝庆人。“五四”后，受陈独秀思想影响，于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赴苏进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负责中共旅莫支部工作。1924年9月回国，参加《向导》编辑工作，任上海市委委员。1925年1月参加党的“四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后任中央常委。1927年4月，李大钊牺牲后，被派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与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入狱，他亦被捕；在狱中同陈一起写“申诉书”。1937年8月获释后到上海重整托派组织。1942年7月，托派分裂，彭成为“多数派”头目。1948年底组织“中国革命共产党”，企图指挥解放后的托派活动，反对新生的政权。后移居香港，旋即旅居西贡和巴黎。1973年在美国定居。在1951年第四国际第三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以及书记局成员，1983年11月28日，病死于美国。

人由莫斯科及巴黎回国。周恩来于月初到达广州，先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后来陈延年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后，周任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10月1日 发表《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认为：“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而广州政府现有的军队，“完全是以利结合的雇佣军队，我敢说没有一连一排是可靠的革命军队。”广州政府“完全建立在反革命的军队反革命的官僚及反革命的商人阶级之力量上面，这反革命的军队官僚与商人，不但是支持政府的力量，并且是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势力之大本营。”主张，国民党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及放弃广州政府，”“回到革命同盟会的时代，毅然决然下全党动员令‘到民间去’，在一切民众中做广大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人农民兵士的大民众……”^①。

10月8日 在《向导》“双十特刊”上发表《辛亥革命与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第一是误用了不能贯彻革命宗旨的口号”——“排满”；“第二是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第三是左派首领过于和右派妥协了”。称：“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痛楚的回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②

10月10日 上海各团体在天后宫召开国民大会纪念双十节。国民党右派及其指使的暴徒破坏会场，并将拥护反帝反军阀演说的上海大学学生黄红打死。陈独秀就此发表《这是右派的行动吗，还是反革命？》愤怒谴责右派“实在只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及军阀之走狗”^③。

① 《向导》，第85期。

② 《向导》，第86期。

③ 《向导》，第87期。

10月10日 陈独秀遵照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精神，致函维经斯基，再次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并摘录决议中的一段话，明确反对共产国际在武装斗争和广东革命根据地问题上的政策：“按照当前党的意见，如果国民党不停止其军事行动，不放弃广东政府，那么客观地说，它就不可能从右向左转并靠拢群众。因此，我们认为国民党应当停止其军事行动（包括北伐）并放弃广东政府。”^①在这次中央全会上，瞿秋白作了关于在广东省的路线的报告，中共中央批评了瞿秋白和鲍罗廷，并作出决议指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引者）在军事政策上给予国民党帮助，实际上加强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势力。执委员（即中共中央——引者）认为，鲍罗廷犯了一系列错误，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中央的作用，并与之实行妥协，在执行国民党从上到下的政策方面也犯了许多错误。最大的错误是他对国民党军事行动的支持。”^②

10月29日 发表《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称：“此次北京政变，显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这个新工具比旧工具更柔顺服从一点，更得中国的所谓‘舆论’赞助一点。”英美更换新工具的阴谋，“乃是实现一个由列强共同操纵的各派军阀首领之和平会议（即政变中所传天津会议），并由此会议产生一个由列强共同支配的各派军阀（或加入一二财阀？）首领合作之委员制的政府。”呼吁：“我们不扫荡一切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军阀，决无实现和平安定的局面之可能。……我们若仍希望基督将军出来或段祺瑞再出可以弥缝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结果仍然是要失望！”“溃烂必更甚一次。”同时发表《肃清内部》，认为：“中国国民党，在党

①② 格鲁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

内,在广东境内,都急需积极的采用肃清内部政策。”“反革命的商团虽然打退了,而广州政府所受反革命势力宰割的危机并未曾消灭,第一是心腹之患的范廖军;第二是各县绅士大地主所统率的乡民团;第三是久据东江的陈洪林叶各军。……因此,我们总以为国民党目前重要的工作,不是侈言北伐,而是肃清党内的反动分子和境内的反动势力”^①。

11月1日 与秘书毛泽东共同签发《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指示各地加强党务,随时向中央报告讨论和执行中央文告的情况^②。

11月初 孙中山决定离粤北上后,陈独秀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与彭述之、蔡和森等人一起,反对中共广东区委支持孙中山北上的意见,认为孙此举是“军事投机”,“与段祺瑞妥协”,主张孙应留广东,巩固革命胜利。而广东区委则认为孙之北上,可以使革命运动推向北方发展。^③

11月6日 在《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上附言:“这个通告发出后,中局政策略有变更,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于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中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割中国的阴谋。”

11月7日 发表《俄罗斯十月革命与中国最大多数人民》^④。

11月12日 发表《国民党的政治态度》,认为:“放弃政权与军事行动,到民众中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领导

① 《向导》,第89期。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

③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④ 《向导》,第90期。

民众,对于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不放过每一个争斗,这是国民党的政治态度所应取之上策。”利用现有政权与军事势力,与帝国主义及军阀争斗,“虽不能根本打破一切帝国主义与军阀循环起伏的旧局面,而却是革命的行动,可以算是中策。”“怂恿己党党魁无条件的与军阀合作,与帝国主义妥协,以冀在政权上分得若干余沥;这种下流的政治态度,不待言不得救中国,并要葬送国民党的生命!”^①

11月19日 就孙中山到沪及报上发表孙的《北上宣言》^②事,签发《中央通告第二十二号》^③,认为孙的宣言“纯粹代表国民党中派的观念,措词含浑,大有与各军阀妥协之余地,……并无代表人民利益的具体要求”,表示中央要发一宣言,向中山提出政治的具体主张,同时指示各地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在报纸上在城市农村向民众游行演讲,宣传党的主张,促成国民会议实现。同日发表中共中央第四次对时局的宣言:支持孙中山北上及其政治主张,再次强调解决目前危机的方法“只有”国民会议,并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为未来临时政府和国民会议的十三条政纲^④。

11月19日 《向导》“记者”发表《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维护陈独秀在《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和《我们的回答》中的立场观点,批驳国民党中央对《向导》周报“强分国民党为左中右派”的“警告”^⑤。

是月 邓中夏发表《我们的力量》,不指名批判陈独秀轻视

① 《向导》,第91期。

② 孙中山17日到沪,21日离沪。18日《申报》等报刊登了孙10月10日发表的《北上宣言》。

③ 《通告》原件未见,此系团中央转发件,顺序号及日期,是根据通告内容及瞿秋白的回忆拟定的。

④⑤ 《向导》,第92期。

无产阶级力量的观点，强调：“工人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在主力军的地位。”“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①

中共中央向鲍罗廷建议，停止支持黄埔军校，因为该校已被右派所把持。

12月初 与彭述之、维经斯基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进行起草中共“四大”文件的工作。关于民族革命性质问题，陈与彭略同，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维经斯基则持异议，认为“不能确定，须看将来的成功如何”。不过后来到审查草案时，他亦承认了陈、彭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彭不同意陈和瞿（秋白）“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高”的观点，提出无产阶级是“必然的领导者”。^②

12月3日 发表《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指出：“我们为什么赞成国民会议？第一，因为这个会议无论将来成功或失败，眼前便给我们以民众的政治活动之机会；第二，将来成功固佳，即失败也能够给一部分人以革命需要的教训。”主张：“速开国民会议之预备会议，现在的临时执政奉还政权于人民，即以此由人民团体选出的预备会议执行临时政府的职权，国民会议由他召集，他的主席团就是此临时政府处理各部行政的首长。”^③

12月10日 发表《孙段合作与国民党之运命》，称孙中山

① 《中国工人》第2期。

② 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1925年2月2日），《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③ 《向导》，第93期。

“入京”是个“险途”。因为“日本及段祺瑞为支配全中国计，是想拒绝与拉拢互用，使中山在投降式的条件之下和他们合作。”指出：“还是接受民众欢迎的意见，还是接受军阀拉拢的意见，这是中山先生脱离或陷入此‘险途’之唯一标志。”“国民党与国民合作是坦途，国民党与军阀合作是陷阱，中山先生将何去何从呢？”^①

12月17日 发表《国民会议促成会与中国政局》^②。

12月20日 彭述之撰《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表示不同意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要资产阶级来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之事，若望其来作国民革命的领导，宁非梦想。”并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③

读彭述之《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原稿后，发表《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口头上放弃原来“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说：“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主义天然敌对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④

《新青年》季刊出版第4期后停刊。

12月24日 发表《国民会议声中之民选省长》^⑤。

① 《向导》，第94期。

② 《向导》，第95期。

③ 《新青年》季刊第4期；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56页，香港前卫出版社，1975年4月版。

④ 《新青年》季刊第4期；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⑤ 《向导》，第96期。

12月31日 发表《国民会议与商人贵族》^①。

12月 与团中央局林育南共同签发党中央和团中央通告，指示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要求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党及团均应全体动员努力工作，指示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名称和各地组织应该统一；应竭力邀请劳动群众及中小商人参加并为促成会的重要成员；促成会工作中党及团同志须合组一党团，直接受党的地委领导；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主张及其反动政策；不但要集合已有的社会各团体于促成会，并应乘机组织新团体，鼓吹省长及县长民选等。

^① 《向导》，第97期。

1925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四十七岁

1月 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苏维埃中央主席团分别作出决议,谴责托洛茨基的反党言行,解除其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月17日 孙中山致电段祺瑞,反对善后会议。2月1日,段祺瑞炮制的善后会议开幕。3月1日,为抵制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倡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京开幕,并在全国掀起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

1月,冯自由、马素等人在北京组织“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邹鲁、谢持等人组织“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二者都发表反共宣言,反对容共、反对改组国民党。3月,两组织合并为“国民党同志俱乐部”。3月26日,国民党中央开除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的党籍。

2—4月 全国十多个大城市的工人纷纷罢工,其中上海、青岛两地日本纱厂的工人罢工规模和影响最大,中共中央专门成立罢工委员会领导这次罢工斗争,并命令上海万余名共产党员参加罢工运动。

3月12日 孙中山病逝北京。

7月1日 广东大元帅府改组,成立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

席，鲍罗廷为高等顾问，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不参加政府。在北京的“国民党同志会”宣称：在共产党问题解决前，广东政府一切行动无效，中央一切职务由俱乐部代理。

8月20日 廖仲恺被暗杀。胡汉民、许崇智涉嫌，被逐出广东。

11月23日 张继、谢持、林森、居正、邹鲁等国民党第一届执监委员，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通过《取消共产党的国民党中之党籍》、《解雇顾问鲍罗廷》、《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共产党员》等议案，形成“西山会议派”。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戴季陶、叶楚傖、邵元冲应邀参加了预备会议，因反共策略上的分歧，未参加“西山会议”即回上海。12月，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召开四中全会，批判“西山会议”是非法的，是分裂革命的反动行为。

1月7日 发表《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①。

1月10日 与罗章龙共同签发《中央通告第二十四号》，指示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揭露及抵制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包括一定时间的（一日或二日）罢市、罢工、罢课及罢税的运动并示威运动。19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对段祺瑞“善后会议”之议决案，指示党在群众面前揭露段氏政策之真相，使民众向段政府要求国民会议促成会得派代表参加善后会议，并占善后会议人数三分之二，以阻止段氏计划为目的，并使段氏立即召集国民会议。若段氏拒绝人民要求，即举行示威、抗议、罢工等。《通告》批评了国民党领袖之消极抵抗政策——既不公开反对善后会议，亦不参加。主张“参加，批评善后会议，催开国民会议”^②。

① 《向导》，第98期。

② 张伯简给东方大学同学的信（1924年2月5日），《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1月11—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闸北区横浜路六号举行。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作工作报告。代表们讨论工作报告时，完全同意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对中央一年多来领导全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基本上表示满意，同时对某些工作中的失误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大会讨论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及工农联盟问题；对国民党则采取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大会《宣言》揭露段祺瑞善后会议的阴谋，号召全国人民赶快组织起来，召集国民会议。大会还通过了维经斯基提出的以中共“四大”名义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案。会后陈独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为宣传委员，张国焘为中央工农部主任，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领导中央秘书处，主管中央行政事务。1926年冬，王若飞任中央秘书长，受陈独秀领导。一切人事调动如委派各地负责人等，均由陈独秀以组织部主任名义，提交有关会议通过任命^①。

1月21日 发表《列宁与中国——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民众》^②。

1月28日 发表《我们应如何对付善后会议》^③。

2月5日 汪孟邹复胡适上月27日函，告“仲翁（独秀——引者）并未北上，仍常到牯岭路，身体、精神较前为好得多也”。翌日，汪又致函胡：“今日仲翁来到五马路，我告以兄讯问他北来否。谈论许久，他有一讯嘱为快呈请阅。我意此事关系吾兄前途，的确极为重大，他们恐属有意的利用，吾兄切勿无意的受他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11页。

② 《向导》，第99期。

③ 《向导》，第100期。

们的利用，出席之日务望独立发挥自由言论，千万谨慎，至禱至禱。怡荪、洛声均不在世，我亦不得不随同仲翁自附于诤友之列也，惟吾兄谅之、恕之。”15日，汪又复胡适10日及11日的来信：“与仲翁讯，候他来时转交，我已详细看过，至为喜慰，哥之不谋私利，我辈岂有不深知之理，只恐谋私利者利用哥之地位声名，热心以为他们谋私利之工具耳，此我等所以不得不言而求吾哥万勿误会之一点也。哥之不荐一个人，不写一张条子，与至少要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来，此种主意，我是十分赞同。愿吾哥本自己的主张，谨慎做去，进之者有益于国家之前途，退之无损一己在社会所占之地位，此我之目的也。仲翁对于吾哥确是十分爱惜，但他说话偏激，哥素知其详，望勿介意为幸为幸。”①

2月7日 发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指出：工人阶级的势力“是新生势力的代表者，他是富于集合力及决战力者，他是天然的农民之同盟者。”“资产阶级中包含着‘反革命’、‘非革命’、‘倾向革命’三种分子，只有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一个不妥协的革命阶级。”“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若没有工人阶级有力的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②。但该文说，中国社会势力三种并存：军阀、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未提农民。

2月14日 发表《大家应该开始懂得善后会议的价值了》，同时发表致章行严的信，斥诘章所掌管的北京司法部查办共产党的训令，要求章在报上公开答复③。后来章行严回答说：“始

① 胡适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存。函中所述胡适被利用事，是指他参加“善后会议”。

② 《向导》，第101期。

③ 《向导》，第103期。

愚(即章自称——引者)长秋曹,独秀自沪贻书,诘愚刊章取缔共产党状,此独秀不知我,有此烂言。”但又称:“愚殊自信,共产说在中国,实无意义……愚在柏林少治马克思书,其法衡之吾国,盖无一而可。”攻击“独秀派之共产论,只知产之共,而不知产将以何法而共。”“至青年假斯名号,失学丧身,流毒社会。”①

2月21日 发表《愚弄国民的国民会议条例》、《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及“寸铁”六则:《国民党究竟应当和谁合作》、《国际奴隶境遇》、《善后会议与社会主义》、《共产和普选果足以亡国么?》、《你们早已背叛了民党啊!》、《只要脸厚什么事都好干》②。

2月—9月 参与领导上海工人运动。历次罢工的最高指挥者是陈独秀。每有重大的决议,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等问题,都是工运干部和他共同开会决定的。常开会的地方是宝山路南边某同志的家里。

3月7日 发表《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对付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总策略》及“寸铁”四则:《精神文明、东方文化与段祺瑞》、《崇信外国》、《军阀与国民会议》、《陈炯明与辛亥同志俱乐部》③。

3月14日 发表《悼孙中山先生》号召“全中国的革命分子,应该因中山先生之死,加速的集合到中山先生创造的国民党,团结成伟大的集合体,来继续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同时发表“寸铁”九则:《一朝天子一朝臣》、《社会党与政府官吏》、《废帝得志是何意义》、《高一涵应该知罪呵!》、《“过激”之第三个解释》、

① 《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30号。

② 《向导》,第103期。

③ 《向导》,第105期。

《静候江亢虎在善后会议宣传社会主义》、《反……救亡会》、《护党还是叛党》、《工人运动与各国在华工业》^①。

3月中旬 看望来中共中央主持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张国焘，对李大钊在北京领导的欢迎孙中山北上及国民会议运动表示赞许；对孙中山逝世可能引起的后果表示忧虑，强调今后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发展^②。

3月21日 发表《评中山先生死后之各方面》^③。

是月 为出版《字义类例》作自序，称：“这本书是我于民国二年亡命上海闭户过冬时做的，其中只有解释假借有点特殊的意见。”“近代学问重在分析，此书分析字义底渊源，于中学国文教员或者有点用处。”^④

罗亦农回国到上海，中共中央决定调他到广东与陈延年、周恩来、谭平山、鲍罗廷五人组成驻粤委员会（即两广区委）就地指导工作^⑤。

4月4日 签发《中央通告第十九号》，指示“根据中山遗言做反帝及废约宣传”；公开征求国民党员，大力发展左派力量，“有必要时，亦可在工人区域发起国民党的组织”。这样，“我们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才有和右派竞争选举的可能”。

4月5日 发表《统一与分立》及“寸铁”七则：《呜呼孙段合作》、《反段与降段》、《帝国主义下的难民与苏俄》、《好个不使劳动界反对资本家的劳工》、《究竟是谁荒谬？》、《可惜五十万元的

① 《向导》，第106期。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7页。

③ 《向导》，第107期。

④ 《字义类例》，亚东图书馆（石印本），1925年出版。

⑤ 李文宜：《碧血洒龙华，红花遍神州——忆罗亦农同志》，《人民日报》1982年5月13日。

民脂民膏》、《两角同盟》^①。

4月19日 发表《亡国的上海》^②。

4月22日 发表《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③。

《新青年》仍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改为不定期刊物出版。

5月初，与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一起，接见新近入党由北京来上海的吴玉章，决定利用吴与国民党孙中山的深厚的历史关系，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指示吴先去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取得联系，然后再到四川工作^④。

5月5日 以党中央总书记名义与团中央总书记张太雷共同签发《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指示“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和组织，以便在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和右派中派竞争”；“切实进行国民党内部训练，并使训练大权，完全在我们同志手里”。

5月10日 发表“寸铁”十二则：《卖国》、《你们当真外抗强权吗？》、《班禅与张天师》、《今年五一的感想》、《圣经与鸦片》、《反共产与军阀》、《过激主义与被压迫者》、《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五一运动到底应该反对谁？》、《卖国贼与国民党右派》、《段祺瑞解散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意义》、《赤化与转化》^⑤。

5月16日 签发《中共中央关于援助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罢工工人的通告》（中共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就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罢工失败及昨天日本厂主枪杀工人顾正红、王福金事件，指示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的同志们，号召工会、农会、学生

① 《向导》，第109期。

② 《向导》，第111期。

③ 《新青年》（不定期）第1号。

④ 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中国青年》1961年第8期。

⑤ 《向导》，第114期。

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一、由各团体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二、由各种团体发起筹募援助上海纱厂工人捐款。三、由各种团体名义发起组织宣传队向市民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者历来欺压中国人之事实，造成排货行动。四、广州、长沙等处应号召群众向日本领事馆示威。

5月19日 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运动的通告》(中共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就上海日本纱厂杀伤中国工人数十名事件，指示各级党组织“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一、各地应即邀当地 C. Y. 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罗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进行时应与国民党合作。二、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电请政府向日本交涉取消其在中国开设工厂之权利。

5月24日 发表《“反唐”与国民革命》^①。

5月28日 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举行联席会议，与会者分别汇报了国民党、雪耻会、学生、工人等方面活动情况。李立三指出，在工人方面，组织上尚好，但要得到胜利，必须扩大社会运动势力，各团体、各学生起来援助；并提出二点援助意见：一、要求学生到各校宣传，召集代表大会演讲；二、区党部与区分部举行会议，组成演讲队。在讨论“有多少人数可以出发演讲”问题时，大家估计上海大学、文治大学能出 200 人，国民党能出多少，不清楚，于是，蔡和森提出：我们干群众运动，必有各方面之明了统计，现在笼统的状况，颇难予以决定。他建议“向各方面活动……以刺激其同情”，到 30 日对人数作一精密统计。恽代英提议先以国民党名义组织二、三百人，在 30 日前，先行到各

^① 《向导》，第 116 期。

校去演讲。最后议决四条：（一）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二、向学校宣传，并须派工人同志同去。三、印行传单——包括外人侵略一切事实。四、上街演讲示威定于30日下午。^①

5月30日 晚上，与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恽代英、王一飞、罗觉、张国焘等人开会，决定首先发动反抗外力压迫的罢市、罢工、罢课运动，拟出要求条件大纲：租界当局必须承认此次屠杀的罪行，并负责善后；租界统治权应移交上海市民，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会议决定陈独秀居中指挥，立即组织上海总工会；李立三代表上海工会同全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商会和马路商界联合会共同组织一个工商学联合会，作为这一运动的领导机构。还商定斗争策略，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尽量减轻华资厂商的不利及保障市民的正常生活。李立三还奔走于陈独秀和虞洽卿之间，倾听虞对工人运动的意见，并请他代筹一部分经费，救济罢工工人；李立三到北京活动时，虞还写了介绍信给

① 联合会议录。据李立三回忆：陈独秀参加了这天晚上的中央紧急会议。当蔡和森在会上提出“组织发动各阶层群众于5月30日集结到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时，陈独秀认为蔡的主张是“空泛不切实际之谈”，断言“如果在示威时有三五百人参加，便算是我们的成功。”而多数同志同意蔡的意见，才通过《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决议案（《纪念蔡和森》，《红旗飘飘》第5集）。因为至今未发现这次“中央紧急会议记录”，李立三此说存疑，而其所指此会，是否就是上述“联席会议”？陈独秀是否参加了会议并作这样的发言，也都待考证。从上述记录看，与会者包括蔡和森在内，对三十日上街演讲示威的人数，都心中无数。恽代英曾在1926年五卅运动周年纪念前夕回忆说：“在二十六七日，我党才决定要学生在六月二日以前到租界上做一次很大的游行演讲的示威运动。这时候，我对于这样一个策略，还有怀疑的地方，因为要他们到租界上去游行演讲，租界上是不许可的，明明要他们去牺牲。我相信有三百人可以跟着我来，但有许多人，总觉得很不愿意……。其实我的见解，是错误的。至廿八日，再细讨论，才决定先找我们的同志——学生和工人——到各学校里去宣传，激动他们。……廿九日，做了一天的工作，于是出来的人有了三千多个，与我所揣测的多了十倍，并且很受欢迎。”（上海市档案馆等：《五卅运动》（上），第237—238页）。

财政总长李思浩。

6月4—29日 帮助瞿秋白创办《热血日报》——中共中央创办的第一张日报，指导“五卅”运动，并在报上发表多篇不署名文章，批评大资产阶级在斗争中的动摇；又通过同乡某某的关系，把广东帮资本家霍守华从安徽找到上海来，在总商会中加强支持工人学生群众要求的力量。

6月6日 发表《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揭露控诉帝国主义的“五卅”大屠杀，提出这次运动的五大教训和五条“最低限度的要求”。同时发表《日本纱厂工潮中之观察》^①。

是月 中共中央就“五卅”惨案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帝国主义“大屠杀而引起的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所以这次反抗运动，“将是一种长期的民族争斗。”“中国共产党更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坚持到底的来维持并发展这个长期的民族争斗。”^②

6月20日 发表《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认为“五卅”争斗的性质，“乃是全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斗争，决不是那一个地方那一部分人对某一事件某一国家之争斗；换言之，此次争斗应该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争斗的方法，不可依赖法律，亦不依赖现政府，只有依赖国民自己的团结力。”主张：“立即在上海召集全国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议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严责政府宣布执行。倘政府不肯

^{①②} 《向导》，第117期。

执行此议决，立起国内战争，建设一个国民革命政府。”^①

7月2日 发表《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提出“五卅”运动在“上海交涉破裂”，移京进行，总商会主张“上海开市”，以及大资产阶级妥协后的应付办法：“要扩大工商学兵联合会或雪耻会遍于全国，成为群众的行动机关，执行各地排货、罢工、废约、反抗媚外的军阀奸商及教徒等反帝的实际运动。”“急须在北京或上海组织全国工农兵学商联合大会，以为指导全国运动的中央机关。”“急须武装学生工人商人农民，到处组织农民自卫团，以抵抗军阀之压迫”等^②。

7月16日 发表《广州战争之意义》，指出广州讨平杨希闵刘震寰战争的意义：“一方面是直接驱除反革命的军阀盘据广东，一方面是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英日势力侵入广东。”^③

8月10日 发表“寸铁”三则：《我们认识江亢虎了》、《“醒狮”与“诚言”》、《孙宝琦与“醒狮”》^④。

8月15日 发表《此次运动中之帝国主义与军阀》^⑤。

8月18日 发表《军阀及资产阶级在上海民众运动中之影响》^⑥。

8月20日 廖仲恺被刺后，陈独秀与维经斯基一起，反对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主张严厉处置国民党右派胡汉民、许崇智的意见（放逐苏联，不使其归国），“恐怕联合战线太破裂了”。于是，胡被逐广州后，即作为国民党代表赴苏参观，并参加共产

① 《向导》，第118期。

② 《向导》，第120期。

③ 《向导》，第121期。

④ 《向导》，第123期。

⑤ 《向导》，第124期。

⑥ 《向导》，第125期。

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在苏联，胡受到隆重的接待和欢迎，并于翌年4月下旬回到广州。

8月22日 上海商务印书馆在陈云、沈雁冰、杨贤江、徐梅坤等人领导下，举行“要求加薪及平等待遇大同盟罢工”，27日胜利结束。罢工期间，徐梅坤每天向陈独秀口头汇报罢工进展情况，取得指示。陈认为这次罢工很有影响，要求尽力做得好一些^①。

8月23日 发表《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提出“今后我们的总口号”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同时发表“寸铁”四则：《江亢虎的人权》、《江亢虎的宣传之道》、《罢工与法律》、《孙宗昉三出风头》^②。

是月 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罢工运动的去向问题。“五卅”以来的上海工人罢工斗争，由于反动势力的压迫，大资产阶级的背叛，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在政治和经济上发生了许多困难。在会议上，“多数意见主张运动扩大到北方，有少数同志主张武装暴动，另有一部分意见主张收缩，结果决定继续运动。后来国际训令要保持势力，应由政治斗争转到经济斗争和部分的经济要求，将政治的责任推到北方和南方政府身上。”^③于是决定收缩，逐步引向复工，发表《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为坚持罢工告工人兵士学生》。某日，陈独秀在闸北香山路工人部机关参加工运干部会议，支持刘少奇意见，主张为了防止工人阶级的孤

① 徐梅坤：《回忆一九二五年的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1辑。

② 《向导》，第126期。

③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60—61页。据《告工人兵士学生》书，这次中共中央会议应是8月10日

立，保存工人组织已得的胜利，及为了准备更好的进攻，中共中央决定改变罢工的策略，即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要求，逐步复工。旋即各厂相继复工。

8月30日 致函戴季陶，批判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小册子，斥其在理论方面，“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在态度方面，“以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的谬论^①。

9月7日 发表《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总结了三年来中国政局的变化及党提出的口号、主张及其收到的效果，指出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革命”的口号，“已经深入民众。”指出“五卅运动”在“资产阶级之妥协和奉系军阀之高压、大受打击而陷于停顿”之后，应取“新途径”是：“（一）改变上海、香港罢工政策，以经济要求及地方性质的要求为最低要求；（二）委托南北政府合组一外交委员会，来解决全国性质的对外根本问题；（三）开始国内战争，合全国的力量，打倒英日帝国主义走狗——奉天军阀。”^②

9月11日 发表“寸铁”四则：《加伦将军的分身法》、《戴季陶反共产派运动》、《可怜的段府》、《奉军在北京之治外法权》。

9月25日 发表《我们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及“寸铁”九则：《“赤化”与“过激”》、《康有为与奉系军阀》、《康有为、章士钊、戴季陶》、《段执政的“甲寅”》、《资产阶级的民生主义》、《奉军大义灭亲》、《帝国主义者不可无走狗》、《帝国主义者为什么帮助反

① 《向导》，第129、130期。

② 《向导》，第128期。

动军阀?》、《是谁的国家?》^①。

是月 会见由北京来的朱蕴山和高语罕，听取他们转述的李大钊关于西山会议派正在酝酿反共阴谋的情况介绍，及李要求研究对策的意见；共同议定：发展地方左派国民党工作揭露右派反共阴谋，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派朱蕴山回安徽贯彻上述方针，为召开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作准备。

10月12日 发表《今年双十节中之广州政府》^②。

10月13、14日 在亚东图书馆两次会见北来的胡适，“非常高兴欢喜”，但有争论，“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意见”；谈的是“问题与主义”老问题。陈重“主义”，胡重“问题”^③。

10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六十号，指示声援广州政府和纪念十月革命宣传要点。

10月30日 发表《反奉运动与法统问题》及“寸铁”五则：《戴季陶之道不孤矣》、《究竟谁是不良分子?》、《孙传芳自己想想看》、《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又是一个共产军》^④。

是月 中共中央在北京苏联驻华使馆内召开四届二次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鲍罗廷参加了会议。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陈独秀认为：“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企图巩固自己的势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即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的政策所牵制。”^⑤ 国际代表和中央其他委员多数反对他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因

① 《向导》，第131期。

② 《向导》，第133期。

③ 汪原放日记，《回忆亚东图书馆》第94页。

④ 《向导》，第134期。

⑤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为这意味着根本改变国共合作的方针，共产国际不会同意。但会议对国民党的看法和策略有了改变：把它看成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党，而不再是“四个阶级的联盟”；策略上，不再强调“团结左派，打击右派”及争取领导权的方针，而认为国民党内演成共产党与右派的斗争，对于我们是不利的，应该退出漩涡，让国民党左右派自己去斗争；这样也可推动左派起来，积极负责，我们不要去包办代替。会议通过决议，强调在巩固国共合作、扩大统一战线的同时，要保持党的独立性和独立工作；“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秘密的组织，并全力以赴地公开地从事政治运动。”^①新入党的同志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的工作。陈独秀表示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②。但是，王若飞在后来评论说：“须知当时国民党左派即是共产党，我们如果不去代替，就无所谓左派，大的错误就此铸成。”这次扩大会“是不要国民党的精神，是不要领导权的精神，是较大的错误。”^③从此，党对国民党的策略，就纳入了“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轨道，实际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和苦力，这也就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特点，从而导致了大革命失败。

11月7日 发表《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④。

11月上旬 某日，在亚东图书馆再次与胡适发生争论，说：“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生气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⑤

① 《党的基层组织计划》，转引自《罗易赴华使命》，第23页。

②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③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④ 《向导》，第135期。

⑤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95页。

11月17日 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告，指示反对奉系军阀、关税会议及沪案重查等宣传工作。

11月21日 发表《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认为“五卅”运动证实了“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中国资产阶级“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指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要靠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力量^①。

是月 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否定周恩来、陈延年、鲍罗廷等广东区委提出的建立中共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的计划。由于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中，蒋介石表露出在军队中排斥共产党人的企图，周恩来在东征结束后，即同陈延年、鲍罗廷商定：不再与蒋合作，另组国共合作的部队。此计划遭到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否定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征得第四军李济深的同意，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和一部分黄埔军校的党团员为骨干，只在广东肇庆第四军内，成立了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为当时我党直接领导的唯一正规军队。

是月 会见由皖来沪的朱蕴山和高语罕，决定朱蕴山、高语罕以特邀代表资格，与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闇公等一起去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并特函广州区委书记陈延年，让其发展朱蕴山入党（后来，朱到广州后，由高语罕、薛卓汉介绍，陈延年批准入党）。

11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告第六十五号，指示与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斗争问题。

12月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告第六十六号，指示开展群众示威运动，打倒段祺瑞反动政府。

12月3日 发表《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指出孙中山逝世

^① 《向导》，第136期。

后国民党内分裂出的“戴季陶派是新右派”，是“口头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口头信仰三民主义，而不想实行的非革命派”；“他们的专门工作只是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斗争这三件大事”^①。

12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告第六十七号，指示各地通电反对西山会议派，并逐条驳斥了西山会议通过的反共决议。

12月10日 发表“寸铁”七则：《中国军阀之左右派》、《说假话》、《工贼替安福派说话》、《联贼军总司令》、《预防赤化的国民党右派》、《以赤化为仇敌的奉天商会》、《时事新报太赤化了》^②。

12月20日 发表《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认为“左派领袖汪精卫、蒋介石等在国民政府所做的工作”“功多于过”；“然而右派对于他们的攻击，竟无所不用其极”。主张：“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固然应该和国民党左派结成亲密的联盟，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因为“只要他们不右倾至于反动，还算是右派而非反动派。我们对于这种右派，并不特别反对”；但又认为，此时戴季陶“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也非常严重。这倾向若继续发展下去，便和以前的右派即反动派毕竟是一家眷属”^③。

12月某日 在维经斯基赞助下，与蔡和森、张国焘三人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与同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有联系的戴季陶派人物孙科、叶楚傖、邵元冲谈判国共关系问题于上海苏联领事馆内。在会上，陈独秀首先发言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

① 《向导》，第137期。

② 《向导》，第138期。

③ 《向导》，第139期。

的企图，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将在第二次国民党大会上不增选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的人数。双方协议，加强团结，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支持广州国民党中央及国民党政府，中共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并“保驾”对方回粤参加国民党大会。谈判后，陈独秀派张国焘去广州，指导国民党“二大”上中共党团的活动，纠正已往“过左”的偏差（即只注意依靠汪、蒋“左派”，不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①。

12月下旬 鲍罗廷召集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等人举行会议，鲍指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团结左派，联络中派，打击右派”的政策，是“死板的公式”。他和陈（延年）、周（恩来）都反对以向右派让步的方式，去联络中派，主张“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准备在国民党“二大”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党籍，在中央执委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右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他们讥讽陈独秀等人与孙科、叶楚傖、邵元冲等成立的协议是要不得的安抚政策，他并且号召广州的党组织反抗上级的决定，主张根据广东的真实情况作出决定，修改中共中央的政策。鲍的意见，遭到张国焘的批驳，不欢而散。

胡适复函陈独秀，就北京群众 11 月 29 日烧毁《晨报》馆事，批评陈认为“该烧”的意见，主张“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还声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上主张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攻击陈“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

^① 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第 720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2 册，第 67—68 页。

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①。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 355—357 页。

1926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

四十八岁

2月17日—3月15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举行,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认为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指示中共要保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要反对两种有害的倾向: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它无视中国无产阶级独自の阶级任务,导致一种与一般民族民主运动实行无定规的联合的情况;反对极左情绪,它忘记农民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力图越过运动的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任务。蔡和森代表中共参加了这次会议。

7月 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对派“联盟”,加紧进行反对苏共中央的活动。10月,苏共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向反对派首领提出警告,撤销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11月22日—12月16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第七次扩大全会。会议把中国问题列为议事中心,成立了中国委员会。会议明确决定在中国推进土地革命,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等。会议通过《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认为“自从广州政府建立以来,实际权力掌握在国民党右翼(六个委员中五个属于右翼)手

中”。指示：“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和在北伐军“解放的省份里”将要建立的政治机构，以便实行民族革命的土地纲领。认为土地问题尖锐起来，成了“目前形势的中心问题”；“对于这个基本问题持坚决态度并能给予彻底回答的那个阶级，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指示中共“把土地国有化的要求提为无产阶级土地纲领的基本要求”；在目前，在国民党政府的辖区内，应当实现的措施是：减租减息；把反动军阀及同国民党国民政府进行内战的买办、地主和土豪的寺庙与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等。指示中共对国民党的方针是：反对右派，与左派密切合作，批判动摇的中间派。中共代表谭平山参加了这次会议。共产国际执委及主席团委员罗易，在会后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赴华，执行决议。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期间及其以后，斯大林陆续发表《论中国革命前途》、《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等著作，阐述中国革命的理论。

7月1日 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在工农群众支持下，12日攻取长沙；9月，攻克汉口、汉阳；10月10日攻克武昌，基本消灭吴佩孚的部队。另外，东路军于11月占领九江、南昌，基本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

10月底 国民党中央与广东省党部举行联席会议，在中共影响下，通过决议：打倒个人独裁，加强党内民主，召回汪精卫以抑蒋介石。

12月 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企图在南昌另立中央，并与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勾结，准备公开背叛革命。

1月1日 中共广东区委就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二大”加强反帝联俄扶助工农，对于破坏工农运动的党员严厉处罚，开除反革命党员，巩固国共合作。《宣言》痛斥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指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是“最好的国民党党员”，“真能信奉孙文主义”，“在每一次的革命运动中是最勇猛的奋斗者”，“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还批驳了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论调，指出“本党决无心占据国民党，如国民党与国民运动需要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时，本党党员不待国民党的命令，必可立即退出。但是现在既未到此时期，本党决不因帝国主义走狗之反对而退出”。

1月1—19日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由汪精卫主持，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通过了反映共产党主张的一系列决议，并明确指出“西山会议”纯属违法，是破坏国民革命的反动行为，对“西山会议派”首领邹鲁、谢持，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林森、戴季陶等人为警告处分。陈独秀在会前及会议期间，致函中共广东区委，认为目前郭松龄倒戈失败、冯玉祥四面受敌、奉军气焰嚣张并与吴佩孚勾结一起的形势，革命处于低潮，指示中共在统一战线方面要执行让步的策略；在国民党“二大”上要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括进中央委员会中去，右派也要争取，以示团结。当时，鲍罗廷及中共广东区委对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中央的路线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对右派进行了斗争，使共产党掌握了一些部门的领导权，如谭平山为组织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毛泽东为代理宣传部长等。但另一面，也受到陈独秀中央及其到会代表张国焘的牵制，犯了严重错误；在选举中，由于张国焘的坚持，作了错误的让步，在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员只占七人，左派十四人，右派和中派却有十五人。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共产党员只有一人。国民党中

执委和中监委常在一起开会，结果造成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会后，中共广东区委曾作出决议，指责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上海谈判及国民党“二大”上的退让政策。

1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七十一号，表示对目前政局的分析及对策，认为北京政局动摇，但若无有力的民众运动争取政权，则奉张扑灭郭松龄，吴佩孚停止反奉，冯玉祥在奉直联合的恐吓而散乱自己的势力——帝国主义者便不难帮助反动的奉直军联合而恢复军阀统治的新反动政局。为此，“我们职任，应当赶紧联合国民党、学生、工人、小资产阶级等革命群众，督促右派、国家主义派，以及商会等人民团体，起来共同奋斗”，“广州国民政府应与国民军及其他反奉势力，以及全国人民团体代表（商会、学生会、农民协会、工会等）共同组织委员制的临时中央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十九日，又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三号，认为目前政局有渐趋于日奉直联合之势，“故最要紧的是人民和进步武力的联合战线”，“我们应恢复去年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务须极力扩大其范围，务须与各种社会阶级的派别合作，极力免除不必要的分裂现象。”

1月下旬 会见参加国民党“二大”后来沪的朱蕴山，听取“二大”情况及广州见闻，派柯庆施随朱蕴山、薛卓汉回安徽建立国民党省党部。朱为驻皖常委，柯为秘书长，薛为农民部长，并在各县建立组织，积极开展工作。

1月下旬—2月下旬 患伤寒病住进医院，未通知组织。组织派人四处寻找无着，称为“陈独秀失踪”事件^①。为此，国民党右派、醒狮派及南京的国家主义者放出谣言说，陈独秀秘密赴武汉勾结吴佩孚去了。《向导》第143期（1月21日）以《国民党

^① 《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1926年2月21—24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55页。

右派的小伎俩》为题，发表记者与南京读者梁内的通讯予以辟谣。

2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六号》，指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我们应做的工作是：“竭力赞助左派对右派的斗争，竭力扩大左派的组织；同时，又要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因为左派的发展是要以C.P.为核心的，离开了C.P.，绝不会形成一个有力的国民党左派。”同时又说：“为对付目前的反动政局，……我们应建筑一民众团体的联合战线，我们要在这个联合战线的策略中去减轻右派的反动力量，去拉住一部分较好的右派首领，去取得右派下面的群众”；“我们对于右派的政策，决不能笼统的把他看成与左派敌对的固定的组织，更不能逼他团成一气，把他看成整个的对象来攻击；我们要努力使他们逐渐分化……”；“在思想政策的宣传上绝对不能让步，应努力痛斥右派的错误；在行动上则力求取得其合作”。

2月21—24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因病未出席。当时张作霖与吴佩孚联合攻打冯玉祥，冯准备通电下野，北方形势紧急。同时，各种反动势力“互相联合出全力以搜索我党中央机关，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陈独秀又失踪无着，于是促成了这次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会议初开，即接陈独秀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在会议上，李大钊、陈延年、任弼时、谭平山、瞿秋白等都主张发动群众斗争，支持国民党，挽回冯玉祥；对于南方，会议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在北伐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紧开展群众工作；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会议认为“中央已不适宜在上海，因为，A.上海不是政治的中心；B.更不是目前革命的重心；C.不能有完备的技术机关以指挥日愈发展的群众大党”，所以，决定中央迁移北京，上海设交通局，广州设临委，“万一不

幸国民军在北方失败，中央决移广州”。“此项意见须征独秀最后意见方始确定”。

3月2日 会见去广州途经上海的苏联考察团布勃诺夫等人，共同分析了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表现和力量、国民党的内部状况、广东的工作和形势、北伐、与冯玉祥国民军的合作、党中央迁出上海、以及国民革命的前途等问题。陈独秀的看法很悲观，认为“即使最激进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也是反对革命的……但不应当把全体资产阶级都称作是反动的，其中的一部分有可能是中立的”；“我们对待这些人的政策是，不应当把他们作为革命力量来依靠，我们的政策在于使他们保持中立，不那么十分反动，而稍微温和一点”。他反对布勃诺夫等人把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全部都划入革命阵营的观点，认为除工人农民外，只有小资产阶级左翼才能参加国民运动；同时对农民问题也表现出无动于衷和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主张北伐只讨伐吴佩孚，打败吴后，即与奉军签订停战协定，与孙传芳、冯玉祥等组织临时性的过渡政府，以便修正（而不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发展和组织群众力量，发展经济，准备新的消灭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时机到来。因为他认为：“就最近的前景来说，反革命力量的成功希望大于我们国民运动，因为反革命分子比革命分子联合得更紧密”；现在是革命积蓄力量的阶段。如果不能打败吴佩孚，如果吴或张（作霖）取胜，“那么最近这半年就将是十分困难的时期”。

陈还表示坚决不同意北京中央全会关于党中央迁出上海的决定：“我个人是主张把中央委员会留在上海的。第一，上海是无产阶级的地区，这里毕竟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多数；第二，上海有着很好的通信联络设备。”会谈中，陈还极力批评广东的同志，并指出党中央不能设在广州，否则中国共产党将“作为广

东共产党”进行工作。^①

3月7日 发表《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②。

3月12日 中共中央就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发表《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称当前有两件“最痛心的事”：一是国民党左右派之分裂，一是反赤运动之高涨。说“极诚恳劝告中国国民党的右派同志们，……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取消和左派分离的党部组织，合成整个的左倾的中国国民党，来担负中国民族革命的工作”。呼吁“中国国民党左右派结合起来”^③。

3月18日 北京群众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共产党人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在大沽口的侵略挑衅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在段政府门前遭到残酷镇压，是为“三·一八”惨案。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宣布段祺瑞是“彰明较著的卖国凶犯”，指出：“唯一的办法，只有实际的行动，民众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苟安就是送死”。^④

某日晚，到亚东图书馆，就“三·一八”事件，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说“我们从小一道革命，你现在怎么这样的糊涂了，我和你绝交”。气恼至极，快信寄出。^⑤

3月20日 蒋介石制造“三·二〇”事件，派兵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包围苏联顾问团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当时鲍罗廷和加伦已奉召回国，不在广州，顾问团工作由军事顾问季山嘉主持，还有布勃诺夫率领的苏联考察团。事件后三、四天，陈延年、

① 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76—3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

②③ 《向导》，第146期。

④ 《向导》，第147期。

⑤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02页。

毛泽东和布勃诺夫及苏联顾问团代表开会研究对策。陈延年、毛泽东等主张联合其他国民党势力，坚决反击蒋介石阴谋，这个意见被会议否决。顾问们认为只要蒋介石保证北伐，可以同他妥协。苏联领事馆代表与蒋会见后，一面电告莫斯科请示对策，一面决定因反对蒋的北伐主张而遭到蒋忌恨的季山嘉和考察团撤回回国^①。消息初传到上海，陈独秀表示愤慨。但因情况不明而毫无对策。

3月27日 发表“寸铁”三则：《红派势力与外人势力及曹锟势力之消失》、《安格联为什么要听张作霖电令？》、《孙文主义的信徒呢，还是冯自由主义的信徒？》^②。

3月底 布勃诺夫回国路经上海，陈独秀等人代表中共中央与之谈判，决定一面派张国焘去广州了解事件真相，一面等待莫斯科的指示。

4月3日 在《向导》上发表《广州事变之研究》，根据布勃诺夫及报上提供的消息，指出“三·二〇”事变的策动者是“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示意与蒋介石无关，而蒋采取行动，是由于误信共产派倒蒋阴谋的谣言）；要求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严惩“事变之主动者”。同时又发表《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驳斥国民党右派散布的“三·二〇”事件是“共产党有倒蒋阴谋”引起的谬论，声言：“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谁破坏革命势力统一，谁便是反革命！我们的政策是统一，右派的政策是分裂，他们在广东想

①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印行，第41页。说季山嘉反对蒋北伐主张，是蒋制造的借口；实际是因为季要蒋去帮助冯玉祥训练干部，并在给养等方面没有对蒋的第一军予以特殊的照顾，而遭到蒋的忌恨。

② 《向导》，第147期。

分裂革命势力”。发表《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认为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与冯自由为首的老右派的不同，在于“他们不但要反对军阀，并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可是他们以为左派联俄、联共政策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而要加以修正”。新右派“还非常模糊幼稚，还未能离开反革命派而独立自成一派”。发表“寸铁”三则：《这就是戴季陶所谓“仁爱”之言》、《国民党右派之光荣》、《帝国主义者悬出重赏来了》。^①

4月初至4月中旬 中共上海区委及各地党组织纷纷要求中共中央对“三·二〇”事件作出正式决定，以便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并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对付蒋介石。同时，陈独秀也接到了陈延年写来的关于“三·二〇”事件的“详细报导”。于是在4月中旬，陈独秀召集中共中央会议，决定以下对策：一、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孤立蒋介石；二、在物质和人力上加强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必要时打击蒋介石；三、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为了实现上述计划，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人选为彭述之、张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陈独秀一面指定彭述之为特委书记，前赴广州组织特委，与国际代表商讨上述计划，一面电莫斯科共产国际，再次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

4月13日 发表《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批评一般人不分“军人和军阀”，视“冯玉祥蒋介石也是军阀”，加以反对，是错误的；还说蒋介石要求辞去一切军职^②，“以免步军阀之

^① 《向导》，第148期。

^② 蒋制造“三·二〇”事件后，曾感孤立，假惺惺地向军事委员会呈文，说：“此事起于仓卒，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

后尘,这和一般见解军人和军阀不分是同样的错误”。声称:“不但蒋介石绝对不是军阀……”,若把他们和张作霖、吴佩孚“一概加以反对,……这样不分是非皂白的糊涂乱打一阵,其结果只有打着自已,而打不倒敌人,……中国革命是一天没有希望的呵!”同时发表“寸铁”六则:《绅士们请看北京血案的司法调查》、《你们代表谁?》、《一个不行动的党》、《全民政治与全民革命》、《反赤与苛政》、《独立报对谁独立?》^①。

4月中旬 在亚东图书馆房子里,探望“三·二〇”事件后逃到上海的高语罕。高说:黄埔军校竟然升起写“蒋”字的大旗。校长吃饭,要军乐队伴奏,真不成体统!陈独秀说服高语罕要冷静、忍耐。

4月23日 发表《国民党右派大会》,就国民党右派邹鲁、张继、谢持等人在上海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肆反共,攻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成立伪中央等事件,指出:“国民党右派不但有了和左派分离的组织,现在又有了和左派不同的政治主张”。“我们已不能奢望右派向左回到广州中央,只得竭诚奉劝他们不要再向右跑到反革命派那边!……蒙他们不弃认我们为友军,现在敢以友军资格,希望他们和我们在相同的口号‘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工作上合作”。同时发表《国民军与北方政局》^②。

4月 中共中央发出党内通告第九十七号,指示当前的宣传口号是“反对军阀战争!要求和平!召集国民会议!”

苏共中央就中国“三·二〇”事件作出决定,否定托洛茨基提出的中共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认为“必须执行把共产党保留在

① 《向导》,第149期。

② 《向导》,第150期。

国民党内的路线”，应当“使国民党右派退出国民党或把他们开除出去”^①。

4月底 鲍罗廷和彭述之先后到达广州。鲍即与蒋介石会谈，鲍答应蒋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等条件；蒋同意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相应措施^②。5月上旬，彭述之在广州组织特委机关，并两次召集特委会议，提出陈独秀中共中央的对蒋政策。鲍罗廷认为：“广东局势异常危险，很有可能发生右派（指胡汉民、吴铁城、古应芬、任朝枢代表的广东派——引者）的反革命政变”，暗示中共中央的反蒋政策是不合时宜的；表示苏联与国民党的友好关系，不能因“三·二〇”事件而有所损害，“莫斯科一直是在设法冲淡这一事变的严重性，期望我们能设法挽救”。

5月1日 发表《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劳动运动》及“寸铁”九则：《捷足射利的上海》、《唐生智也赤化了吗？》、《讨赤大元帅》、《反赤的滋味》、《各国公使为什么均有喜色》、《国民外交原来如此》、《这是以党治国吗？》、《可怜的租界华人立宪运动》、《白俄不是外力吗？》^③。

5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一〇一号，认为现时全国政局“已到了一个极反动的时期，……国民政府忙于对付内部的误会，忽略全国的政治，不能积极地有所动作”。提出我们的工作原则是“统一革命的势力”；“巩固广州革命政府，维持国民军在北方的势力”等。

5月8日 发表《最近政局之观察》、《我们要认清敌与友》及“寸铁”四则：《张作霖口供中之赤与反赤》、《章炳麟与镇威孚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1页。

② 马丁·威尔伯等：《中国的苏联顾问》，第228页。韦慕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文资料叙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1950年版。

③ 《向导》，第151期。

威》、《向赤或向反赤之路标》、《奉军胜利之教训》^①。

5月15日 发表《南方形势与国民党》，认为因吴佩孚攻湖，并计划攻湖后以八省兵力攻取两广的计划，将使南方的形势“十分严重”。主张全国民众应出全力拥护两广革命根据地。两广迅速出兵援湖，并肃清广东内部反动的右派势力。再次示意制造“三·二〇”事变的右派与蒋介石有别，谓右派“在军队中禁止阅看汪精卫蒋介石的演说词”。同时发表《宪法与贿选》、《英国大罢工与东方民族运动》及“寸铁”四则；《张作霖、吴佩孚的假慈悲》、《不怪外人都说中国人自己不好》、《官民合作》、《外交界是以平等的好感对谁》^②。

5月15日 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中任执行委员时不得超过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一，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规定共产党发指示给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会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之任职，皆离职；组织部长谭平山由蒋介石接任，旋即由张人杰担任；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改由顾孟余担任；秘书长吴玉章改由叶楚傖担任。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③，并兼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方针，认为“否则，其势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鲍罗廷的意见是：“原则上不退出，但必须以退出相威吓”。即：“我们在原则上虽然不退出，但在策略上应当以退出来威

① 《向导》，第152期。

② 《向导》，第153期。

③ 原主席是汪精卫，“中山舰事件”后受蒋介石排挤，不久出洋；二中全会上，张静江任主席，7月，蒋又取张而代之。

吓”。因为他认为蒋介石提出种种条件是要限制共产党，也不愿意共产党退出，他还需要苏联的援助，进行北伐。鲍罗廷还向彭述之表示：除了蒋介石，没有人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所以“我们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二〇”事件以来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整理党务案”，支持他尽快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彭述之主持的中共广东特委第三次会议，通过了鲍罗廷的主张，否定了陈独秀中共中央的政策。苏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的“五·一五”事件，举行了临时会议，决定：一、“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要设法同国民党磋商“职务上某种分工的可能性”；二、“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人”要从国民党组织机构中撤出来，但那些“尚未向国民党公开的”就不要撤出来，或暂不撤出；三、两党“可能分离”的问题，“在紧急情况下”需要予以考虑。但是，那时脱离国民党是出于不得已的。共产国际一面由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论文，“最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一面派远东部部长维经斯基来华，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倾向。陈独秀接到国际指示后，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痛陈必须退出国民党”的理由，但多数同志主张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最后表示：“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①。

在国民党中央第二次会议上，孙科提出“禁止以后国民党有左右之分”的议案，攻击陈独秀《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一文是“有意挑拨”。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反驳孙科提议之无理”，并予否决^②。

5月22日 发表《直奉冲突之迫近与各方应采取的态度》、

①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② 乐声：《最近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向导》，第157期。

《孙传芳最近的主张》及“寸铁”十则；《“过激主义”也是国粹了》、《国民党败类中之先知先觉》、《师生合作与学生会》、《李景林张宗昌之共产》、《合肥段公与总统曹公》、《又是一个曾左》、《吴佩孚已是事实上的大总统》、《孙宝琦妙语天下》、《你们还要反赤吗？》、《是地痞还是警察？》^①。

5月25日 发表《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②。

5月30日 撰《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③，发表《打破“民族的巴士的狱”》及“寸铁”三则：《全中国人都过激了吗》、《到底要怎样才不是过激？》、《亚细亚民族大会与谢米诺夫》^④。

6月3日 发表《对于上海五卅纪念运动之感想》^⑤。

6月4日 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以私人名义，给蒋介石一封信，逐条批驳蒋介石就“三·二〇”事件对共产党的“栽诬”，辩白中共并无“阴谋倒蒋”，称：“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欲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我知道我们的党并且相信我们党中个人，都没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还说：“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竟至使先生不相信我们，……这是我们十分抱歉的事。”^⑥同日，中共中央也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书

① 《向导》，第154期。

② 《新青年》（不定期刊）第4号。

③ 《新青年》（不定期刊）第5号。

④ 《向导》，第155期。

⑤ 《向导》，第156期。

⑥ 《向导》，第157期。

国民党中央，说明国共两党合作的方式，或为党内合作或为党外合作，原无固定之必要，只因当初商之于孙中山，孙先生以为党内合作，则两党之关系更为密切，才决定“令本党党员得加入贵党，同时本党与贵党结政治上之联盟”。对于“五·一五”“党务整理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至于其中关于两党合作方式之改变问题，“则吾两党本为革命联盟中之友军，可各自根据其党之决议以相协商”。声明中共的原则是：“团结革命势力以抗帝国主义，不问其团结合作之方式为何也。”^①总之，在对待“三·二〇”与“五·一五”事件问题上，事件的发生，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是对资产阶级国民党“当退让而没有退让”和“包办太多”的结果；鲍罗廷和广东区委则认为，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的结果；在对策上，鲍罗廷共产国际主张采取暂时让步的政策，以争取中共保留在国民党内，准备以后新的进攻，“来一个我们自己的‘三·二〇事件’。”陈独秀则在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被否决后，继续奉行其“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路线。

6月16日 发表《红枪会与中国农民暴动》及“寸铁”六则：《威林顿眼中的华人价值》、《反赤军惠及警察》、《平民之不平》、《人类之耻辱》、《请看反赤军阀之卫国救民！》、《好个“为国家立了大功！”》^②。

6月19日 国民党中央致函中共中央，通知说国民党中央推举张静江、谭延闿、蒋中正、吴稚晖、顾孟余五人为出席两党联席会议代表，催中共选三名代表，使联席会议早日成立^③。

6月23日 发表《直奉对峙的混沌政局》及“寸铁”八则：

① 《六大以前》，第510页。

② 《向导》，第158期。

③ 《向导》，第165期。

《中日亲善声中之日本侵略》、《好个经济上的提携》、《平民的中日亲善》、《“友谊的态度来交涉”之结果》、《工人活命问题》、《官绑票》、《共产主义适合于国情》、《徐锡麟孙宗昉你又来了》^①。

6月28日 蒋介石就总理纪念周在黄埔军校发表讲话，谈到陈独秀6月4日给他的信：“我在党代表宴会席上的讲演，曾经再三声明，三月十八号中山舰案，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讲的话，并不是对共产党而讲的，故无答复之必要。……陈独秀同志以前同我的主张也完全相同，他曾于三月二十日以前给我一个电报和几封信，所论的意见大体相同，所以今天，我可以再声明：三月二十日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②

6月30日 发表《革命的上海》及“寸铁”九则：《国民党右派与赵恒惕》、《刘芦隐与张君勱》、《国民党右派与陈炯明》、《雷殷犯了什么罪？》、《美术家再往何处遁？》、《左排赤党右讨军阀》、《崇拜曾左罗江的国家主义者》、《国家主义的政纲》、《可以靠外力替我们革命吗？》^③。

是月 某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问题。陈独秀反对北伐，彭述之附和；张国焘反对陈的意见。瞿秋白也拥护北伐。二对二票，反复辩论了几次，陈独秀发了脾气，桌子一拍，张口大骂。张国焘不敢回骂，终于默然了。于是通过了反对北伐的决议^④。

7月7日 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违背二月中央北京

① 《向导》，第159期。

② 《黄埔潮》第2期，1926年版。

③ 《向导》，第160期。

④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特别会议的决定,反对北伐,认为“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是各阶级革命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自求解放”;现在的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必须他真是革命势力向外发展,然后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军事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同时发表“寸铁”四则:《赤化过激都是国粹》、《吴佩孚与国会》、《顾维钧的巨款从何而来?》、《丁文江第二次“友谊的磋商”之结果》^①。

是月 北伐开始前,加伦和中共广东区委表示支持北伐;发起“迎汪(精卫)抑蒋”运动,准备打倒蒋介石,并派周恩来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陈独秀表示:第一,反对北伐;第二,北伐就是北伐,既不是拥护蒋介石,也不是打倒蒋介石(实际上,不打倒就是拥护)^②。周恩来后来回忆:“陈独秀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开会时,张国焘代理主席,“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③。

7月12—18日 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四届三次扩大会议,在会上作“中央政治报告”并起草决议。在报告中宣称:“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

① 《向导》,第161期。

②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24页。

或至于危险。……在事实上，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因此，我们此时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应该一方面努力拉住小资产阶级，使之接近工农群众，而不完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所统治，以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以防其将来之妥协；一方面极力巩固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促进资产阶级之革命化，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我们若妄信资产阶级可以革命到底，不预防将来之危险（指革命得到些小胜利后，资产阶级“便立刻发挥其妥协根性，离开民众，背叛革命而与敌人合作”——引者）……这便是右倾的错误；同时，若现在即否认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之作用，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这便是左倾的错误”。对于国民党的政策，报告说：“我们要联合左派（指汪精卫、甘乃光等）并中派（指戴季陶、蒋介石等），向反动的右派（指李福林、冯自由、马素、古应芬等）进攻；我们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有时还需要扶助中派”^①。在会议讨论时，陈独秀发表反对国民政府北伐的意见，认为北伐军能否打到武汉，大有疑问，得到大多数同志的支持，通过决议称：“南方国民政府之出兵，亦尚只能是防御反赤军攻入湖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彻底北伐”^②。为此，会议通过《中共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没有支持北伐的文字，而“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天真地强调各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自动的发表政纲，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然后汇合成全国政权的国民会议，由此会议建立全国的人民政府，解除人民自己的

①②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51页。

痛苦。

同时，陈独秀和彭述之一起，再次提出一项决议案：“所有中共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仅只实行党外合作，并同左派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陈、彭解释说，“只有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我们才能真正实行独立领导工农运动的政策”^①。从1927年4月15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社论《中共“五大”和国民党》内容推测，陈、彭的这个提案有四条内容，即四项决定：“第一，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第二，采取一定的独立的政治策略；第三，竭力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成为国民党的基础；第四，建议国民党不要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而成为地方组织，可以采取俱乐部形式。”参加大会的多数中央委员和国际代表拒绝了这个决议案，大会决议重申：“我们仍旧认为国民党的发展及我们参加国民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提之一。”同时，大会又同意将陈、彭的提案提交共产国际去考虑。托洛茨基看到这个提案后赞扬说：这是“无条件正确的”；但被共产国际所拒绝^②。国际执委彼得罗夫（即费德尔·拉斯科尔尼可夫，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委员会书记之一）在这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国际执委“七大”上回顾说：“中国共产党内，却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念。……由此乃产生华北北京委员会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情绪。遗憾的是，这种错误的建议，不仅在中国本土，而且在我们联共也得到了同情的反应。这是一种极其有害的、错误的、投降主义的观点，这是一种必须彻底批判的失败主义思想。”大会决议强

①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20页，香港前卫出版社1975年版。彭述之为《托洛茨基论中国》（英文版）一书作的“前言”（1974年4月26日）。

②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1927年4月3日）。《中国革命问题》（王凡西校译），第16页，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托洛茨基把陈、彭的这个提案，误认为是中共中央全会的决议。

调，由于许多重要的原因，“认为共产党应该离弃国民党的这种主张，乃是错误的。中国革命发展的全过程、其性质和前途都要求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并在其中加强自己的工作。”^①

但是，中共中央四届三次扩大会议在否定陈、彭关于退出国民党的提案的同时，也批评了共产党包办国民党的做法，从而进一步肯定了“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机会主义政策。在陈独秀起草的政治报告决议案中，还表示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运动的前途是“由工农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以革命的手段达到民族资本主义的建设”。大会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竭力阻止农民夺取政权，建立武装，强调农民协会不应有“阶级色彩”，而应包括中小地主在内，建立乡村联合战线；反对消灭地主武装“民团”，而“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此外，还规定农民运动限制在减租减息的范围内。中共广东区委后来反对这种农民政策，主张土地问题在更高阶段上解决，不应因国共合作而阻碍了农民斗争，遭到中共中央陈独秀的否定^②。

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张国焘、瞿秋白赴粤参加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陈独秀“病入医院，……在病中仍管理一切工作。但总有许多事情因而停顿”^③。

7月 鉴于“三·二〇”事件后，联共反对派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议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批驳了托季主张，作出决议：“中央委员会全会赞同在中国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年)第1辑，第227—228、282页。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11页。

③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87页。

问题上联共(布)政治局和它在中国的代表团的活动,并确认反对派(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建议是明显机会主义的,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是投降主义的;召回加拉罕同志,放弃中东铁路,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认为这种立场只有在彻底消除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即在阶级斗争的殖民地战线的最重要地区资本主义完全而牢靠地稳定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中央委员会并不排除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但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反对派的上述建议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些建议的总和表现了不能容忍的失败主义。”^①

7月12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建立“国民的联合战线”,推翻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并提出二十三条政纲,作为联合战线的共同争斗的目标^②。

7月14日 发表《帝国主义者最近在上海之暴行》^③。

7月中旬 接见由欧洲回国的朱德,并将其介绍给国民党和中共上海负责军事情报的机关,决定派朱德去四川,争取军阀杨森倾向国民革命^④。

7月25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对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宣言,号召全国工友、农民及各界同胞援助国民革命军北伐,努力参加国民革命,站在一切民众之前,引导一切民众援助国民革命军使之得到胜利。

是月 《新青年》(不定期刊物)出版第五期后永远停刊。

7月31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一号,宣称:“我们可以说

① 格鲁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

② 《向导》,第163期。

③ 《向导》,第162期。

④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197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全国反赤潮流现已到一低落时期，而革命潮流则随北伐军之进展而上涨，广东政府之北伐已成为全国民众最注意的一个问题。”表示：“我们并不是反对北伐是赞成北伐，尤其在现时广东北伐更为必要。”但又指出“我们虽极力赞助广东政府之出兵，同时须预防过分宣传北伐之流弊”；应当“提出我们独立的政治主张，而不可笼统的宣传北伐。”《通告》仍强调“国民会议”是我们总的政策口号，以北伐拥护“国民会议”之实现；还具体指示了广州、战区及北方等各种不同地区如何响应北伐、进行国民会议的工作。《通告》实际上改变了陈独秀原来反对北伐的错误态度，但据郑超麟说，陈独秀始终未作自我批评，这样，在干部中“对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是很大的打击。张国焘认为，当初不是我错了，是陈独秀错了。瞿秋白也是这样认为的”。

8月13日 所著《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在广东引起震动，国民党“中派及右倾的左派领袖，均表示不满”；顾孟余“直斥仲甫同志有意挑拨人民与国民政府之感情”；张静江则请鲍罗廷“劝仲甫勿再作这类文章；黄埔特区（国民党）党部则提出中央党部控告，并禁止同学购阅向报（即《向导》），左倾分子不赞成，竟至用武”。国民党中央开会正式讨论，“李济深第一个起来说这篇文章并不错，孙科亦然，左派诸人借此机向中派发牢骚，最后勉强敷衍的由主席张静江写一信给仲甫结束此案”。在群众方面，工人、农人、商人中，此文宣传“均发生很大效力”。^①9月13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驳答张人杰抗议的复信，坚持《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的立场观点，申明：“我们对于出师北伐是否国民革命之唯一先著，对于怎样出师北伐，和你们都有不同的

^① 《向导》，第171期；《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79—80页。

意见。你们一闻不同的意见便以为是攻击，你们这种不受善言的老脾气也仍然丝毫未改，更是令人失望！”^①

8月14日 中共中央致函河南区委，强调有能力的共产党人应多做民众工作，而不应从事军事工作，“替别人做苦力”，“替别人造成战胜的局面来压迫我们”。

8月23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十二号，就当日报载孙传芳致蒋介石书，要蒋排除俄国人与过激派事，指示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应速发表很严正的宣言，公开反对孙传芳书函。

9月6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钟字)第十五号，指示发起反对英帝国主义援助吴佩孚攻击北伐军的运动。

会见柳亚子，回忆与亡友苏曼殊的交往及合译《惨社会》等情况^②。

9月上旬 与中共中央多数同志一起，以上海是照顾全国的中枢和武汉局势尚未稳定为理由，搁置了张国焘提出的关于将中央从速迁往武汉实地指挥革命与战争的提议，派张国焘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赶往武汉，独当前线指挥的重任^③。

蒋介石等为抬高自己的地位，使党政军三权集中于总司令，以统制实力强大的唐生智，企图迁移中央政府，匆匆宣布于十月一日召集国民党中央与各地省党部联席会议，以使远地代表不及赴会，企图包办会议^④。

9月中旬 蒋介石鉴于“反蒋迎汪空气异常浓厚”，“自觉自

① 《向导》，第171期；《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79—80页。

② 柳亚子：《记陈仲甫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第279—286页，北新书局1928年版。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142—143页。

④ 《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议的意见》，《中央政治通讯》（1926年9月20日）。

已地位之危险”，派人到上海请陈独秀和吴廷康赴汉，“请 C.P. 勿赞成汪回”，以“维持他总司令的地位”。中共中央向蒋介石表示：“我们赞成汪回”。但在以下三个条件之下：“1. 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2. 仍保持蒋之军事首领总司令地位，愈加充实蒋之实力，作更远大的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助小军阀倒蒋；3. 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①

9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钟字)第十七号，就十月一日国民党要召集中央扩大会议，左派必然要迎汪(精卫)事，指示说：“我们同志在民党中，应向左派宣传‘革命势力统一’的口号，便是必须汪蒋合作，使汪能主持国民党”；“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在现时内外情势之下采取此政策很危险的；一动摇了北伐的局面，二继蒋之军事首领不见得比蒋好，我们向蒋诚恳的表示，汪回后我们决无报复行为，决不推翻整理党务案”。“此次大会主要是要产生一个左派的政纲(对工农政策实施的政纲)，为我们与左派合作的基础，……如果蒋能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我们亦可不坚持要汪回来。”

9月17日 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通报十六日中央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联席会议结论，重申十七号通告精神，认为广东政府自中派当权以来勾结反动势力，摧残工农学革命民众，使得广东的民众已不相信甚至敌视国民政府。出路有三：一，迎汪倒蒋；二，汪蒋合作；三，使蒋成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第一办法太危险，第三办法进行亦多困难，“比较最好的是取第二办法”。信强调关键要产生一个“对工农政策实施的左派政纲”，“指导权在左派手中，可以容许中派甚至右派参加工作”。信还要

①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77—78页。

求粤区工作应把所有能力都集中在农民运动上，去做反对土豪劣绅工作。

9月20日 中共中央作出《对于国民党十月一日扩大会议的意见》，重申十七号通告精神外，揭露蒋介石匆忙宣布十月一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之用心，表示我们“应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因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则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要求改造广东省政府，组一个汪、李（济深）、孙（科）合作的政府，强调国民政府当注重各省自治权，打破总司令的委任制度，以减少军事独裁倾向。《意见》认为，吴玉章提出的要在大会上说明“三·二〇”事件真相的要求“太利害了”，若此，“则蒋完全是反叛，现时当不宜如此尽情揭露，可以含浑一点。”

中共中央发表《中央局报告》，就七月扩大会议后的形势，提出一系列放弃革命领导权的主张。一、对于国民党，报告宣称：“我们的态度是虽不退出 K.M.T.（即国民党——引者）但不代替 K.M.T.；对于蒋介石中派诸人的骄张之气，漠视一切”，“我们应处处保持在野党的地位，善意的忠告他们。”二、对于国民党内的派别冲突，报告宣称：“我们现时对于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这个平衡的维持中，还可逼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我们极力促成迎汪复职的运动，但决不是梦想回复到三月二十日前局面，决不是倒蒋。我们的口号是‘汪蒋合作’”；“将党权、政权速交与汪”；“仍保持蒋之军事首领总司令地位，愈加充实蒋之实力。”“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三、对于北伐，报告指出陈独秀《论国民政府北伐》一文主要意思是：“1. 北伐只是一种讨伐北洋军阀的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2. 须防止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不能因北伐而牺牲民众之自由权益。”“北伐中我们的政治号召是：‘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我们不

梦想此次北伐军事胜利就是一种革命，就能实现‘接收政权的国民会议’。”还说：“总之中派（指蒋介石——引者）的北伐是意在他们的政权扩大，我们对于北伐是要求民权运动的扩大。”^①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市民运动会议。罗亦农在会上说，上海暴动无产阶级要避免领袖地位，若急于来领导革命，必引起帝国主义害怕，而向我们进攻，屠杀，资产阶级也不敢同我们合作。要把领导权让给虞洽卿。并说，这个政策区委和中央都已赞同。

9月21日 中共中央局与吴廷康举行会议，就蒋介石要中共勿赞成汪回及请吴赴鄂事，讨论汪蒋之间、蒋唐之间权力应如何分配，以免他们相互间的冲突，决定将军权和党权分开，请汪回掌握党权；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准备在武汉作第二次更大规模的黄埔式的练兵，扩充十师以上力量；将地方的军队及财政与中央分开，建立省民自治政府，以免蒋与各地小军阀权利之冲突。

9月22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钟字）第十八号，指示当前工作：一、帮助北伐军保住其既得之胜利；二、发展国民政府统治下各省之民主政治运动；实现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提出工农商等被压迫民众的总要求，要求民选省政府、县政府、乡自治机关；三、充实国民党左派的实力，恢复左派在广东的政权，实施左派的政纲等十六项。

9月25日 发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在批驳研究系造谣时，再次声明对革命前途的观点，称：“中国的历史和经济状况，现在还是国民革命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代。”“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

^①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61—91页。

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胜利若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至少我们能够渐渐走上对外民族独立对内建设民主政治的道路。”“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还不是工农政府。”“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同时发表“寸铁”十一则：《人民之军队》、《好一个有弊而却公道的治外法权》、《张宗昌的亲口供状》、《南军之行为》、《这也是赤化运动吗？》、《国家主义者那里去了？》、《……政还诸……民》、《丑哉和平运动》、《师生合不作》、《反赤的老民党原来如此》、《建设专家研究系》^①。

9月27日 中共中央复函中共湖南区委，指示对唐生智的政策是：帮助唐生智发展军队，取得两湖政权，反对抑唐。

9月 中共中央致函湖北区委，反对董必武参加湖北省政府，说，“我们的任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

10月1日 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指示李大钊不参加国民党中央组织的“特务委员会”。该会是北伐军打下武汉后，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的，以处理湖北党政事务，拟请李大钊参加。中央此信要求广东区委向国民党中央交涉：“李同志决不能加入这个组织”，“我们的任何同志在现时都不能加入”。

10月3日 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认为蒋介石个人此时确已向右倾，前敌战况又不佳，不顾蒋意硬迎汪回，殊太危险；中央对汪、蒋问题的新决定是：汪暂不回，以广东省政府权交给左派。

^① 《向导》，第172期。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钟字)第二十二号,指示党员入黄埔军校问题。鉴于北伐军攻克武汉后,黄埔军校决定招收大批入伍生,以培养北伐军下级军官。《通告》规定:“我们的同志宜少派人前往”,“凡已任有工作的同志——尤其是工运、农运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惟能力幼稚不能独立工作而生活又难自维持想入黄埔者,亦可允其前去。”

10月4日 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根据一些国民党人士反映我党“左倾”、“政策老练深沉”、“一切群众均在C.P.手内”的意见,批评广东区委及苏联顾问包办国民党的错误和在手工业工人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发展左派势力的意见,指出“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要求各地党组织帮助汪精卫等发展左派势力、取得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给左派“以负责的机会”,使他们“有群众,有力量”,“去掉怀疑、畏惧、防闭心理”。

10月7日 中共中央作出《时局变动与我们对于汪蒋问题之新决定》,强调迎汪回国一定要得到蒋之赞许,千万不可“不顾蒋之意硬迎汪回”。

中共中央复函湖南区委,再次强调本党不参加政府,“必须立足于在野党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

10月10日 发表《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之态度》。①

10月12日 发表《我们现在怎样斗争?》,主张北伐军在打败吴佩孚以后,“第一步是要消灭孙传芳势力;第二步是要消灭奉张势力。”认为:“这两个军阀势力是目前中国半封建势力之代表,消灭了他们,才能够停止内战,……才能够使中国历史由半封建时代进化到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发表“寸铁”十一则:《孙传

① 《向导》,第173、174期。

芳章炳麟的双簧》、《好一个有节操的章炳麟！》、《妙哉孙传芳的三爱主义》、《好个中国和平之奥妙！》、《研究系主张社会革命？》、《“反国民革命者”的民权呼声》、《以党治国与军事专政》、《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请看治外法权所产生之公道！》、《反赤派听着！》、《章炳麟和康有为的财产不齐》^①。

10月15—28日 国民党中央暨各省市党部联席会议，作出一系列决议，决定开除西山会议派分子石瑛、覃振、傅汝霖、林森、张继等八人，通过目前行动的四条政纲：一、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政策；二、拥护孙（中山）、廖（仲恺）农工政策；三、反对西山会议派；四、拥戴汪精卫为领袖。中共中央认为，此政纲是“我们与左派合作的根据”。

10月17日 致函各级党部：“我们现在都已喊出‘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这一口号了，可是怎样才能走到群众的政党呢？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由此我提议：我们党在明年春天第五次全国大会以前，党员应发展到四万以上（C.Y.应该照此数目加一倍）。”“最大部分的中国领土是农民世界；尤其是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这些省份，都已经有了农民运动，我们的党在这些省份应该喊出一个口号：‘党到农民中去’。”^②12月5日，中央局报告称：仲甫同志的“这个提议当然不是空想。”^③

10月19日 发表《对于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希望》，认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各省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即将制定的“新的政纲”，“使全国各阶级的民众都认识国民党国民政府究竟是什么！”希望“新政纲”表明：“国民政府的基础是建筑在民众势力之

^① 《向导》，第175期。

^②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133、134页。

^③ 同上书，第132页。

上,而非建筑在军事势力之上;因为这是中国由半封建的军事专制到革命的民主政治之唯一标记。”同时发表“寸铁”九则:《北京黑化了》、《避开革命的新方法》、《讨赤特捐》、《高叫拥护国旗的是什么人》、《丁文江与爱国行动》、《傅子庵的和平运动》、《上海包庇私贩烟土者是谁》、《国家主义者曾琦与万县惨案》、《哪里有中华民国?》^①。

10月23日 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暴动,失败。暴动前,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决定这次暴动“以商界为主体”,“以国民党的钮永建和吴稚晖二人为主力”;在未来的市政府中,“不反对资产阶级为市民取得政权”,无产阶级“不拿政权”;“我们只须有人参加,不必作重要的地位,我们的目的只在取得民众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②等。

10月24—25日 中共上海区委先后召开临时主席团会议和各部书记临时联席会议,总结第一次暴动经验教训,罗亦农在会上指出:“这次我们认识资产阶级毫无力量,不要把他们的力量看大。以后上海的运动,应很坚决的认定只有工人阶级可以主动,否则一无所有。以后特别要认定自己为一切的中心”^③,“以自己为主体”。

10月26日 彭述之参加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中央局对上海第一次暴动的看法,不同意中共上海区委对这次暴动的估价,指出:“至于这次究竟是否暴动,独秀同志说此次是军事的投机,我说不暴动的暴动。……我们千万不

① 《向导》,第176期。

②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15、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同上书,第48页。

应太自己夸张,的确是一个军事投机”^①。

10月30日 中共中央作出对鄂区政治军事工作的指示,对唐生智请我党湖北省委书记彭泽湘做他的政治部主任,并允许“在他军中进行秘密组织”一事,表示彭只任“顾问”,“不就其他实权官职”。在12月9日作出的《唐生智言论之左倾与我们对唐应采取的策略》中,指示“在唐军中我们不做秘密组织工作,……只助唐做政治教育,提高他们能够革命”。

10月 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指示在北伐军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当加强土地运动。后来斯大林说,这个电报是错误的,几星期后,共产国际就自行取消了。^②

11月4日 发表《对于国民军再起的希望》,认为:“‘冯玉祥回国,国民军再起’,在中国革命有重大的意义。”“今日的冯玉祥,我们不能当做从前的冯玉祥看待了!”希望“国民军并不是简单的军事势力,乃是一种政治势力,他的势力应该很深的建设在民众势力之上,尤其是农民。”同时发表“寸铁”十四则:《军阀口中的赤化与苏俄》、《到底是谁没收人民财产?》、《帝国主义者意中的反赤作用》、《孙传芳丁文江是不是中国人!》、《孙中山的北伐还是段祺瑞的北伐?》、《以招商九轮报效孙传芳的是谁?》、《请看研究系站在那一边!》、《原来抗张、吴就是乱华》、《比约与顾内阁》、《何以军阀辈这样爱国》、《此路不通的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与研究系》、《苗民和蒙古的国家主义者》^③。

11月4—5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并作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指出外国及中国同志中有人认

①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页。

③ 《向导》,第177期。

为中国国民革命已经成功或快要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就要到来的见解是不对的；还有，有些同志以为这个民族革命也可以由中国共产党来做，不一定要有民族革命的党，以及在国民党外另搞一个民族党的说法，也是不对的。因为没有民族党，共产党“不能够完全拿住农民”，“C. P. 的政权在现时世界政况上不能够站得住”。“我们可以肯定说：现时中国还是民族革命时代，在这时代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和我们合作，K. M. T. 乃是现时中国的唯一民族党。”《报告》回答了粤区和北方区有些同志提出的国民党能否革命？是否站得住？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不是对？国民党中究竟有没有左派存在可以做和我们联盟的对象等问题。回答都是肯定的，并且在指出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地的工作都由共产党包办的情况后说：“这些事实只可证明两件事：(1) C. P. 与左派联盟是可以的；(2) 左派虽不愿意我们包办，还是需要我们帮助与领导，这个责任，还是我们一时不能放弃的。我们若是放弃这个责任，甚至于退出 K. M. T.，便是完全让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结合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来领导革命。”《报告》在批评粤区同志因对左派要求太高而忽视左派领袖的错误时指出：“现时 K. M. T. 左派有三个缺点：第一是左派没有具体的政纲；第二是左派领袖无中心人物；第三是左派领袖与群众隔离。我们要帮助左派的就是这三件事：使左派有政纲；使左派领袖有中心人物；使左派领袖有群众。”同时又认为：“至于农民政纲如武装、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此分裂，因为我们不能因为维持和左派联盟而失去农民。但这是较远将来的事，在现在及最近的将来，在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困斗中，我们与 K. M. T. 左派联盟关系愈持久些，便于中国革命愈有利些。因此，我们与 K. M. T. 左派关系不是降低我们的农民政纲以图维持此联盟，而是要确定我们的农民政纲，

在主观上、尤其是在客观上努力影响、推进 K.M.T. 左派，使此联盟不致因彼此农民政纲相差太远而促成过早的分裂，虽然彼此的农运立脚点不能相同。”会议拟出了准备提交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审查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九条：一、推翻农村中劣绅的政权，并由革命的农民建立平民的政权。二、革命的农民参加县政府组织。三、武装农民，乡村中一切武装势力受乡村的革命民众政权指挥。四、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等。^①

11月4日 北伐军攻克九江，上海积极准备第二次武装暴动。6日上午，罗亦农在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传达陈独秀对暴动组织问题的意见：在上海区委下面建一个支部，海军（当时海军计划有七条船参加暴动）每船有二人组成小组。中央组织海军三人会议专门讨论，以王荷波及赵世炎为指导员^②。晚上11时，陈独秀参加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特别会议，谈中央局对上海第二次暴动的政策问题，指示“要赶快使虞（洽卿）等派员去接洽周凤岐、保安会。可组织工商学联合会同样的组织。我们现在可以要两个领袖，钮永建军事的，虞洽卿民众领袖”。^③而在11月2日的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上，罗亦农就已指出，第一次暴动“一大差误”，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没有自信”，“而依赖钮、虞”。

11月9日 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批评他们所谓“抑唐扶蒋”政策。北伐后，因唐生智的军队发展很快，并控制了两湖

①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146—150页。

②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同上书，第79页。

政权，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和广东区委及两湖的同志都提出建议，要党中央注意防备唐，不要使他由“对抗蒋的力量变成对抗国民政府的力量”，以及对付中共等。陈独秀等人在本信中表示拒绝采纳这种意见，并指责他们受了蒋介石的影响，意在“扶蒋抑唐”，是“非常之大的错误”。

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举行会议，讨论并得出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意见，认为原定北伐军在攻克江西后不再东下的政策应改变，鉴于让民众容易选择，不能容许于黑奉、赤粤之外再有一鼎足的第三势力存在，以及为免除北伐军内部的地盘冲突，使“蒋以后有了浙、闽、赣三省，也可成为一个局面，不必再回汉口与唐生智冲突，回广东与汪精卫冲突”，“则北伐军是应于肃清江西境内敌军后继续东下，直至完全消灭孙传芳的势力为止”。认为蒋已有电表示，大会又通过迎汪复职，战争情形又好，“故汪应即回”；只要汪到广州，“事实上便成为左派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并且是党的中心，所以我们当极力设法劝汪回”。指出蒋之将政府及中央党部迁移武昌的提议，是“实际阻止汪回之策，此事必须反对”^①。

11月15日 发表《十月革命与东方》及“寸铁”八则：《研究系官运不亨通》、《研究系是只白虎》、《国家主义者对国民党党旗及北伐》、《国家主义派有了极阔的首领》、《军阀讳败之词令》、《和平代表自身的和平问题》、《为什么不要求赤俄撤退驻华海陆军》、《又是一个为孙传芳保江山者》。^②

11月中旬 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任中央农委书记，与阮啸仙、彭湃、易和元、陆沉、肖××及C.Y.（一人）七人组成

^① 《中央局报告》（192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92页。

^② 《向导》，第178期。

中央农委，在汉口设立办事处，指导湘、鄂、豫、赣、川农运工作，并拟出目前农运计划（11月15日作为中央局决议发布），称：“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①

11月19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举行会议，传达陈独秀来信：北伐军南下，尚非其时，可以停止暴动宣传，要注意工会及党的内部工作。^②

11月25日 发表《革命与武力》，认为：“革命是不能没有武力的，可是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须与民众合作，必须受民众的和党的制裁，才能够免除形成军事独裁走到反民众利益那边去的危险。”不指名地抨击了蒋介石“挟军事势力，使党的集体意见以军事首领的意见为从违，使党的一切决定都要仰军事首领的鼻息”的独裁行径；主张“真正有觉悟的革命军人，……应该放弃军事独裁的野心，诚意的与民众合作，尊重民众的意见而受其制裁，至少也要受党的制裁。”“尊重党的集体意见，服从党的集体制裁。”“以免流为个人的军事独裁。”“虽统率十万大军的总司令也应该如此。”同时发表“寸铁”八则：《英国律师口中之帝国主义》、《花姑娘大老板与反赤运动》、《到底是谁抢夺他人的财产妻女为己有》、《自治呢还是由军阀保境安民》、《丁文江比军警还要反动》、《国家主义派眼中的爱国军及其五色旗》、《国家主义派眼中的赤化》、《青天白日旗是共产党的吗？》^③。

12月2日 中共中央局致函江西党组织，严厉批评共产党

①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150—152页。

②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96—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向导》，第179期。

员参加省、县政府的倾向，说是“腐败堕落”，“机会主义”，“必须急速纠正，这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当立刻限期命令他辞职”，否则“立即登报公开开除”。以北伐军政治部主任资格取得的省政府委员中我们四个同志，因时局一时不退出，“以后必需换人”。国民党省党部中九人我党占八人，应迅速改选，“我们至多只占农民、青年、宣传三部”。

12月4日 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就广东严重局势，批评“鲍罗廷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就贸然主张向武汉迁移国民政府，是“又做了一件大错”，和以前主张“以黄埔为中心”、主张“退出K.M.T.”、主张“需要蒋专政”是同样的大错。信还批评广东区委十月二十三日政治报告中反映的盲从鲍的以下观点：认为国民党中无左派；新局势是：“民众与政府的对抗”即“整个的C.P.与国民党的冲突”；“C.P.今后应当渐渐完全站在在野党的地位，改变以前与国民党的关系”等等。指出这种见解与苏联反对派托洛茨基主张退出国民党“是同样理论的来源”，“好象很左，其实非常之右，因为他们这样左的政策正是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欢迎的”，必须加以痛切的纠正，“必须认识左派领袖的确存在”，并执行“切实与左派领袖合作”，与右派冲突时“必须用左派出面”等十项策略，以应付广东的新局势。

12月5日 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局报告》，表明一系列重大政策：一、对参加政府问题：“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在野党，处处要立在民众方面工作，不可即有对于政权的尝试。我们同志不能加入政府组织。”二、对上海工人武装暴动问题：“并不幻想此时在上海可以用市民暴动的力量实现平民政权，只是努力推进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尽量减少军阀的统治势力，实现一个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式自治市政府。在这样政权下我们所希望得到的

是工会组织事实上的存在，一般市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相当的自由，以及反抗租界帝国主义之根据地。”三、“应付目前的局面”十大政策是：“第一，努力发展国民政府势力所到地方的民众运动，使之能与军事势力的发展相适应，能影响军事势力左倾。”“第三，努力使汪、蒋间，蒋、唐间以及各军相互间之冲突减少，集中力量作二次反奉战争的准备。”“第四，使汪精卫能够迅速回来，使左派能有中心领袖，使国民政府能有中心人物（蒋现时虽是国民政府中心，但不为各方面所满意），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均比较的强健有力。”“第五，努力帮助 K.M.T. 左派势力发展，使左派渐渐能够有群众，有力量，可以站得住，使他们不恐惧 C.P. 而与之合作”等等^①。

发表《孙传芳败后之东南》，指出：“农民推翻劣绅政权的暴动，此种运动才开始，将来或者是中国民主运动最后的最高形式。”同时发表“寸铁”六则：《中国人都赤化了吗？》、《向直鲁军乞援的是孙传芳还是董康呢？》、《张作霖讨赤不彻底》、《国家主义者有了帮助了》、《怪哉没有资本家不要资本主义的资本制社会》、《江苏人快要受反赤运动之赐》^②。

国民政府宣布，任命谭延闿为临时代理主席，停止在广州办公，准备迁往武汉。

12月10日 鲍罗廷偕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人，以国民党暨国民政府代表团的名义，到达武汉，筹备迁都事宜。鲍向张国焘表示，将在武汉执行联唐（生智）反蒋（介石）政策。张将鲍的意向报告中共中央，中央表示赞成^③。

①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102、116、117、129页。

② 《向导》，第180期。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171页。张此说与12月5日的《中央局报告》精神不符。当时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似不可能赞成“联唐反蒋”的政策。

12月13日 赴武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即政治局与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鲍罗廷的联席会议)(又称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反对党内的左倾,防止党外的右倾。说:“国民党问题之要点乃是一个民族革命中联合战线问题。”“最近九江、南昌攻下之后,这个赤的联合战线又有发生危险的倾向。这个危险倾向的由来:一因江西战胜后,军事势力有离民众而右走之倾向;二因工农运动之发展,使资产阶级恐惧;三因帝国主义改用新的分离政策;四因我们之失策。”国民党右派“急欲缓和工农运动以取得帝国主义者承认国民政府,……想由帝国主义的承认以取得统一中国的政权。”报告提出挽救联合战线破裂的策略是:一、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二、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三、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四、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五、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退出国民党而领导群众和国民党冲突,……要不得;我们的出路只有留在国民党中联合左派和右派争斗。”“我们的党之独立,是指独立的政治宣传和党的组织,而不是说在现时一切实际政治争斗都应该独立行动,不与国民党合作。”六、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政府。七、确定我们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①。在土地问题上,陈独秀与多数同志一起,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急进政策,主张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为此,会议通过了《关于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决议案》,决定“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C.P.因包办而孤立”。陈独秀还说“工人运动过火”,“现在这样闹,把小资产阶级都吓跑了,不能这样干”。^②

^①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171页。

^②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12月下旬 回到上海，与瞿秋白、彭述之、维经斯基一起，多次到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与刚从苏联来的三位驻华代表——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勃雷希脱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策略等根本问题，并与维经斯基、彭述之共同坚持“传统的路线”——由“宣传而组织，由组织而武装暴动”，亦即主要以工农群众的武装暴动推进革命。瞿秋白和三位苏联同志一致主张“新路线”，即主要依靠北伐军，群众做向导、报告军情、缴溃散兵的枪枝等“苦力”、“别动队”的工作；党的工作应主要放在支持北伐上。他们进行了反对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的活动。三位苏联同志表示，陈不能执行“新路线”，但另换一个领袖是不成功的，因为他在党内的威权太大了。从此，瞿秋白开始写作“反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实际是反对陈独秀维经斯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①。

是月 共产国际电令中共中央，应采取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及各省政府的政策。当时，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武汉后，鲍罗廷竭力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以帮助和加强国民党左派；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中共中央则坚决反对，以避免与国民党右派冲突。为此，共产国际作出了如上决定。后来，谭平山出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苏兆征为劳工部长。

冬 周恩来秘密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及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① 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勃雷希脱给苏共中央的信（1927年3月于上海），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40页，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1927年(民国十六年 丁卯)

四十九岁

1至4月 帝国主义各国加紧镇压和破坏中国革命的步伐。截止3月份,列强在上海、长沙、武汉一线配置的兵力达四万多,各种军舰一百三十五艘。他们还宣传要以关税和领事裁判权上的让步,利诱中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4月初,美国国务卿凯洛指示美驻华公使:“告诉蒋介石,除非他能表示可以满足我们要求的行动,列强各国将采取认为适当的措施。”日本外相币原也表示要蒋介石来“维持秩序,压平暴乱”。

3月16日 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批判“当代的取消主义者”“鼓吹脱离国民党,等于是鼓吹取消中国革命”;并说:“蒋介石在革命发展的现阶段不得不表示效忠于革命的主义,效忠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学说,表示服从这个群众性政党国民党的领导。”

4月3日 托洛茨基发表《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指出中国革命分裂的危机“不可避免”,主张“共产党完全独立”;赞扬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去年七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的中共退出国民党的提议“是无条件正确的”,呼吁立即建立工人苏维埃。

4月5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就中

国问题发表演说，批驳托洛茨基的关于中国革命危机的警告，解释为什么要支持蒋介石的理由，说蒋“是服从纪律的”，他“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者外，不能有其他的作为”^①。会议通过决议，批评要求脱离国民党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②。

4月14日 季诺维也夫向联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中国革命提纲”，批判斯大林4月5日演说和联共中央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要求中共“政治与组织的完全独立”，“成立不容纳资产阶级代表的苏维埃”；批评了陈独秀与汪精卫的联合宣言“是绝对错误的”，“孕育着最大危险”^③。

4月21日 苏联《真理报》发表斯大林起草的“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中国革命问题》，指出：“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事件完全证实了“把共产党保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的“正确性”；“革命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武汉成了“革命的中心”；主张“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批判托洛茨基提出的中共退出国民党和建立苏维埃的主张是“反对武汉政府”，“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越过了革命的阶段”，“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④。

5月13日 斯大林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谈中国革命问题，批驳反对派提出的中共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建立红军等主张，认为只有在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建立两重政权，国民党和苏维埃争夺政权时，“共产党就必须退出国民党”；只有在

① 斯大林的演说词后来没有见报，此乃录自南斯拉夫共产党员武约维奇的当场记录，转引自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389—390页，1932年纽约出版。

② 《真理报》，1927年4月6日。

③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99页，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④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99页。

“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才必须成立苏维埃；“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现在主要的是“要改善现有军队，用一切可行的办法使军队革命化”。指出：当前中国革命的策略，不能同时进攻张作霖和蒋介石；支持首先北伐的主张，并强调武汉政府“应当大力支持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土地革命”^①。

5月17日 托洛茨基撰文批判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认为蒋介石的政变证明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的“四个阶级联盟”政策的破产；把武汉政府视为“革命中心”是“多么不确、浮浅、庸俗”。批判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主张中国革命“扩大后再行深入”的观点；主张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代替武汉政府^②。

5月18—30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第八次全会，托洛茨基与斯大林辩论了中国问题。托洛茨基在发言中着重批评了陈独秀的两个思想：“将土地革命延迟至疆土在军事上已有保证之后”；“将政治改组延迟至军事胜利之后”^③。他要求把反对派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的批评公诸于众，遭到大会拒绝，并被斥为“反党罪行”。全会通过特别决议，谴责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分裂行动，撤销了托洛茨基共产国际执委的职务。

全会期间，布哈林、陶里亚蒂（意共）和特兰（法共）三人组成的中国小组，讨论“马日事变”及农民武装进攻长沙的消息，布哈林说：“农民夺取土地吓坏了武汉政府，如果我们不限制土地革命，我们将失去我们的左派同盟者。”特兰反对这种看法。斯大林支持布哈林的论点，并出示鲍罗廷拍来的电报：“国民党左派决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7页。

②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9页，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③ 同上书，第51页。

定反对土地革命，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同共产国际的破裂。”斯大林表示目前应“使用策略”！“我想给鲍罗廷发去指示，叫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国民党党员和国民党军军官的土地。”陶里亚蒂表示赞同斯大林的意见，并据此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特兰表示服从多数，但“保留”自己的意见^①。决议声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是“正确的”；认为蒋介石叛变后的武汉政府和国民党，是“无产阶级直接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合作的特殊形式”；“共产国际执委会极其坚决地反对退出国民党的要求”；指示中共吸收工农劳动群众“加入国民党”，参加武汉政府，反对提出“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要求中共支持北伐，同时，“必须在武汉政府所辖地区内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此外，决议还批评了在蒋介石上海政变时，中共中有人提出发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的起义的策略，“是极不明智的”，“只有在有一定的胜利可能时，才可以发动起义。”^②根据以上全会精神，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出了著名的五月“紧急指示”（因为六月一日到达中国，又称“六一指示”）。

7月2日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人向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提出《联合反对派政纲》，其中中国部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猛烈抨击斯大林、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中国执行“机会主义的路线”，“帮助资产阶级”，说“斯大林等客观上是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冯（玉祥）的帮手”；“现在还要与汪精卫的中央发生关系就是直接与刽子手联合”。认为：武汉政府“就是中国的克伦斯基政府”，“挽救中国革命必须彻底改变一切指导方针”；共产党立刻退出国民党，退出武汉政府，建立苏维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中国小组委员会会议纪要》，特兰整理，转引自《罗马赴华使命》，第94—97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19页。

埃,夺取武装,“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地主、军阀、高利贷及豪绅等。”^①

8月9日 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陷入了右倾。这个倾向十分错误地把民族革命同土地革命对立起来”。宣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由于不断背离共产国际的指示而要为中国工农的失败承担应有的责任。”“现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可以满意地指出,兄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已经克服了右倾,领导路线已经端正了”;“革命转入了自己发展的更高阶段,即直接为建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斗争的阶段。……在短时期内,新的革命高涨将取代革命的暂时失败。”^②

11月14日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通过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出党的决定。

1月初 汉口、九江工人及革命群众占领并收回英租界。

1月3日 蒋介石致电武汉,主张国民党政府暂设南昌,遭到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否决。1月9日,蒋去武汉,武汉掀起反对独裁、实行民主的“反蒋迎汪”运动。

2月21日及3月7日 蒋介石两次发表反共演说,叫嚣要制裁左派,制裁共产党。3月6日,蒋介石诱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从此制造一系列惨案,解散并捣毁了南昌、九江、安徽等地的党部和总工会。

3月10—17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联合,最后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

^①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81页,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40页。

图，通过了一系列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决议，但仍让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还选举尚在国外的汪精卫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增设五个部，中共党员正式入阁，苏兆征、谭平山分任劳工、农政部长。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5日，广州发生反共政变。28日，北京李大钊等二十余人被奉系军阀捕杀。

4月18日 南京蒋记国民政府成立。

4月19日 武汉国民政府出师北伐。

5月中、下旬 驻武汉西边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和驻长沙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相继叛乱，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朱培德也在“礼送出境”的幌子下，实行反共。汪精卫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出一连串训令，诬蔑工农运动“破坏公共秩序”，“骚乱后方，摇动军心”，命令各级政府限制工农运动，取缔一切“排外运动”，严禁土地革命；如有违反，“依法惩治”^①。

6月1日 北伐军攻克郑州、开封，与冯玉祥国民军会合。

6月10日 武汉汪精卫、唐生智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计谋反共。会后唐生智率军回防武汉；冯玉祥派代表联络蒋介石。

6月19至21日 冯玉祥与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决定反苏、反共、宁汉合作，促武汉速决大计。

6月29日 武汉国民革命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表“反共训令”，呈请中央政府、唐总司令“明令与共产党分离”。

7月15日 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第二十次扩大会议，决定“分共”。21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分共”经过的报告，称罗易交

^① 《武汉褪色记》，《国闻周报》，第22期。

给汪精卫看的共产国际“秘密议决案”是“共产党方面危害本党生命的议决案”。

8月13日 蒋介石下野，9月去日本乞求帝国主义更大的支持。国民党宁汉合流，但接着各派又为了争权夺利，展开剧烈的角逐，汪精卫失败。12月，蒋介石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月8日、26日 在维经斯基的支持下，两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写政治报告，认为一股巨大的反共潮流“在国民党内掀起”，革命出现了危机；“我们的意见以为，我们当前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使汪精卫、蒋介石与其他军官之间重修旧好”；认为“减轻人民负担”的口号，在目前是不合时宜的，需要减轻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惧怕心理；对外，则需要暂停对日、美、法的反帝运动，集中力量反英，孤立英帝^①。

1月11日 发表《各国承认国民政府问题》^②。

1月12日 召集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应否支持武汉工人收回英租界事件。陈独秀说：“为什么我们应当赞成它，我们该进行什么鼓动呢？现在侵略者不是英国人，而是中国人！”会后，中共中央给湖北省委一封信，说收回租界是“过火”了，要他们负责维持夺取租界后的“秩序”。“中央委员会的意见认为，外国人与小资产阶级是不应该激恼的。”陈独秀还对国际代表说，汉口工人纠察队一定要解散，因它是由小资产阶级与手艺人及一部分非产业工人组成的。他认为工人纠察队应由少数“诚实、阶级觉悟与无可非难的”工人组成^③。

① 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勃雷希脱给联共中央的信（1927年3月17日、上海），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40页，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② 《向导》，第182期。

③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1月17日 发表《谁杀了谁》及“寸铁”七则：《张学良不怕赤化吗？》、《张宗昌八字韵语的宣传》、《好忠厚老实可怜的英国人！》、《极端分子之志》、《上海英租界不干涉任何政党吗？》、《张天师破产了！》、《好狗政府》^①。

1月21日 发表《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②。

1月27日 发表《英国帝国主义最近对中国进攻政策》、《谁践踏了谁？》及“寸铁”九则：《帝国主义的走狗傅筱庵》、《大学生眼中的农民》、《呜呼！稳健分子》、《国民党的敌人是谁？》、《去年今日的汉口与广州》、《张宗昌的三不知》、《放狗屁的〈甲寅〉》、《优伶也赤化了吗？》、《妙哉圣道会》^③。

1月28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时局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向中国国民运动进攻，不但用直接的和间接的武装势力硬的方法，而且用软的方法，从国民运动营垒中诱惑所谓稳健分子所谓温和派，破坏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号召工人、农民“帮助国民政府与国民党”；要求国民政府的领袖们，“不离开革命，不离开民众”，以“更广大更有组织的民众为后援”，不“因民众势力之高涨而怀疑，而动摇”^④。

1月底 中共中央举行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文件，瞿秋白表示完全接受国际的路线，批评中央过去的路线和国际不合，特别提出土地革命的重要。彭述之则为中央路线辩护，与瞿秋白发生冲突。陈独秀站在彭述之一边。会议通过决议，接受国际的决议。

① 《向导》，第183期。

② 《向导》，第184期。

③ 《向导》，第185期。

④ 《向导》，第186期。

1月31日 发表《革命与民众》，批判右派关于“工农运动太过火了”的叫嚣，及九江、南昌的军事胜利以后，各地限制和摧毁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倾向”；指出“情形颇和辛亥革命胜利后相似，这是何等的危险倾向”；认为挽救危险只有“武力与民众结合”^①。同时发表“寸铁”四则：《无耻的九省联合会》、《稳健之孙文主义》、《反革命者的国旗》、《英国雇用的奸细国民外交协会》。

2月6日 毛泽东视察湖南农运后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指出：“党从前对农运的错误”应予纠正：“（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联合战线的议论。……（六）第三时期（农村革命暴动时期——引者）内农运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②

2月7日 发表《“二七”纪念敬告铁路工友》、《赤的运动与中国外交》及“寸铁”十二则：《讲容忍的国家主义者》、《曾琦与麦克唐纳尔》、《国家主义者眼中的国家和政府之分》、《国家主义者的国家与中华民国》、《究竟是谁无祖国》、《令人肉麻的国家主义者》、《怎见得我们不要国家》、《梁启超也佩服英人之忍耐》、《好高明的稳健派》、《谁对谁的宽大政策》、《北洋军阀“安”的成绩》、《英国不是帝国主义？》^③。

2月中旬 上海第二次工人暴动前夜，中共中央举行会议，瞿秋白要求参加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中央不要他去，派了彭述之

① 《向导》第186期。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

③ 《向导》，第187期。

去。彭在活动分子会上作报告，提出中央对第二次暴动的口号时没有政权的要求。瞿秋白又提出一个对于上海暴动的提案，指出这一错误，提出工人应参加市政府选举及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陈独秀和彭述之反对这个提案。据有关这次暴动的档案资料记载，19日上海总工会下达总同盟罢工令的口号是：罢工响应北伐军！罢工打倒孙传芳！民众政权万岁！工人自由万岁等^①。20日，上海区委宣传大纲，号召广大市民罢市，罢课，参加夺取政权的斗争，指出“关于口号今日略有变更”，特重申于下，……召集上海市民代表会，组织“上海市民临时革命政府”！^②21日，上海区委承认“今昨天的工作，最大的缺点”在于：“1.没有指明上海的行动是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的行动，没有把这种思想在民众中做广大的宣传。甚至于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脱离群众绝对独立的危险现象”。“2.没有有组织上指挥党内与党外的一切工作。”^③24日，瞿秋白又提出《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批评党在“二暴”中的错误策略“简直是卖阶级的策略”，建议竭尽全力鼓励工人阶级“武装斗争的意志，指明其夺取参政权之目的”^④。此后不久，瞿秋白即离沪去汉，撰写《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又名《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什维克主义》），批判彭述之主义，实际上批判1923年以来陈独

① 《上海总工会为决定二月十九日起罢工下达总同盟罢工令》（1927年2月19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1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对工人的宣传大纲》（1927年2月20日），同上书，第130页。

③ 《中共上海区委特别通讯（第一号）》（1927年2月21日），同上书，第131页。

④ 同上书，第154页。

秀为首的党中央及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推行的“二次革命论”、放弃国民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错误^①。

2月16日 发表“寸铁”《奉天居然想勾结蒋介石》，揭露日本东方社“一面电传杨宇霆(奉系)谓‘蒋介石若对于共产派加以彻底的压迫，则南北之妥协非不可能之事’；一面电传‘蒋介石及其干部之取缔过激运动’”，称“我们且看蒋介石怎样在行动上回答杨宇霆这个提议”。同时发表《无产阶级与民族运动》、《张作霖宣言之解剖》及“寸铁”《曾琦与何海鸣》、《何海鸣将到广东、江西、汉口宣讲反赤》、《是谁愿与北方军阀妥协》、《中立呢还是共管》、《青天白日旗下反青天白日旗的分子》、《中英人之见解不同如此》、《日本的如意算盘》^②。

是日 中共上海区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世炎说“中央来信要我们赶快做反英运动”，并指出：“现在蒋介石要来，我们如无运动，他必与帝(国)主(义)妥协”。会议讨论了反蒋问题，指出“此问题，我们党已决定”，蒋现为一切反革命派所包围，遭左派反对。左派“三月一日要先开会，蒋非消极即反叛与屈服”。“我们决坚决反对(蒋)，拉住左派”。会议决定“赶快准备”“一个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主要的总罢工，次要的武装继续”。关于罢工的准备、武装技术、联合战线等问题，要“找中央及国际的代表详细讨论”^③。

2月17日 中共上海区委秘书处第十一号通讯指出，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区委反蒋斗争态度和工作：蒋与帝国主义勾结从内部破坏革命日趋严重；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右派反动势力的中

① 《六大以前》第670页。此文在4月中共“五大”上散发。

② 《向导》第188期。

③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112—1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心,我们在各地应即刻开始作反蒋的宣传。但是“不可使这个争斗简单成为 C.P. 与 K.M.T. 的争斗,无论在何争斗中都要拉出左派,与左派联合进行”;“不过所谓与左派合作,是要我们能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不是要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①。

2月中旬 罗易借谭平山来到广州,贯彻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决议。

2月19—23日 上海工人由总同盟罢工发展为武装暴动,失败,24日复工。

2月22日 共产党为纠正头两天暴动中没有指明“人民夺取政权”的缺点,提出“召集上海市民代表会,组织‘上海市民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并由罗亦农、汪寿华与国民党代表商量。吴稚晖认为这是 C.P. 要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的政府,坚决反对说:“倘若共产(党)必欲自立名目者,乃无意与国民党合作,吾立国民党地位,敢提出抗议。”罗亦农等解说成立此委员会为讨论军事等,吴才勉强同意。嗣后吴、纽(永建)、杨(杏佛)又借海军提前开炮事,对共产党不满^②。

2月23日 致函吴稚晖,斥右派说“西披(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是谣言,望吴“万勿轻信”,称“西披分子多出力,这是革命者应尽之义务”;“西披绝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谁愿分离,便是谁不忠于革命”;对于海军提前开炮事,承认是错误,因“军阀肆意屠杀,群众忍耐不住,自由行动,甚至于影响海军”^③。

①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1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吴稚晖先生全集》第9卷第877页,台湾1969年出版。

③ 《吴稚晖先生全集》第9卷第877—878页。

是日 参加中共中央与中共上海区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停止今天的暴动,由上海总工会发令复工,扩大武装组织,准备下次暴动等。会议还决定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尹宽、彭述之、周恩来等八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指导上海的工作。^①

2月24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工友》,指出这次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直接反抗封建军阀的第一次伟大的政治斗争”,“可惜上海的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众太软弱没有决心”,致工人“孤军深入”;“在这次罢工中主要的缺点是没有武装准备,没有准备武装暴动的决心”;号召上海工人加紧团结,扩大组织,准备武装,向新的斗争中去,“成立工人代表会议,参加市政府,建立民主政权。”^②

是日晚 参加特委会议,讨论上海第二次暴动后的问题。对准备第三次武装暴动,发表重要意见,强调“军事运动,目标要集中,不要散漫”;建议应“集中浦东,因浦东码头工人及流氓都可训练,且陆战队要到川沙”;浦东军队较少,“容易夺取武装”;强调武器来源是“夺取武装”,“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工会也要有活动分子会”。他还报告了与海军及国民党左派联系的情况,说对“张曙时、杨杏佛、钮锡生都有信去解释,并说明罢工并未失败,而是要准备较大规模的运动”。指示党务工作“要尽量发展新同志,不好的淘汰掉。部委与工会方面缺少工作人才,现要重新分配”;人才来源:“支部中之工作努力者”及“新的工人领袖之失业者”。^③

①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137页。

② 《向导》,第189期。

③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148—153页。

2月25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指出“以宣告复工开始另一新的形式之争斗”，号召：“全上海革命的市民，应该在上海市民公会上海总工会领导之下，立刻全体动员！”“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则中国的武装市民及将来的北伐军必须进入租界，‘以武力回答武力’！”“工人及一切革命的市民起来夺取武装，响应北伐军，拥护国民政府！”“由市民公会召集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一切权力归市民大会，实现国民政府之北伐目的——市民会议的政纲”^①。

是日晚 参加特委会议，指出“市民公会代表非常重要，可不必拘一定形式，只要有代表都可以，开会时也不要拘法定人数”；“政治情形，天天加严”。国民党“左派病的病，走的走”，只是C.P.去做，“没有一定主张”。指示要加强对武装暴动的宣传工作，“宣传品每天要出新闻式的宣传大纲，不过一百字的时事报告，作经常政治宣传品。文字尤其要特别浅显。又宣传不必一定靠文字，而是要由负责同志常作口头宣传，不要只做传达员，要按枢蔚（区委）宣传策略去口头宣传”。会议通过派工人代表团去见北伐军白崇禧，通过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和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工友书^②。

2月26日 参加特委会议，听了各方汇报后指示：“同志原（元）气稍稍恢复，各方工作非常紧张，我们要加紧做工（作），尤其是技术工作。”具体意见：（一）不要占机关，因我们无甚实力。但兵工厂关系重要，仍要想法夺取。（二）北伐军不到上海，上海无法解决。在将到时，我们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这二层是武器与政治同有意义的。最要紧

① 《向导》，第189期。

②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174—178页。

的是真正的群众大会。至于夺取武装,可以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都夺取。(三)市民代表会议,要各地方各区域都成立,成为一种权力。上海市政府即建筑在许多小政府上面,是非常有力量的。(四)总同盟罢工,要决定为夺取武装,为开代表大会而罢工,不应回到家去,不要为罢工而罢工。(五)罢工时间,要在松江失守以后,事先要组织广大的交通队,又要组织迅速的侦探队,又要组织宣传队,以便很快的行动,等等。这些意见,最后都作为会议决议通过^①。

2月27日 参加特委会议,讨论宣传、军事、党务等问题^②。

2月28日 参加特委会议,(一)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改选,因吴稚晖担心C.P.太多,陈独秀指示,“我们可以申明,并不要‘五雀六燕’,我们就以名单先要他去圈定”;“可以明明(白)告诉吴稚晖,要三个人(三分之一),可提出名单”。(二)二三天以内,“党的组织仍要加紧工作,因北伐军如果不来,上海即为鲁军所有。”“以后白色恐怖必定要来,我们应在此时赶紧做工作。”(三)“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需要委任的。此为重要争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我意在名词上要改为民选市政府,使民众格外明了。我们要在北伐军未来前,造成很浓厚的民选空气,预先选好,然后与他们讨论名单,结果就成为民选政府。……此运动胜败不可必,全仗事前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好。”^③

2月28日 发表“寸铁”十则:《稳健分子悔悟投诚的机会到了》、《共产党造谣惑众!》、《不受抬举的唐生智》、《宣讲呢,还

^①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191—192页。

^② 同上书,第206—213页。

^③ 同上书,第219—227页。

是拍影戏》、《果然是共产党梦呓与造谣吗》、《戴天仇其奈日本人的
一定范畴何》、《中国人能忘记“五七”、“五九”吗》、《国家主义
派又为张雨帅所赏识了》、《外看强权内储国贼》、《三民主义信徒
的双包案》^①。

是月 蒋介石两次派代表到上海与陈独秀等人谈判，要求
共产党停止“迎汪复职”运动，而以“助蒋拒汪”为合作条件。陈
答：“在革命进展的观点上，在国民党团结的观点上，共产党只是
主张汪蒋合作，而不是拥汪倒蒋，却没有理由可以违反中国革命的
需要，以及国民党党员群众的心理，而反对迎汪复职。”^②

维经斯基由沪至汉，了解情况，不同意鲍罗廷的反蒋政策，
认为革命阵营内部不宜分化太快；否则将无法对付北方军阀及
帝国主义的雄厚势力；对中共与工农运动，也是不利的。接着，维
经斯基去南昌与蒋寻求谅解，结果失败^③。这时，上海维经斯基
及陈独秀中共中央的政策是“蒋汪合作”，既不是武汉鲍罗廷的
“拥汪反蒋”，也不是蒋介石要求的“助蒋拒汪”。

3月1日 参加特委会议，指示以后口号要规定原则：
“（一）不要笼统，要切实。（二）要集中，不要太多——集中口号
可定：收回租界，民选政府，市民代表大会政府，拥护武汉国民政
府四口号。”^④

3月2日 晚八时，参加特委会议，提出市民政府要分两部：
“一、要宣传准备暴动后的一个临时政府。二、再做到民选市
民〔政府〕。”关于暴动时间，提议在北伐军打下苏州常州就动，松

① 《向导》第189期。

② 陈独秀：《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向导》第198期。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181页。

④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251页。

江打下后亦动；若资本家开除工人太多时，可以单独罢工^①。

晚九时，又参加特委会议，提议“现在宣传可加深二点：一、反对叶楚傖、郭泰琪。二、反对大商卖(买)办阶级。前者可说叶为西山派，郭为萧耀南、吴佩孚的走狗，现在都要到上海来做行政委员；后者可说大商卖(买)办阶级勾结外国兵，拒绝北伐军，都要特别反对。”“为加紧准备工作起见，应规定六号(礼拜日)为准备罢工期。实际上的行动，要临时决定。”^②

3月3日 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提出警告：“当前中国革命正在经历着阶级力量重新组合和帝国主义各国军队的集中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只有执行明确的发展群众运动的方针，革命才有可能取得进一步胜利。”“必须把我们的方针指向武装工农，把各省农民委员会改造成为有自卫武装的、名符其实的权力机关。还必须把我们的方针指向驱逐国民党右派分子，使他们在政治上名誉扫地，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共产党千万不要掩饰国民党右派背信弃义的反动政策，必须动员群众团结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周围。”^③

3月4日 参加特委会议，听取汇报后表示：“市民政府最后必须经过市民公会的选举，然后打电〔报〕到武汉国民政府请他批准，事前就用谈判的方法，先求一致。”提议派人到汉口的任务是：“请出兵，报告罢工经过及今后上海政府问题等。”彭述之、罗亦农提议关于市政府，先由陈独秀以个人名义与杨杏佛、钮锡生等谈判，然后再开两党联席会议^④。

3月5日 中共上海特委举行会议，讨论上海暴动问题。关

①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255页。

② 同上书，第265页。

③ 曼特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何失败？》，苏联《真理报》1927年7月16日。

④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277页。

于起义准备，陈独秀提议：“要赶快预备组织员，一罢工立即组织工会”；“国民党会议时，要提出反对西山会议派”。周恩来报告了军事方面的准备情况，提出“如果明天发动，只(至)少要预备三千元^①，尚无着落”。陈独秀提出起义的发动要讲究时机，“不要太早。有二标准：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至到龙华。”彭述之认为这样“太迟缓”。讨论后，最后陈独秀归结为：“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会议讨论了暴动时各区的指挥人，最后由陈独秀认定。陈还决定：“党的方面，士炎(即赵世炎)代理书记。”罗亦农提出整个行动由特委指挥，紧急时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陈独秀。赵世炎提出：“明天所有消息集中仲甫。”表明暴动的实际总指挥是陈独秀。关于市政府，陈独秀提出，代表人数至少一千人，工人占一半。工人、学生的负责人，“我们的要先选好。临时把名单经群众通过。”会议最后拟定了市政府十五个成员名单。其中共产党员有：罗亦农代表C.P.，汪寿华代表工会任劳动部长，顾顺章代表店员，丁晓先任秘书长，侯绍裘代表国民党省党部任财政部长，刘荣简代表学生，王承伟代表手工业者等。

另外，在会上罗亦农汇报了与国民党联系的情况，说吴稚晖、钮锡生、杨杏佛看了陈独秀2月23日致吴的信后，都表示满意。“吴说从前确有误会，我们以为C.P.的民众仍有强奸气，现在我们主张并无不同处。”关于暴动，会议决定由陈与他们接谈^②。

3月6日 参加特委会议。会议决定为准备第三次武装暴

① 指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

②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278页。

动,加强工会建设,充实工会的领导力量,把全市产业工会划分为十七个产总,并制定工会组织法。陈独秀提议组织法应明文规定:不得总工会许可,不得私立工会。

是日晚 与罗亦农一起到钮永建办公处晤见钮、吴稚晖、杨杏佛。吴认为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二百年尚嫌不足,否则急切轻挂招牌,只是赝品。陈答现在哪里行共产,行共产不是疯子么!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答:二十年。吴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①。

发表《我们目前的奋斗》,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增派来华兵力,帝国主义和军阀对国民党右派的软化,“自称革命而实际上不能始终忠于革命分子,受了反革命之诱惑,也渐渐暴露他们的真面目,想和反革命妥协”;革命“已经到了和帝国主义军阀决死战的时期”;主张:“中国革命者目前的奋斗,不但要反抗帝国主义,不但要歼灭军阀,并且要严厉的打击想和帝国主义及军阀妥协的一切右倾势力,必须打击得他们没有力量能够扶起垂危的反革命势力。”同时发表《国民党内纠纷与中国革命》,认为:一是国民党内所谓稳健派有与奉天军阀及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倾向;二是反工农运动的事实日渐增长,“这两件事,只要有一件继续发展而不加以纠正,都是以断送国民党的政治生命,断送中国的革命运动。”主张“国民党内革命分子站在革命原则上和右派冲突,这是必要的;我们不应该取非革命的和事老态度,责以避免党内纠纷,在事实上帮助国民党内反革命的势力之继长增高。”还发表“寸铁”《蒋介石能和张作霖政见相同吗》,批驳奉系赵欣伯关于南北妥协的谈话,指出:“蒋介石是一个有

^① 《吴稚晖先生全集》第9卷第810--811页。

革命历史的人，他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唯一信徒，他那肯忍心忘了中山先生临终之言，为军阀所软化而不继续革命？如果蒋介石肯软化，也只是他自杀。”同时发表“寸铁”《西山会议派连资产阶级还不如》、《党皇帝》、《西山会议派打倒了吗》、《反革命当然攻击革命》、《西山会议派连安福派还不如》、《可为曾琦辈浮一大白》、《投机商人——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的左右》、《呜呼！美国博士》、《苏联何尝有什么“党化教育”》、《工友为什么要反对联军不反对党军？》^①。

3月7日 中午和晚上两次参加特委会议，指示上海职工运动在北伐军未到之前，要做二种工作：一、政治宣传；二、工人经济上的要求。上海总工会等五大团体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上海市民临时代表会议组织法》。

3月8日 参加特委会议，当会议讨论市民代表会议时，陈独秀说，市民代表会议，起码要一半工人代表。

3月9日 参加特委会议，提议市民公会尽快在今日召开，推出执行委员会。开二百人的代表会议，此会中可出三十至五十人的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在代表中选出十七人为常务委员会，在常委会中，组织秘书处，管理一切事务。但是“现在不要筹备市政府，要等北伐军来后再产生”。“将来上海的局面，必为右派与民众争斗剧烈之地，我们要能拿住中小商人，为将来争斗时之要具”^②。

3月10日 参加特委会议，鉴于国民党杨杏佛等不同意C.P.提出的市民会议组织法，主张由国民党省、市党部代替市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执行委员会；在地方上，职业团与地

① 《向导》第190期。

②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301—302页。

方团同有选举资格等。陈独秀表示：“我们只要名称上让他们改变，如主席团可改为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改政务委员会。至于地方团体一层，我们不能赞成，……只限于职业团体。我们还要提出限制反革命派之当选。”并说要亲自与杨杏佛谈话，以影响他。还提议要国民党员组织专门反对劣绅反革命派的团体，使许多劣绅反革命分子在北伐军来后不敢出头^①。

在会上，陈独秀还传达说，“莫斯科来电不要在北伐军未来前宣布第二次罢工”。

3月11日 参加特委会议，提出确定市民会议名单的原则，并强调要选举小商人和学生。因为学生虽无职业，“但有很大群众，所以要特别加入”；将来组织商民协会，特别要使之群众化，“免大商人操纵”^②。会议讨论了三十位参加市民会议的名单。第二天，上海临时市民代表会议正式组成。

3月12日 发表《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中之悲愤》，不指名地谴责蒋介石等人“取消”和“抛弃”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令人悲愤?!”同时发表“寸铁”八则：《溥泉溥泉，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军阀为什么怕纠葛》、《津汉情形的确不同》、《个人的军事独裁之榜样》、《全部党军都能够接受张作霖、吴佩孚的提议吗》、《于中国实际政治有经验者是谁》、《我即党与朕即国家》、《日本人污蔑中国革命领袖一至于此》；通信两篇：《答符琇（军事行动与民众运动）》、《答王纯礼（革命军与工农群众及革命党）》^③。

3月13日 就蒋介石在南昌的反共演说，以中共中央名义致书国民党中央，予以批驳，揭露蒋介石的反共行径，及其与奉

①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304—306页。

② 同上书，第309—310页。

③ 《向导》第191期。

系日帝的勾结，要求说明这是蒋介石的“个人行动”，还是“贵党多数之意思”；表白共产党对党务整理案未曾违反，而且为避免纠纷有超过此案所决定以上的退让；奢望蒋介石受国民党中央制裁后，不再“一意孤行”^①。

3月14日 参加特委会议，主张在工人区域，八小时工作制应赶快提出。

3月15日 参加特委会议。罗亦农在上海活动分子大会上作报告，指出目前革命运动的危险倾向，列数蒋介石的种种反动事实，表示赞助武汉反蒋；认为战胜蒋、挽救革命及C.P.存亡的关键是工农与小资产阶级联合，战胜一切反动势力，直接取得政权，建立民主独裁制，C.P.在其中“完全取得领导地位，丝毫不能退让”^②。

3月16日 参加特委会议。

3月17日 参加特委会议，指出现在上海的运动有二件重要运动：一、扩充市民代表会议；二、扩充国民党的组织。将来上海武力是蒋介石的，民众是C.P.（的），革命武力与民众分离，结果两家不利。我们要有很大的群众来威胁武力，使他让步。我们如果有大多数的群众对他示威，他也或许能够让步。所以我们在这一礼拜内要特别发展国民党员。将来对付右倾军阀，可用党员大会来解决最后难解决的问题。

苏联驻华代表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勃雷希脱，在上海写给苏共中央一封信，认为最近几个月事变表明：中共“目前的领导机关是不能实行坚定的共产主义政策的，…… 在党的

① 《向导》，第192期。据李立三回忆，为批驳蒋介石的反共演说，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曾两次致书国民党中央，虽在批蒋上比较强硬，但在表白中共及拉住蒋介石问题上，不同意武汉的反蒋政策，乃是“示弱”，后来上海三次暴动时还是“欢迎蒋介石”的口号。

②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323页。

领导机关中，有一个派别，它决心要将党推向右倾，走上取消的道路，同时这一派别及其政策又受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指维经斯基——引者）的支持”。“中央委员会本身，现在实际上由三个人组成的，彭述之代表右派，瞿秋白代表左派，‘老头子’（指陈独秀——引者）代表中派。我们都相信，假使能使彭述之与伍廷康（维经斯基）孤立起来，放些新鲜空气进中央委员会，弄一些工人进去，那么这个‘老头子’，虽然有其一切缺点，却是比伍廷康同志高强得多的一个人，他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够继续成为党的领袖之一。”^①

3月18日 发表《评蒋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讲》，批判蒋介石的南昌演说对“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之说”“无一字声辩”，“而只痛骂自己的同志”；要求蒋介石“立刻在言论上在行动上，证明所谓南北妥协共同反赤，的确是日本帝国主义造谣煽惑、挑拨是非、中伤捣乱以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同时发表“寸铁”八则：《曾琦与薛大可》、《毕庶澄与西山会议派就是这样纪念中山》、《西山会议派和英帝国主义同样纪念中山》、《我们冤枉了西山会议派！》、《帝国主义者眼中之蒋介石》、《中国国民革命的武器是些什么》、《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想推翻国民党的是谁》、《戴天仇愿意出卖工人吗》及与海外国民党员蒋希曾的通信^②。

是日 参加特委会议。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在小商人、店员、学生群众中，要无限制的发展左派国民党，以制裁将来军事力量之右倾。在二个月以内，上海要有五万国民党员^③。

① 《上海来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140页，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② 《向导》第192期。

③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245页。

3月19日 下午1时和晚上两次参加特委会议。

罗亦农在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各产总联席会议上下达第三次武装暴动预备动员会。目的是：夺取民众政权，工人要得到武装。口号是：罢工，罢市，消灭直鲁军！罢工，罢市，响应北伐军！罢工，罢市，建立上海市民革命政权！等等^①。

3月20日 参加特委会议，提议市党部及民众方面，赶快派代表去见白崇禧、薛岳，要他赶快来取上海。

3月21日 参与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暴动。当时，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坐镇指挥部（施高塔路四达里，原是一个党校），周恩来（中央军委负责人）和赵世炎（江浙区委第二书记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在前线指挥，陈独秀在郑超麟家里（北四川路横浜桥南），通过交通员郑超麟和夏之栩与指挥部联系，参与指挥整个暴动^②。深夜三点，陈独秀来到指挥部，见闸北天通庵车站的敌人顽抗，工人起义军久攻不下，曾写一字条交人送到闸北，主张“把我们的武力撤退到乡下去”，未被采纳。翌日天明，敌人已缴械给日本兵，退入租界，暴动胜利。

3月22日 上海总工会搬到湖州会馆公开活动，陈独秀在上海总工会举行的庆祝武装暴动胜利的大会上发表演说，从巴黎公社讲到十月革命，赞扬上海工人阶级了不起，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军阀的军队。

3月23日 晚九时，中共上海特委举行会议，讨论武装暴动胜利后的问题。陈独秀提出要想办法使左倾的薛岳部队“留在上海”，并且根据苏联同志的意见，主张发动工人、农民、共产党员和团员去参加薛岳的部队。除把剩余的武器弹药送交薛岳外，

^①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345、349页。

^②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瞿秋白、张国焘在上海第二次暴动后离沪去汉，蔡和森在莫斯科，只有陈独秀、彭述之在上海。

陈独秀提议工人收藏的枪械暂时不能出俱乐部，因易守卫。关于纠察队，陈独秀主张整编，要调得力者百余人为干部，作为纠察队中心，加紧训练；其余复杂分子，实行淘汰。关于上海市政府，陈独秀提议应报告武汉国民政府委任，并催款。

3月25日 晨七时，参加特委会议，对由于受蒋介石操纵，虞洽卿、纽锡生、陈光甫、白崇禧等人不到上海市政府就职事，陈独秀提议：“明天代表会要通过不就职的委员取消，再选。一面委员要就职，并通知领事团，区市代表会要常开，补选委员，可把孙科、宋子文等都选入。”还提议帮助薛岳“扩充军队，要一千五百工人”，同时又说“不要把薛岳弄太左了，只是使他存在，加紧他的政治工作，最后要弄到无论谁不能来，来就同他打，但应尽可能免冲突，同时准备最后冲突”；还提议组织慰劳队，慰劳纠察队和革命兵士，开工兵联欢会等①。

是日 在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扩大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被称为“中国革命领袖”而受到一致拥护。区委根据陈的提议决定：要号召一百万民众一致起来拥护市政府；明天召集市代会，取消不就职委员，重新补选。如果无效，就要开全上海群众会示威，并指出这次我们是为取政权，如果政府不建立，就失掉意义②。

晚八时，参加特委会议，对所传白崇禧要解散工人纠察队事，指出：“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

①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385—387页。

② 同上书，第394、395、403页。

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此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①

对白崇禧调开薛岳事，陈主张“我们要赶快以各区党部分头召集党员大会拥护留薛。”

3月26日上午九时，参加中共上海区委会议，指出蒋介石从江西反动以来，“被害的都是C.P.”；南京惨案，英美打死中国一、两千人，“所以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我们把这两个问题联合起来看，所以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提议在明天市民大会上做工作：一、包围白崇禧，号召反英，要蒋反英，民众愿作后持（援）。二、挽留薛岳。认为“反英运动要扩大，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最好要将反英与反蒋联合一起，暂时对日美不管，减少敌人”。罗亦农在会上传达了昨天特委会议精神，指出“现在中心问题就是上总的武装纠察队的问题，上总要有纠察队才有说话的地位，因此就要与右派军事力量发生战斗”。鉴于蒋介石在江西已开始杀我们的同志，“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挽救这个全国的危机，要严阵以待，集中兵力，并将吴淞及南市大部分兵力调来，四周布防，保护上总与俱乐部。我们要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这个争斗比这次暴动的意义更大。幸而胜则已，不幸亦可影响全国，断绝蒋之政治生命”。^②

下午四时，蒋介石到上海。中共上海区委在六时召开活动分

^①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388—390页。

^② 同上书，第391—392页。

子会议上指出：“蒋来别有用心，我们应有明确的观念”；“他将集中势力与 C.P. 算账”，“完全为想压平上海民众力量”，“重要的为工人与纠察队问题”^①。

3 月底至 4 月上旬 蒋介石三次派原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胡公冕约请陈独秀与蒋谈话，均被陈以有病推辞。蒋介石十分恼怒^②。

3 月 28 日 参加特委会议，认为若工人纠察队与蒋介石冲突，“太阶级性了”，“完全失掉联合战线”。

致函中共上海区委，指示：目前我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静江），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上总除力争保持纠察队外，要少说政治。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对罢工反英问题，第一先决条件要得民党及老蒋同意，现在上总及党要发一通告，说明罢工要待命令，目前暂做宣传及准备的工作。上海区委即召开主席团会议贯彻，决定去慰劳蒋介石，请他参加明天市政府就职大会，还准备“召集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欢迎蒋总司令”。^③

中共中央发表为此次上海巷战告全中国工人阶级书和告全世界工人阶级书，指出暴动虽然胜利，“然而这些革命的胜利品时时刻刻都在危险状态，时时刻刻都有被内部妥协分子葬送即被敌人夺回之可能”。呼吁“全中国工人应该崛起”，全世界工人“起来阻止你们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工人及革命的国民政府武装进攻”^④。

3 月 29 日 参加特委会议，报告联系薛岳情况，对 C. P.

①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 406—407 页。

② 胡公冕：《我的经历》，《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 2 期。

③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 424—428 页。

④ 《向导》，第 193 期。

要薛任上海市公安局长事，陈独秀表示：只要对大局有利，就可担任。

3月30日 参加特委会议，传达共产国际来电：“一、不要用武力冲入租界。二、注意左、右派的冲突”。周恩来在会上估计局势，认为蒋介石对付我们已有预备，他有四个目标：C.P.、工会、工人武装、左派。周提议“我们现在要缓和，自己好准备”，“现在南京很重要，是重心”，要拉住程潜，中央有一人代表仲甫去与程潜谈话，可有效力。武汉策略有大的错误（指一切问题都在武汉解决，看轻东南——引者），也要派人去^①。会后，陈独秀即派彭述之赴宁汉。

据彭述之后来回忆，大家“检讨当前极度危险的局势，一致认为：除了坚决采取行动反蒋外，别无其他出路”。周恩来、罗亦农支持。周认为：“如果我们采取行动对付蒋介石，薛岳（他所指挥的一师驻闸北）和严重（他的军队分驻苏州无锡一带）可能站到我們方面来，但举行军事行动反对蒋介石，恰好是违反国际的政策。”陈独秀与彭述之觉得，“我们两人不能作此违反国际路线的重大决定”；因而，陈独秀派彭述之去武汉，“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委员陈述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②。

是月 《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机关报）第十一期发表文章，

①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436—438页。关于共产国际的电报，1927年7月16日《真理报》上曼特林（起义时苏联驻上海代表）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为何失败》中说日期是31日，内容是：“在群众中开展一次运动，反对正在策划中的政变，并开展一次反右派的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我们不要匆促地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须隐藏起来。”“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陈独秀表示服从，但罗亦农恼怒地把电报“摔在地下”（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②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14页，前卫出版社1975年版。

再次谴责陈独秀和彭述之去年七月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的中共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4月1日 在郑超麟的家里会见周恩来。周报告汪精卫已到上海及与汪见面的情况。陈独秀同意周的意见：直接送汪去汉口，不让他在上海与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要员见面^①。

4月2—3日 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等人连日在蒋介石司令部开会。吴提出检举中共案，要求各地反共将领实行清共；蒋提出马上做两件事，“赶走鲍罗廷”，“分共”。最后决定依汪精卫主张，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于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以求“解决”。以前，暂时应急之办法：一、由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各地共产党的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武汉中央及政府所发命令，“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不接受”；三、各军队、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暂时取缔”“制裁”；四、“凡工人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等^②。

4月3日 与周恩来一起会见汪精卫。汪质问陈独秀：“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口号，并要主使工人，冲入租界。”陈答“决无此事”。汪转达吴稚晖的话，称陈是“口头骗你的话，不要信他”。陈答以亲笔作书面宣言^③。翌日，陈独秀就起草《汪陈宣言》——《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

4月初 武汉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临时中央，连电催促

① 这一点实际上没有做到。

②③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在广州中大演讲》。《申报》1927年4月8日。

陈独秀赴汉，认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问题都应集中力量在武汉解决。

服从共产国际电令（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放弃反蒋计划，并与汪精卫协商联合宣言^①。

4月5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报发表《汪精卫、陈独秀宣言》。《宣言》宣称：“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4月10日，《共产国际》编辑马尔丁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评论《汪陈宣言》：“最近从中国收到的情报可以判断，现在中国共产党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由于它的有才能的领导，无产阶级开始逐渐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同时又和农民、大量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尚未脱离革命的大资产阶级保持统一战线。这部分大资产阶级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由于无产阶级地位的巩固。”

蒋、汪、吴（稚晖）等国民党要员在沪开谈话会，吴说“汪陈宣言”“外间误会甚多，以为从此中国归两党共同治理”。汪大笑说：“宣言”“仅言两党误会不可发生，未言两党共理中国”；“宣言”“仅两党首领外交上之友谊谈而已，不关于两党之政策也”。吴说：“治理中国止（只）有国民党，没有联了共产党来共治之可能”^②。

4月6日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罗亦农报告认为“陈汪联合宣言，已使许多造谣中伤的右派伎俩都将打破，许多怀疑的国民党分子也可不怀疑”，要求“所有国民党党部及我们党部要发表宣言表示拥护”；尤其在群众中“要特别宣传我

^①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② 《民国日报》1927年4月6日。

们的领袖独秀同志”。同时指出：“蒋与我们争斗的中心问题，为解除上总纠察队武装问题，他要取消上海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此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最后的决斗”；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训令，认为与蒋“没有调和余地”，“我们不避免冲突”，“我们唯有与蒋奋斗，我们有实力有群众，只要策略应用得好，有胜利的希望”，“我们决定不收藏枪械，坚不缴械”，“决不投降与退却”。但又表示“以民众的力量去镇压蒋之反动”，“不取进攻的形势”^①。

中共江浙区委发表宣言，拥护国共两党领袖“告全党同志书”^②。

中共上海市执委发表宣言，认为两党联合宣言“不但把中国目前革命的形势分析得非常清楚，可使我革命的同志们明瞭今后革命的政策，且把两党在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如何集中力量密切合作的意义，说得非常透彻，使一切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的造谣中伤，无所施其伎俩，这是促进中国目前革命运动的重要言论，是挽救中国革命危机的唯一良剂，本党部誓率全上海同志一致拥护，并切实遵循，努力奋斗，以冀我上海的革命运动得以维持继续达到最后的胜利”^③。上海沪东各工会联合会代表所属十六万工人，发表宣言表示决不为谣言所惑，并誓必拥护两党对于目前的革命主张^④。

另外，6月7日，上海临时市政府也发表宣言称：“今读国共两党领袖汪陈两先生告两党同志书，披沥肝胆，剴切陈词，使两党同志及各界革命民众，数日来所积之疑虑，为之涣然冰释”；“本市政府于国共两党领袖之宣传，誓竭诚拥护，务期集合各界革命民众一致合作之精神，以促成中国革命之成功”。国民党上

^①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444页。

^{②③④} 《新闻报》1927年4月6日。

海特别市党部也宣称：“本市党部深知在帝国主义根据地及一切反革命势力大本营之上海尤为一切谣诼所丛出，足以淆惑民众视听，特竭诚拥护本党领袖汪精卫同志及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先生之联合宣言，领导沪上全体同志，决心与共产党开诚合作，团结到底，……秉承两党领袖之宣言，协商切实进行办法，以收行动一致之效，而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①

中共江苏省委、沪西各工会联合会、浦东工会联合会等机关团体，都发表拥护国共两党合作宣言^②。

发表“寸铁”六则：《谁敢再想做中国之爹亚士》、《英国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了吗》、《稳健派原来如此》、《青天白日旗下之上海新闻界》、《张作霖已说出南北妥协的条件了》、《徐朗西做人难》及通信《答沈宾析、朱近赤（国民革命之归趋）》^③。

是日 登船离沪，10日到汉口。

4月6日至12日 罗易不顾中共中央的反对，提议答应蒋介石的请求，与鲍罗廷一起去上海会见蒋介石（当时蒋介石要求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前去拜访，商讨由于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引起的各种问题），并准备起程^④，因发生“四一二”事件而作罢。

4月13日 罗易以“第三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蒋介石：“你已决定在南京召集几个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开会。这一行动显然违反了你和汪精卫所订的协议，即关于党内一切争论的问题，应提交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这个会议应在武汉召开，并须有你参加。”“我们劝告你放弃计划中的南京会议，它实际上将使党陷于分裂，而你将承担在关键时刻破坏民族阵线

①② 《新闻报》1927年4月7日。

③ 《向导》，第193期。

④ 罗易1927年4月13日致蒋介石的信，《罗易赴华使命》，第64页。

的严重责任。我们劝告你遵照协议，将党内一切争论问题，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你如果采纳这个劝告，我们将乐于访问南京，以便和你亲自商讨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① 蒋介石未予置理。

4月13至15日 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与鲍罗廷、罗易等人商谈今后革命去向问题。赞同鲍罗廷的主张：继续北伐及向西北发展。^② 陈独秀说：“革命不能在武汉等死”；“目前迫切任务不是深入革命而是扩大革命”；认为若深入革命，巩固武汉革命基地，就必须支持农民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要求。这样，共产党人就必然要转而反对国民政府，而那样是非常危险的。罗易强烈反对这种主张，斥之为“机会主义”，“是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背叛”，“与共产国际的提纲（指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会议决议——引者）是矛盾的”。罗易说：“总的说来，我不反对北伐，但我反对立即出兵。”北伐前，“必须作好一定的准备”，即巩固武汉基地，开展两湖地区的土地革命。张太雷、彭述之支持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意见；谭平山、张国焘建议南伐广东李济琛；瞿秋白主张先东征反蒋，然后北伐^③。

4月15日 中共上海区委给各部委、各党团一封信，指示

① 此电文由武汉“国民新闻社”发表，原载《中国新闻》，（1927年4月14日），转引自（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王洪等人译：《罗易赴华使命》第6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主张革命向西北发展的“西北学说”是鲍罗廷发明的。4月3日武汉的日本水兵在日租界杀死中国工人，并将租界内的劳动群众驱逐出境，武力封锁租界；同时帝国主义各国还联合警告武汉政府，准备共同镇压中国革命，其势汹汹。鲍罗廷为之吓倒，发明了“西北学说”：认为“东南帝国主义力量太大，不能做革命根据地”；小资产阶级也动摇了，对此只能妥协；出路是“到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那儿可以联络冯玉祥，接近苏联（李立三《党史报告》）。

③ 《罗易赴华使命》，第162页。

因市政府、市党部被封，立即掀起反蒋运动，“要把这个运动做得极大，使之成为全上海人民反蒋的奋斗”^①。

4月16日 中共中央根据罗易的意见，通过《关于继续北伐的决议》，强调北伐之前，“必须将早已在国民党统治下或革命已经完成的那些地区的革命基地加以巩固”，进行土地革命；提议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考虑。两天以后，由于国民党根据鲍罗廷的意见决定继续北伐，中共中央又撤销了上述决议^②。

4月16日 中共上海特委举行会议，由汉至沪的李立三、陈延年传达中共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1)调罗亦农去武汉，派陈延年为上海代理书记，与李立三、维经斯基、赵世炎和周恩来组成特委。(2)因奉方进攻甚烈，决定如果蒋尚不十分反动，还可姑予敷衍，先北伐。陈独秀还“来电表示反对打蒋”。周恩来主张以区委名义提出抗议，反对中央先北伐而反对反蒋的决定，“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示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致使此次大受其亏。国共联合宣言毫无积极意义。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军事上“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罗亦农主张，“对于中央并不要责难”，“只处提出意见态度”。陈延年主张，“在政治上，要说明我应乘资产阶级政权未稳固前打他，才有胜利希望，如再延缓，资产阶级的政权一经稳固，我们就无法可打”。“会议决定今天就致电武汉中共中央，由周恩来起草，加上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顾夫共六人签名发出”^③。

①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456页。

② 《罗易赴华使命》，第176页。

③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457—460页。

4月18日 中共上海特委会举行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对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决议案认为上海失败一方面虽为客观环境所造成，但主观上也有错误，“不但是上海党的错误，而是整个党的错误，……这实是我们党的根本错误”。其原因，第一没有坚决认定对于大资产阶级斗争的策略；第二没有扩大无产阶级的领导影响于小资产阶级。“此二大错误，自中央以至于沪区都负责任”。“中央为使上海区校正上面的错误，决定今后工作的策略，即为积极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与大资产阶级努力奋（争）斗，扩大无产阶级的领导，影响于小资产阶级，夺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维经斯基参加了会议并发言，承认对蒋介石的认识和策略上错误，“是国际中央与中国中央的指导上的错误”，同时指出陈独秀曾阻止瞿秋白对蒋介石“非常明彻”的观察意见在上海区委大会上发表。周恩来提出错误的责任问题，批评“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与上海都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等；对于这种错误，“中央完全承认才能指导全国，尤其是（彭）述之不能再站中央委员的地位”；“此次运动东方局也要负责”^①。

4月中下旬 有一天，陈与吴玉章商谈。吴说为建立我党掌握的军队，已促使武汉国民党政府决定，把共产党员连某指挥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人员、粮饷、军械都已经筹划好了，唯谭延闿表示异议。陈独秀认为计划中配备的枪械比别的军队都好，怕引人妒忌；自己建立军队，太惹人注目。这样，此计划被搁置下来。一天，陈独秀又与汪精卫、吴玉章等商谈局势，有人反映，农民押着某某司令的母亲游街，农协扣留了政府的粮米，汪暴跳如雷：“这不是造反吗，岂有此理！是政府管农会，还是农会管政

^①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463—467页。

府？”陈也附和说：“是谁在湖南搞的，简直是乱搞！”^①

4月20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表示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委员会4月17日作出的“罢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除党籍和拿办”的决议，指出：“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军阀之联合势力，必须发动广大的群众”；“民族主义的中国必须建设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政权”，“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若经过农民革命，革命的民主主义政权是不能建设的”。强调“农民革命是与国民革命不可分开的”；“国民革命应该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国民革命再要向前发展便需一个农民革命”^②。

4月25日 在鲍罗廷住宅参加会议，讨论取缔一切“过火”工农运动的“决议”；“决定向帝国主义退让，内容是取缔一切所谓过火的群众运动。”鲍对此决议作了解释，说中国革命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好”（帝国主义能联合起来压迫革命）；工农反帝反商人的运动“过火”，反映“流氓”的利益；宣称：“我们一定要取消流氓的利益”；“停止一切直接反帝的群众行动”。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并当即派夏曦回湖南去“取缔一切过火的运动，以后一切群众运动都要听国民党中央的命令和指挥”^③。

4月26日 参加国民党土地委员会^④扩大会议，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与方法是：一、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是没收大地主及革命军人之外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二、公布佃农保护法。三、无土地之革命士兵退伍时必须给以土地。

① 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中国青年》1961年第9期。

② 《向导》第194期。

③ 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1928年6月22日），《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139—140页。

④ 国民党中央于1927年4月成立了由邓演达、谭平山、顾孟余、毛泽东组成的土地委员会，讨论解决土地问题方案。

四、解决土地之先决问题必须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等等^①。

4月下旬 多次召集有国际代表参加的中共中央会议，并任主席；在罗易与鲍罗廷的无休止争吵中，站在鲍罗廷一边。鲍主张广泛联合，向西北发展，纠正工农运动过火；罗主张加深革命，巩固武汉，土地革命^②。

4月下旬至6月 与张国焘、谭平山一起，作为中共代表，多次参加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国民党方面代表是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汪为会议主席。讨论内容，先是东征反蒋问题，后来主要集中在限制工农运动“过火”的问题上。有一次汪精卫就唐生智提出的“群众污辱其家属”事件，质问陈独秀，陈不知所措。关于土地问题，陈独秀提出“政治没收”——即仅仅没收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汪精卫反对这个主张说：“政治性的没收是一种极笼统的宣言。如果在那一区内，农民运动已充分有力，那末农民就会把一切地主都叫作反革命者和劣绅，以没收其土地；如果农民还未强健起来，那末，他们就连真正的反革命者也不能制服了，……而专门抢夺小地主的土地了。……这样一来，则最感受痛苦的，就是我们所要吸收到我们方面来的小地主了。必须很妥当地决定我们的条文，以免引起他人的曲解。”……如此，两党联席会议始终扯皮，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③。某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象是各样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力。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力，

① 《党史研究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编）1981年第1期。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32页。参加会议的还有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张国焘、任弼时、维经斯基。

③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米夫：《中国革命》，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3年版。

或是和他们决裂。”^①

4月27日至5月9日 在汉口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执行主席，主持开幕式，并代表中共中央作两年来工作报告——《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共分十一个部分。报告检讨了过去中共中央反对孙中山北上，主张退出国民党，没有积极地坚决地帮助北伐，以及上海暴动时没有估计到敌人的力量，马上想在上海实现民主专政等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同时又为“三·二〇”事件中的妥协和退让辩护说：“共产党的退让，是由于力量不足和党没有适当的准备而引起的。在广东发生这样的错误应该认为是可以宽恕的。”报告对当时决定命运的几个根本问题，发表了自己系统的意见：一、对形势，认为革命下一时期是“低落时期”。二、对国民党，把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代表地主、军阀和资产阶级右翼利益的势力，视为“小资产阶级”，强调合作与“让步”，以至不惜牺牲工农利益，继续指责工农运动“过火”。三、对土地革命问题，主张等待北伐完成以后再行，即“先扩大，后深入”，并强调“小地主也是小资产阶级”，反对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四、对革命发展方向，认为“东南是帝国主义的基地”，再次呼吁“向西北发展”。

大会讨论时，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毛泽东等人对陈独秀报告中的错误作了批评。毛泽东还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但是他的意见遭到陈独秀的拒绝，没能提交大会讨论。大会最后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文件，否定了陈独秀提出的现在时期的形势是“革命低落”的观点，提出是“紧张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否定了“先扩大、后深入”的主张，指出“共产党应竭力执行

^①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规定“农民政纲”是：“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分给农民耕种，但不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强调“现在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及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在这革命的联盟之中，无产阶级将实行其领导权”；“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①

大会选举时，由于陈独秀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并且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拥护大会的决议，还由于陈独秀当时在党内的威望以及没有合适的替代者等原因，所以仍选他为党的总书记，与李维汉、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苏兆征九人组成政治局，与李维汉、张国焘三人组成政治局常委。罗易在5月9日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五大”是“布尔什维克的大会”，成功地解决了两个问题：“确定了党的正确政策和选出了在目前情况下尽可能好的领导。”^②

5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国共两党在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关系》的决议，称：“在现阶段，无产阶级不是单独的承担革命的领导，根据形势的需要，它也由国民党左派保证其革命的领导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同它合作，加强左派，并帮助它领导国民革命但同时不能丧失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③ 同日，罗易撰文阐述中共“五大”关于无产阶级“行使领导权”的含义：“因为现时的革命仍建筑在数个阶级的联合上，无产阶级不能单独指导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并非革命的唯一指导者，不过他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第399页。

② 《罗易赴华使命》，第266页。

③ 同上书，第274页。

在革命斗争中执行联盟的领导权罢了。”^①

5月18日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决定，派张国焘赴武昌，支援防守武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叶挺部队，粉碎夏斗寅独立十四师叛乱部队由宜昌向武昌的进攻。

5月20日 下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鲍罗廷住宅举行的会议，总结粉碎夏斗寅叛乱的经验。

是日 谭平山就职国民政府农政部部长，发表演说，称农政部的政策就是执行国民党的农业政策，激动农民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实现农民同“革命军队”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并且加强武汉政府领域内的农民组织。汪精卫演说欢迎谭平山就职，称他是“非常善于处理农民问题”的领袖^②。

5月24日 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罗易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决议草案。决议草案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领导机关中“唯一的小资产阶级代表”，而国民党及其中央却“主要由封建资产阶级领导人组成”，因此，说国民党“已成为以工农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革命民主政党”，是“一种机械的看法”。草案还认为共产党由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观念，加入国民党时没有实现“独立权”，“结果，党犯了严重错误”。但草案又强调：“应当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以“通过现在有投降倾向的小资产阶级政权机关”，走向工农民主专政。政治局对这个决议草案，“既没有通过，也没有否定。”^③

5月26日 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马日事变”的对策。21日，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省委发出指示，决定发动长沙附近农军，于30日围攻长沙的许克祥叛乱部队。汪精卫得知

① 《向导》，第195期。

② 《人民论坛》，1927年5月21日，第1、5页。

③ 《罗易赴华使命》，第283页。

后大发脾气，指责中共不该围攻许克祥。鲍罗廷“异常焦急”，主张国共双方组织代表团赴湘，“一面查办许克祥的叛变，一面查办农运过火”^①。陈独秀为此召集政治局会议紧急磋商，并作出《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决议案，指出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叛变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湘籍军官在内）的势力及宣传，动摇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贫农幼稚行动”；指示“一切非本党政策所规定的幼稚行动，立须依本党的领导力量，切实矫正”；“关于土地问题……必须先行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并且“当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强调若农运发展到非“没收大地主之土地不可”，也须在两个条件之下：“（一）能使革命军官中立；（二）能与左派群众及领袖共同行动。”^②陈独秀和中央多数同志认为：“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反对反动势力。如果这样，我们就破坏了国民政府的威信，而将自己和国民政府对立起来了。”^③所以决议还宣称：“现在本党的责任即不是推翻他们，也不是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在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责任是等候时机，深厚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④于是，陈独秀签署了中央致湖南省委的信，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避免公开冲突，把问题转移到武汉来解决。命令下达后，农民武装多数退却，只有浏阳一支，因未接到上级指示，孤军扑城，致败。事后，汪精卫对陈独秀讥笑说：你们十万大军怎么连许克祥一个团也打不赢。

5月下旬 国民党中央根据鲍罗廷的提议，于5月26日派

①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75—76页。

② 《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3期。

③ 米夫：《中国革命》，第176页。

④ 华岗：《中国大革命史》，第505—506页。

出由谭平山、鲍罗廷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去湖南查办许克祥，遭到许的威吓折回后，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组成的政治局常委曾通过蔡和森提出的“两湖决议案”，号召广大农民群众以自己的势力来解决许克祥，向长沙取围攻封锁之势；自动的没收土地，实行赤色恐怖，发展农军五万以上，准备推翻现在代表土豪劣绅的国民党中央等，要求中央政治局追认^①。

5月至7月 与秘书黄文容搬出中央机关“六十一号”，另租房子居住，秘密起来。每天还同国民党重要人物见面，一个人综合各方面的秘密消息，每夜临睡前口授黄文容记下，用复写或油印，发给党内重要同志，也给湖北省委一份。其中有许多关于国民党要人的态度和私下言论，这是在这些要人身边工作的同志报告上来的。

6月1日 共产国际“紧急指示”传到中国（罗易曾对汪精卫说，这个指示是“给我与鲍罗廷的”），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充实国民党中央；动员两万名左右共产党员，加上五万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举行会议，讨论国际指示和北伐军攻克郑州后的军事问题，以及追认常委通过的“两湖决议案”：一、关于国际指示，包括鲍罗廷和维经斯基在内，一致认为无法执行，责怪莫斯科太不懂武汉的情形。决定回电莫斯科：“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②意思是现在无法立即付诸实施。罗易也同意这个意见，但他认为“这是一个原则，不是不能执行，只要汪精卫说服过来，就有办法”。^③于是，罗易就在6月5日私自将国际指示泄露给了汪精卫，第二天又给了汪一个副本，企图在紧急

①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79页。

② 《罗易赴华使命》，第112页。

③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关头“重新赢得汪的信任”。汪见后“非常吃惊”。陈友仁得知其内容后，面如土色，说：“这意味着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罗易并且对汪说：“你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汪拒绝接受，并指责说：“你们破坏了协议。”^①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了从国民党内部透露出来的罗易私自向汪精卫泄露国际指示的消息，大家都怔住了。鲍罗廷报告了国际，国际来电停止了罗易的代表资格。此后，鲍罗廷“垂头丧气”。陈独秀“认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无法善后”，开始消极^②。二、关于攻克郑州后的北伐及“两湖决议案”问题：陈独秀、鲍罗廷、瞿秋白、李立三主张东征蒋介石；罗易、谭平山主张南伐广东李济深；蔡和森主张先解决两湖问题，认为：“两湖反革命大暴动不解决，而高唱东征、南伐，只是一句空话！”罗易认为“两湖决议案”与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相合，表示完全同意。会议通过了“两湖决议案”及《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农运策略》（令农民部指导各级农协党团执行），指出现在农运的主要任务是以农民为领导建立乡村自治的革命的农民政权，但又强调革命不能离开现时在军队中的军官，不没收军官家属的土地同财产；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也应等到乡村自治政权建立后才能实行。此后，两湖开始进行反对反动的国民党中央的宣传，并派大批军事同志赴湘发展农民暴动，推翻许克祥。国际代表罗易与中央代表周恩来等组织了指挥湖南暴动的“特别委员会”。“最后外国同志听了一个不关重要的报告，认为我们自己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为不可能”，原案推翻；周恩来与罗易“大闹一场”，委员会取消^③。毛泽东遵

① 《罗易赴华使命》，第117页。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51、252页。

③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0页。

照中央常委秘书厅发的指示（即中央常委及政治局通过的“两湖决议案”），在湖南进行“反对反动的国民党中央之宣传”，谭延闿等人对此大骂“C.P. 有推翻国民党阴谋”。陈独秀闻之，大发雷霆，以为“这一手来不得”，否定了自己原来同意的提案^①。

6月4日 中共中央就“马日事变”发表告全国农民群众书，号召湖南农民积极准备武装起来，“努力去推翻长沙的反动军阀”，“帮助国民政府重新在长沙建立政权，拥护国民党反抗反革命的军阀”。同时指出：“湖南农民是整个农民运动的先锋”，“应当受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扶助”；要求农民“与小地主结成同盟，共同参加反抗大地主与豪绅的争斗”；指示对革命军人的土地“不能没收”，对于他们的家属“更不能波及”，“禁止这些幼稚行动是农民协会的重大责任”^②。

接受罗易的建议，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义，致函国民党中央，指出：“目前根本问题是怎样实施某种限度的土地改革，以满足已觉醒的农民群众之正当要求，而达到革命根基深入之目的。”声称“国民革命军的将领都是相信民主自由的革命领袖，对于土地改革定能拥护”；“中国革命的将来，中国人民的命运，全靠贵党在此时期之坚决的行动”；最后提出削平湖南反革命的六项要求：立即下令，由唐生智派兵讨灭长沙叛乱；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之发生等^③。

6月初 国民党中央通过决议，解散湖北省黄冈地区国民党委员会和农会，因为黄冈国民党批准农会没收革命军官和小地主的土地，中共中央农民部派员调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该地严格按国民党的决议进行土改，革命军官和小地主土地均未

①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6页。

② 《向导》，第197期。

③ 《向导》，第197期。据罗易后来说，这封信及信中六条“提议”，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正式批准（《罗易赴华使命》，第113页）。

触动，只没收了臭名昭著的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建议湖北省政府代表(共产党员)不要执行国民党的决定，并要求国民党中央改变决定；陈独秀则命令他“执行国民党的决定”^①。

6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张国焘去郑州，了解即将召开的国民党郑州会议情况，布置河南党的工作。

6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陈独秀在会上对形势表示乐观，认为张发奎和唐生智部队回防武汉，会造成力量的平衡和取消三十五军(何健)在两湖的垄断地位；同时，共同北伐的计划已被打破，共同解决共产党的危机业已延缓，从而使武汉“局势平静”。罗易反对这种估计，认为唐生智军队的到来，“相反只能增加反革命的危险”；“被国民党诬蔑为工农运动‘过火’的和陈独秀斥之为‘幼稚越轨’的种种表现”，都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提议中共执行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采取进攻策略：立即征服广东，武装工农，发动湖南暴动，改组国民党等，并提议，一、北伐军凯旋回汉时，实行总罢工，支持陈独秀6月4日致国民党公开信中的“六项要求”。二、发一反对朱培德、许克祥的宣传大纲，要求讨伐朱培德。蔡和森和任弼时支持罗的提议，多人反对，争辩多时，最后勉强通过。消息传出，鲍罗廷“气得要死”；彭述之“到处宣传中央与湖北省委‘荒唐’”；谭平山“臭骂罗易‘左派’幼稚病”，都认为中共没有力量与国民政府决裂，要求重新召集政治局会议进行复议。不到三天，即开政治局会议，因多数反对而取消了罗易的提案。李立三提议改反抗性的示威罢工为欢迎北伐军凯旋的罢工，以此达到支持陈独秀公开信中所提要求的目的。陈独秀也反对总罢工，害怕这样会“发展为公开战斗，工人会被杀害”。他“同意召开群众大会”。会议通

^① 罗易：《反革命活动和共产党人的策略：防御还是进攻》，《罗易赴华使命》，第313—314页。

过了李立三和陈独秀的提议，蔡和森保留意见。^①

6月11日 撰《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承认从“三二〇”到“四一二”，“我们一年余的忍耐牵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指蒋介石）屠杀民众屠杀共产党的代价！”称“国民政府的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进展之一个重大时机，在革命史值得大书特书的”^②。

6月13日 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返回武汉。湖北总工会在总工会领导人刘少奇及中共中央秘书厅（当时秘书长是蔡和森）的同意下，在“欢迎铁军凯旋”罢工与示威中违背中央决定散发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纵容许克祥的“宣言”并高呼“打倒纵容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等口号。汪精卫见后对鲍罗廷和陈独秀流泪切齿地攻击总工会“连络武人来倒我”。陈表示对总工会的行动极为不满；鲍“尤其深恶痛恨这一日的罢工表示”^③。

6月14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说：“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动，这种情形，必须矫正”。^④

6月15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罗易提出的《国民革命纲领草案》，与鲍罗廷共同认为“这个纲领提出了工人阶级的最高要求”，必须修改。鲍主张在两党政治问题、群众运动的控制问题、工商业问题三个问题上“让步”，才可避免“与国民党的破裂”，即不要提土地革命，不要提武装工农，特别提出有利于工商业者资产阶级及取缔工农运动的条文。罗易提出：“如按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意见去做，则只能帮助反革命。”陈独秀主

①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0—82、142页；《罗易赴华使会》，第320—323页。

② 《向导》，第198期。

③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6页；米夫《中国革命》，第117页。

④ 华岗：《中国大革命史》，第502页。

张“把土地问题的解决提交两党联席会议”。罗易批评说：“这是一种倒退！”陈独秀反对“农政部掌管农民自卫军”的提法，说：“国民党会把这看作是对它的权力的威胁。”罗易说：“这纯粹是投降！”“草案”最后按鲍罗廷陈独秀的意见修改后通过，要求立即收复广东，支持冯玉祥北伐，消灭湖南的反革命，增强国民党作为国民革命领导者的权威等。罗易还提议要求国民党通过这个纲领，“否则，我们就分道扬镳”，会议没有对此作出决议^①。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授意下，陈以个人名义致电共产国际，解释暂时不能执行国际“紧急指示”的原因；承认“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但又说：“大多数军官来自中小地主阶级，因而反对土地革命。”“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都抱有敌意。……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是困难的”。“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宣称：“我们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②

国民党中央复函中共中央：“希望贵党一方面帮本党矫正过去工作的幼稚，一方面严切训练贵党各同志，使能在此危险时期，同负重大的责任。”表示有两项原则“可以先为贵党告者：（一）对武人越轨行动，必须制裁；（二）对农协幼稚行动，必须矫正。”

在《向导》（第198期）上发表高一涵的《武汉国民政府与共产党》文章^③，企图表白“国民党中央的权没有落到共产派手中”，却公布了原是秘密共产党员的吴玉章等人的身份，说国民党中央里，除李大钊外，“只有于树德、谭平山、吴玉章、恽代英、林祖

① 《罗易赴华使命》，第330、332页；《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7页。

② 《罗易赴华使命》，第324页。

③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5日。

涵、杨匏庵等六个共产党员。”吴见后十分生气，质问陈独秀；陈答：“为了这件事，我一夜没有睡，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把你们几个人公开了好！”^①

6月中下旬 共产国际训令中共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调回鲍罗廷。国际代表“驼背毛子”表示：“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指导权。”此“训令”被鲍罗廷扣下，秘而不发。直到7月12日，鲍才实行改组中共中央^②。

6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退出国民政府问题，陈独秀提出“不仅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要退出国民党”；“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鲍罗廷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瞿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会议通过“十一点声明”，称：“中共党员可以随时退出政府”（未提退出国民党）^③。

撰《湖南政变与讨蒋》，列数许克祥在“马日事变”后的种种反俄反共反工农反武汉中央的罪行，驳斥“马日事变”只是为“纠正农民运动的幼稚行动而发”的谬论，抱怨武汉政府对许克祥的庇护^④。

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发表讲演，其要点：一、每次劳动大会都有新的时代与责任。二、此次劳动大会应联合小资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攻，完成中国反帝国主义、非资本主义的国民革命。三、目前中国工人在增加组织扩大力量，努力在可能的政治

① 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中国青年》，1961年第9期。

②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8页；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③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63、266页。

④ 《向导》，第199期。

与经济状况之下，作经济斗争。^①

6月22日 与蔡和森、李立三纵谈形势，蔡“深感于对帝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两让政策没有出路”，“主张提出反帝运动，甚至不惜掀起武装干涉，在抵抗武装干涉的反帝高潮之下来猛烈的实行土地革命”^②。翌日，陈独秀即召集李立三、蔡和森、张国焘举行“中央常务会”，讨论通过了蔡和森吸收些独秀和立三意见起草的“提高反帝运动的通告”和“致上海区委的信”并以中共中央秘书厅名义发出^③。致上海的信认为：武汉国民党“正在抛弃三大政策，投入蒋介石的怀抱，这种向右转趋势的客观原因是反帝运动的低落”；“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没收土地和武装工农，结果将与国民党立即破裂，而与国民党立即破裂意味着我们党立即被消灭”；克服危机“最正确和最必要的策略”是：“上海必须在一个月內准备强大的反帝运动。工商学要公布总罢工，示威游行要进入外国人的地区……”。这个运动将迫使帝国主义占领南京和上海，帝国主义方面的这种行动定能再次在全国引起强大的反帝浪潮，从而摧毁蒋介石的基础和粉碎武汉政府中右派的威胁”。但这个通知和信发出后，蔡和森又“自己感觉不正确”——“显然表示一种没有出路的冒险主义、拼命主义的精神”，于是又提议政治局全体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复议。但是，陈独秀两次召集这种常委扩大会议时，都只有陈独秀、蔡和森出席。陈说：反帝运动是我们的经常工作，何必再三讨论。蔡说：“此通告及信与对帝国主义的让步政策根本相反……，不敢自信正确，必须提

①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3日。

②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1页。

③ 华岗说此信是6月19日发出的。如是，则陈与蔡、李的酝酿不是在6月22日，而是6月18日左右（《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

出于政治局正式讨论。”^①在6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此信时，罗易抨击此信“非常危险”，是“要用反帝斗争取代阶级斗争”，“这不是领导无产阶级去争取胜利，而是去遭受屠杀”；提议“否决这封信，并建议另外草拟一个反帝运动的计划”。政治局同意罗易的提议，但秘书厅说该信已发往上海^②。蔡和森提议张国焘另起一通告，“说明前一通告及致上海信之错误”。^③

6月26日 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陈延年任书记，郭伯和为组织，韩步先为宣传。同日，三人被捕，因韩叛变，陈、郭暴露身份，陈延年从狱中给汪孟邹写了一封信，汪急于营救，即到南京找胡适。胡表示“我一定营救他”，又把陈延年的信交吴稚晖。吴立即报告蒋介石（一说密报上海警备司令杨虎）。7月4日，陈延年、郭伯和即被杀害^④。代理书记赵世炎于7月2日被捕，19日被害。

6月28日 晨，在汉口鲍罗廷住宅召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讨论盛传何健即将反共，解散总工会纠察队的消息^⑤。张太雷提议纠察队、童子团问题必须解决。周恩来报告中央军部和省委军部业已决定于今日下午将总工会纠察队秘密编入张发奎军。蔡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公布，以消灭何健暴动之借口。”会议遂决定公布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作出的解散工人纠察队的命令^⑥，实际编入张发奎部队。同时通过张国焘、蔡和森提议的中央机关立移武昌的决定，以与国民党中央

①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1页。

② 《罗易赴华使命》，第348页。

③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④ 杨虎致吴稚晖的信（1927年7月2日），《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

⑤ 何健于6月29日发表反共训令，呈请武汉国民政府及唐生智总司令，“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国闻周报》，第4卷第29期）。

⑥ “命令”说：将纠察队所有的枪械交还给公安局长，并请求国民政府派遣武装警察保护职工会（米夫：《中国革命》）。

脱离接触，并准备军事斗争。讨论时，陈独秀曾表示犹疑，说过河往返，与国民党接头不太方便。夜里，在武昌新机关，陈独秀又与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开会，任弼时代表共青团中央提一决议，批评党中央回避土地革命。陈独秀大发雷霆，碎之于地^①。瞿秋白书面提议：土地革命暂以减租减息为条件；“中心问题，仍在贯彻对国民党左派让步政策。”张国焘“提议整军经武，注意军事工作”。陈独秀不理张的提议，对瞿的提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正式决议案，提交于中央扩大会议^②。

6月某日，在汉口鲍罗廷住宅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鲍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说，宣称：“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罗易十倍以上的革命”；中国“在客观上无产阶级本有取得领导权之可能，……可是我们主观的力量没有成熟，我们不能领导农民（是地痞领导的），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工人，我们不能组织广大的失业军，所以我们不能取得领导权”；“斯大林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可是斯大林他所接受于季诺维也夫（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前的委员长，反对派首领）的遗产太坏了。以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于实行”。陈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驼背毛子”与少共国际代表则提出一反对老鲍演说的决议，指明第三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方针前后是一致的^③。

6月30日 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作政治报

① 据李立三回忆，此事发生于6月30日的会议上。

②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③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告。会议通过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十一条款政纲”，承认中国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国民政府，两党联席会议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执行国民党决议和国民政府的法令；“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为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不得党部或政府之许可，不得执行司法行政权，如捕人，审判及巡逻街市等事”等等。这个被称“机会主义集大成”的决议，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武汉国民党的急骤右转，推迟其叛变^①。

谭平山在《人民论坛》上发表离职声明，说由于“未能纳农民于正轨”而请准离职。事先，汪精卫要谭平山与苏兆征立即上辞呈退出国民政府；唐生智则提出优待办法，送谭部长和苏部长出洋考察。鲍罗廷表示同意后一办法。

7月1日 撰《中国国民党的危机及其出路》，认为：“以汪精卫先生为中心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及左派的武装同志，应该有一大觉悟，下一大决心，首先自身团结起来，再和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拿出中山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的精神，来一个从左边的清党运动，毫不顾惜的清除党内一切反革命及不革命的投机分子，……国民党才有出路”，所谓“联蒋反共”、“反蒋反共”、“反蒋分共”都是和蒋介石走一条道路，是“革命的左派国民党寿终正寝”^②。

^①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王若飞说这个决议是陈独秀起草的。张国焘则说是鲍罗廷根据莫斯科电令草拟的，蔡和森说是陈独秀秋白在其6月28日提议的基础上起草的，瞿在会上还作了说明。

^② 《向导》，第200期。

7月4日 中共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动到来时如何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陈独秀开始提出：国民革命军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的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蔡和森主张上山。毛泽东也主张上山，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会议在讨论对付湖南何键反共事件方针时，仍然坚持联唐反蒋的政策。陈独秀也同意上山。

7月8日 发表“寸铁”八则：《请加入张作霖的党去罢》、《可怜的山西各界代表》、《阎锡山的国民党……的国民党》、《张胡子真笨》、《山西省议会移交烟具》、《急求南北妥协的是北张还是南蒋》、《纯正三民主义信徒的奉宁晋联盟》、《究竟什么是真正工农》^①。

7月12日 根据共产国际“训令”，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为成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兼常委。陈独秀被停职，“不再视事”。鲍罗廷建议陈独秀和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遭陈拒绝^②。陈独秀旋即与秘书黄文容一起隐蔽起来，住到党开设的一个纸行（党的秘密机关）楼上，后来又转移到工人住宅区。接着，陈独秀致函临时中央，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③

7月13日 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推行“限制群众运动的政策，任令一切反革命行动不受任何惩罚”，“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这种政策“实足以使国民

① 《向导》，第200期。

②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87页。

革命陷于湮灭”；声明：中国共产党“决不能对于国民党中央现时这种政策负责”，“反对这种政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还声明：“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①

7月14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宣称：“武汉政府已成为反革命势力”；“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性错误”。指责中共中央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非但没有去领导土地革命，反而在许多场合成了阻碍土地革命的因素。党的个别领导人还提出了明显的机会主义口号：‘只有扩大革命才能深化革命’或‘先北伐，后土地革命’”。号召中共党员同中央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纠正领导的错误：一、共产党人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二、在退出武汉政府之际发表原则性的政治声明，揭发武汉政府反对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的路线；三、不退出国民党，抗议国民党中央倒行逆施，要求撤换国民党现领导；四、全力加强无产阶级群众的工作；五、开展土地革命；六、建立党的秘密战斗机关；七、采取措施，“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员。……拒绝承认那些违犯共产国际纪律的领袖”^②。

7月21日 瞿秋白由庐山回汉口，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中央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

7月23日 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与纽曼来华，与张国焘、瞿秋白谈话，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如否定国际五月关于武装工农的紧急指示，

① 《向导》第201期。

② 《真理报》1927年7月14日。

自动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等),因此,决定改组中共中央,反对机会主义,惩罚陈独秀,他不能再任书记。

7月底 向临时中央局提议:一、把一切工会农会及政权机关转交于国民党左派;二、我们在左派政权下进行下层群众的日常工作;三、暂时专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回避大的牺牲和破坏。

8月4日(或5日) 罗明纳兹和纽曼到长沙,在俄国领事馆召集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会议,要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因为“陈不执行第三国际的决议”。代理书记易礼容表示不同意打倒陈独秀,认为革命连续失败,同志牺牲惨重,党组织多遭破坏,一时创巨痛深,不易活动,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还有号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来领导;革命失败不能说是他一个人的罪,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也有份。会议开到第二天早晨,无结果而散^①。

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在汉口的中央委员都参加了,陈独秀虽是中央委员,又在汉口,却未与会。临时中央有人主张应邀陈独秀参加,罗明纳兹反对^②。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实际解除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张太雷、项英、向忠发、卢福坦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但会议无论在政治上或组织上,口头上或文字上,都未提及陈独秀的名字。会后瞿秋白和李维汉一起,到陈独秀住所,告诉他关于“八七”会议的情况,并劝他接受国际的要求,到

① 易在会上还主张土地革命不该打倒中小地主。“八七”会议上,罗明纳兹批判湖南省委书记代表地主阶级思想,会后,党中央解除了易的书记职务。

②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莫斯科去，但他坚持不去，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①。

8月 某日晚，召见陈乔年和汪原放，对汪说：“我在打算，要到上海去。可是对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我想，你到上海去跑一次，问问孟邹，看看我可去不可去。”当时汪担任着党中央出版局局长和领导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及一个纸店的工作，公开的工作是汉口《民国日报》国际版编辑。陈让汪把这些工作交给毛泽民办。在上海，汪孟邹告诉汪原放：陈独秀可以来上海。汪原放月底返汉转告陈。陈离汉前还布置了一件事：把长江印刷厂两部对开架印刷机拆运到上海。致使后来瞿秋白布置汪原放印单张《向导》（杂志因时局反动出不成了）时，印不成了②。

“七一五”武汉反动后，陈独秀还让乔年告诉汪原放，要汪去找报馆工作的光明甫说情，到柏文蔚的三十三军办事处搞一个位置，作为“护身符”③。

9月10日（八月十五日）和黄文容、汪原放、陈啸青（亚东职员）化妆后秘密登船，前往上海。晚上到九江，正值中秋之夜。半夜以后，甲板上人少了，陈独秀出来凭栏赏了一会江月。一路上，不时沉吟：“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④到上海后先住酱园弄彭礼和家，后搬浙江北路一个小弄堂居住。陈独秀要汪原放不要再与自己联系，不要再干了。他还通过乔年对汪说，“不要再干了。还是把店事做好要紧”⑤。

9月 中共中央从武汉撤到上海。某日，瞿秋白和李维汉一起去拜访陈独秀，向他索回黄文容来做郑超麟编辑《布尔塞维

① 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

②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30页。

③ 同上书，第126页。

④⑤ 同上书，第127—132页。

克》的助手，并再次劝陈赴共产国际，陈又拒绝。

9月 开始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后写成一部书稿（未出版）；余暇时间，偶然就某一特定问题给中央写信，贡献一点意见，但都因与中央意见枘凿不相入而未被采纳。

10月24日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继《向导》停刊后创刊。编委主任瞿秋白请陈独秀写文章，陈从第1期至1928年2月27日的第19期，共写“寸铁”一百五十一则，署名“撒翁”。首期发表“寸铁”八则：《不进则退》、《汪精卫的出路在那里？》、《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马寅初又出博士的丑》、《滑稽的禁令》、《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张作霖的共和与国民党的国民革命》、《阎锡山冯玉祥仍然是赤》。

10月31日 发表“寸铁”《国民党也可以为帝国主义镇压革命了》，说“自蒋介石来到东南，极力为帝国主义者压服革命的民众，至八九月间，帝国主义者感觉得国民党的军队镇压革命也很得力，东南局势也渐趋平静，无须他们自己多驻军队了，遂调回英军一半。现在又打算调回二千，其余留驻二年，观察此二年中，中国有无革命运动发生，再定去留。”同时还发表《国民党也想求得帝国主义的信任了》、《国民党也要“外崇国信”了》、《张作霖的遗嘱》、《国民党清党的效果》、《所谓无政府党本来就是这样》、《速成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孙中山无常识处》、《不甚赞助捕房的法官之下场》、《汪精卫是第五代反共者》、《好一个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一切反革命联合起来》、《杀尽中国共产党》^①。

11月7日 发表“寸铁”三则：《黄埔失败第一个重大原因》、《团结三民主义信徒之结果》、《军阀政客是哪些人？》^②。

① 《布尔塞维克》第2期。

② 《布尔塞维克》第3期。

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梁干乔、陆渊、史唐、区芳、陈亦谋、张特等人，与苏联托派一起，在红场上纪念十月革命第十周年游行时，高呼“拥护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口号，并与其他游行群众发生冲突，酿成严重事件；事后，梁干乔等人被遣送回国^①。

11月9至10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于上海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全中国仍处于直接革命局势中”，命令党员和群众在城市中举行“武装暴动”。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统治了中央。王若飞在会上表示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②。会议期间，政治局又决定陈独秀去莫斯科。陈不愿去，并对黄玠然（文容）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他认为党现在的路线不正确，同时也反对中央改组，认为国际为了挽救威信而牺牲了他和谭平山^③。

11月11日 致函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当不至崩溃”；“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我提议用‘四不’口号（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更简明容易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国。”^④

① 杜畏之：《中国托派的起源》（未刊稿）。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59、64页，1977年12月香港周记行出版。对参加这次事件的人员，说法不一，所列姓名供参考。

② 李培之：《飞度关山的人——回忆王若飞同志》（李小丁整理），《人民日报》1982年1月8日。

③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黄玠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党史资料》1979年第1期。谭平山在这次扩大会议上被开除党籍。

④ 《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7年12月出版。

11月12日 再函中共中央，指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的政纲，且明言是‘武装暴动的工农革命’”，与国际屡次议决案中说的“民族革命”不同；要求中央迅速确定“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①。

11月14日 发表“寸铁”二十一则：《还是吴稚晖说老实话》、《反共清党与收回租界》、《华官委托捕房越界捕人》、《为新军阀造机会》、《提高党权》、《党治之下不谈法治了》、《蒋介石是向田中求婚吧》、《国民党仍难团结吗》、《江南二老》、《反共清党后的忠实党员》、《双包案的清党运动》、《枪决大批共犯》、《替代》、《汪精卫行为不当》、《有趣煞的总理纪念周》、《作壁上观的北伐》、《国民党眼中的革命成功》、《以国民党党员为限》、《横逆变成了神圣》、《我真是害了你们了》、《事非偶然》^②。

11月16日 瞿秋白撰文阐述中国革命性质是“无间断性的革命。要说中国革命已经是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固然不对，要说中国革命仅仅是民权主义的革命，……更是不对”；它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③。

11月21日 发表“寸铁”五则：《国民党中的端庄刚毅》、《盛哉党化》、《辽皇帝与党皇帝》、《改组与纠正》、《党国》^④。

12月5日 发表“寸铁”十九则：《圣诞》、《好大胆的胡适之褚辅成》、《资产阶级独裁的上海市参事会》、《吴稚晖的思想还不落后吗》、《主义的流弊》、《沈恩孚的教育目标》、《反共清党后的

① 《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7年12月出版。

② 《布尔塞维克》，第4期。

③ 《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

④ 《布尔塞维克》，第5期。

两个印象》、《数典忘祖》、《驳马克思不是容易的事呀》、《郭先生和自己开顽笑》、《移步换形的骗术》、《反共而不流入资本主义？》、《“杀其人而用其法”》、《夸大狂》、《同志之标准》、《世界太左了》、《中国人的晦气》、《汪精卫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不同》^①。

12月9日 中共中央常委复函陈独秀，批评陈独秀反对暴动、反对夺取政权、及目前工农斗争应局限于“四不”，局限于经济改良的主张；指出国民党因内部矛盾重重，决不能巩固其统治，而其统治长久与否“全看民众暴动的力量能否汇合而成较大规模之胜利”。因此，“现在可以说工农的任务是发动一切武装暴动，组织群众暴动，汇合联络各方面的暴动，其目的便在夺权”。指出：“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针。”“农民群众在现在的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与政治的。所以以‘四不’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须走到暴动，……接下去立刻就是政权问题。”“只准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政权的目標，这就不对了。”“如今经济上改良的可能非常之少，……非工农自己取得政权是不能得着改良的。”^②

12月11日 广州起义，曾建立广州苏维埃政府，激战三天三夜，因敌强我弱而失败。张太雷英勇牺牲。

12月12日 发表“寸铁”七则：《“第五层序”的革命》、《反共的国民革命》、《下层轰动》、《这就是提高党权》、《何以要讨伐唐生智》、《工人应受宠若惊》、《反共人的功劳》^③。

12月13日 午前，致函中共中央，认为：“广州暴动，无论

① 《布尔塞维克》，第7期。

② 《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

③ 《布尔塞维克》，第8期。

成败我们都应该做！”并提供五条意见：“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遭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广州革命政权用“工农兵平民代表会议政府”似较妥当，不可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的口号；“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共产国际代表不要参加广州事变^①，等等。

12月下旬 中共中央常委就广州暴动问题复函陈独秀，指出：广东暴动“原定的计划是大规模的发动农民群众的暴动，解决其经济问题——尤其是土地问题”；提早在市内暴动是敌人逼出来的，所以广州暴动虽败，“则其他各乡之暴动可以趁军阀混战而形成多部分之割据与再行汇合的局面”。关于“工农代表会”，复函说：是“广州所提的口号”，其性质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分政权的政府”；“民权主义的独裁”在中国“其势非以共产党一党政权表现之”。强调“独裁是任何革命中都需要，这种解释，我们只有公开的对一切人宣传，无论如何避忌是无用的，也是不应该的”。对于陈独秀提议与国民党某派合作问题，复函指出：“既然除反革命的国民党及革命的共产党以外，复有‘半革命’的第三党（如左派社会革命党），则两党联席会议恐是不能实现的事实。”^②

12月19日 发表“寸铁”十一则：《少一个皇帝》、《共贼汪精卫》、《反共的共产国际》、《我们发现了国奉之不同了》、《请看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李宗仁骂自己》、《国民党死亡之正式讣告》、《之洞主义》、《国民党投降了研究系》、《杀人的国民党》、《小

^① 《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共产国际代表组曼曾参加广州暴动的领导，并在战斗不利时，拒绝叶挺提出的撤退到海陆丰的建议，主张进攻，进攻，再进攻，致使损失惨重。

^② 《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

人党》^①。

12月26日 发表“寸铁”七则：《吃人的血腥的道德文化》、《究竟是谁惨杀？》、《研究系称心了罢》、《共产党是抢劫的吗》、《叶开鑫与汪精卫》、《反共先生的下场》等^②。

是年 编注《革命文学史》。

年底 陈乔年正式由武汉调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

① 《布尔塞维克》，第10期。

② 《布尔塞维克》，第11期。

1928年(民国十七年 戊辰)

五十岁

1月17日 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

2月25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判了中共中央的盲动主义路线以及中国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和“不断革命”的观点，强调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党的中心工作是“组织群众与争取群众”。

春 托洛茨基三次复函普列奥布拉任斯基^①，说“广州暴动”证明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是一个空洞的虚构，一种无价值的东西”，强调“第三次中国革命”^②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胜利。^③

6月8日 托洛茨基撰写《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批判斯大林和布哈林向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其中第三部分的标题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抨击“草案”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只是拥护已经破产的

① 《中国革命问题》，第159页。

② 托派称中国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为第一、第二次革命，未来革命为第三次革命。

③ 托派头目王文元说：这是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第一次公开抛弃“工农民主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公式（《中国革命问题》第161页）。

机会主义”，在基本原则仍继续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文章系统论述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指责共产国际斯大林在大革命失败问题上文过饰非，“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之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在当时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的”^①。刘仁静、王文元在国际“六大”工作期间见到此件，受到很大影响。

7月15日至9月1日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其中关于中国革命部分，重复了中共“六大”决议案的观点。

10月4日 托洛茨基撰写《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论述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和策略，认为现在中国“相当的和平和相当的统一”，“经济生活开始活跃”，“明显露出兴盛的征兆”；中国资产阶级对工农赢得了胜利，并在“强迫国民党的各派军阀屈服于集中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取得更有利的帝国主义的妥协”。认为“现在中国并无革命局势，……它正转变成为一个长短未定的两个革命的中间时代”；“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提出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并与“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中国民族完全独立”等口号密切联系，以争取群众，集合队伍，“经过议会制度时期将达到为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②。

^① 《中国革命问题》第180页。托洛茨基向苏共中央、共产国际“六大”提供这个文件，并要求恢复其党籍。“大会”只印了这个文件的第一、第三部分，发给少数代表阅读，阅后收回，结果引起很大反响，加速了共产国际和一些国家(包括美、加及中国)共产党的分裂(分裂出托派)。

^② 《中国革命问题》，第215—216页。此件及《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被中国托派视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它为中国托派规定了理论、纲领、路线和政策。

1月至7月 江西(方志敏)、湖南(朱德、陈毅)、湖北(贺龙)、福建(邓子恢、张鼎丞)、陕西(刘志丹)、湖南(彭德怀)等地举行武装暴动,创建红军和根据地。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5月和10月,湘赣边界党举行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总结井冈山等根据地经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2月 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中央党部和南京政府,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会议主席。4月,蒋冯阎桂联合北伐张作霖,6月占领北京。

5月7日 王若飞为中共江苏省委起草了一个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议案、反对瞿秋白中央盲动主义路线的决议案,批评中央“高潮”的形势估计和“暴动”的策略^①。

6月20日至30日 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在上海召开全国经济会议,部长宋子文主席,讨论了统一财政,统一交通,裁兵等问题,根据蒋介石提案,筹备裁兵促成会^②。

8月 国民党召开五中全会,议决取消各地政治分会,全国军令政令统一于“中央”。

10月 蒋介石任国民党政府主席。

① 转载于《中国革命问题》,第226页。这个文件及12月的“江苏省委独立事件”,后来被托洛茨基及中国托派视为中共党内非托派势力用托派观点反对“共产国际”的重要证据。

② 此会议被托洛茨基及中国托派视为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并收获成果(统一中国,使军阀屈服,取得帝国主义让步和支持,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证据。

12月 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国民党表面上统一中国。汪精卫、陈公博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称为“改组派”），并在各省市发展组织，与蒋介石等国民党其他派系争权夺利。

是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支持新的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及何孟雄、蔡振德、马玉夫等人反对李立三主持的中央改组江苏省委的决定，宣布“独立”；经说服教育，项英承认错误，省委放弃“独立”，蔡振德、马玉夫坚持原来立场退出省委。

1月2日 发表“寸铁”六则：《鬻子政府》、《真正国民党》、《如此这般的反共清党》、《白崇禧口中的清党大功》、《分治合作与联省自治》、《孙中山瞎了眼睛》。^①

1月初 被苏联遣送回国的梁干乔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成为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并在北平、香港、广州、武汉、苏州、哈尔滨诸城市建立分支。在上海设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史唐为首任干事长（后来继任者有张特、区芳、梁干乔等），委员有梁干乔、史唐、陈亦谋、李梅五、宋逢春、张特、陆渊，候补委员肖冰洋、区芳、唐月波、徐正庵。陆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徐正庵负责江浙地区活动；梁干乔负责华南的活动；区芳负责华南的宣传工作；陈亦谋负责华南的组织工作；宋逢春负责华北的活动；肖冰洋负责华北的宣传工作；李梅五负责华北的组织工作。

1月16日 发表“寸铁”十二则：《容安与共信》、《金箍棒》、《蒋介石也是共产党》、《武汉又多一个冤鬼》、《反共不彻底》、《国民党根本不要民众》、《一朝天子一朝臣》、《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是

^① 《布尔塞维克》第12期。

救国救民的呀》、《可怜的胡汉民》、《忠实同志又多一个》、《蒋介石也谈什么土地问题》、《吴稚晖识主》。①

1月30日 发表“寸铁”十一则：《逼钱与打战》、《杀穷人》、《两件肉麻的事》、《国民党是一种什么党》、《国民党的劳动立法》、《冯玉祥眼中的共产党与国民党》、《新学阀》、《反共始祖》、《险象丛生的国民党》、《请看中国的阶级与争斗》、《大元帅不是好做的呀》②。

2月6日 发表“寸铁”八则：《反革命的阶级》、《铲共还是铲蒋》、《国民党本来不过尔尔》、《拜金主义能救中国的穷吗？》、《殖民地驯服的奴隶》、《“第三国际之野心？”》、《啊！原来你们是革新党》、《太好了》③。

2月13日 发表“寸铁”七则：《欢迎改造博士》、《阿要难为情嘎》、《三民主义者的阶级观》、《三民主义者的阶级调协办法》、《三民主义者的交友与楷模》、《乱党》、《哈同花园与俄领馆》④。

2月20日 发表“寸铁”十则：《即是》、《忠实同志乎、叛逆乎？》、《是谁从中播弄呢？》、《国民党还能欺骗民众吗？》、《达尔文和马克思同时倒霉》、《运动民众与民众运动》、《国民党的理论与方法》、《谁是中国的国民革命者》、《无赖与有赖》、《“党人可杀”》⑤。

2月27日 发表“寸铁”四则：《上海工统会的饭碗快打破了》、《国民党人腐化的亲供》、《谁说国民党不要民众》、《威风》⑥。

① 《布尔塞维克》，第14期。

② 《布尔塞维克》，第15期。

③ 《布尔塞维克》，第16期。

④ 《布尔塞维克》，第17期。

⑤ 《布尔塞维克》，第18期。

⑥ 《布尔塞维克》，第19期。

2月 陈乔年被捕,解龙华警备司令部。6月6日,被杀害。

2月至4月 数次接待张国焘来访,对张提出的组织“工农党”,以摆脱瞿秋白的盲动路线,摆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领导的建议,“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同时提出种种困难,须慎重,后因盲动路线的结束,中央准备“六大”而作罢。陈独秀预料“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这种显明的盲动错误”^①。

3月 共产国际作出4月份在莫斯科召开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其中有一条是要求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等人去参加。4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任弼时传达了这个决定。5月开始各地代表陆续起程。6月中,多数代表到达莫斯科。

5月中旬 拒绝共产国际的邀请和中共中央的劝说,不赴苏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表示再不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可如往常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②。

春夏间 完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分(一)自序及说明;(二)北京话;(三)汉口话;(四)上海话;(五)广州话五部分,并分别请邓颖超、项英、沈雁冰、陆缀文、杨殷、罗绮园核校了各地方言。此稿后来卖给商务印书馆,但未能出版,为此胡适和赵元任等曾赠陈千元稿费,“维持了好久的生活”^③。

6月18日至7月11日 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65、367页。

② 同上书,第366、367页。

③ 《何之瑜致胡适的信》(1948年1月7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306页。

科举行，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盲动主义错误。大会批评大革命时期的右倾错误时，不仅批评了陈独秀，还批评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等。共产国际虽未作自我批评，但也认可了中国方面对其所派代表的批评并在组织上改变过去由外国人充任国际驻中国代表的体制，而改为中央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机构——中共代表团，以此来指导中共的工作。对于大革命时期右倾错误的责任问题，王若飞不同意有些人搞文过饰非，把错误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认为应该党中央集体负责。他在会上发言，批评了陈独秀领导的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同志的错误；同时，对他担任中央秘书长期间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他还提名陈独秀当候选人。瞿秋白在“六大”《政治报告讨论之结论》中说：“是否责任由他（指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功绩。现在只能说他个人做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10月 出席“六大”的云南代表王懋庭^①带回王若飞给陈独秀的信由郑超麟转陈，内容是“六大”情况，并劝陈不再消极。

出席“六大”的汪泽凯回国，向陈独秀报告了“六大”经过，劝陈与他们一起积极行动起来反对党中央。陈表示：“我不来，我

^① 王懋庭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在“六大”上发言时，曾为陈独秀的错误辩护（丁基实：《参加中共“六大”的回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1辑）。

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①。

秋 九、十月间，潜伏在莫斯科中国留学生中间的托派分子，在莫斯科郊外集会，正式组织起来，推举出一个干事会，安福为书记、王文元宣传、范金标组织，曾猛和卞福临为干事，李平和谢英为候补干事；决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高等院校的中国留学生中发展组织，翻译宣传托洛茨基的文章和托派文件，与国内托派组织及苏联托派组织建立联系等，到今年冬天，他们的成员发展到一百四五十人^②。

11月初 斯大林召见瞿秋白、张国焘，询及“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他这个问题

① “六大”后，瞿秋白、张国焘、王若飞被留在莫斯科。总书记向忠发，宣传部长蔡和森（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回国，但不到一个月，蔡因“六大”前的工作错误被撤职查办，不少中央委员牺牲、叛变、消极，李立三就由候补中委上升为正式中委，并任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在这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汪泽凯、郑超麟等人积极活动，企图怂恿陈独秀“为在党内争夺领导权而斗争”。

汪泽凯，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参与发起组织“少年共产党”，任执行委员。1923年秋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秋回国，被派往安源，任中共安源地委书记。后到冯玉祥国民军中做政治工作。1926年任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长。1927年参加中共“五大”，任江西省委书记。1928年出席中共“六大”，回国后被派往地方工作，不久离职回沪闲居。1929年与陈独秀等转向托派。

② 曾猛：《一九二八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中托派组织活动情况》（未刊稿）。《双山回忆录》，第83、92、102页。

安福，江苏无锡人，托派，1929年底被苏联查出后，流放西伯利亚，后回到国内，下落不明。

王文元，浙江海宁人，原为中共党员，1927年7月赴苏，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陈独秀去世后，与郑超麟结为“少数派”。全国解放前夕，成立“国际主义工人党”，任书记，随即逃亡香港、澳门活动。1975年去欧洲。

曾猛，浙江温州人，原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赴苏，加入托派。1929年回国，参加“我们的话派”，为该派候补中央委员。1932年10月，与陈独秀一起被捕。之后他写了悔过书。获释后到温州进行托派活动，建立温州托派组织，为中国后期托派培养了一批骨干。

似是判定陈独秀被中共“六大”排出中共中央之后，可能会采取反共产国际的态度。他所担心的是陈独秀有无能力另行办报或另行组党等——张国焘)张国焘答：“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他做了这么些年的著名的中共领袖，其他的社会关系早已断绝了，现在似乎没有人敢于支持他办报。……一般人看来，他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著名共产党员，因此，他之不能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是很显然的。”^①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425—426页。

1929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

五十一岁

1月初 苏联政府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国。2月12日,托洛茨基亡命土耳其。

4月16至23日 苏共中委及中监委联席会议,撤销布哈林《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主席职务。11月,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开除布哈林出政治局,给李可夫等严重警告。

3月至12月 蒋介石集团分别与桂系、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等各个军阀集团发生战争,并将他们击溃,战场遍及南方和中原各省。

7月10日 国民党破坏中苏协定,非法解除中东铁路苏联局长、副局长等人职务,并把他们驱逐回国。

7月至8月 托洛茨基接见记者并撰文,号召在中东路事件中,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称“我们拥护社会主义祖国,但不是拥护斯大林路线”,批判德法等国托派认为中东路事件是“苏联侵犯了中国的自决权”的观点。^①

12月3日 中苏签订“伯力协定”,恢复“中东路事件”以前的状态。

^①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313页,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4月5日 毛泽东在前委致中共中央信中批判了中央以城市起义为中心,忽视农村斗争的倾向,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建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

4月16日 中国托派“全国总干事会”创办中央机关报《我们的话》(油印、小32开本,报名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创办的同名地下刊物)。创刊词宣称:“我们要拯救工人阶级的自己的政党——消灭一切党机关的官僚化,指出国际及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政治路线和策略——使我们的党无产阶级化,使党的领导走上无产阶级行动的正轨。”从此该派被称为“我们的话派”。该派还办有内部机关刊物《反对派内部生活》,交流组织内部的情况^①。

5月至8月 通过尹宽介绍,从归国留学生托派分子王平一手中,见到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等文件,并与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反复学习、讨论,逐步接受托派主张^②, (一)关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责任——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和共产国际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 (二)关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党继续推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的路线; (三)关于国民党蒋介石上台后中国资本主义性质和国民党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 (四)关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低潮形势和国民会议的斗争策略——反对

① 有材料说《内部生活》是托陈派《无产者》的前身,是搞错了。

②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第71页。王平一,山东人,因尹宽曾任山东省委书记,与尹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加入托派,回国后曾在上海共青团中央经济斗争部工作,旋搞工会工作。1932年10月与陈独秀等一起被捕,无罪释放后,不久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解放战争时曾任国民党山东省社会厅长(一说济南市社会局长),后逃台湾,当“国大代表”。

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特别是农村武装斗争的路线；(五)以“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反对中共的“工农民主专政”。但对中国革命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以及“国民会议”问题的认识，陈独秀一直与其他托派有不同的认识。^①从此，在党内形成“陈独秀派”的托派小组织。

6月 中共中央举行六届二中全会，指出“最近党内发现了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小组织，这一反对派现在已成为帝国主义破坏苏联，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②“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它在目前中国党内理论水平低微与党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与党内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指导机关的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党的反对派。”^③

是月 托派“总干”发表《告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书》^④。攻击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及《红旗》上对托派的批判是表明党“已经抛弃了革命的立场，拒绝了改正错误的诚意，公开叛变了列宁主义，正在毁灭整个党的组织”；宣称其“一年来已经把自己的旗帜树立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呼吁“全党的同志，都一致站在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旗帜之下，勇敢的向机会主义者斗争！”

7月12日 中共中央发表“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

-
- ① 《郑超麟回忆录》本年谱所引《郑超麟回忆录》，均系其1945年2月完成的手稿。（日）中岛岭雄：《“中国的托洛茨基”彭述之同我的谈话》，日本《中央公论》1968年12月号。
- ② 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现在革命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18页。
- ③ 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组织问题决议案，同上书第31页。
- ④ 《我们的话》，第10期。

言”^①。

7月24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四十二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②。

7月27日 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发表宣言，号召工人、学生、店员、兵士执行共产国际决定，为纪念“八一”国际反战争的赤色日，纪念南昌暴动两周年，保卫苏联，拥护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在八月一日到马路上去示威。

7月28日 以“撒翁”的笔名致函中共中央，批评中央在中东路事件中“拥护苏联”的宣传“太说教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建议中央补发一个通告，取消四十二号通告中关于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会“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及“促成全国革命高潮”的说法。

某日 在家接受中共中央向忠发、周恩来的谈话，问：“照马克思主义说，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向答：“当然是农村支配城市！”周修正说：“理论是城市支配农村，然而……”^③。

8月1日 中共领导上海群众集会游行，遭血腥镇压，有四名工人领袖牺牲，数百群众被捕。此外香港、广州、厦门、天津、北京、奉天、哈尔滨等城市都有群众集会游行活动。

8月3日 中共中央复函陈独秀，指出陈与中央的分歧

① 《红旗》第31期，1929年7月17日出版。

② 《红旗》第34期，1929年7月27日出版。

③ 参见《郑超麟回忆录》及陈独秀1929年8月5日致中共中央的信。当时以毛泽东、朱德、方志敏、贺龙等代表的共产党人，利用新军阀的混战形势，农村武装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城市斗争由于敌强我弱及左倾的干扰，不断遭到失败，迫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农村，并逐渐摸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的道路。而陈独秀则相反，在8月5日的信中，他指责中央这种正在转变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不只是部分的策略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陈提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之误国政策”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如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批评陈“走上了资产阶级的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自然要反对‘拥护苏联’的口号”。

8月5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出版反托洛茨基主义特号（第36号）发表李立三的《反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的机会主义大纲》、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大纲》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脱离反对派的宣言》。编者按语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前两年是闹得很凶”，目前“已至末路穷途，从此终古”，“不料在中国党内竟”开始了它的“萌芽”，“必须严重的注意”。李立三在“大纲”中指出：“现在托洛茨基反对派其所以会成中国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严重问题，主要是由于过去机会主义的思想与他们汇合起来的原因，所以我们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时候，一定要同时指出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反对机会主义思想的残余，然后才能根本肃清反对派的思想。”

是日 给中共中央一封长信，贡献“一年以来慎重考虑”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后取得的“结论”，并要求在党报上发表，“以便公诸全党讨论”。这封信猛烈抨击中央“八七”、“六大”以来的路线仍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认为大革命之失败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资产阶级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并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封建势力已“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蒋桂等战争的性质“都是资产阶级政权之内部冲突”。批评中央对国民党政权和蒋桂战争性质的认识是“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与策略”。批评党内没有民主，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全党开展对党的路线的“争辩”。

8月7日 《红旗》第37期在《两个口号——误国政策与拥护苏联》专栏内，公布《撒翁（即陈独秀——编者）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1929年7月28日）和《中央答复撒翁同志的信》。

8月11日 复函中共中央，指责中央8月3日的信“对于我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反驳所谓“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误国政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的说法；说中央“把策略和原则混为一谈，这不是偶然的错误，乃是‘你们的原则’错误，……拿几个原则机械地死板地用命令主义蛮干，而不知道对于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有时间空间性的不同的活的策略运用之必要；这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①要求本信及8月5日的信早日在《红旗》上公布。

8月13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②，指出中央发现反对派“在党内与党外有他的秘密组织，有他的秘密的出版物”；“现在中国机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正凭藉着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反对现时党的正确路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号召各级党部及全党同志“严重注意”，“开会讨论，并须有决议回答”，“绝不容许”反对派破坏中国党的统一；对反对派的思想宣传和小组织秘密活动，除给以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不留恋地开除出去”。

8月20日 《红旗》（39期）出《两个口号——误国政策与拥护苏联》专号，刊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详细批评陈独秀来信的长文章《批评撒翁同志对于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并附《撒翁同志复中央的信（1929年8月11日）》，文章批评陈独秀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

^① 《红旗》第39期，1929年8月20日出版。

^② 《红旗》第43期，1929年9月20日出版。

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精神，与无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的观点和阶级观点绝对不相容的”，它“极有害于革命的斗争，有害于党对于中东路问题的整个的路线，必须给以严厉的批评，使全党的同志得到正确的了解”。此后，《红旗》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误国政策”口号的文章。

是月 中共中央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封信，报告六大后中央几次邀陈独秀赴莫斯科，陈几次允诺，但总是迟迟不行，上月他又答应将日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看阅研究一遍，于年后再赴赤都。同时陈却“写来这三封信，很值得中央注意。……我们决定将他的来信发表，公开的与之作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①。

8月24日 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被捕，30日被害。他们在狱中曾写信给中央：“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②

8月28日 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批评陈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再加上时局的紧张，中央不容许公布陈8月5日致中央的信。^③

①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第51页。该选辑发表此信时，注明日期为11月2日。但从信的内容和11月22日中央给国际的信看，应是8月20日。信中提到的陈独秀三封信，显指7月28日、8月5日及11日的信。中央原考虑将这三封信都发表，但后来考虑到发表8月5日的信，弊多利少，有了改变。11月22日中央给国际的信中说：“八月二十日曾由旅德谢同志处转上一药水长函，不知收到否。”如果在8月20日与11月22日中间，还有一封11月2日的信，那么问8月20日的信“收到否”，就应在11月2日的信中就问了。

② 周恩来：《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页。

③ 陈独秀1929年10月10日致中央的信。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是爱维尔特和里克尔特。

是月 与尹宽二人作为本派代表，和“我们的话派”的代表区芳等人谈判加入托派组织事宜，并要求“总干”提供材料，共同讨论问题。“总干”要求陈独秀派承认它的正统地位，分别地而非集体地经过审查，加入它的组织。陈独秀对此没有成见。彭述之则反对，认为他们都很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领导。双方谈判没有结果^①。

托派分子刘仁静、王文元、吴季严等人自苏回国。王、吴在党内隐蔽下来，分别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任干事。刘则向中央代表恽代英公开表示反对六大大会及中央的路线，并限期将自己的意见提到中央；然后，他在党外进行公开的托派活动^②。他回国时曾绕道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托亲自起草了中国托派政纲——《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纲领》^③，由刘带回中国。托还给刘起了“列尔士”（Lels）假名，委他充当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之间的“通讯员”。所以他回国后即以“老托代表”自居，调解“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关系。

不久，陈独秀在郑超麟家，约见刘仁静，听取刘拜会托洛茨基的情况及托氏起草的中国托派“政纲”；委托刘向“总干”表示：他将公开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派的理论和策略；提议双方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此议被“我们的话派”拒绝。

9月20日 中共江苏省委召开“支部干事会及中央、省委、区委各代表联席会议”，解决彭述之、汪泽凯问题。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在会上要求彭述之对各项重大问题表态。彭述之在会上作了三次发言，其内容：（一）认为陈独秀对中东路问题

^①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15期，1930年3月出版。

^② 中共中央致刘仁静的信（1929年12月29日），《红旗》第66期。《双山回忆录》第113、114、143页。

^③ 《中国革命问题》，第238页，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根本意思确是希望中央除一般主要的口号之外，还须有最切合群众，使一般群众容易了解的口号”，是对的；指责中央对陈独秀“过于夸张，过于吹毛求疵”。(二)认为陈独秀对于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是承认的，现在已不是机会主义者；而“中央一年来的政治路线，就是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继续”。(三)关于反对派问题，彭说正在收集材料，研究、考虑，“达到一定结果以后，……如果我是赞成反对派的主张，我便要公开地站在反对派的政治路线上奋斗”^①。(四)彭攻击党对国民党政权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观点是“机会主义”，“根本错误的”。(五)彭宣称“我们提出来的政治意见与中央的机会主义的整个政治路线不同，……此种‘对立’是没有不可以的”。并攻击党的铁的纪律是“废话”和“官僚们压迫群众的工具”。

是月“我们的话派”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区芳主持下，讨论通过了吸收陈独秀派的三个条件：一、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②

会后，陈独秀托列席“总干”会议的刘仁静向“总干”提议：陈独秀派以个人名义分别加入组织。刘仁静并提出召集“临时代表大会”，修改“二代会”政治决议案，改组“总干”，以吸收陈独秀、彭述之加入领导。二人提议均遭拒绝。^③

“总干”成员梁干乔因不同意“二代会”政治决议案中关于形

① 实际上，彭述之此时已完全赞成托派主张，但为了留在党内，充当“党内反对派”，他故意这样说。

② “我们的话派”致托洛茨基的信(1929年11月15日)，双山译《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16页。该书无出版单位及日期。

③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列尔士：《反对派统一运动的前途》(油印小册子)，《答我们的话派》，《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出版。

势和活动方式的观点^①，以及对陈独秀派的“三个条件”，抵制了“二代会”，并伙同张师与区芳、史唐、张特决裂。梁认为陈独秀等是“旧机会主义者”要求加入反对派是“阴谋”，“不要理他们”；“三个条件”是区芳、史唐“受了陈独秀收买”^②。

向刘仁静表示拒绝“总干”的“三个条件”，说：“我们的话派”组织内部不准自由讨论，我们加入无益有损，决定与彭述之等人自行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并通过决议，谴责“我们的话派”的“门罗主义”；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自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③、罗世凡^④为常委、何资深^⑤为秘书长；请刘仁静帮助起草纲领。他们“一面分头对上海本地的党员和外地来上海的党员进行宣传，

① “二代会”决议认为当时形势仍是反革命时期，梁则认为已经“复兴”；区芳认为托派活动在党内和党外同时进行，梁则主张主要在党内进行。

② “总干致梁干乔的信（1930年4月25日），《反对派内部生活》（“我们的话派”内部油印机关刊物）。

③ 马玉夫，湖北襄阳人，曾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加入“少年共产党”。后转莫斯科东方大学，1925年回国，在上海做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任江苏省委委员，参加“江苏”省委独立事件，事后脱离省委。与陈独秀等人一起转向托派时，曾把他联系的二个工人支部及一些工人，拉出党内，从而成了陈独秀的亲信、托陈派的领导人。1931年托派组织统一后，他因未被选进中委，到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并成为中统特务。

④ 罗世凡，湖南宝庆人，1929年受马玉夫影响，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参加托陈派。1932年10月，与陈独秀等一起被捕；抗战爆发后获释，回湖南，后病死。

⑤ 何资深（1898—1952），湖南安乡人，北京大学当学生时加入共产党，是何宝珍（刘少奇前妻）的哥哥。大革命时在湖南工作，做湘潭县委书记。1927年5月以湖南代表参加“五大”，会后任中央组织部干事。马日事变后，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长，旋继毛泽东后任省委书记。秋收起义时，任湖北特派员。后参加党的“六大”，历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山东省委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秘书长等职。1931年5月被捕，1937年获释后改名何之瑜。在江津国立九中教书，受北大同学会委托，照顾陈独秀生活。陈独秀去世后，成为遗嘱执行人，并负责整理编辑出版陈独秀遗著，《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等，大量著述整理后未及出版。解放前夕，参加郑超麟、王文元组织的《国际主义工人党》，当选为中央委员。

拿托洛茨基的文章给他们看；一面把原来的陈独秀派和新影响来的人编成小组，学习和讨论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在支部会议上，“就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同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党组织属于江苏省委领导——引者）和中央组织部派来的代表进行辩论”，并使一些支部“与党宣告脱离”^①。

刘仁静致函托洛茨基，表明反对“我们的话派”关于注重在党内进行反对派工作和不与陈独秀派谈统一的主张，并表示因此而要与“我们的话派”决裂^②。

夏 撰写《论中国革命性质》，以示在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时，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有所保留。文章结论说：“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即民主革命——引者），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总和。”^③

10月6日 中共中央致函陈独秀，指出其已经在政治上取与党对立的错误路线，组织上和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中央为此给以书面的警告！”“立刻停止这种活动。”并重申公布陈独秀的信“有妨害于对敌人的斗争”。“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并编入中央直属支部参加党的生活”。

10月10日 复函中共中央，指责中央“固执掩护错误的政治路线，……已深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向中央“作一次最后的警告！”说国际与中央代表的谈话是“政治上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要我做文章”（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引者）是“发狂闹

① 郑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国托派早期历史》，未刊稿。

②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5页。

③ 该文未曾发表过。刘仁静看到此文后，视为陈独秀们坚持“民主革命”和“工农民主专政”的“机会主义”立场的证据。参见1930年11月22日刘仁静致陈独秀的信和该年12月15日陈独秀的复信，《无产者》第9期。

笑话”。宣称：“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10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批判陈独秀8月5日的信“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决议在逐条批判陈信观点后指出：“这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决议特别谴责陈独秀“在未经中央决定以前，把他写给中央的信，自由在同志中间宣传”等“小组织行动”。决定：“一、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二、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三、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10月21日 江苏省委作出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并在25日举行的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上通过^①。决议

^① 《红旗》第52期，1929年11月10日出版。

蔡振德，陕西榆林人，曾就学于北京大学、莫斯科东方大学，是中共旅莫支部后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回国，随刘伯坚在西北军做政治工作，后到武汉参加湖北省委工作。1927年底到上海参加江苏省委。“独立事件”后，退出省委，旋与陈独秀等转向托派。1930年底，见托派没有前途，自谋出路，退出托派，投奔新任陕西省省长杨虎城，曾任《西京日报》社社长。后来据说作为杨的代表去新疆同盛世才谈判时，被盛所杀。另有一说，说他1933年参加马仲英军事冒险，进入新疆，死于战场。

指出四人“完全推翻了列宁主义的路线而走到取消主义的泥坑，中央所指出陈独秀致中央信中的一切错误，就是他们的共同观点，他们并且拿独秀的信来向党内作过宣传与活动的，……并且积极的进行他们小组织的活动，企图使党分裂；汪泽凯向毛泽民同志作反党的宣传，经过省委的警告，他不仅不能接受，而认为同志间应有的事。马玉夫在沪中的支部中，法南的支部里、外县的工作同志及上总的工作同志中进行他反党的活动，破坏党组织。蔡振德把独秀的信用复写纸写好，到同志中宣传，找省委的巡视员谈话。他们完全是有机组织的来攻击党破坏党，如敌人一样的向党进攻，这是列宁党的组织所绝对不能宽恕的。因此省委批准区委的要求开除他们四人的党籍，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

10月26日 与彭述之联名致函中共中央，称党目前的任务是向民众指出：“民众自己起来，为召集代表民众自身利益的国民会议而奋斗。”指责中央指出的“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的口号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党中央的政策是“盲动主义”“机会主义”的政策；“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经预先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宣告：“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

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托洛茨基派。”^①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三三三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5)第413页。

11月5日 刘仁静发表题为《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的小册子，宣布“我们的话派”和“独秀”两个团体的“统一运动”以“失败”而“告一段落”，认为这是因为在“对党的态度和国民会议策略”两个中心问题上，两种意见很明显的冲突。主张今后讨论这些问题，“先为思想策略上的统一，再做到组织上的统一”。

作为上述小册子的附录，刘仁静发表《评陈独秀同志双十日给中央的信》，认为陈独秀在接受“反对派观点”上有了进步，如批评了国际领导，承认了过去的错误，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民主政纲；但又指出陈“没有完全的站在反对派的观点上”，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还是新的说法，旧的内容”，如说“盲目的执行了国际的路线”，而不是“自觉的执行”；提出“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口号“将成为民主专政者之最后遁害”，等等。

11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指出陈独秀“八七”会议后及“六大”前后，屡次拒绝共产国际及中央决定，拒绝赴苏“讨论中国问题”及参加“六大”和“接受国际的训练”，“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地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我们的话派”致函托洛茨基，告诉他向陈独秀提出的“三个条件”，“他（陈独秀——引者）拒绝执行我们的要求，继续自己的独立活动，因此，我们认为陈独秀不曾脱离机会主义，我们决定象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那样反对他。”^①

^①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16页。

11月27日 《红旗》(第57期)发表慕石(即王明)文章《论陈独秀》,指出:“从中国共产党队伍中开除出去了的陈独秀,如果能幡然痛悔,安心做一做他自己所谓的‘改造中国文字’工作,那么,或不致于更进一步的走向公开的反动道路上去。否则,……不久的将来,或者中国一般社会上,又要轰传一个反革命的陈独秀!”同时公布:《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凯、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

是月 托洛茨基复函刘仁静,答复他的九月来信:“您说他们(指“我们的话派”——引者)反对陈独秀参加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为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自己分裂的。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我们与他之间,在过去的歧见(一九二四——二七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间没有事先的郑重考验,不可能统一起来。无论如何,现在就搞左派统一,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决裂,那是鲁莽的。”“恰好您自己就说陈独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是在R^①立场上的,并不与我们一致,可是这个问题却是基本的。现在与坚持‘民主专政’的人搞统一,便是不可饶恕的轻率。”同时指出托派“在党员内部进行工作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不能因此与“我们的话派”决裂^②。

12月10日 发表《告全党同志书》,逐条对中共中央开除他的理由进行辩解,宣称大革命的失败,主观上是由于共产国际制订的实行“党内联合”的机会主义政策,而自己则由于“认识不

① 即拉狄克,曾是苏联托派的骨干,但在大革命时期中共退出国民党及以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一直动摇,与托洛茨基有分歧。1927年被苏共开除后,表示悔过,承认“工农民主专政”等观点,1930年恢复党籍,因此,被托派视为变节者。后来,他又被开除,并在1937年“托布反党案件”审判中被判长期徒刑。

②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3页。

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深深的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地做了史大林小组织的工具”。同时猛烈抨击“现在的中央，忠实的依据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第六次大会的破产路线，执行上述的破产政策，把过去的机会主义和过去的盲动主义结合起来，以断送党、断送革命”。攻击中央已“无可救药”，煽动全党起来，“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12月15日 与彭述之、郑超麟策划八十一人^①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②，作为本派（人称托陈取消派）的“纲领”，并公开本派小组织，公开活动。《意见书》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是：主张将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将来的政权应该是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后要求恢复托洛茨基的党籍和领导工作，恢复中国党内被开除的同志的党籍，改组联共及国际与各国支部的领导，重新决定联共、国际及中共的路线政策等。

12月20日 中共江苏省委发出通知，批准上海沪东、沪西、沪南、闸北各区委支部开除郑超麟、刘伯庄、尹宽、李季、陈碧兰、杜琳、薛农山等人党籍，因他们对中央开除取消派领袖陈独

① 据郑超麟回忆，其中三分之一是虚构的假名，以壮大声势，实际只有五十几人。

② 这是九月份刘仁静根据托洛茨基提供的中国托派纲领帮助陈独秀起草的草案，再由陈独秀修改扩大而成的。这时刘仁静已与陈独秀闹翻，并攻击陈是机会主义向反对派投机的“政客”，因此，刘未在上面签字（列尔士：《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评陈独秀十二月十日的告同志书》及1930年3月16日发表该文时的附言，和《附答陈独秀》，均载《十月》第1期）。

秀、彭述之等“或始表示怀疑与借故反对，或公开破坏党的决议，而终则完全走上取消派反革命的道路，甚至有些分子秘密印刷传单咒骂全省二次代表大会与全党同志。”^①

12月22日 托洛茨基复函“我们的话派”^②，解答“国民会议”等问题，说中国将来工农胜利后的政府“必然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但目前的“中心政治口号，就是国民会议”。关于陈独秀，他说：“我很知道他在革命那几年中的策略是史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对刘仁静说的陈独秀趋向托派，表示

① 《红旗》第65期，1929年12月28日出版。

刘伯庄，四川人，曾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加入“少年共产党”。1923年回国后曾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兼共青团北京地委书记、团中央委员、党中央候补委员。大革命失败后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顺直省委“前委”书记，并参加了中共“六大”。1929年初参加江苏省委“独立事件”。1929年与陈独秀等一起转向托派。1930年任“无产者社”沪东区委第一任书记。1932年陈独秀等人被捕后，一度任托派临委书记。后来脱离托派，化名刘剑南，到北京民国大学教书。抗战初期与小同乡任卓宣编反共刊物《抗战向导》，病死四川。

李季，湖南平江人，北京大学学生，1921年随陈独秀到广州做教育工作，后留学德国和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大学教经济学。两湖农民运动掀起时，他回家躲在一个山庙里写《马克思传》，大革命失败后才写完，下山。1929年与陈独秀等转向托派，但对别人把他的真名列于《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不满，认为有害他的安全。后来他参加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以托派观点，论述中国的经济和历史。解放后曾登报悔过参加托派的错误。

陈碧兰，湖北黄陂人，彭述之的妻子。1924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1925年回国，初在河南工作，后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妇女部及上海市委工作，之后又随彭述之去武汉等地工作。同彭述之一起转向托派。抗战胜利后，主办《青年与妇女》杂志。1948年秋，彭述之建立“中国革命共产党”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后随彭逃亡国外。

薛农山，江苏人，1929年受马玉夫影响转向托派，曾负责“无产者社”法南区委工作。1930年进入“神州国光社”，任编辑。1932年陈独秀被捕后，另谋出路，投靠孔祥熙，做了特务。1933年进入《时事新报》社。抗战时随报社进重庆，任主笔，对陈独秀晚年生活有所照顾。后来又投靠政学系头子张群，曾任海外部部长。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搞对外贸易。

② 《反对派的内部生活》（“我们的话派”内部机关报）1930年4月25日出版。

“很欢迎”；但对“我们的话派”说陈还没有放弃机会主义，则表示“直至现在我还没有读过陈独秀任何纲领式的声明书，所以没有可能在此问题上发表意见”。信末提出他与斯大林分歧的十五个问题，作为衡量陈独秀和其他人“与我们是否原则上一致”的标准。

12月28日 刘仁静撰文《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①，猛烈抨击陈独秀1929年12月10日《告全党同志书》，说“独秀的主要原因是脱卸他过去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文章运用陈在大革命期间大量言行，证明其犯的错误是“透明(彻)的孟什维克主义”；而现在“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反执之愈坚”。文章论述陈在总结大革命教训和今后革命性质与策略问题的意见，与托派“政纲”“全不相容”，说其“假借反对派的招牌”，“实际是旧货贴了新商标”，变成“右派反对派”。声称：“我们最初对于陈独秀曾不乏幻想”，但“短期合作”后，发现他“离开革命立场，精神衰败”，“坠落成为一个失意的政客”，“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集合于他周围的……都是些欺诈失意的政客”；“我们应当丢掉他”。文章最后认为当前托派运动中有三条不同的路线：陈独秀为代表的“右派反对派的路线”，梁干乔为代表的“投降派的路线”^②和“我们”为代表的“左派反对派的路线”。

12月29日 中共中央致函刘仁静，指出他逾期已久，终不见把自己的意见提出，住处亦未告知中央，“又据王平一说你回国时经过欧洲，曾找见托洛茨基，并受托命回国活动，最近又以列尔士署名公布《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的文章，显然你不仅在宣传反对派的意思，且公开承认你在进行第二党组织……”

① 《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出版。

② 因为梁干乔认为当时革命形势是“复兴”，应取“进攻”策略，与党的观点相似，故曰之为“投降派”。

信最后要求刘三日内书面答复中央，公开表示对六大决议及中央路线、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如逾期再不回答，中央即认为你已经默认，根据以前事实作最后决定”^①。刘仁静就这样自动脱党了。

是月 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展肃托运动，中国学生托派组织头子赵彦卿交出二百多隐蔽的托派分子名单。

中共中央接到莫斯科的来信，信上说，八月间回国的同志多数在中大六月党员大会中被指有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活动的嫌疑。中央即向信内所指出的同志，分别发出通知，要他们负责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意见，以及是否参加反对派活动的情形^②。

是年 托洛茨基的经典著作《不断革命》完成，称他的“不断革命论”由相互联系的三个思想构成的：（一）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必然遭到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对，这样，单靠一国内部的力量，是无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只有主动把革命推行到其他国家去，从而激起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才有出路。（三）国际革命的不断性。摆脱一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孤立”状态的唯一出路是世界革命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

① 《红旗》第66期。

② 中共中央为刊登《由莫回国同志对反对派问题的声明》的按语，《红旗》第87期，1930年3月26日出版。

1930年(民国十九年 庚午)

五十二岁

5月 托洛茨基领导俄、法、德、西、比、美、奥，意等国托派首领组成托派国际——“共产主义反对派临时国际”(即“第四国际”前身)，指导各国托派运动。

1月5日 毛泽东致函林彪(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评那种不愿经过艰苦工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倾向，指出只有建立和发展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才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批评先争取群众再举行全国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的实情不适合的”。^①

3月至11月，蒋、冯、阎、桂中原大战，蒋胜。其间，9月，反蒋各派在北平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并决议“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打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0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针对反蒋派的策略，决定于1933年5月5日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

是年 全国红军和根据地利用军阀混战得到很大发展，红

① 本文表明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正在形成。文中批评的错误思想，也是当时托陈派反对农村武装斗争的思想。

军扩大到十三个军，约十万人，分布在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等十余省，三百多个县，建立了中央区、鄂豫皖区、湘鄂西区、广西左右江区等十五个革命根据地。

1月 刘仁静、王文元、宋逢春、董汝斌、陆梦衣、紫亮、廖麟、黄焦桐、黎白曼、周庆崇^①十人，发表《告同志书》，批判“总干”起草的“二代会”政治决议案与托洛茨基起草的中国托派政纲“全然矛盾”，是投降派的理论；反对陈独秀派加入托派，完全是为了地位，而不是出于路线分歧，“总干”内部的分裂也是如此。《告同志书》回顾了刘仁静与陈独秀派初期合作的经验，说“我们帮助他们走向反对派的道路”，并“本着试验的态度，进行反对派的统一运动”，“进行过数次正式的交流意见”，“发现了各种深刻的不同意见”，“帮助我们了解右派的政治面目”。同时还列数陈独秀派的错误是：“不彻底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保存自己的旧的小组织”，“否认中国在反革命时期内有议会制前途和主张人民自动召集（国民会议）的极左路线”，革命性质上“还主张中国革命须经过一个民主阶段”等。宣称“我们的责任是对他（陈独秀）作无情的批评”，“先由思想上策略上的统一，再做组织上的统一”。宣布“总干”已经死亡，拟集合同意的同志，共同发起“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

1月25日 刘仁静致函托洛茨基，抨击陈独秀仍然坚持“工农民主专政”等“机会主义立场，汇报他们与之决裂的经过，及

^① 《双山回忆录》上说，十九人签名在《告同志书》上，成立十月社的时间是1930年春夏间，不确。《十月》创刊于3月10日，其组织早已有。

董汝斌，又名董建平，陕西人，1925年赴苏，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参加托派，回国后曾为“我们的话派”华北地区负责人。

黎白曼，又名黎彩莲，武汉人，大革命失败后赴苏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久参加托派。1929年回国，参加短期党内工作，清理托派时被开除；1936年病死，被称为“中国托派中最杰出的女革命家”。

他们与“我们的话派”的争论，请示是非，此外还介绍了中共在上海组织的游行示威及农村游击战争的情况，攻击为“冒险主义”。

是月 梁干齐、张师“因刘仁静引起与陈(独秀)派合作问题之斗争”，与史唐、区芳决裂，自动脱离“总干”工作，并将“总干”所有通信处席卷而走(包括与托洛茨基的通信处)，断绝了反对派国内外的关系。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局”前身)将查获的《反动刊物共产党首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送交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处置”。“训练部在《审查报告》上批示如下：“这篇《告同志书》我们可以看出几点：一、陈独秀自去年八月即开始积极的作反中央工作。二、陈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动。三、陈开始在党内组织小组织。四、该党内部日渐分裂。”训练部与中央宣传部商定，由宣传部部长阅毕后，“再约中央各部会商办法”。^①

1—2月 设在莫斯科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召开“关于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讨论会，维经斯基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总结了中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探讨了陈独秀错误思想的发展，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和责任，批驳了托派的观点。他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他认为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方针是“正确”的，“我和中共中央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于没有理解这一指示要求将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的全部意义”，“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却估计过高”，因而“必然导致在革命的性质和动力问题上，并进而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采取孟什维克的方针”。他还说，起先，他对陈独秀的错误认识不足，“斗争不力”，采取了“调和主

^① 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义”的态度；后来，又在业已爆发的革命性质和规模问题上，同有“不正确的看法，以致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而中共“五大”后，还“让他留在领导机关，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一个很大错误”。这个发言，后来整理成《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一文^①，在同年《中国问题》（俄文杂志）第4—5期上发表。该刊编辑部在文后附言指出，维经斯基检讨错误的发言，“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后来，在讨论过程中，他修正了这些错误，承认同志们批评他的不彻底性是正确的。编辑部认为，维经斯基同志按照党的要求，改正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同时对鲍罗廷批评说：“他在当时犯的决非是小错误，后来他又多方掩饰这些错误，因而，编辑部对于鲍罗廷同志的沉默，表示惊讶。……作为一个党员，他的义务是，应当记得作自我批评的必要性。”

2月8日 中共中央将共产国际电报转给陈独秀，并要陈于一星期内给以书面答复。国际电报邀请陈前去参加国际“政治书记部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

2月21日 刘仁静致函托洛茨基，批判陈独秀等八十一人发表的“政治意见书”，并列举“我们的话派”种种错误，表示二者不能统一。^②

2月24日 托洛茨基回复刘仁静1月25日的信，称：“关于陈独秀派，因为这一派继续的站在‘民主专政’的主张上，换言之即对于最根本的问题站在史大林及马尔丁诺夫的主张上，这就决定了问题，假使陈独秀直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一所谓‘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在中国的作用是掩盖纯粹的孟什维克的政策，……那是很坏的；同他统一组织，全然谈不到，因为他的软弱，同

^①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58页。

^② 参见1930年4月3日托洛茨基致刘仁静的信。

他作实际的协定,是没有意义的。”还说:“关于陈独秀派的估量,‘我们的话派’比较的正确。现在这种不同的意见,已经消灭,因为你十分正确的对陈独秀派采取了完全不可调和的态度。”信中还同意刘仁静对乡村游击战争的攻击;要托派在党和革命群众中,描画这种战争“要可悲的陷于腐化与堕落”的“前途”。关于活动方式,信指示中国托派“不仅应当在思想上,而且要在组织上形成,在现在的状况下,自然,她的组织只能在党外存在。但是她必须伸张她的触须于党内。反对派的同志在党内工作的,以愈多为愈好,但是他们自然必须在反对派小组织领导之下进行工作”,“在原则方面应当保持完全不可调和的态度”。^①

2月27日 复函共产国际,断然拒绝国际的邀请,斥是“官僚的办法”,抨击国际五六年来指导中国革命“是站在官僚机会主义的路线上”,“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并赞颂托洛茨基预言正确。申言“关于中国问题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一)将来第三次革命的政权是工农民主独裁,还是无产阶级独裁?(二)目前的任务是直接准备武装暴动,还是提出过渡时期的政治口号(如国民会议)作民主的斗争?”“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②

3月1日 本派机关报《无产者》^③创刊,并撰《本报发刊词》,称:“本报的责任就在团聚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国

① 《十月》第2期,1930年7月15日出版。

② 《无产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出版。

③ 《无产者》报原是列宁1905年5至11月在瑞士日内瓦主编的一份地下秘密周报——俄国社会民主党(布)中央机关报。据郑超麟和王文元说,当时他们托派完全模仿列宁、托洛茨基十月革命前的斗争方式,主要是办一张报纸,宣传群众,推动革命高潮的到来;而报纸的名称,也多照搬,如《我们的话》、《无产者》和后来的《火花》、《火星》(托派广东区委机关报)、《斗争》等。托陈取消派从此被简称为“无产者社”。

际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领导之下,彻头彻尾地扫除现在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之机会主义的路线,盲动主义的策略及官僚主义的党制。”同时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论述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和策略,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是“走向逐步统一与相当的稳定”,帝国主义“都一致企图援助中国代表整个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之统一与稳定”,主张无产阶级应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极力要求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使之走向革命高潮,……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革命浪潮在两个浪潮中间”)和策略口号(苏维埃)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攻击中共中央从左的方面“消极抵制”国民会议;刘仁静等人则从右的方面“歌颂资产阶级民主政制”,“助长工人群众的幻想”。另外还在“杂碎”栏中发表《究竟是不是造谣》、《究竟是谁造谣》、《去年革了谁的命》、《好一个“绝对正确”的路线》、《无产阶级和谁来建立民主专政呢》等短文,对党中央在去年8月5日陈独秀致中央信上的几处短注,进行反驳,并对中央的路线及其“错误”进行抨击。

《我们的话》出版“反列尔士专刊”(第15期),批判刘仁静等人对“总干”的攻击是“谣言”,对国民会议有幻想,揭露刘与陈独秀派曾“开秘密会议反对总干”,批判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的立场观点“与我们完全不同”:(一)文饰自己的错误,说成是“盲从”;(二)坚持二重革命论的基本观点;(三)不赞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提出了“无产阶级贫农专政”,“与史大林派的‘工农民主专政’同一意义”;(四)不取消自己的小组织。总之,“陈独秀派简单的不承认我们的口号与策略,刘仁静则承认了我们的口号与策略,而曲解了她的原意”,二者都是迷信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主义者”,必须与之作“无情的理论之战争”。

《红旗》(第80期)发表赵醒民《我对于政治的认识和态度——脱离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声明》，表示：“幼稚的我，没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正确——六大——的策略，因而走上了极端错误的歧路。”

3月8日 中共中央决定摘要发表《由莫回国同志对反对派问题的声明》，这些人是鲍成美、汪耕新、袁凡、蒋先启、胡识因、金贯真、张颖新、濮得之(德志)、罗亚兰、黄烈文、恽雨棠、杨先择、王士秀、蒋德芳等十四人，他们都断然否认与反对派的关系，拥护中央六大路线，拥护共产国际与联共，坚决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中央表示：“从这些声明中，中央认为这些同志没有反对派嫌疑的正确证据。但中央很希望这些同志，不仅在书面声明上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更应当在工作过程中，努力执行正确路线，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①

3月12、15日 《红旗》(第83、84期)发表向忠发文章《陈独秀等之反革命的政治意见书》，批驳他们“加罪于共产国际”、“诬蔑党与群众”、“政治估计与策略路线”、“反苏联的阴谋”等方面的错误。

3月15日 刘仁静撰《答我们的话派》，批判区芳等伪造并公布“二大决议案”，在陈独秀问题上造谣，要求“总干”彻底承认错误。^②

① 《红旗》第87、88、89期。其中1月6日濮得之、张颖新夫妇的声明内容与事实不符，即他在莫时即倾向托派，并且发表声明后不久即加入了“十月社”。

濮得之，即濮德志、濮一凡，托派内部化名“西流”，安徽怀宁人，与陈独秀家是亲戚。早年留学日本、苏联，在苏倾向托派，与张颖新结婚。1931年5月濮当选了托派中央委员旋即被捕，张即他适。1932年春保释出狱后又与陈独秀一起入托派中央，同时出任招商局月刊编辑。1932年10月又与陈一起被捕。1938年陈入川，他去云南定居。陈独秀晚年与“西流”通信中，发表了重要的思想观点。

② 《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出版。

3月16日 刘仁静在发表《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时“附言”，^①批判陈独秀等八十一人声明在他帮助起草的稿子上“扩大了许多”，“没有一点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陈独秀巩固他过去的错误。”所以他拒绝签字。

3月22日 刘仁静撰文反驳陈独秀，说陈《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一文又重新表露陈的“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我们与史大林派争斗时，同时须更无情的肃清这些机会主义分子”。^②

3月22日 《红旗》(第86期)发表中共中央致何资深、张以森^③、庄季贞、陆沉^④、刘毅的公开信，指出在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的具名者有你们的姓名，“党站在政治立场，组织路线上，应调查这一具名，是否你们自觉的列名，抑系取消派的假借名义，望你们自登报日起在一星期内切实执行下列办法：如系被取消派假借名义，应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的文章限一星期内必须交到中央。否则党认为你们已自觉的参加反党的行动，党只有给予最后的制裁”。不久，这些人都会被开除出党^④。

① 《十月》第1期，1930年3月30日出版。

② 《附答陈独秀》，《十月》第1期。

③ 张以森，湖南长沙人，大革命前曾与母亲二人掩护过在长沙做地下工作的毛泽东，大革命时，在武汉曾为毛泽东抄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共“五大”时做秘书抄写工作。革命失败后，又与母亲二人掩护过湖南省委书记何资深，并与何结婚，后来与何一起转向托派。1931年5月，与何一起被捕。后来加入王文元、郑超麟的“少数派”。

④ 陆沉，原名卢斌，湖北黄冈人，早年与恽代英同为私立中华大学附中学生，后来到安源煤矿搞工人运动，任共青团安源地委书记。1925年春刘少奇离开安源以后，他任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嗣后调中共中央，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并帮助农运书记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务主任。旋到武汉，任中共湖北区委农民部长，湖北省农协委员长，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任江西省委书记。曾参加“八七”会议。1933年，投降国民党加入中统特务组织，并成为其骨干。抗战期间，被派到胶济铁路担任特派员，为中统进行武装活动，被人所杀。

3月24日 托派广东省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向“总干”提议：“誓死不同陈独秀派妥协，否则香港区全体同志脱离反对派。”^①

3月29日 《红旗》(第88期)发表问友(即中央宣传部秘书潘文育)文章《陈独秀不如中国资本家》，批驳《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对苏联的攻击和污辱。

3月30日 “总干”发表《给无产者社一封公开信》，列数“无产者社”领导者陈独秀“六大错误”：不勇敢承认过去机会主义错误；中东路事件中提出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口号；“对于群众运动(指罢工、上街示威等——引者)消极的倾向”^②；歌颂资产阶级政权的统一与稳定；“以为红军就是土匪，以为苏维埃就是流氓无产阶级”。公开信号召“无产者社”，要求犯了错误的领袖“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否则用组织的纪律去制裁他们”，“开除出去”，“解散分立的小组织”，“努力于全政治意见之反对派的统一”。

是月 “总干”发表批判“陈独秀错误”的“第三号政治通告”。^③

“无产者社”临时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总干”第三号通告。马玉夫、罗世凡明确表示同意“通告”观点，认为陈独秀在“保护苏联、目前革命形势之估计及对‘红军’的态度问题上，都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会议作出决议，要求“总干”系统地指出“无产者社”领导者的错误，以便提交扩大会议讨论。^④

① 广东省干致“总干”的信，载《反对派的内部生活》。

② “总干”认为陈独秀批判的中共盲动政策表现——“强迫罢工”、“命令示威”等都不是盲动主义，而是应该干的经常工作。

③④ 参见1930年3月30日总干《给无产者社——一封公开信》，《我们的话》，第19期，1930年7月30日出版。

刘仁静、王文元等创刊机关报《十月》，宣称“与史大林主义、投降派（指“总干”——引者）、右倾机会主义者（指“陈独秀派”——引者）作无情的斗争”，被称为“十月社”。“总干”作出开除刘仁静、宋逢春等人决议。^①

4月2日 托洛茨基致函中国托派，批评各派对于“国民会议”的争论“渗入了太多的玄学和甚至有点学院主义”，说国民会议能否实现，谁实现它和怎样实现它，“只能做种种假定”，指示托派用全力提出“国民会议口号，为它进行勇敢与坚决的斗争”，以此来“暴露”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政策必然破产”，使托派“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中的主要力量”和“首领”。^②

4月3日 托洛茨基答复刘仁静2月21日的信（并附4月2日致中国全体托派的信），要刘把陈独秀等八十一人的意见书“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得尽可能地完美确切”，还催促“十月社”与“我们的话派”实行统一。^③

4月5日 《红旗》（第90期）发表赵醒民批驳“我们的话派”诬蔑他的文章，承认自己由于意志薄弱，一年来陷于“合法运动”泥坑中，呼吁托派分子“赶快脱离可耻的取消主义的路线，回到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之下来”。此前，“我们的话派”宣布开除赵的党籍，并说“他的投降，在中国列宁主义者反对派中可算第一次”^④。

4月9日 《红旗》（第91期）发表李立三的《回答托洛茨基的问题》，驳斥托洛茨基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文中对中国红军运动的诬蔑。同时发表问友的《托洛茨基之取消中国革命

① 《反对派的内部生活》（之二）。

②③ 《十月》第2期。《怎样去统一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组织》（油印小册子）。

④ 《我们的话》第15期。

的理论》，批驳托洛茨基的中国问题大纲《中国政治状况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任务》。

4月12日 《红旗》(第92期)发表题为《陈独秀讴歌国民党的“稳定”》的署名文章，批判陈著《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

4月13日 撰写《关于所谓“红军”问题》，^①攻击中共中央领导人“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攻击红军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其前途不外是(一)统治阶级的内战一时停止，‘红军’便要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因自己内哄而溃散；(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或为他们的经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

4月16日 中共江苏省委在《红旗》(第94期)上发表给彭桂秋^②、段浩、朱崇文、刘静贞^③、王永庆的通知，指出在陈独秀等八十一人政治意见书中“有你们的名字。不知是你们负责签上还是取消派假借你们的名义？现特通知你们，务于本期红旗出版之日起，一星期内，都写声明书和反取消派文字交省委，以表示你们的真实态度。如果你们不声明，不做文字，则是你们自己有反党行动，省委当即执行纪律，给以最后的制裁。”结果，这些人 都被开除出党。

4月25日 “总干”分别致函梁干乔和张师，谴责他们自动

① 《无产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出版。

② 彭桂秋，又名彭仲文，河北保定人，在苏留学时与吴季严等接近。1929年回国后加入托陈取消派。1933年到桂林师专教书。1938年到重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处翻译。抗战后期在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当专员；胜利后回南京，在新闻局当专员。解放后向人民靠拢，做翻译工作。

③ 刘静贞，郑超麟之妻，云南人，原是中共党员，江苏省委组织部干事。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入狱后，她化名吴静如，任上海托派临委与南京狱中陈独秀之间的联络员。

辞职,席卷“总干”所有通讯处,造谣攻击总干成员,“客观上帮助了陈(独秀)刘(仁静)派”等六大错误,要求梁一星期内“声明改正”,否则“自绝于反对派”。

4月26日《红旗》(第97期)发表问友的《苏维埃区域与陈独秀》文章,批判陈独秀《关于所谓“红军”问题》“没有一句话不是反革命的”。

是月“无产者社”一些成员因生活困难等原因“气势消沉”,“心灰意冷”,“把一切事情都推到陈独秀一个人身上”;陈找到被党开除而离开“上海总工会”工作的何之瑜(何资深)任“无产者社”秘书,并着手对组织进行整顿。上海有一百一二十人,分为沪东、沪西、法南三个区,纱厂和码头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北京一个支部,香港到一九三一年春成立一个支部;成员中,老党员和知识分子占多数。^①

5月1日“我们的话派”召集“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梁干乔和张师在会上“不承认错误”,并提出“打倒总干”的口号,会议决议开除梁干乔和张师。

5月2日“十月社”就托洛茨基二月与四月来信(致刘仁静的信),作出决议,并写信给“我们的话派”,称在党内党外工作关系和国民会议等问题上,与托氏“完全一致”;承认“我们中有一部分同志过去进行了与陈独秀派统一运动,……已公开的承认了这种错误,而且事后在行动上更对陈独秀派做过无情的批评”;要求“我们的话派”的领导分子亦能公开的承认错误,解散“总干”,筹备全国大会,实行统一。^②

① 何之瑜:《关于陈独秀的托派活动》,未刊稿。

② 《十月》(旬刊)第2期,1930年7月15日出版;《怎样去统一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组织》(托派油印小册子)。

“我们的话派”就托洛茨基来信作出决议，并复函刘仁静等人^①，强调托信所说“关于陈独秀派的估量，是我们的话派比较正确”，称刘等已被“开除”，与其关系是“个人和团体间的，而不是两个组织间的关系”，“要求作‘两个’组织间的统一是完全错误的”，要求刘等公开声明承认错误，才能回到反对派组织中来。

5月7日 《红旗》(第99期)发表中共中央组织部致托派分子黎彩莲、叶英^②的信：“你们许久失了与党的关系，不自动的积极的找党，这是一种有意离开党的表现，中央不知你们住在何处，无法与你们发生关系。希望你们速设法将自己的地址交来，否则这是有意离党，党在组织上应给以最后的处分。”接着二人被开除党籍。

5月14日 《红旗》(第101期)发表中共中央《为开除吴季严、王文元、周庆崇党籍事通知全党》，指出吴、王在工作的过程中，“完全是取消派的倾向与行动，反对六次大会决议案，反对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中央屡欲以教育方法纠正，但他们始终不能觉悟。中央直属支部决议开除其党籍，中央已批准。但因他们的住址对党秘密，开除的通知无法送到。以后又发现吴季严列名于陈独秀等的政治意见书，王文元列名于刘仁静的告同志书，同时周庆崇拒绝工作，……列名于刘仁静的告同志书，中央亦决定开除其党籍。特此公布。”

① 《十月》(旬刊)第2期，1930年7月15日出版；《怎样去统一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组织》(托派油印小册子)。

② 叶英，湖北人，大革命时在武汉国民党军官学校女生队学习军事。革命失败后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加入托派，与王文元结婚。1929年与王一起回国，在党中央某机关工作。王文元入狱后，她与薛农山同居。抗战时又他适，在重庆国民党一个机关做事。

5月15日 李立三撰文批判陈独秀等取消派的“现在丝毫没有革命高潮的象征，只是统治阶级稳定，革命低落时期”的说法，是“帮统治阶级宣传的无耻的勾当”。^①

6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认为已经具备了全国各地大规模武装起义的条件，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从而，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中央。“决议”批判取消派陈独秀各派在政纲上（召集国民会议）行动上（勾结工贼，破坏罢工等），“都与改组派没有丝毫原则上的差别”；“我们从现在起，坚决的到群众中去肃清他们的影响，才能扫除他们反革命的危险。”

6月14日 《红旗》（第110期）以《红军与陈独秀先生》为题，发表易元（罗绮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被捕叛变）批判陈独秀《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说：“中国革命的舞台上，再也没有独秀先生的座位了，他的位置现在是介于胡汉民、吴稚晖、戴季陶、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之间，或者还不如。”

6月17日 “我们的话派”致函托洛茨基，申述不能和“十月社”统一的理由，并继续攻击陈独秀派的机会主义。

是月 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指示中共“应该揭露陈独秀派与托洛茨基派的反革命的工贼作用，使他们想与群众组织发生联系的企图不得成功”^②。

在“无产者社”召开的代表会议上，作《关于中国左派反对派过去及目前工作》的报告。会议决议“宣告完全同意于托洛茨基

① 《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14期。

②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集，第130页。

同志所指出关于中国革命过去失败的教训、未来的前途及目前的政治形势之分析、并决定以他所作国际纲领草案的批判、第六次世界大会后之中国问题及中国政治状况和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的任务等论文,作为我们斗争的基础”。决议在阐述形势,抨击中共的“机会主义”后,指出了领导群众作防御的斗争,整顿内部组织,培养工人干部,除上海外,在广东、武汉、天津、青岛及东三省各工业中心区域发展工作,与托派国际建立经常关系等八项重要工作。^①

7月2日 《红旗》(第115期)发表关向应文章《同路人的叛变》,批判托陈取消派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在阶级斗争不剧烈的时候,他们是我们的同路人,但在革命决斗的紧急关头,他们就叛变”。

7月3日 “十月社”全体大会作出决议,就刘仁静在批判陈独秀过程中宣扬“一九二三年一部分同志(张国焘、刘仁静等人——引者)主张加入国民党而对国民党怠工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错误观点,要刘“坦白地承认错误”^②。刘声明服从大会决议,但会后又拒绝承认错误,旋于19日被“十月社”开除。^③

7月5日 《红旗》(第116期)以《论红军的前途——复陈独秀》为题,发表署名文章,批判陈独秀攻击红军是“土匪”、“流寇”的观点。

7月17日 妻高大众在安庆去世,享年53岁。

7月27日 中共中央命令红军(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进

① 《无产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出版。

② 《十月社声明》,《十月》(旬刊)第2期。陈独秀及其他托派皆认为不应加入国民党。

③ 《十月社对刘仁静同志的决议》,《十月》(旬刊)第2期。刘在19日大会上声明“与十月社脱离关系”“十月社”则声明刘仁静以后一切言行“与十月社无关”。

攻长沙，28日乘虚攻占，8月5日被迫退出。

8月9日 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发表致中央委员会转全党同志的信^①，抨击中央6月11日决议，认为“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把党的中心工作更进一步的转入农村，希图在农村中另行组织一种力量，以闯入城市”。同时攻击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坚持的农村武装斗争，是“企图拿乡村来领导城市，拿‘红军’来作攻打城市的救世军，这不是领导革命，这只是跟在农民意识的尾巴后面去作军事冒险”。要求党接受托派的国民会议主张，注重城市公开的民主斗争；呼吁全体党员自动起来向领导机关“抗议”，“要求它立刻停止一切军事投机的冒险举动”。

8月22日 托洛茨基分别复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赞扬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当我们有了象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象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青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托还对刘说：“我怕我这里的陈独秀的地址不能用。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读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给双方的信还认为各派“并没有纲领上的战略上的分歧意见，有些细节上的歧异，这些歧异，你们（指“我

^① 《无产者》第3期，1930年10月10日出版。

们的话派”——引者)和刘仁静都拿来异常地夸大了。我决然看不出所有这三派有什么各自分立之理由”。信严厉批评“我们的话派”“要其他两派都须向你们承认错误，然后你们允许他们加入你们的组织……这种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们的特色”。“我无论如何是不同意的”。最后要求三派加速统一：“共同拟订一个简短的统一纲领，并依照人数为比例，召集一个统一大会。”^①

8月31日至9月4日 由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的红一方面军再次进攻长沙，屡攻不克，遂转进江西开辟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9月1日 托洛茨基复函“十月社”和“陈独秀派”，称：一、国际局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因为我们所有的材料未证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严重的纷歧意见。二、因此任何中国左派反对派的那一派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国际左派反对派的代表以反对另外的派别。三、对于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们曾接得译成英文的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同志公开信。在这信中，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因此我未看出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的称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为右派的理由。

是月 托派“临时国际”书记局（托洛茨基等各国托派首领签名）发表《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并寄到中国，系统地重申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各种问题的立场，催促中国托派小组织早日统一。

^①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23页；《建立》（中国托派少数派机关报）第1期，1947年5月出版。

9月24日 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在上海召开,批评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停止了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从而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对全党的统治。但是全会决议又认为李立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决议还肯定党与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并“把他们清除出去”是正确的,指出党内有托陈派残余“暗中活动”,“甚至于形成整个路线”,必须坚决肃清。^①

9月29日 “十月社”和“我们的话派”的北方区组织接到托洛茨基来信后联合成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派)”,“提议在最近期内各派派一代表开一座谈会。决定协议委员会的组织方法与日期”;声明“我们没有认整个无产者社为左派反对派,因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是那起领导作用的陈独秀同志,在许多重要问题上还没有与左派反对派的意见一致。”该“提议”在列举了陈独秀在革命性质、政权、国民会议、红军问题、中东路问题、机会主义错误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后表示,希望“独秀同志能诚恳地改正现在那种非反对派的观点,能坦白地承认“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②

秋 赵济、刘胤、王平一等七人,组成又一个托派小组织,出版《战斗》刊物,被称为“战斗社”。他们成立组织,与上述三组织没有观点分歧,只是“到时在统一商谈中及统一组织中我们也可

① 参见《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关于政治情况和党的总任务的决议》、《中共三中全会告同志书》。

② 《接到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后我们对于统一的提议》,《十月之路》(中国左共同盟反对派机关报)第1期,1930年10月26日出版。

占一位置”。^①

10月1日 就蒋冯阎战争结束，国民党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发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对于时局宣言》^②，认为“国民党会议变相的国民会议即使实行召集，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不能为民众保障任何利益”。为此，宣言提出“要求由直接平等普遍不记名投票而产生的国民会议”；“国民会议召开前的选举中，任何党派应都有公开的召集会议演说、发表政见、竞争选举之无限制的自由。”

是月 “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和“战斗社”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派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③，商定协委工作（一）起草统一政纲；（二）筹备统一大会。王文元为协委起草了《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声称“第三次革命一开始

^① 赵济：《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2期。

赵济，云南大理人，原是中共党员，在广州做党的工作，联络广东省委与党中央。北伐时，在唐生智三十六军中做政治部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去苏联入东方大学，接受托派观点。1929年回国后，一度在党内工作。这次，他自任“战斗社”书记。1931年托派统一后，任托派中央组织部干事。1933年以后，曾参加托派临委。抗战爆发后，回云南。1942年托派分裂时，站在“少数派”一边，并同意以云南托派组织名义，参与筹建1949年的托派“国际主义工人党”。

刘胤，又名李建华，笔名李麦麦。湖北武汉人，大革命时期曾在武汉做团的工作；失败后去苏联入东方大学，接受托派观点。回国后曾翻译考茨基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书，卖稿给樊仲云、陶希圣办的新生命书店。1931年5月托派中央被破获后，他投降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并由陶、樊介绍，进复旦大学讲课。

“战斗社”的其他成员王平一、徐乃达、解叔达、闵荫昌都是莫斯科留学生，来燕堂未去苏，这五个人，后来也都加入国民党中央组织，成为搜捕共产党人的打手，也搜捕托派首领。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被捕，就是这些人所为。

^② 《无产者》第4期，1930年10月30日出版。

^③ 参加协委的各派代表是：“无产者社”：吴季严、马玉夫；“我们的话派”：区芳（后改为梁干乔），陈亦谋；“十月社”：王文元、宋逢春；“战斗社”：赵济、来燕堂。

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一切未解决的民主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中附带地完成”，“要严厉地批评含义模糊的口号——‘无产阶级与贫农的专政’”。这些都遭到“无产者社”的反对。

共产国际执委致函中共中央，认为中国还没有“真正的红军”，“没有苏维埃政府”；指示中共现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准备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建立坚强的政府以及在非苏区方面极端努力地组织群众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批判李立三“说中国已经有在全国范围内成熟的革命形势，并且说这样的革命形势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成熟了”，以及“说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一定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刻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的托洛茨基观点，指出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路线。

11月10日 发表《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就十月革命十三周年纪念，抨击斯大林在列宁死后对内对外采用的“机会主义政策”，大声疾呼：“十月革命已处在危险之中，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已接近一个危机的时期，应该加紧一切努力以重新树立十月革命的进程！”“首先就是要改换苏联共产党及整个共产国际之现在领导的路线……”。

11月12日 “无产者社”给“协议委员会”转“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斗社”全体同志一封公开信^①，提出统一“必须建立于政治原则的完全一致与群众的完全一致上面”，在策略上的不同意见也要“分清谁是谁非”，要求三派发表声明，放弃过

^① 《无产者》第6期，1930年11月25日出版。据郑超麟、王文元回忆，此信是彭述之操纵马玉夫、吴季严背着陈独秀搞的，旨在阻挠即将到来的托派组织的统一。彭述之因有感于其他三派青年托派对他没有好感，不会在统一组织中奉他为领袖，所以千方百计破坏和延宕统一。

去批评陈独秀时发表的错误意见及“机会主义”、“右派”等“错误成见”，要求“总干”检讨自身分裂及随意开除人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等。

11月20日 “协委”就“无产者社”的公开信发表第三号通告《协议委员会对于无产者社来信的决议》，不同意讨论策略问题求得一致意见后再实行统一，坚持“同时进行政治讨论与准备大会”的原则，主张为了“迅速召集大会以完成统一起见，不得不提高协委本身的职权，取消各派机关报，停止各派领导机关的活动，混合各派组织”。

11月20日、22日 刘仁静两次致函陈独秀，并附两篇文章（《对政纲草案的意见》、《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①，要求在《无产者》上发表，以对去年发表的《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作“极大的修正”。信中强调“过去我们间的争论，已由老托来信解决，我完全承认老托之正确”，“完全同意”陈独秀对统一运动之态度及对于革命性质之估量，以及十月一日对于时局的宣言；声称与陈“已没有重要争论”，过去争论有些是“说法不同”，甚至“完全是基于误会”，“现在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意义”。“因此，我要求加入你们的组织。”两篇文章抨击王文元起草的“政纲”及其中“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意见”，提议“改组起草委员会”，由陈独秀、区芳“直接参加”，“重新起草政纲”。

11月24日 “我们的话派”召开全上海积极分子第二次会议，并作出决议^②，认为“统一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应即刻免除组织的成见，开诚布公地努力促成统一，在最短期内，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区芳也发表文章^③，承认过去反对陈独

① 《无产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出版。

② 《我们的话》第22期，1931年1月6日出版。

③ 《谈谈统一问题》，《我们的话》第22期，1931年1月6日出版。

秀派等不良倾向的斗争有错误，就是“神经过敏”，采用了“对待敌人的方法”，提议“犯了错误的同志应该为了反对派的统一，放弃自己的观点”，“加速召集代表大会”。

12月15日 复函刘仁静，赞扬刘上月20日及22日的信有“可惊的进步”，认为“现时已距统一不远”，劝刘“不必加入‘无产者社’”。说过去的争论是“咬文嚼字”，“本来不十分重要”。“所以我始终取了沉默的态度。”但声明与刘仍有不同意见：（一）不同意刘的“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形式”的观点，说刘“对国民会议本身性质始终都没有正确的认识”；（二）去年未发表的关于革命性质文章中的观点有了发展，认为“不必机械地以十月代表社会主义革命，以二月代表民主革命”，因为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在十月革命初期才“彻底完成”，“你现在赞成我以前二月十月之和的意见，以为中国下次革命的初期还要经过二月，我倒不赞成了。”^①再次论证“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批评协委纲领起草人王文元至今还认为此口号是“反动的或含义模糊”的观点，这是诬蔑列宁和托洛茨基。最后望刘仁静“对统一运动特别努力，以弥补过去的缺陷”^②。

12月20日 王文元发表《关于政纲上的两个争论问题》，认为起草反对派政纲草案只需把1929年6月托洛茨基起草的政纲“更系统地抄录一下，再增一些最重要的争论问题”，而“不必用‘自己新的意见’来‘创造什么更漂亮的政纲’”。坚持“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批驳刘仁静、陈独秀的观点；坚持认为“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口号“含义模糊”，因为

① 陈独秀这时认为中国下次革命如十月革命，整个的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但从解决民主任务开始。

② 《无产者》第9期。

没有说出谁是“领导者”。^①

“十月社”答复“无产者社”的公开信，承认以前将“策略上”的不同解释，“夸为原则的不同”，“不承认整个无产者社是反对派”是错误的。批评所谓“政治一致与群众一致”的原则，坚持现在就应当“取消各派指导机构及各派机关报”的立场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名称。^②

12月28日 刘仁静撰《反对派统一运动之过去与未来》，总结一年来托派统一运动，“首先是我们的话派使用史大林的方法，准备反对派的分裂的基础，其次是十月社开始夸大争论，加深此种分裂”。批评“梁干乔是一个组织论者”，“在政治上没有原则，只是想在组织上如何占得优势”；“王文元是一个玄学大家”，“时常表现出动摇，没有原则”；赞扬“无产者社”“很少参加那种玄学的争论，而且他所发表的许多文件，比各派更能应用反对派的主张于政治分析，这是它的功绩方面，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却带着一种保守的倾向……直到最近才显然改变态度，积极为实现统一而努力”，“将使统一迅速实现，这是值得庆贺的。”^③

12月29日 刘仁静复函陈独秀，认为“关于过去争论问题，有许多不是实际的问题，这些争论的结束，以愈早为愈好”。解释“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不过是“临时以譬”，“说明落后国家民主主义由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的意义。既然这种说法不能代表我的内容，则我当然是取消这种说法而保存其内容。”^④

是月 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名义，发表《为国民会议

①② 《十月之路》第2期，1930年12月20日出版。

③ 《明天》第1期，1931年1月1日出版。

④ 《明天》第1期，1931年1月1日出版。

运动告民众书》。^①

托派国际致中国各个托派小组的信到达中国^②，指出各派争辩“都是关于次要的问题”，并说“我们读到陈独秀给中共党员的公开信（即1929年12月10日《告全党同志书》——引者）都很愉快。我们相信这个宣言表示对国际反对派的充分同情，不但可能并且绝对需要和其他两派合并起来”。

是年 曾托高语罕送三本托洛茨基言论集给朱蕴山，望朱加入“无产者社”。朱说“我不参加”，并让高将书还陈，嘱陈也不要搞“托派”这个名堂。认为陈是中国共产党的“开山书记”，宜慎重；苏联和国际的事，我们弄不清楚，冒然卷入是非漩涡，很难拔出。陈不听所劝，从此，陈与朱不谈政话，只有私交了。^③

下半年，搬进熙华德路一幢石库门房子里，结识潘兰珍，旋同居^④。

① 《无产者》第7期。

② 此信草于9月12日，由巴黎转辗抵达中国已是年底。《无产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出版。

③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未刊稿。

④ 潘兰珍（1908—1949）江苏南通人，出身贫农，从小随父逃荒到上海，进英美烟草公司当童工。后来受人欺骗，生过一个小孩夭折，独居上海熙华德路一幢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里。陈独秀则住在同一幢房的前楼。两人朝夕隔楼对窗相望，产生感情，后同居。但陈一直未告诉她自己的真姓名和身份，只说是姓李、南京人。陈教她识字读书。1931年，潘听人说楼上亭子间里住着一个“老西”（即共产党），陈听到此消息后，即在郑超麟的帮助下，搬到周家嘴路一条弄堂底的裁缝铺前楼居住，后又迁岳州路永吉里十一号居住。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时，她因生活上事与陈争执，赌气跑回娘家。当她从报上看到陈被捕的消息及照片时，才认识他是陈独秀。这时，虽然陈独秀劝她另谋出路，但她毅然负起了照顾陈狱中及出狱后生活的重担。1949年病死。

1931年(民国二十年 辛未)

五十三岁

1月7日 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陈绍禹)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取得了领导地位，在党内开展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造成党组织的极大混乱。

1月31日 国民党南京政府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等，并规定由军事机关审判。

4月至5月 蒋介石纠集二十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被粉碎。

5月5日至17日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包办的“国民会议”在南京举行，通过为蒋介石独裁统治服务的《训政时期约法》。约法规定“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约法”的解释权由国民党中央行使之，等等。

7月至9月 蒋介石纠集三十万兵力，亲任总司令，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被粉碎。

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张学良东北军奉行蒋

介石“不抵抗”命令，使日军很快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九一八”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怒潮。

9月22日 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谴责日帝侵略，号召“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

国民党政府把中日事件诉诸“国际联盟”。“国联”在英法帝国主义操纵下通过两点决议：（一）停止一切冲突；（二）双方撤退军队。公开袒护日本。

11月7日至20日 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被选为共和国主席。

12月 “九一八”后，国民党各派军阀和政客利用人民抗日反蒋怒潮，打击蒋介石集团。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提出解除蒋的兵权和主席职务等为条件，取消广东“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统一”政府。国民党政府发生统治危机。15日，蒋介石被迫下野，汪派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林森代理主席。

12月17日 国民党代表在“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的卖国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各地学生代表在南京示威抗议，国民党派大批军警在珍珠桥附近屠杀镇压，造成震惊全国的惨案。全国人民在反日反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及追悼“一二·一”被杀学生的运动中，捣毁了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上海、北京、汕头的国民党市党部，山西、浙江、陕西的国民党省党部和江阳县党部等，喊出了“打倒国民党”，“革命民众组织自己的政府”，建立“民众政权”的口号。

1月1日 刘仁静见拒于“无产者社”，一个人成立“明天社”，创刊《明天》（油印刊物），发表《反对派统一运动之过去与未

来》及他1930年12月29日致陈独秀的信等。

1月8日 托洛茨基复函中国各个托派小组织，解答各个争论问题：“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起初就是错误”；“‘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口号，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相冲突，而只是补充这个口号，并使这个口号通俗化”；赞扬陈独秀在81人声明中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完成和胜利，只有依照十月道路，才可以达到的观点“完全正确”。“将‘红军’同土匪混为一谈……是应该纠正的，革命的农民武装队，自然有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和职业的土匪加入，但整个运动则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国农村条件里头”；“国民会议”能否实现等问题是“猜谜式的问题”，“没有任何可能，来预先猜测事变在实际上究竟怎样进行”。再次强调：“我确定地相信现在进行统一的诸派别间果然是完全没有原则分歧的。”呼吁：“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①

是月初 应尹宽之请，到尹家听取关于彭述之操纵马玉夫、吴季严破坏协委统一工作的情况，恍然大悟，表示坚决鄙视内部组织上的阴谋诡计。从此，开常委会（无产者社）时，就吵架：陈独秀、尹宽、何资深赞成统一，彭述之、马玉夫反对统一。陈独秀并坚决主张召回协委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与尹宽代替之。^②

先后找“我们的话派”代表梁干乔和“十月社”代表王文元谈话，表示：“统一是中国反对派的绝对必要。如果不统一，则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艰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则‘老人’太多了。”谈话后，正式撤回马玉夫、吴季严，由自己和尹宽出席

^① 《中国革命问题》，第234页，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② 参见《郑超麟回忆录》。

协委。此举使王文元等人深为感动，从此统一运动顺利进行，大家推举陈独秀写“政纲”与土地纲领，尹宽起草职工运动决议案，梁干乔起草组织决议案。^①

1月20日 主持“无产者社”执委会议，讨论托派国际9月12日来信，并重新确定“无产者社”对“统一工作”的根本态度，向其他三派发出《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②，认为过去各派对于左派反对派根本原则的解释和目前政治问题的观察“确有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但不能做为“分裂的理由”，“因此我们应取消‘算旧帐’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认错误的办法”。主张各派乘中共中央因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路线”而“陷于完全破产”之机，“迅速统一起来，以集中力量并建立反对派在群众中的信仰”。“以最简捷了当的手续完成统一工作，……立即开始作召集统一大会的准备，政治、组织、职工、农民等决议草案的起草委员会立即开始工作。”

1月21日 撰《国际路线与中国党》^③，就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激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认为“国际现在的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并没有甚么原则上的不同，和他自己以前的路线也根本没有两样；“站在盲动的国际路线上反对盲动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有使党比立三时代更加混乱无出路。”

2月5日 主持“无产者社”常委会议，讨论并决定将上月执委会关于统一问题的决议，以“常委”名义向“无产者社”各支部发出书面通知——《第六号通告：反对派统一问题》^④。该“通

① 参见《郑超麟回忆录》和《双山回忆录》第159页。

② 《无产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出版。

③ 《无产者》第10期，1931年2月1日出版。

④ 《无产者》第11期，1931年2月30日出版。

告”以四比一（彭述之反对）通过。它叙述了“协委”前段工作，肯定了“无产者社”代表“打消”别派提出的“承认错误”和“统一大会前取消各派组织和机关报”的提议的做法，同时指出，“我们无产者社当中，也有人在国际所示的办法以外，提出了枝节问题……要统一须以无产者社为中心。”宣称有关纲领的理论问题和大会名称（即统一大会而非“第三次大会”），必须认真讨论，争持到底，但不能把别派某些个人的不正当倾向夸大到整个组织的倾向，而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

2月15日 撰《告全党同志书——立三路线与国际领导的破产》长文^①，并以“中国左派反对派统一协议委员会”名义散发，抨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小组织在米夫的帮助下，把“立三派”和“秋白派”均打下台，把罗章龙开除党籍，“这是共产国际分裂中国共产党的阴谋”。文章逐条对照“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指示后，“向全体党员同志宣布：共产国际之宣布‘立三路线’完全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破产，‘立三路线’的错误，根本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并攻击“重视农民作用的路线”，“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典型思想”。建议“规定日期召集全党的代表大会，对于政策及党制，加以根本改变——必须完全采取左派反对派的路线”；“我们应当选举代表参加大会，并且在会上讨论左派反对派恢复党籍问题，我们得立刻回到党内来。”

2月30日 发表《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②，说读了托派国际及托洛茨基“来信中的呼吁，使我惭愧无地”，“若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还未能迅速统一起来，“这已经是罪恶了”，“若不痛改前非，若仍旧要搜索枯肠……来阻碍统一，这是罪恶

^① 油印小册子，据何之瑜的《独秀著作年表》所列，系陈独秀起草。

^② 《无产者》第11期。

之罪恶。”“我个人是彻头彻尾赞成国际意见的”，“我从来不愿意把真理捧在一边，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棍’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呼吁：“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迅速实现统一。

发表《我们为哪样的国民会议而奋斗》^①，抨击国民党的《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和《紧急治罪法》。

刘仁静以“明天社”的名义，要求加入“协委”与各派平等协商统一问题。“协委”研究后，由陈独秀向刘转告答复：“不承认明天社为左派反对派的小组织，只许列尔士个人随时贡献意见”，并指出刘仁静过去的意见“与国际矛盾”，“是极可怜可笑的”，“必然归于失败”^②。

3月2日和13日 刘仁静两次以“中国共产主义反对派（明天社）”的名义致函“协委”^③，对陈独秀转述的答复，表示“无上之惋惜”，攻击陈独秀起草并由“协委”八人签名通过的政纲草案是“极左与极右之混合物”，只能代表“上层的统一”，要求交下层讨论并译寄托派国际，统一大会应推迟到讨论总结及国际来信后再开，否则要求列席统一大会。

3月15日 发表《中国将来革命发展的前途》^④，声称与“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在革命性质上的争论点，“不是否认中国将来第三次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定论”，而是“引起将来革命的因素是什么”，“是否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是否在最初阶段还会经过民主时期”，“在什么时候踏上社会主义政策的

① 《无产者》第11期。

② “明天社”给协委的两封信，《明天》第4期，1931年3月25日出版。

③ 同上。

④ 《无产者》第12期，1931年3月15日出版。

道路”等等。认为“民主任务仍然是能够引起将来第三次革命之因素”，“将来革命高潮之最初阶段中会有很短的民主时期和两重政权之可能”，“在革命暴动之胜利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一开始，即应和完成民主任务同时，踏上社会主义政策的道路”。结论是：“中国的革命，是以民主要求开始，而以社会主义终结。”

4月7日 托洛茨基致函陈独秀，热烈夸奖陈在《无产者》第一期的文章，说：“我很想学习中文，单单为了能阅读你关于中国经济的作品，我就该学习中文”；并说由这些文章见到：“尽管中国革命遭到了溃败，而马克思思想却依旧活着，而且在发生作用。”最后要求陈给他写关于中国“反对派的目前情形”的“详细的来信”^①。

是月 王文元发表《我们的不同意见》^②，认为陈独秀《中国将来的革命发展前途》一文总算在关于“革命性质”混战中“规定了范围”；声明过去的争论是“文字的挑剔”，指责是“刘仁静作俑”，现在“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对资产阶级及其民主主义的态度与策略不同”；抨击刘仁静把“国民会议”作为“奋斗目标”，“实际上是一贯的民主主义者的思想。”

5月1日至3日 在上海大连湾路王芝槐^③家参加四个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作关于起草《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的政治报告。“纲领”分：（一）过渡期中反

① 双山译《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42页。译者注：陈独秀未曾有过专门的经济著作，这里指的“经济的作品”可能是文字隔阂而引起的误会。据编者考查，信中指收到“第一卷”，从时间上看，可能是指3月1日出版的《无产者》第1期；陈的作品可能是指《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

② 《十月之路》第5期。

③ 王芝槐，铁路工人，中共党员，被马玉夫拉入托陈派小组织，曾任“无产者社”沪东区委委员。1931年5月被捕，后来获释后离开托派，去正在建筑的浙赣线上谋生。

对派之总任务；(二)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三)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四)中国革命的前途；(五)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派及反对派目前的任务。攻击“中国共产党差不多一走上斗争的舞台就在机会主义领导之下”，声称“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小组织，其目的就是站在马克思和列宁的真实基础上复兴共产国际。为着同样的理由，它绝不与共产党的活动隔绝，它在每一个问题中采取它的态度，它在示威罢工等斗争中，无情的批评正式党领导之政策的错误，并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对正式党领导作任何的让步”。规定目前的任务是“在革命的彻底的民主口号之下，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革命”等。大会在讨论陈独秀说的“全中国表面的统一，可能在国民党统治下获致”观点时，因大多数代表反对而撤消。在1日和2日的大会上，通过了“纲领”、“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问题提纲”。陈独秀起草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未通过，“交特别委员会继续讨论”。会议通过托派组织名称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以示他们仍是中共党内的一派，从内部夺取领导权，“改造”共产党。5月3日选举，陈被选为中央委员^①。

刘仁静因不同意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以“明天社”组织的名义）参加协委，而被排斥于大会之外，亦未被选入“中央”。他反对这次大会^②。

参加1日大会后回家，见到何资深转交的彭述之写的一封信

① 《郑超麟回忆录》；《双山回忆录》；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有材料说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取托派名称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不确。“同盟”名称到1935年才采用。

② 《“明天社”致协委的信》（1931年3月2日和3月13日），《明天》第4期，1931年3月25日出版。

长信，十分气愤。信斥责这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誓死不承认”。

5月5日 参加托派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拿出彭述之的信给大家看后，当面责问参加会议的“候补中委”彭述之：“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等等么？”问得彭述之“满脸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①。会上，选举了五人组成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书记）、陈亦谋（组织）、郑超麟（宣传）、王文元（党报）、宋逢春（秘书。王文元回忆，秘书是罗汉^②）。会议决定合并各派在上海的小组，与中共在上海的规模略同，分成沪东、闸北兼沪中、沪西、法南（法租界及南市）四个区委，并着手“为真正的国民会议进行广阔斗争”。“独秀已经写了一篇专门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的长文”。

5月23日 因马玉夫向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托派中央被破获，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何资深、楼国华^③、濮德志

① 《郑超麟回忆录》，彭述之因不是代表，未参加统一大会，但在选举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② 罗汉，湖南人，早年曾赴法勤工俭学，大革命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曾在北京做党的工作，旋赴苏入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后曾负责托派华北区委工作，属“我们的话派”。不久被捕入狱。出狱后，到上海参加托派统一大会。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后，罗脱离托派组织，但仍接济贫困的和狱中的托派分子。抗战爆发后，他到南京，为营救狱中的托派分子及陈独秀与党合作抗日而奔走。后来到重庆，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兵二处任技术委员，曾受北大同学会委托，照顾陈独秀的生活。1939年5月，日机轰炸重庆时死亡。

③ 楼国华，1905年生，浙江余姚人，原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受到苏联回来的托派的影响，加入“我们的话派”。1931年5月被捕。1936年刑满释放后，改名楼子春，负责托派领导工作。1942年托派分裂时，站在王文元、郑超麟一边。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文华影片公司充当高级职员，负责为托派“少数派”筹备组织经费，管理托派刊物《新旗》及其书刊的出版发行。1949年在托派“国际主义工人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旋随王文元逃往香港。在香港常以一丁笔名，撰文攻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

等十三人被捕。唯陈独秀、彭述之因告密者不知地址而幸免。托派组织陷于瘫痪。

7月 吸收尹宽、蒋振东^①等，组成托派新“中委”。

8月某日，尹宽秉陈独秀之命，召集会议于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组织部长宋敬修代陈独秀出席领导。是夜，与会者全部被捕，除尹、宋外，还有金鸿图，孙玉杰。

8月6日 起草并发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告民众书》^②，声讨国民党统治四年来的种种罪行，宣言：“中国人民不能再在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下，受尽帝国主义军阀的蹂躏了！”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奋斗”，“召集群众的国民会议预备会”；“各业工人否认国民党的工会法，自由的组织自己的工会”；“农民自动平均分土地”；“反对国民党屠杀农民及共产党”等等。

9月5日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委员会理论机关报《火花》创刊^③。

在《火花》上发表《国民党与中国统一——统一是中国进步的必要条件》，指出国民党二十年来不断的内战和不能统一中国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军阀制度”，只有工农“革命政权”是中国统一的唯一前途”。

① 蒋振东，浙江人，原为中共党员，曾一度代理中共杭州地委书记，并在1927年2月参与领导杭州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1930年春，参加托陈派的“无产者社”，与马玉夫一起，在工人中进行托派活动。抗战期间，托派分裂，他追随彭述之派。解放后，他继续进行反对新中国的托派活动。于1952年12月被人民政府逮捕。1979年获释，现为上海市政协文史馆成员。

② 落款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火花》第1期。

③ 第一期封面名称是“伊斯科拉(Iskra)”，即英文“火花”。后来改成中文“火花”附“ISKRA”32开本，油印。《火花报》一般译成《火星报》，原是列宁在1900年欧洲进行地下工作时主编的全俄第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纸。

9月10日 蔡和森发表《论陈独秀主义》，认为陈独秀主义“是中国革命运动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孟塞维克路线之典型的代表”^①。

9月13日 撰《中国将往何处去》^②，批判戴季陶从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出发，以“三民主义”代替或冒充“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根本是反动的”；同时也批判托派中任曙说的“中国经济已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的见解。指出：“二者根本错误的共同点，都是从纯经济观出发，而不是从政治斗争出发，都是从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出发，而不是从不断革命论出发。”文章认为中国的出路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

9月24日 起草并发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③，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号召“民众立刻自动的武装起来”！“立刻自动的组织各地方国民会议预备会，领导反日斗争和准备普选的全国国民会议之召集”！“反对屠杀农民和对日取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政府！”

10月1日 就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颜惠庆讲话，撰《抗日救国与赤化》，抨击国民党对于日本侵略的“不抵抗”和“力持镇静”的政策，批评资产阶级妄想的中间道路。指出：“我们敢断言：赤化是全中国最大多数工农劳苦人民所乐为的，不乐为者只有少数的军阀、资本家和地主而已。”“全世界已经只有两大营垒：一面是赤化的苏联，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革命民众；一面是反赤的帝国主义，各国资产

① 《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5期。

② 《火花》第2期，1931年10月出版。

③ 《火花》第2期。

阶级及其政党。此外所谓中间势力，或者不存在，或者等于不存在。”“专就此次抗日救国运动这一具体问题而论，也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全国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众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众援助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一是服从反赤化的国民党政府之统一指挥，对日本帝国主义退让，或求救于其他帝国主义，使中国不亡于日本即瓜分于列强，此外没有第三条道路。”文章最后提出了驱逐帝国主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或土地不足的农民；召集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等八项“赤化政纲”，称“我们相信中国大多数人民是能够接受赤化政纲的。”^①同期发表《对于现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坚定的战争》。

10月8日发表《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认为“在此次反日救国的运动中，只有‘排货’和‘对日宣战’这两个主张，不但是多数人民的意志，而且比较正当”。指出“只有由工人和学生组织大规模的检查队，然后排货运动才能收实效”；“要对日宣战，要实现民族革命战争，要获得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胜利，只有中国第三次革命复兴，以革命的民众政权（这一政权，将经过全国抗日救国会而实现，或经过国民会议，或苏维埃而实现，是由其组织的内容与斗争来决定的），代替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领导全国的革命民众和兵士……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战”^②。

10月25日《红旗周报》（第21期）发表署名文章——《是对日宣战？还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指出：“在此

① 《火花》第1卷第4期。

② 《火花》第1卷第3期。

次反日运动开展时，明显地便有两个根本不同的中心口号。一个口号，是由南京国民党中央提出，而被一切反革命派别——从国家主义到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拥护的；另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而得到全国工农兵贫民及革命学生所拥护的。前一个是对日宣战，后一个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10月30日《红旗周报》（第22期）发表署名文章——《满洲事变中之取消派》和《陈独秀的“康庄大道”》。前者批判陈独秀托派中央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后者批判陈独秀的《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指出“陈独秀在‘康庄大道’上做着第二个五卅运动的梦”；他主张由“工农商学联合起来”是在“幻想第二个五卅的民族统一战线”，“事实上是要和资产阶级妥协，要引诱工人去投降资产阶级，屈服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豪绅地主”。文章还指出，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和游击战争，而只要“工农商学兵联合组织抗日救国会以实现民众政权”来领导对日作持久战，以及只要工人学生检查队大规模的检货排日，是反对革命的幻想和空谈。

是月 托派中委尹宽、宋敬修、蒋振东被国民党逮捕入狱，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中央又陷于瘫痪。

11月7日 发表《国联第二次会议后的局势》、《我们争论之中心点》^①。

11月16日 撰《两条路线——答民杰及小陈两同志》^②，批

① 《火花》第1卷第5期。

② 《校内生活》（托派内部中央理论机关报，油印）第1期，1931年11月28日出版。

判严灵峰^①(民杰,当时任托派中央宣传部干事)和陈岱青^②(小陈,时任托派法南区委书记)在革命性质和国民会议问题上的左倾观点。因为严、陈在《论所谓革命的民众政权》、《革命的民众政权与国民会议斗争》等文章中,反对陈独秀的观点,鄙视“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国民会议是资产阶级机关”,革命高潮一来,就应“冲突国民会议”,“在社会主义口号下夺取政权”,完成由资产阶级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使第三次革命越过民主革命阶段,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还抨击陈独秀在抗日运动中提出的“建立革命民众政权”的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可怕的绞绳”,“比之斯大林式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反动口号来,更为坠落,更反动些”。他们认为目前是反革命阶段,根本不应提出政权问题,“提出‘建立……政权’为行动口号,这正是模范斯大林主义者在现在所干的勾当”。陈岱青为首的法南区委书记还在其机关报《起来》上发表与托陈派中央观点对抗的宣言和意见书。陈独秀批判这种观点是违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阶段论的路线”,认为国民会议的民主口号,“不但在

① 严灵峰,1904年生,福建连江人,1924年入福建大学,后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加入托派。1929年回国后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讲政治经济学、哲学,并从事译著,主编托派刊物《动力》,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与中共进行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1931年5月托派统一后,任托派中央宣传干事。1932年10月陈独秀等被捕后,一度参加托派临委的工作。后来被捕,旋投降中统特务机关,写下万言书,表示愿“带罪立功”,提出扑灭托派残余的具体计划。抗战爆发后,在重庆任国家总动员会议经济检察处处长,兼四川省经济检察总队长。抗战胜利后,投靠留苏时的同学蒋经国,曾任福州市市长,继又到上海金融管制局任职,帮助蒋经国,以管制金融为名,大肆掠夺。解放前夕,逃往台湾,现任台湾大学教授。

② 陈岱青,原名陈聚,福建福州人。1926年入苏联东方大学,1929年回国,加入“战斗社”。托派统一后任法南区委书记,因不同意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中央在“九一八”、“一二八”事件中的策略,被解职。1932年10月陈独秀等被捕后,他曾一度参加托派临委。1933年到北京中国大学教书,11月被捕,旋投降,改名林一心,后追随陶希圣、郑学稼在复旦大学任教,进行文化特务活动,打击进步学生。解放前夕去台湾。

反革命阶段用得着”，并且是经过它直接走到革命阶段，夺取政权。表示：“我个人绝对相信这个路线是正确的。”认为“革命民众政权”口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说法”。指出：以中国现有的技术与经济基础超越过民主主义阶段，一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最无知识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者才能作如此想”。

11月20日《红旗周报》（第23期）发表张闻天撰写的《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在批判“‘左’倾反革命的托陈取消派”时，着重批判了陈独秀《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道》一文，指出“陈先生为得要‘对日宣战’，……甚至要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全国抗日救国会’来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以至他们在自己党纲上所写的‘直接平等不记名的国民会议’，也可不要！可见陈独秀的‘革命的民众政权’，是完全依照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决定的！”

11月27日撰《国联第三次决议后的局势》（笔名顽石），揭露英法美帝国主义牺牲中国，袒护日本，与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配合起来”，断送中国东三省；号召全中国民众，自动组织起来，自动武装起来，召集紧急的国民会议，以人民的名义，以人民的行动，来代替国民党政府“回答巴黎的决议，回答一切帝国主义。”^①

11月28日发表《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领导爱国运动》，指出托派内部在反日运动中有“极左倾”思潮。这种思潮反对在宣传鼓动中使用“救国”“爱国”这类名词，“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论调”；而他们的“理论”是“工人无祖国”，“我们不应爱资产阶级的国救资产阶级的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

^① 《热潮》，第1期，1931年12月5日出版。11月23日，国联第三次会议通过日本代表芳泽提出的“派遣中立调查委员团”亲华的提案。

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是我们阶级的立场”云云。文章详尽地分析批判了这种“极左倾”思潮后表示：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因为完成中国民族解放，已经是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并且它在完成这一任务的斗争基础之上，可以比在纯粹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获得政权。^①

11月30日 发表《此次反日运动中的几个问题》、《最近上海工人运动与党的领导》^②。

12月5日 主编《热潮》(周刊)创刊，并题刊头。发刊词中宣称：“二十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账的热潮，……两种热潮之合流终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由于日帝侵华和英法美帝国主义“无忌惮的牺牲中国见好于日本”，“今日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时期”，我们的热潮能否淹没他们的凶焰，“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众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没帝国主义的凶焰，淹没它一切的敌人。”

在《热潮》(第1期)上发表《直接谈判之途径》(笔名三户^③)和《论对日宣战与排货》(笔名“顽石”)。前文就日使重光葵与国民党政府代表顾维均在南京谈判，以及日使矢野与张学良在北平的谈判事件，批判揭露这是“城下之盟”和“牺牲东北”。后文主张“对日宣战”和“排斥日货”，“对日宣战必须靠民众自己的武装

① 《校内生活》，第1期。

② 《火花》第1卷第6期。

③ 三户，取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以示托派力量虽小，必能推翻庞大的国民党统治。

力量”，“排货必须有学生和工人组织大规模的检查队，充分严厉的检查才能收效。”

12月11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指出：“我们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动员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在我们的领导之下，用民众的铁锤去打击这一崩溃的动摇着的反革命统治，取得中国革命在几个主要省份（湘鄂赣皖）的首先胜利。”指示“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的口号必须立刻转变为领导武装与夺取武装的斗争”；“应该毫不迟疑地使广大民众团体的代表会议（如‘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逐步成为民众政权的雏形”^①。

12月12日 《热潮》第2期以《警告》大标题，用粗体字斥国民党“政府为避免和日军冲突，不惜提出中立区和锦州撤兵这种卖国政策”，及南京上海等地镇压爱国学生的暴行，号召“大家醒觉”。

12月16日 撰《真正的危机》（笔名顽石）^②，综合分析了“九一八”后中国各阶层及政党团体对日本侵华态度后声称，“中国人民之不能及时奋起自救，我以为这才是此次反日运动之真正危机！也就是中国民族之真正危机！”指出人民的自救，只在“向政府示威，捣毁阻碍反日运动的党部，殴打妥协卖国的官僚”，“还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道路，在现状看来，只有由反日的学生与市民，把对付政府与党部的力量，转到工人与兵士中去，‘越轨’的学生市民和‘越轨’的工人兵士结合起来，再和‘越轨’的农民结合起来，直接行动，随地驱逐暴日势力和袒护暴日的势力”；否则，“只有准备当亡国奴”。

12月17日 撰《论国民救国会议》（笔名三户）^③，揭露汪

① 《红旗周报》第27期。

② 《热潮》第3期，1931年12月22日。

③ 《热潮》第3期，1931年12月22日。

精卫上台后主张召集的“国民救国会议”之“民主政治”，“只是以一部分人独裁代替个人独裁之装饰品、假面具而已”。

12月20日 撰《“一二一七”与“三一八”》(笔名顽石)^①，就“珍珠桥惨案”，愤怒声讨国民党政府，揭露所谓民主政治家汪精卫替下野的蒋介石做两件事：“屠杀爱国民众”，“签订卖国条约”。指出学生的血，将宣告“政府死刑”。

12月23日 撰《“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笔名三户)^②，揭露汪精卫改组派政府的内外政策“仍然和蒋介石政府的主张一样”，“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真意当然是交涉而不抵抗”；标榜“民主政治”，不是“对于人民的民主”，而是“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官僚的民主”，即“均权共治”。批驳国家主义派所谓“反动为静”和“跃出漩涡”的“埋葬学生运动”和“埋葬反日运动”的主张，指出学生运动“要自觉的转换其方向，即是集中其时间、精力和热忱于工人、农民和兵士方面来，……才能使反日运动进到更高的阶段”。

12月26日 为《火花》第7期刊登托洛茨基的文章《狼狽的溃退——马奴易斯基^③论民主专政》写按语，攻击张闻天做的《庆祝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文^④和《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书》^⑤，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既然走的是十月革命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区别”；抨击中共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口号

① 《热潮》第4期，《“一二一七”血案专号》，1931年12月29日出版。

② 同上。

③ 马奴易斯基是当时共产国际负责人之一。这年十月革命节时，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专政》的文章，认为“中国的革命民主专政”，必须把属于中外资本的企业一律没收。

④ 《红旗》周报，第22期。

⑤ 同上，第23期。

之原因，“是为‘反地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中留了一席之地。”

撰《谈谈“越轨行动”》(笔名顽石)，批驳国民党加在爱国学生运动头上的“越轨行动”罪名。认为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学生捣毁国民党党部，喊出“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因封存和没收奸商的日货而发生了侵犯私有财产和干犯法律的问题”等等“越轨行动”，都是“必要的”，“必需的”，应该“大于其‘越轨行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类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轨行动’。可以说，没有‘越轨行动’，便没有人类进化”。“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①

12月29日《热潮》出版《“一二一七血案”专号》，发表《“一二一七”与“三一八”》、《“一二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等文章。

是年全国发生历史上少见大水灾，殃及十八省，淹没二十七万人，灾民四千三百多万人。国民党政府丧心病狂，贪污灾民救济款，陈独秀本年发表的论文中对此多次予以揭露。

夫人高君曼在南京病贫交加中去世，享年46岁。1921年以后，陈独秀因忙于党内事务，高君曼常埋怨他对自己照顾太少，两人时常吵架。党内一些同志也认为高的表现，对党的活动有影响，住在一起不方便。于是高就回南京娘家的房子居住了。但高仍常来上海，以“亚东”为联络点，与陈独秀见面。1925年11月13日汪孟邹日记记载：“晚八时，仲翁(即独秀)来，想见君曼女士。”14日日记：“昨晚仲翁走后，他的夫人君曼女士来，相左未见。”“(她)只站着和我谈谈，说她去看病，医生说有肺病，穷人害了富病了。到南京是为了省一点生活费(在上海每月百十来

^① 《热潮》第5期，1932年1月7日出版。

元),但到宁后,陈每月只寄五十元,太少了。这不是明明要逼我上死路吗?”汪孟邹和汪原放劝她:“仲甫太忙,也没有办法。党里事务烦多,他那有功夫回家。”高君曼在南京住一间草屋,家具破碎不全,絮被也支离散烂。她卧病在床,凄凉不堪,曾得陈公博的接济,去世后,陈又囑潘赞化为她营葬。后来,陈公博到南京狱中探望陈独秀时,独秀为此表示感谢^①。

^① 陈公博:《寒风集》第263、264页。地方行政社1944年12月版。

1932 年(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五十四岁

1月21日 蒋介石重返南京，与汪精卫改组派联合执政。

1月28日 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在人民群众支持下，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抗战。国民党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压力，极力破坏上海抗战，5月5日签订屈辱性的“淞沪停战协定”。

10月2日 国联调查团发表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告书”，公然侮辱中国，袒护日本，提议国际共管东北，遭到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的谴责。

1月1日 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发表《告全党同志书》^①。认为目前左倾的学生运动。“已由反日走到反国民党”，呼吁全党同志起来“纠正党的领导机关之错误以及改造整个党”；“由党员群众要求中央对于现实的民族民主斗争迅速采取坚决勇敢的态度与积极政策”；“集中全力于城市职工运动，以推动工人群众能够很快的起来参加并领导反日反国民党斗争”；“令苏区的武装力量尽可能的就近向有工人运动或反日运动的城市前进，和这些运动汇合起来”；“对于所有工会运动

^① 《火花》第7期，1932年1月出版。

中，罢工斗争中，学生运动中，反日运动中，国民会议斗争中，反国民党斗争中，以至组织苏维埃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之联合行动，不加任何形式的阻止与破坏，以便统一我们的力量，向阶级敌人进攻。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

1月6日 撰《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即自救》^①，认为日本占领满洲是一切帝国主义无形瓜分中国的序幕，亦即中国殖民地化的序幕。国民党只知卖国和屠杀反日民众，安心做帝国主义的儿皇帝。只有劳苦民众的奋斗，才能够决定中国的命运。主张“在反日反国民党的高潮中涌现出一个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作为“全国民众反日斗争的总机关”，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反抗帝国主义，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

1月7日 托派“常委”^②就托派北方区“临委”（以汪泽凯为书记）分裂出“临时工作委员会”（以任曙^③为书记）而作出“对于北方问题的决议”，批评旧临委“九一八”以后执行的“取消主义和等待主义的路线”。认为“目前是国民党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由动摇而走向崩溃，民众已经开始抬头的新时期”，“形成了无产阶级进攻的客观环境，反日的民族斗争已造成了武装民众的特殊

① 《热潮》第6期，1932年1月23日出版。

② 此时托派中央“常委”只有陈独秀、彭述之等二、三人。

③ 任曙，原名任旭，四川人，大革命时在广州工作。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嗣后又任湖北省委代理书记，做农运工作。1927年底随陈乔年到上海。曾代表湖北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参加托陈取消派后，主要活动是用托派观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著书《中国经济问题》，以此参加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1932年在托派华北区委与汪泽凯分裂后到上海，在陈独秀等被捕后，曾一度任托派临委书记，旋又在托派内部矛盾中撒手而去，脱离托派，投靠国民党。抗战时在四川任县长。有的材料把任曙误认为是任卓宣，因此视任卓宣为托派，不确。

机会……我们一秒钟也不能放松的抓住目前这一新阶段的实际环境与机会，鼓动工人群众起来为这些口号而斗争，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指示两派“立即无条件的合并起来”，成立“北方区临时特委”，注意领导北平学生的反日反国民党运动，把主要目标都集中在铁路工人、矿工及平津市镇工人和纺织工人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小组”^①。

1月9日 中共中央作出《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指出托陈取消派与国民党改组派、江苏耆老和第三党一样，“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

1月17日 撰《由反日到反国民党》(笔名顽石)^②，认为学生运动走出了“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然的逻辑”。“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

撰《挤他们到后台去》(笔名顽石)，认为在民族斗争中表现动摇的资产阶级一时向左盘旋的分子，如上海市商会、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的领袖们、大学教授们、各大报的记者们、各省国难救济会的政客们，以及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如学生会的大小领袖和工会的官僚们，“必然会被前进分子挤到斗争的后台去，同时也必须把他们挤到后台去，反日斗争才能向前发展！”^③

1月20日 撰长文《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认为与列宁描绘的俄国1905年革命时形势相似，“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已是一个新时期，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已开始发展的时期；这一新

① 《校内生活》第2期。

②③ 《热潮》第7期，1932年1月23日出版。

时期就是大多数民众表示不能与国民党政府相容，……且觉悟到有建设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因此我们左派反对派应当觉悟到不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不仅予以民主任务（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民族独立等等的内容，而要加以实际的条件，使这个会议认真能执行它自己的责任，……即要求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文章明确指出：“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同时批评了托派内部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念：“认为‘革命的民众政权’不能表现政权的阶级性，应该译称‘无产阶级专政’。”“认为目前还未到发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的时期，因此遂认为目前在宣传鼓动上不应该涉及政权问题；又因为目前没有代替国民党政权的适当口号，遂认为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文章最后针对党对“国民会议”的批判，发表声明：托派主张的“国民会议”，“乃专指我们所要创造的‘国民会议’，……当然不是指国民党资产阶级所召集的任何‘国民会议’。”“参加统治阶级的‘国民会议’和革命阶级所创造自己所要的‘国民会议’是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①

1月25日 博古发表《论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口号》，张闻天发表《取消派内部关于政权问题的争论与我们的主张》^②，指出“只有苏维埃才是真正的民众政权”。二人着重分析了共产党的“民众政权”口号与陈独秀的根本不同：陈的“民众政权”是要欺骗民众，表示他们的“革命”，并且是“靠国民会议”来实现的，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党的“民众政权”“是在用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之后实现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

^① 《火花》第1卷第7期，1932年1月28日出版。

^② 《红旗周报》第28期。

1月29日和30日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名义起草并发表《为“上海事变”第一次告民众书》、《第二次告民众书》^①，称：“现在的事实已显然证明，中国的士兵及一部分下级军官，在民众反日的激烈空气下，不违反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之下，是可以抵抗帝国主义强盗军队的。”文件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破坏十九路军抗日的种种活动，号召“上海一切被压迫民众立刻武装起来到前线去！一切巡捕义勇军及各地的士兵自动起来参战！十九路军的士兵及下级军官们坚决反对南京政府的无抵抗主义，防止上级军官的妥协，作战到底”！“立开上海市民众代表会议，组织紧急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物质力量，帮助抗日的武装队伍！”

2月10日主持托派“常委”会议，起草并通过《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局势与我们的任务》^②，称：“绝对拥护这次反日战争”，“如果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党派还未放弃对日战争的旗帜而企图推翻国民党政权，我们和他们可以在共同行动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众之最凶恶的敌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做过不少的错误，毕竟还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党，它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并且应该站在民族领袖地位；它此时即应号召民众自动的建立全权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的反日斗争。……红军一与某一工业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汉）民众运动汇合起来，即应在那里召集国民会议，做反日反国民党斗争之总领导机关。”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的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用全力推动城市工人自己的以至进攻的斗争。

① 油印传单。据1935年1月史朝生等人托派中央批判陈独秀机会主义文章（《校内生活》第13期）透露，这些宣言是陈独秀起草的。

② 《校内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出版。

罢工运动一广泛起来,便应组织工人苏维埃,如果当地已有义勇军或我们能够影响的军队,更进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应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在适当地点召集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领导全国范围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为执行以上的任务,我们……积极要求我党的领导机关改变策略,召集紧急会议,以谋整个的党策略上组织上的统一,在未统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动上的合作。”

是月 与彭述之,罗汉三人共同署名,给中共中央一信,建议“合作抗日”^①。

主持托派上海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通过2月10日的常委决议案。

3月初 在上海亚东图书馆门口路遇曾猛,商定在建业里为曾租一间房子,作为托派中央机关报《火花》新的刻写、印刷、出版机构,曾负责全盘工作,托派中央为其提供房租及伙食费。据托派中央常委秘书长谢德盘当时对曾猛说,这些费用全由陈独秀一人提供。《火花》从第四期开始,继续出版。^②

3月3日 起草并发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为日军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油印传单),以上海抗战失败,列数蒋介石国民党“纵敌卖国”六大罪状,疾呼“全中国的革命民众们!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纵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自动的召集全权的国民会议”。

3月10日 刘仁静撰文^③批判陈独秀起草的2月10日决

① 罗汉1938年3月致叶剑英、博古、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1938年4月25日《正报》及1937年10月1日“致述之信”(未刊稿)。

② 曾猛:《我与陈独秀的关系及我所知道的陈独秀的托派活动情况》(1955年9月28日)未刊稿。

③ 《对于政治决议的意见》(列尔士),《校内生活》第3期。

议案,称:“在共同行动上”首先推翻国民党政府,是要中国无产阶级“再作资产阶级的苦力”;认为今日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提出“组织苏维埃”是“空谈”;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是违背“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与这些意见作坚决无情的斗争”。

3月14日 陈岱青为书记的托派法南区委写信给“常委”^①,批判陈独秀起草的《为日军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书》在根本上是脱离了阶级观点及现实各阶级在民主民族斗争中真实的关系,认为“十九路军的抵抗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表现,它对工人阶级影响只是一种欺骗的作用”,“没有丝毫抵抗主义或半抵抗主义的气息”。抨击告民众书对十九路军“歌颂”和“原谅”,“必然增加工人阶级对十九路军乃至其他左派资产阶级的幻想,充分表现尾巴主义的精神,必须严厉加以纠正”,并拒绝散发。

3月19日 托派“常委”复函法南区委^②,称《为日军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书》是为“引导群众的悲愤意识集中到当政的政府这个中心”,斥法南区委“把一切敌人都看做一样,这样简单的笼统的战术往往在客观上帮助了目前最凶恶的敌人”,为此“予以警告”。同时,对法南区委因“不同意常委的宣传文件,便搁置不发”的“无政府主义错误”,给以“书面的警告”。

3月28日 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前途》^③,再

①② 《校内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出版。托派法南区委委员是赵济、陈其昌、王平一、李特。

陈其昌,河南洛阳人,曾读北京大学,1925年在北京加入共产党,一直从事学生和工人中的秘密工作。1929年加入托陈取消派,被开除出党。1933—1937年,任托派临委书记,曾编译有关苏联审判布哈林——托洛茨基案件的《莫斯科审判真相》、《社威委员会判决书》等书,著《中国民族大迁移问题》及大量中国经济方面的文章。1942年陈独秀逝世后不久,因帮助其兄用秘密电台为重庆国民党收发日伪经济情报而在上海被日本宪兵捕杀。

③ 《火花》第1卷,第9期,1932年4月15日出版。

次攻击“红军”是土匪“为生活而奋斗的方式”，“现在的‘红军’运动，不但还没有城市工人革命运动的领导，即党（国际与中国党）的领导亦不充分，领导的政策更不正确。……而且党有农民意识化的危险”。认为“如果领导有正确的政策，即‘红军’运动和反日运动联系起来”，“将能展开另一新的前途”。

4月1日 发表《拥护帝国主义政策的特殊论据》^①。

4月14日 撰《我们要怎样的民主政治》^②，批判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以及国家主义派、安福系，旧直系，上海救国联合会派、《申报》（史量才）等鼓吹的“民主政治”是“伪民主”，并指出“即在欧美资产阶级国家……为资本主义狭窄框子所限制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只能是有利于富有阶级少数人的民主政治”。“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之民主”，“是民主主义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新最高阶段，也是一切政制在历史上发展到今天的最高最后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共产主义者，本是最忠诚最彻底的民主主义者。”

4月24日 以“常委”名义致书“北方特委及全体同志”（即对北方问题的第二次决议），批评两派托派分子对于一月七日的常委决议“均未完全接受”，未能实行“无条件的合并”。批评赤声对加入特委的抵制，补充批评了晴光在分裂组织上的错误以及操纵特委犯下的新的错误，指出特委所拟工作计划中的左倾错误，如：“由反日进到反一切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统治”，“没收中外资产阶级的财产”，“在工农群众中准备苏维埃的前途”等。决定指派刘伯庄为特派员，赴北平改组特委，取消原特委成立的北平市委及作出的给某些人处分的决定^③。

① 《火花》第1卷，第8期，1932年4月1日出版。

② 《火花》第1卷，第9期，1932年4月16日出版。

③ 《校内生活》，第2期。赤声即汪泽凯，晴光即任曙。

此决议到达北平后(刘伯庄未到前),赤声一派拥护,而晴光一派坚决反对。他们立即自动辞职,特委停止工作,北平市委自动解散,以示抗议。刘伯庄要求他们在新特委成立前,暂时恢复工作,被拒绝。他们还拒绝参加新特委,也反对赤声及宋某参加,致刘伯庄不能组织起新特委。刘表示无法工作,于6月初回沪,6月3日致函陈独秀托派常委,报告“我因为不能执行兄方的决议,遂一无所成而回来了”^①。6月27日,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常委名义,作出《对于北方问题的第三次决议》,批评晴光等人抵制第二次决议的贯彻和新特委的组织,“以致北方组织陷入完全停顿的无政府状态”;给晴光以警告处分,给未能坚决贯彻第二次决议而悄然离开北平的特派员刘伯庄以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重新提出名单,组织新特委^②。

是月 托派法南区委扩大会议得出一致“意见”^③,批判陈独秀起草的2月10日“常委决议案”对形势“陷入了幼稚的过分的估计”,认为“不能说已经走上群众运动直接上升、开始革命高潮的时期”;与小资产阶级及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在反蒋斗争中“共同行动”的战略,“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的”,是“引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服从自由资产阶级当苦力”的“尾巴主义机会主义的道路”;“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是“一半投降了史大林派的主张”。“意见”还指出,“独秀同志告诉我们‘乡村苏维埃’之存在是一个事实!……常委同志在‘一、二八’以前曾矢口否认这类史大林派‘伪造’的事实,而现在却突然承认这是事实,这真是出人意料之突变!”

5月5日 托派“常委”发表《对法区扩大会议意见书的批

①② 《校内生活》,第4期。

③ 《校内生活》第3期。

评》^①，批判其“充满了各种错误观点，而且有些问题上可以看出根本是取消主义的观点”；认为他们对“常委决议案”的曲解和反对，是为了“辩护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敌人这一错误的观察”。最后“警告法区扩大会议及一切同志：我们万分不应该因为反对史大林派全然不顾客观环境的盲动主义，遂走到客观主义取消主义之另一极端；我们万分不应该因为反对史大林派依靠农民来代替无产阶级执行革命任务的错误，遂走到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量过轻之另一极端”。

5月11日 托派“常委”发表《批评列尔士同志对于政治决议案的意见》^②，称：“常委决议案中所谓‘共同行动’，是指特定事件之一时的协作，而不是长期的政治联盟；所共同行动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次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而不是整个的资产阶级”；“所谓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在取得政权以前，是组织和政策之独立，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贫农外，不与别的阶级联盟”。认为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是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混合”，“并不反对两党利害一时一致时，有一时的联合”。“我们是否做资产阶级的苦力，要看我们是否独立的组织与政策，不在乎拒绝任何共同行动”。批评刘仁静反对“共同行动”，反对与“农民苏维埃”（红军）“汇合”是“走到等待主义的道路”；“把国民会议和苏维埃政权看成一个东西”是违背“不断革命论”的。

5月20日 托派“常委”发表《对仁静同志论“中国前途”的批评》^③，批评刘仁静在《中国的前途》等三篇论文中表达的意见——中国现在还没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必须经过经济复兴才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在理论上是根本反对

①②③ 《校内生活》第3期。

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在现时局势的估量上，是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局势不是“往下落”，而是“往上涨”，“逐渐走上革命局势”。

5月21日 托派“常委”向各区委、特委及全体托派分子发布《通告第六号——为小陈及法南区委破坏组织原则》^①，称：“自满洲事变发生以来，特别自上海事件发生以来，在我们反对派内部曾发生了一些不同的政治意见和不正确的政治倾向。”指责法南区委书记陈岱青的“取消主义倾向”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并称取消陈岱青法南区委书记的职权，“是完全正确的”。

5月25日 委派彭述之代表“常委”召集法南区委会议，解释2月10日常委决议案。彭述之称：“政治问题保留讨论，待扩会（即常委与区委书记扩大会议——引者）解决，但在政治问题未得到结果之前，法南区委必须执行常委区书联席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及一切日常的决议”；否则，区委须“停止工作”。彭的意见，遭到区委反对，彭当即宣布“解散区委”^②。

5月29日 托派法南区委赵济、陈其昌、王平一、陈岱青、李特联合致函“常委”，谴责彭述之在5月25日会议上的行为，请求“恢复区委”。

是月 濮清泉、宋逢春因狱中时疫流行，保外出狱。陈独秀邮函催促二人加入“常委”，建立起五人“常委”机关。陈独秀仍为书记，委员彭述之、罗世凡、濮德志、宋逢春，秘书谢少珊^③。

① 《校内生活》第4期，1932年10月1日出版。

② 《校内生活》第4期。

③ 谢少珊，又名谢德盘，广东人，大革命时学于黄埔军校，后东渡日本，被驱逐回国，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吴季严接近，回国后随吴加入托陈派。1932年10月被捕后即出卖陈独秀，致陈被捕。谢旋加入国民党中央机关，改名谢力公。据说抗战初期曾用斧头劈死唐绍仪。抗战胜利后任广州大新公司总经理。解放前夕逃往国外。

6月4日 托派“常委”复函法南区委赵济等五人，批驳5月29日的信，并重申只有接受常委政治决议案，承认错误，“常委才有再度考虑的可能”。^①

6月15日 致函托洛茨基，汇报中国托派重整组织的情况，以及“九一八”后，托派中央采取的与左倾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红军”、“义勇军”建立统一战线（“共同行动”）的政策，并请示国民会议等问题。^②

6月16日 发表《中国反日斗争已经没有希望了吗》、《前进与后退》、《东京事变与远东局势》^③。

6月22日 托派法南区委赵济等五人复函“常委”，重申反对“政治决议案”的立场。宣称：“现在没有高过常委及我们间之最高机关——例如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是无权解决我们间之一切政治纷争的。”“自今天起，我们离开了一切区委的职责”，“一切问题得留到代表大会和国际方面去解决。”^④

7月25日 托派“常委”致函“北方特委”，对于原“北方区委”两派头头因不接受“常委”关于北方问题的三次决议，致工作瘫痪，提出“谁表示不干，就让谁滚出去”的原则，“决不姑息地纪律制裁之”。指出北方的政治情形，“在最近将来很有剧变之可能，就是日人很有攫取热河，甚至进攻平津之可能”；要求特别注意学生和产业工人中的工作。^⑤

7月28日 发表《谁和怎样救中国》。^⑥

① 《校内生活》第4期。

② 参见托洛茨基：《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给中国同志的信》，《中国革命问题》。

③ 《火花》第1卷第10期。

④ 《校内生活》第4期。

⑤ 《校内生活》第4期。

⑥ 《火花》第1卷第11期，1932年7月28日出版。

8月15日 撰《反极左倾的错误》^①，批评托派内部以刘仁静、陈岱青和严灵峰等为代表的“极左倾的错误”，指出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我们左派反对派和史大林主义者的争论，并不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完结，也不在第三次革命过程中有无民主阶段，争论的中心点是在经过那一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或民主专政——之下的民主阶段，才能够完成民主革命”；在“联合战线”问题上，“我们的战略不在乎否认民主阶段，而在乎是否因此放弃夺取政权，不在乎反对和某一派资产阶级有某种联盟，而在乎是否因此放弃和它整个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认为“我们此时和极左派所争论诸问题……必须毫不含糊的明确的解决”，“我们才能行动，才能前进。”

9月1日 撰《论国民会议口号》^②，从马克思和列宁的论述中，提出“民主主义的思想，由古代社会传到阶级社会，……要受阶级的影响，而不能成为超阶级的怪物”的观点。批判刘仁静、陈岱青、任曙在国民会议和民主主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指出：“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是被榨取者大众的民主主义，它比之榨取阶级的民主主义，在形式上有更高的发展，在性质上有根本的改变。”

9月22日与26日 托洛茨基复函陈独秀托派中央，回答与“红军”联合抗日的问题^③，说根据俄国的经验，农民游击队“时常和工人及地方党部发生冲突”，认为中国“在农民运动的本身，是有着很强的私有性与反动倾向的……它会仇视工人的，因为早已有了武装，会更增加这种仇视”；指示中国托派，“工会

① 《校内生活》，第5期。

② 《校内生活》，第4期。

③ 《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中国革命问题》第301页。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和党的中心，必须建立起来，先进的工人必须教育起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团结在一起，进入战争中去。”“并且要预备和获得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特别是领导它的‘红军’。”

10月3日 托洛茨基继续复函陈独秀托派中央^①，指示在目前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中，“除了国民会议，不能够提出旁的中心政治口号”。“现在革命的煽动，首先应该尽可能地向着反对国民党政府方面进行。……无论是关于什么具体问题口头的文字的煽动、罢工、露天大会、示威、抵制，都必须加上‘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的口号。”

10月初 撰《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②，认为“不但是恢复并且要提高国民经济，中国才有救”，而帝国主义、国民党、别派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党派都不能救中国。“提高经济以救中国的责任，只有放在代表无产阶级及贫农利益的共产党双肩之上”。宣称：“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史大林派的错误政策足以延迟革命甚至绞杀革命……但共产党是全无产阶级自己的先锋队，并且是全民族的领袖，革命的民众不应该因为党的领导者之错误而根本反对她，而是应该积极纠正党的领导机关之错误，甚至于改造党，以除我们道路上的困难，这正是我们左派反对派的立场。”

10月15日 托派中央常委机关（秘书谢少珊家）被国民党警探协同法租界捕房破获，正在那里开会的彭述之、宋逢春、罗世凡、濮一凡及谢少珊全部被捕。

是日晚 因谢少珊供出地址，患病（胃溃疡、盲肠炎）在家休

① 《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给中国同志的信》，《中国革命问题》第307页。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② 《先锋》（托派北方区委机关报）第4期，1932年11月17日出版。

息的陈独秀被捕。^①

10月16日 与“同犯”彭述之等人坚决反对引渡给国民党当局。

10月17日 在租界捕房受审，反对引渡被判“无效”。

10月18日 与彭述之等人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拘押。

10月19日 乘夜车被押往南京，在火车上鼾然大睡，处危不惊，被传为佳话。^②

10月20日 晨八时，被押到宁，经国民党中央党部接洽，拘押军法司，十余箱文件等运交中央党部检查。

因天气渐凉，随带衣被无多，在军法司禁闭室“函请当局添购衣被”，国民党中央党部准请，当拨洋一百元；又“要求晋謁”蒋介石、陈立夫“申述过去主持托洛斯基派在中国活动情形”，“闻当局已接受此项要求”，将于21日“提陈犯出狱，由宪兵司令部派员押解赴汉”。^③

10月22日 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派员赴汉，向蒋介石“报告捕获陈独秀经过，并携去捕获的各种重要文件，呈蒋审核”。^④

陈被捕后，翁文灏、胡适、罗文幹（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兼行政司法部长）致电蒋介石：“请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不由军法

① 据当时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致南京政府密电（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称：“共犯谢少珊称甘愿自首，并可将共产党首领陈独秀拘捕到案”，旋“按谢供地址将陈捕获”。

② 尉素秋：《我对陈独秀先生的印象》，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1977年出版。

③ 《中央日报》1932年10月21日，当时蒋介石在武汉行营指挥讨苏区红军的反革命围剿。后陈并未解汉。

④ 《大公报》1932年10月23日。

从事。蒋介石“复电照办。”^①

未被破坏的最大的托派地方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北方区”致中共河北省委一封公开信^②，就陈独秀被捕，要求中共“审察其过去对独秀同志所加的一切非议诬蔑之错误，接受反对派的政治路线，并为援救独秀同志而斗争”。

托派北方区委在机关报《先锋》上发出呼吁：“起来！起来！援救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号召推翻某党统治”；“中国的革命群众和一切左翼的社团，一切革命分子都应立即起来，游行、示威、通电、开大会，坚决不拔的为援救陈独秀而斗争！”

国民党中统局主办的《社会新闻》，发表署名文章^③，称陈独秀是“近代政治怪杰”；认为“陈曾是共党取消派，然而他是赤匪的创造者、首作俑者……照现行法规，似应正法，而无活命之可能。反转来说，陈虽是共党，却是反对共党现行暴动政策者，而且还是一个学者，只要他继续反共，似可不至于死。”

10月23日 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八人快邮代电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营救陈独秀，云：“此君早岁提倡革命，曾与张溥泉、章行严办《国民日日报》于上海；光复后复佐柏烈武治皖有功；而五四运动时期鼓吹新文化，对于国民革命尤有间接之助……顾其反对暴动政策，斥红军为土匪，遂遭共党除名，实与欧美各立宪国议会中之共产党议员无异。犹望矜惜耆旧，爱惜人才，特宽两观之诛，开其自新之路。”^④此外，柏烈武、柳亚子、杨杏佛等人都进行了营救活动^⑤。

① 《胡适来往书信集》(中)第139、140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

② 《先锋》第4期。

③ 仿鲁：《清算陈独秀》，《社会新闻》第1卷第7期。

④ 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⑤ 《申报》1932年10月25日。《晨报》1932年10月26日。

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37期)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报导陈独秀等在上海被捕消息,并加按语:“蒋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力网开一面许以不死……或者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

10月24日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谈话会,讨论蒋介石来电——“陈等所犯之罪,系危害民国之生存,国家法律对于此种罪行,早在法律上有明白的规定,为维持司法独立尊严计,应交法院公开审判”——议决陈案“交法院公开审判”。^①

10月25日 蒋介石表示,对营救陈独秀的缓颊各电,“均不作复”^②。

在国民党军政部会客室答何应钦(军政部长)传询,谓与赣鄂等省暴动行动“毫无关系”;抗日问题“仍须联俄方为有利”^③。同时,何应钦请求写字,陈写“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④。

何应钦传询陈独秀后表示:“陈等虽属危害民国罪犯,但以其非现役军人,且犯案地点,又核与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前段规定不合”,“本司无权管辖”,遂令王振南军法司司长备文将陈等转解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⑤

10月26日 与彭述之二人,被解往江宁地方法院。住犯人病室。^⑥

10月27日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电请中央严办陈独秀,并

① 《大公报》1932年10月25日。

② 《大公报》1932年10月26日。

③ 《申报》1932年10月27日。

④ 参见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8期。

⑤ 《申报》,1932年10月27日。

⑥ 《中央日报》,1932年10月27日。

情“惩办出名保释之人”。

10月28日 《大公报》发表短评：《营救陈独秀》，谓“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所以只须给予他机会，叫他堂堂正正地主张意见，向公众公开申述，这正是尊重他爱护他的道理。如果用哀恳式的乞怜，感情式的缓颊，在法律以外去营救他，倒反转辱没了这位有骨头有意识的老革命家”。认为蔡元培等“矜怜耆旧，爱惜人才”的话，是“多此一举”；主张“大家应当成全陈独秀”，即作为“领袖”，“有真诚信念，不变节，不改话，言行始终一致”。

10月29日 国民党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决议，“呈请中央依法惩办共犯陈独秀等不准保释，并电全国一致主张”。

陈独秀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还有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健，国民党湖南省长沙市执委、湖南衡山县、罗田县、江西上高县、山东邹县、广东英德县等党部、陆军七十八师、十九师、十六师、二十七师、五十三师党部等单位。（这些电报均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0月30日 傅斯年发表文章^①，称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星”，主张处置陈案，应“考虑陈氏一生行迹，及近二十年来中国革命历史”，“能够（一）最合法；（二）最近情；（三）看得到中国二十年来革命历史的意义；（四）及国民党自身的革命立场。我希望政府将此事交付法院，公开审判，……不妨依据法律进行特赦运动。”

10月31日 宋庆龄由沪抵宁，旋又飞汉，“为陈独秀事”，欲访蒋介石夫妇。^②

^① 《陈独秀案》，《独立评论》第24号，1932年10月30日出版。

^② 《大公报》1932年11月1日。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赴地方法院探视陈独秀，并赠书籍、水果。^①

受江苏高等法院传询，表示：“愿尊重国家法律，望政府秉承大公，不参加个人恩怨，法律判我是罪有应得者，当亦愿受。”^②

10月下旬 上海托派沪西、沪东、法南三个区委书记高恒^③、寒君^④、屠仰之^⑤举行紧急会议，推选刘伯庄(书记)、刘仁静、陈岱青、严灵峰、陈其昌以及寒君、高恒、屠仰之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上海临时委员会”领导托派工作^⑥。

10月底 陈独秀被解到南京后不久，通过去探望的刘梦符(高君曼的好友及同乡)转给吴静如(郑超麟的妻刘静贞的假名)一封信，要吴去南京军人监狱探望郑超麟时住到刘家(南京中华门)，并随刘去探望陈独秀。

①② 《大公报》1932年11月1日。

③ 高恒，又名高衡、高素明、高理文，湖北人，1925年赴苏入中山大学，毕业后到东方大学当翻译。1929年回国，1931年加入托派。1932年10月陈独秀等被捕后，高曾一度参加托派临委的工作。1935年到广西桂林师专教经济地理，投靠桂系军阀。1938年到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作翻译。1939年到赣南投靠原留苏同学蒋经国，在蒋之第四专员公署当秘书。1943年任《正气日报》总经理兼主笔，与彭桂秋的正气出版社联成一气，把赣南的主要文化机关控制在托派手中，从而成为蒋经国的智囊团中的人物。1945年10月，高随蒋经国(时为东北外交特派专员)赴关外，计划在东北出版《正气日报》，未遂。后回上海，任国民党中央信托局顾问。1948年，他又参与蒋经国在上海搞金圆券骗局。解放前夕，全家随蒋去台湾。

④ 寒君，原是中共党员，早年曾与何孟雄一起从事工人运动。抗战初期，任托派临委委员兼华南区委书记，结合一些青年托派刘家良等“少壮派”，反对陈独秀、陈其昌等人老托派的“机会主义”。1942年托派分裂时，他先属彭述之、刘家良的“多数派”，后转入“少数派”。1945年初，因肺结核病死于香港。

⑤ 屠仰之，浙江海宁人，原是中共党员，在杭州做地下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在《时事新报》社当排字工人，任中共报馆支部书记。后受彭述之、郑超麟煽动，转向托派。1933年脱离托派，投靠国民党。

⑥ 纪它(陈其昌)：《一年来上海组织现象的教训》，《校内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出版。

11月1日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书面警告蔡元培、杨铨，谓其“请宽释陈独秀”之电，是“徇于私情，曲加庇护，为反动张目，特予警告”。

《红色中华》(第38期)以《不幸而言中，陈独秀要当蒋介石的反共参谋了》为标题，报导抨击陈独秀要求晋谒蒋介石的消息。

11月3日 接见来访的段锡朋(国民党教育部政务处长)，托其致函胡适，谓：“辩护事已委托章行严先生及另一位彭先生”，不宜烦请律师过多；谢绝蔡元培、胡适推荐的律师。^①

11月14日 《红色中华》(第40期)以《关于陈独秀……》为题，报导陈独秀候审情况和蔡元培等援陈电内容。

11月21日 《红色中华》(第41期)以《陈独秀——取消派》《叛党！反共！》为标题，报道蒋梦麟关于陈独秀案的谈话，并评论道：“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这个我们并没有诬蔑他，他的老同事蔡元培、蒋梦麟都替他老实不客气的说出来了，这就叫取消派”。

11月30日 致函高语罕，告其家“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即潘兰珍——引者)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务请先生再去探望一次。……如幸而尚存，望携存先生处，……函告潘女士亲自前往领取”^②。

12月1日 致函胡适，谓：“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想要几本书和纸笔“做点东西”；要求存在胡适处的“拼音文字稿”早日出版；认为中国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碍”，“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能够拿出当年提

① 《胡适来往书信集》(中)第141页。

② 汪原放：《亚东六十年·狱中书信》未刊稿，以下凡陈致高语罕的信，除另注明出处外，皆引自该稿，恕不一一注释。

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劝胡适从著不从政。道及段书诒（段锡朋）“常来此探视”，并代为转信。^①

12月7日 致函高语罕，谈潘兰珍及房租事：“潘女士她浦东有父母，她能在香烟厂做工，不需我们帮助，并且事已揭开（指潘原不知陈独秀的真名及托派的真面目，现在全知道了——引者），她必不敢受我们帮助也。”

12月13日 致函高语罕，请高转告潘兰珍“鄙人生活近况，且语以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

12月22日 致函高语罕：“自传一时尚未能动手写，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印行（指汪孟邹——引者）。如老友不能即时印行，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12月31日 上海托派临委向托派各区委、各支部及狱中的陈独秀等人，发出《反对派政治问题争论提纲》（油印小册子），归纳陈独秀、刘仁静、陈岱青、严灵峰等人在民主主义、国民会议、与资产阶级在倒蒋问题上“共同行动”等问题上的分歧观点，要求在托派内部迅速讨论，“使反对派可以早些由理论过渡到行动”。

冬 吴静如按陈独秀嘱咐，到南京探望。从此，陈独秀委派吴静如作交通，建立了与其他托派尤其是上海托派领导机关的联系，有时一、二月一次，传进上海托派临委的文件、刊物和书信，带出陈独秀的文章、意见和书信。

^① 《胡适来往书信集》（中）第143页。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五十五岁

1月至2月 德国希特勒上台执政，残酷镇压德国共产党。

托洛茨基指责德国事件是斯大林共产国际在德国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宣布共产国际死亡，改变过去在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内部“改革”的方针，提出另行组织托派国际。他于10月1日，写成《苏联和第四国际》，提出建立“第四国际”。

1月初 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由于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白区革命力量严重损失，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1月17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声明在停止进攻红色区域，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愿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

3月至5月 日本侵略军侵入关内，威胁平津。5月31日，国民党政府屈膝投降，签订“塘沽协定”。

9月 蒋介石纠集一百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

11月20日 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

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2月7日 致函高语罕：“自传稍迟即可动手”，汪孟邹处不能出版，“曹聚仁曾代表群益公司来索此稿（大约稿费每千字二十元，每月可付二百元）。曹为人尚诚实，惟不知该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听一下”。陈还向高要书，表示急欲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西方革命史》、《法兰西革命》及《我的生平》等。据郑超麟回忆，陈入狱后，大家建议他写自传，通过自传，总结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经验，同时写《中国大革命史》；由托派朋友帮助他找资料。仿效托洛茨基写《我的生平》、《俄国革命史》，象《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告全党同志书》那样，抒发自己的政见。后来伊罗生还表示愿意把他收集的资料提供给他。但伊罗生后来没有这样做，把材料带回美国，自己写了一本《中国革命的悲剧》。

3月8日 上海托派临委通过《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油印小册子），承认“我们左派反对派”，“长期间学究的讨论，与组织的涣散，领导机关三次受破坏，重要领袖的被捕，民族和民主斗争的策略和路线不能深入群众与在斗争中得到切实的运用”。指出：“我们当前的基本任务还是集中一切力量去领导和开展民族和民主斗争。”口号是：“打倒国民党和召集全权的国民会议。”声称：“为要在一切群众斗争中保持共产主义者的一致，我们向正式党提议在一切群众组织中和斗争中愿意与他们切实合作，以反对外部敌人的进攻。”同时又要求改变中共“在中国之破产的领导”。

3月14日 致函高语罕，托告潘兰珍检出羊皮袍及驼绒被二件衣服的当票，以备赎取；并问：“她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否？”又告：“自传尚未动手，此时是否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即汪孟邹——引者）

一谈，只要他肯即时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4月5日 致函高语罕，托“婉言劝她（潘兰珍）不必来看我”（结果潘还是去了，并送了三年牢饭）。

4月14日 上午12时，在江宁地方法院受审时，答：“因意见不同”，被中共开除；对于红军，说“先要有农工为基础，待有政权，才需要军队”，“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与皖湘闽赣等省共党不能合作，是因政策不同”；申述主张“打倒国民政府”三点理由是：一、刺刀政治，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三、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不抵抗。宣称托派最终目的是“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的目的”。另外，在法庭上，还以不作“政府侦探”为由，拒绝指认其他被捕之人。

4月15日 第二次受审，承认托派最终目的是“推翻国民党，无产阶级专政”。

4月20日 第三次受审并辩证检察官朱隽指控陈独秀与中共一样，“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危害民国”。章士钊律师继而辩护，认为陈独秀主张以“法定之选民投票”取得政权。“何得为罪？”“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陈独秀当初曾与国民党“合作”，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1921年广东国民政府教育厅长），且在“汪陈宣言”中苦口相劝“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陈独秀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以反共，“有功于国民党”，主张“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批驳了检察官起诉陈独秀所谓叛国，危害民国，“湛然无据”，法庭应“谕知无罪”。

“省释无辜”。

陈独秀起而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接着，发表“自撰辩诉状”，说，予五十五年岁，“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决非予等之空想。经济落后之俄国，已有初步试验，而获得初步成功。”宣称“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改善工农生活；实现彻底的国民立宪会议。表示对所控“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绝对不能承认”；指出“国者何？土地人民主权之总和也。”控诉国民党“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节节退让”；对内，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替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人民的自由权利……”才是真正的“叛国”，真正的“危害民国”。要求法院“毫不犹豫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4月26日 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庭判决：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夺公权十五年，曾猛、何资深、濮德志、宋逢春、罗世凡各处有期徒刑五年，褫夺公权七年。

法庭宣判后，陈独秀起立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评——《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该报社长程苍波执笔），宣称：“今日中国之国民党，在法律上既为行使中央统治权之团体，则按之国

家为行使统治权之团体之原则，则国民党至少在现行法律上，在现有制度下，即为国家。……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反对并图颠覆国家，即为危害民国，亦即为叛国。”“今日中国国体根本与苏维埃有别，……欲实行苏维埃与运动复辟恢复帝制，同为叛国。”

是月 上海托派临委因内部矛盾发生分裂，刘仁静、陈岱青退出临委，刘佰庄辞职，任曙（即任旭）任书记，召来广东、北平代表召集“全国紧急会议”，补选了几个全国性委员，把“上海临委”改名为“全国临委”，解散上海各个托派区委，成立“上海市委”，遭到陈其昌及各个区委书记的反对，致托派工作瘫痪。^①

蔡元培为《独秀文存》再版撰写“前言”，称赞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时的工作：“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

5月8日 《红色中华》（第77期）以《托陈取消派向国民党法庭讨饶》为标题，报道陈案审判情况。

5月27日 江苏高等法院将判决书送达陈独秀等，陈不服，起草“上诉状”。

是月 亚东汪原放将江苏省高等法院审理陈独秀案件的文字材料（包括起诉、审判、辩论、判决）印行一千册散发。书名为《陈案书状汇录》。陈独秀在狱中读此书后，在章士钊辩护词上进行批改，特别在陈独秀在国民党“清共而后”转化为托派的词句上，改掉了不少，并把托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的意思，完全删去。某日，汪原放来探望，陈即将此批改本对汪说：“唉！行严真糟！你回去，马上告诉他，我再也不要他替我答辩了！你看罢！……这成什么话。”（指托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最后答应让汪把此批改本带回去，给章士钊看看。^②

^① 纪它（陈其昌）：《一年来上海组织现象的教训》，《校内生活》第7期。

^②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59页。

6月15日“上诉状”写成，驳斥所谓“政府即国家”之谬说，揭露国民党政府卖国独裁种种罪行，阐明工农苏维埃政制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段”，“对待剥削阶级少数人以专政，以实现被剥削者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之真正民主国家”。批驳法院的判罪是“莫须有”；“侵害思想言论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实现”，“于理于法两具无当”^①。

6月16日 托律师蒋士豪携“上诉状”赴沪与章士钊律师研究后上交国民党南京政府最高法院。

致函汪原放，要求清理自己欠亚东图书馆的债务：“柏、章（即柏文蔚、章士钊）诸君曾有小款托尊处转收，不知全数若干？除此扣还外，尚欠尊处若干？务请抄一细账赐知。无论如何深交，账目必须清楚。令叔对此往往胡里胡涂，望兄一矫正之。”^②有一次，汪原放到南京探望，陈亲自对他说：“我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了，心里很难过，你可以把《独秀文存》重印出来，让我快快拿版税把亚东的账结清才好。”（陈所以欠亚东钱，除过去他本人及延年、乔年支用外，当时他的小儿子陈哲民在上海读书，学费和零用也由亚东按月支付。）

6月22日 江苏高等法院将检察官的《上诉答辩书》送达陈独秀和彭述之，批驳陈独秀的“上诉状”“牵引他国之政制，图卸罪责，其理由自不成立”，“殊难认为有理由”。^③

是日 与彭述之共同接读检察官的《上诉答辩书》后，提出《再抗辩书》^④，一、以辛亥革命推翻数千年之君主专制，改建民主共和，其为效法欧美政制，和袁世凯以“中国特别国情”而复辟，毁坏民主共和之正反两例，阐明近世各国政制皆“择善而

① 《法治周报》，第1卷，第33期。

②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63-169页。

③④ 《火花》第2卷第1期，1933年12月5日出版。

从”，驳斥所谓“一国有一国之政制，未可强为比拟”之谬说；二、再次以政党、国家、政府“三者界义各别”为理，驳斥所谓“危害民国与叛国”罪。

6月30日 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陈独秀、彭述之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八年。陈、彭之供犯罪所用文件书籍，均没收，其他上诉驳回。

7月 判刑后，每日接见亲友，从不间断。来往书信先经由段锡朋转交，后来通过一九三二年刚入狱时的监狱看守（后离职）的季杰的公馆，建立通讯机关，凡陈独秀各方往来信件，均由该处转递。

7月18日 章士钊应汪原放及陈独秀之请，写信给过去在上海常为陈看病的黄钟医生，请黄赴南京，为陈看病。因为此前汪到南京看望陈时，陈说肠胃病复发，法医看不好，要请黄医生来治。陈即写了一封信，托汪带给章士钊律师。

8月1日 致函汪原放，说高语罕寄的登有陈“上诉状”的《大美晚报》（汉文版）未收到，要汪再搞一份；并嘱汪与章士钊一商，将其辩护词中“清共而后……罪胡为乎来哉”这一段“删去”。信末请汪购或向李季借一部英文的莫尔干著《古代社会》。

8月9日 致函汪原放，嘱购日本改造社出版的莫尔干《古代社会》（上下卷）、《列宁的组织论》、《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论理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等书，寄刘梦符处。还介绍洪孟博和刘仁静释译《马可波罗游记》，认为“此书在近代东方史（特别是中国）极有价值”，并说“其中人名、地名部分很难译，此方面，弟（指陈自己——引者）可尽力考证”。还建议由李

①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59页。

季重译莫尔干的《古代社会》，推崇“此书和《资本论》及《人类由来》为近代三大名著，皆世界不朽名著也”。^①

9月12日 致函汪原放，托购何礼著的几本小册子（内容是主张共和政治的）和《中亚细亚游记》，认为这两种书恐已缺版，“有不朽的价值”，“如能寻得，等于获得宝物。……倘购得，亚东大可重印出版，可请多人作序（弟当然要作叙）大吹一下，这种书真值得一吹也”。又说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洲历史、地理》、《史林》三种刊物中多名著。“我以为亚东亦可于其中选择几种出版，因其有永久价值”；表示：“亚东如真有意办此事，我可寻可靠而价贱的日文译手，由我选编指导为之。此事如商之适之兄，彼必然赞成。”在同日又一信中，还叫汪代售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及清华《国学丛刊》、罗振玉著《殷虚书契》。^②

9月29日 致函托派“临委”并代为起草《目前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③，认为“至少在一九三五年以前，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国家，如果没有意外的大的事变发生，这二三年中还只能是反革命抬头，革命低落的时期。在此革命低落期间，不应该采用过高的自欺的口号，如‘苏维埃’等，我们的力量，应该集中于后年三月国民大会的斗争”。“我提议即日在上海召集一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关于参加国民大会运动的政纲（即政治要求，此政纲中，除以前我们发表的各项要求外，应加上一项：反对国民党起草的宪法草案，宪法应由国民大会自己起草，由全国人民直接总投票表决）及工作大纲”。“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使我们相当的脱离散漫、孤立、软弱的现状”。

10月2日 致函汪原放，因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太贵，囑

①②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60、165页。

③ 《校内生活》第7期，1933年11月23日出版。

不能买，已设法托人借阅。①

10月5日 致函汪原放，托觅英德及德英小字典、日本出的各国语独羽小丛书。②

10月8日 写给托派“临委”一篇短文，《几个争论问题》（署名雪衣）③，谈对几个问题的观点，认为这些问题“具有现实性”，“必须有个真实的解决”，“否则一切工作因为两方面相反的意见相互牵制，一步也不能进行”。一、关于民主运动和国民会议，认为象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能通过民主运动——国民会议道路，比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无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资产阶级在中国已不能完成民主任务。民主运动已变成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批判彭述之仍把民主主义国民会议口号只看成资产阶级的、只能在反革命时期搞改良运动的观点，是“孟什维克”。二、关于“民众政权”口号，认为它是在民众运动高潮而未达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样的中间斗争环境中的一个“临时的鼓动口号”，与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对立，批判彭述之在“九、一八”、“一、二八”反日反国民党运动高潮时，疯狂反对陈独秀提出这个口号。彭当时认为只应提“反蒋”，不应涉及政权问题，并视“民众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三、关于“经济复兴”，认为不管经济状况如何，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运动及有力的同盟军，那里就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批判刘仁静认为必须经济复兴到接近先进国家程度，那里的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革命任务的观点。四、关于苏联问题，认为帝国主义武装进攻

①②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62页。

③ 《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与苏维埃》，1934年5月12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出版，油印本。“雪衣”即色白如雪之衣，又有鹤、白鸚鵡、鸽子之意。清朝名士恽寿平诗词书画俱佳，自称“雪衣居士”。陈独秀在狱中取此笔名，一是表明自己清白，二是与另一笔名“駝儿”相映，而以其才艺论，则也有自比“雪衣居士”之意。

苏联的联合战线已经解体，他们武装进攻苏联没有必要和可能，所以不必再用“保卫苏联”的口号。

10月10日 致函汪原放，告收到赵健带来的书十一本，其中有《第一国际史》、《中国革命史》、《达尔文传》、《不如归》、《书信选辑》、《马克思传》等。又一信，托购《廿五史》。^①

10月11日 致函汪原放，索要英文的《世界地理新字典》等书。在又一信中，谈到偿还亚东债务时，问《独秀文存》还可重印吗？《字义类例》未卖出多少，还有多少呢？^②

10月13日 在11日致汪原放信上加批语，索要1930年由“无产者社”译编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集《中国革命问题》第一、二集，说“此时需用甚殷”；谈到写自传时说：“自传尚未动手写（或不名自传而名回忆录，你以为何如？或名自述）。如能写，拟不分为少年时期等段落，因为我于幼年、少年的事，一点也记不得了，即记得，写出也无甚意义。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谈到读书，他又说：“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要痛，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③

10月30日 吴虞（时为四川大学教授）夜半四点作诗《寄陈独秀狱中》：

早年谈易记儒生， 意气翻惊四海横。

①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63页。赵健是刘梦符的丈夫，从前是柏文蔚部下的军官，那时在慈幼协会工作。

② 同上第163、196页。

③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63、165页。

党锢固应关国计， 罪言犹足见神明。
尽知大胆如王雅，^① 何必高文似马卿^②。
万古江河真不废， 新书还望狱中成^③。

11月2日 胡适致函陈独秀，告《资本论》已托社会调查所的吴半农、千家驹合译，不便再叫李季译等事，表示“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④8日，陈将此信寄汪原放，转李季阅。

11月15日 致函汪原放，表示与胡适绝交：“兄来函为老胡辩护，我深为惊异！你说他太忙，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弟前函及此函所说关于老胡之事，望勿告知他人，即令叔亦不必令知之，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

是月 刘仁静致函陈独秀，批判陈主持托派常委期间的路线和9月29日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说陈在“一二八”抗日运动中主张什么“组织苏维埃”，认为“国民党军队将参加抗日，资产阶级有抗日反蒋可能”，“我们应与之共同行动”，以及认为经济复兴是“纯粹取消派”等等，是“陷于浪漫主义”；而9月29日的文件又“走到另一极端”，以“短视的经验主义代替过去的浪漫主义”，“助长人民的宪法幻想”^⑤。

① 北周大将。据《周书》记载，曾随周太祖战东魏于邙山，时大军不利，为敌所乘，诸将皆退，唯王雅只身冲入敌丛，左右奋击，频斩九级，败敌，太祖叹曰：“王雅举身悉是胆也！”

② 即司马相如。

③ 《吴虞日记》，《党史研究资料》1930年第10期。

④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70页。

⑤ 《对于〈目前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批评》，《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下册。

任曙弃职他去,陈其昌、赵济、蒋振东等人组成托派新临委,解散上海市委,恢复区委,并提出托派今后工作方针是充分运用民主口号与广大群众发生联系,反对中共组织“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对抗的“盲动主义的工运策略”。主张充分利用一切公开的反动的或改良的工会作团结群众及反国民党反资本家的工作。行动口号是:召集普选、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

12月15日 撰《对于区白两篇文章的批评》(笔名雪衣),批判彭述之对“福建事变”提出的“蒋介石只代表中国的买办阶级,不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反蒋”就是执行“民族民主斗争的主要任务之一”的观点,是“离开阶级立场和斗争路线”,“是没有血管神经的腐肉”。文章从托洛茨基说的不能对东方的资产阶级划清他们当中的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界限出发,认为如果视蒋介石只代表买办阶级,“我们左派反对派的一切根本理论与政策,便从根本推翻了”。认为彭述之“以简单的倒蒋口号代替‘打倒国民党’”,是“为国民党内反蒋派做应声虫”,呼吁立刻肃清彭述之的理论,否则会产生“诸多离奇可耻的机会主义政策”^①。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发表《为号召全中国被压迫民众参加上海反帝大会宣言》和《致国际反帝联盟代表团的公开信》^②,要求“派正式代表”参加即将在上海召开的“反帝国主义战争和反法西斯大会”,表示“同意这个会议,我们特地为这个会议准备了一个宣言,公开地号召全中国广大的被压迫群众积极地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热诚地动员我们的一切组织,去执行这

① 《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区白”即彭述之笔名。

② 《火花》第2卷第1期。

种工作”。同时声明：“我们在会议中必需保持我们对于参加的一切党派^①的理论、政策、行动之讨论和批评的绝对自由！”

12月27日 彭述之致函“临委”^②，谈他与陈独秀及尹宽、刘仁静等人分歧，并攻击陈独秀的观点是“机会主义”。

陈独秀撰文反驳彭述之的意见，称彭的“万言书”只是“一些老生常谈、背诵文件和一些不需要再说的废话”，“不值批评”。^③

是月 中共中央指示外围报纸《中国论坛》主编伊罗生^④“写一篇批判左派反对派的文字”，伊认为是诬蔑而拒绝，然后逐渐接近刘仁静、陈其昌等人，与格拉斯^④一起，支持中国的托派

① 《我们间的不同意见》，《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

② 《对于区白的〈我们间的不同意见〉的批评》，《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现阶段之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1934年10月22日出版。

③ 伊罗生，美国记者，来华的公开职业是把中国小说译成英文，寄回美国出版。曾在上海与宋庆龄、鲁迅、蔡元培、史沫特莱等人一起，进行过一些进步活动，并任中共外围报纸《中国论坛》的主编。转向托派后，曾在刘仁静的协助下，广泛收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资料，于1935年回国后写了一本《中国革命的悲剧》，以与斯大林共产国际完全对立的观点，即托洛茨基的观点，全面系统地描绘和总结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过程和教训，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被捧为研究中国大革命的“经典著作”，托洛茨基还为该书写了序。从此，在对待中国大革命的问题上，以斯大林、共产国际和苏联科学院为一方，和以托洛茨基反对派及西方历史学家为一方，形成两个尖锐对立的阵营。争论的焦点，一方认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完全正确，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方认为令中共加入国民党的阶级联盟政策完全错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是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机会主义的路线”。

④ 格拉斯，在中国的化名为李福仁，美籍加拿大人，（据刘仁静所说，另外，王文元则说他是南非人），曾是美国托派负责人之一。刘仁静说他是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而他自己则向王文元声明是因职业关系来到中国，因是托派分子（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所以要找中国托派组织参加。但从他来华后的实际作用来看，他的确起到了托派国际与中国托派之间联络员的作用。他把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的指示精神，传达给中国托派，又把中国托派的活动和各种信息，汇报请示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他在中国的公开职业是上海《达美晚报》和《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从1935年开始，他一直是中国托派临委成员；1942年中国托派分裂后，又属于彭述之派。回国后，曾参加第四国际书记局。

运动。翌年1月,《中国论坛》停刊,《红旗周报》为此发表《坚决反对〈中国论坛〉上偷运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私货(提纲)》,列数伊罗生在该报上表现的一系列托派观点,号召予以揭破,“坚决纠正《中国论坛》上一切错误,彻底改造它,使之成为真正革命的群众刊物”^①。5月20日,伊罗生在托派中央理论机关报上发表《为〈中国论坛〉事给中国共产党的信》,公开表示转向托派^②。

刘仁静为托派常委起草关于“福建事变”的决议和史朝生(施颂德)撰对“福建事变”的意见。认为军阀内部有无战争是民众运动涨落的标准,福建独立是老蒋完结的开始。并认为如果在此时运用国民会议策略是帮助蒋介石政府,重申反对任何形式的阶级联合或共同行动。

是年 美国托派头子格拉斯来华,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副总编和《达美晚报》编辑,并与刘仁静、陈其昌等人接触,支持中国的托派活动,重新沟通与托洛茨基托派国际的联系。陈其昌为书记的托派临委,接受格拉斯的建议(格拉斯认为临委太保守,应增加年轻成员)将北方区委托派骨干史朝生、胡文华、王树本等人调沪,参加“临委”。

① 《红旗周报》第64期。

② 《火花》第2卷第4期。

1934年（ 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五十六岁

7月 托洛茨基创办《新国际》杂志，着手筹建“第四国际”。

12月1日 苏联基洛夫被刺，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等被指控为法西斯帝国主义收买的间谍暗杀集团。

5月3日 宋庆龄、胡汉民等人签名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及《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8月27日 国民党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在南京、曲阜及各地举行首次纪念孔子诞辰活动。10月，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发表谈话，称“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学较之现在一般新学说均为充实”；“希望全国人士从速研究以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11月，国民党中常委又通过“尊孔祀圣”决议。

10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

1月5日 彭述之撰文批判陈独秀完全不了解“不断革命论”，“将民主任务（国家独立统一和土地问题）与代表民主任务斗争的总的政治口号（国民会议）完全混同了”；成了“国民会议狂”，“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一贯“从右边”来接受托

派路线等。声明他与陈独秀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路线分歧,要求托派“慎重的考虑,坚决的选择”^①。

1月7日 撰《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笔名雪衣),批判彭述之等人“把国民会议和苏维埃对立起来”。认为“国民会议即立宪会议,不但是民主任务之一,而且是这一任务的主要支柱,是总摄一切民主口号而与之不可分离的中心口号”。只有“不准备在国民会议口号之下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人,才是“机会主义”。认为彭述之的“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的公式,“包含了几方面的错误,彻头彻尾的错误”;因为它把革命运动分成两个阶段:“用国民会议口号做反对军事独裁的运动”,“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这是“用左的辞句掩饰阶段论路线的本质”,这是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令人惊异的背叛”^②。

1月16日 复函并撰文批判刘仁静,认为如马克思一八五〇年预言德国革命再起未中一样,自己在“一·二八”时号召民众起来反日反国民党,准备复兴革命,准备组织苏维埃、准备领导民众自动召集国民会议取得政权,这一切估量即不幸未中,也未必是刘仁静说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是浪漫主义”;而刘仁静的“中国如无经济复兴,不惟没有革命,且会走向野蛮主义”,及主张“去做那离开了事实十万八千里的经济复兴之梦”,“便纯然是改良派和阶段论者的路线”“是无耻的机会主义”。文章认为托派面临着三条路:一、刘仁静的“经济复兴”之路;二、彭述之的“反蒋”之路;三、陈独秀的“国民会议夺取政权发展中国民族经济”之路。要托派选择到底走哪条路。^③

1月27日 彭述之撰万言长文猛烈抨击陈独秀的“《国民会

① 《对雪衣的政治意见的批评和答复》,《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

② 《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

③ 《我们走哪条路》(雪衣),《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

议与苏维埃》一文除了重复以前的错误与空洞外，更加上了许多新的错误”，“将苏维埃尽量说成一文不值”，“而用刷子将国民会议刷成最光辉美丽的颜色”^①。

2月3日 刘仁静撰文回击陈独秀，认为自己的路线比陈独秀“组织苏维埃的空谈”切实些。批评陈对资产阶级的估量是“动摇的”，一到资产阶级向左盘旋时（如十九路军之抗日），“就对它不免发生幻想”；而对形势的估量，“比我更不加”。“一时轻浮的乐观认为苏维埃革命快要到来，一时又改变成沮丧的悲观，认为革命无抬头的可能，教人们如何对他发生信仰”。这才是“无耻的机会主义”^②。

2月5日 刘仁静撰文完全同意陈独秀对彭述之“单纯倒蒋”观点的批评，但又说陈独秀过去也犯有彭述之同样的错误（如反蒋问题上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刘表扬彭述之“已承认了一九三二年的错误”^③（指主张“组织苏维埃”——引者）。

2月10日 撰文反驳彭述之只会“乱造谣言和乱抄革命文件”，避而不提辩论的中心问题，而“满纸的题外游词，这样的答复只是他自己表示没有争辩能力”^④。

2月20日 托派“临委”通过“宣委”成员刘仁静起草的《政治决议草案》，作为托派日前的行动纲领，并提交下层讨论。

4月6日 致函“临委”，提议在《政治决议草案》中应明确的说到“国际运动的总口号，应该是：‘打倒法西斯的工人联合战线’，而不是‘拥护苏联’；中国运动的总口号应该是‘打倒国民

① 《评雪衣的〈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再论十月革命的经验》，《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

② 《经济复兴与民主斗争——答雪衣同志》，《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

③ 《评区白的政治意见》，《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

④ 《应该这样答复吗？》，《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

党，实现彻底民主的全权的国民会议’，而不是‘倒蒋’”。批评“草案”对国民党准备召集国民会议并颁布宪法这一重要政治问题置之不理。^①

4月6日 撰《读列尔士〈评区白的政治意见〉后》（笔名顽石），反驳刘仁静，坚持认为托派中央在“一·二八”时的“路线是正确的”，说如果将来再出现那样的局势，托派主张迎接革命高潮，而被刘仁静的“盲动主义”和“反马克思”等等大帽子压倒，“我真要为中国革命痛苦！！！”申辩自己在“一·二八”后主张的“共同行动”，与彭述之主张与反蒋资产阶级政治联盟，本质上是不同的。^②

4月12日 托派临委宣委成员史朝生在格拉斯、刘仁静的支持下致函陈独秀，批评陈被捕后的托派中央没有及时组织讨论，统一思想，并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以至组织“几乎溃散”，“极无生气”。批评临委只依靠上海几个老同志挽救局面。主张“在全国范围上去集合一切优秀的坚决分子，相互帮助着推动革命的中心组织和中心工作”，提议临委做出一个关于目前争论问题和组织工作的草案和大纲，发到各地及下级讨论，召开临时大会，推举“特别委员会”，以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并担负过渡期中全国性指导工作。^③

4月17日 史朝生致函陈其昌为首的托派“常委”，批评“对总的问题——特别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准备得太缓慢和太不充分，工作方式好象是个保姆或教授”；要求常委自身将各种重要的问题（包括陈独秀等新提出的）作一扼要的总的讨论和大

① 《对政治“草案”和其他问题的意见》（顽石），《校内生活》第8期，1934年4月30日出版。

② 《读列尔士〈评区白的政治意见〉后》（顽石），《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

③ 《与雪衣同志论召集代表大会问题》，《校内生活》第11期，1934年9月29日出版。

致的定决。

是月 除陈独秀外,彭述之,史朝生、以及沪区委、北平、广东等地托派组织,纷纷批评《政治决议草案》在国际形势、国内经济复兴、国民会议策略、红军问题、建立独立的托派新党等问题上的错误。

5月12日 撰《我对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笔名顽石),批判刘仁静、史朝生去年底对“福建事变”的意见,说刘仁静“有时向左,复又向右”。向左反对“共同行动”,向右又夸大国民党将军及资产阶级自由分子的力量与作用。认为“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不但是我们的基本路线,并且即可用为在现时的宣传口号”。指责刘、史“笼统的对于任何形式的阶级联合或共同行动以全盘的否定,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在阶级斗争未达到最后决胜负以前,资产阶级中之自由主义者,往往因外国的侵略或国内的军事独裁之专横,而表示所谓‘左倾’”;“当他们向左盘旋时,我们可以和他们共同行动,以打击共同的敌人,例如抗日与倒蒋”,同时批评暴露他们的不彻底性和对群众的欺骗^①。

5月15日 史朝生以宣委委员身份列席“常委”会议,提出《当前推动组织的步骤》^②,重复了4月12日致陈独秀信中的主张,要求“建立比较满意的领导机关”,“一切消极、悲观乃至对组织采取绝望的情绪或倾向,必须和它坚决斗争,并予肃清。”

5月17日 撰文抨击刘仁静在《我们的任务》^③一文中说的托派“应当负起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的责任,……国家统一和权力集中,生产力发展这些条件,比现在国家分裂和生产力衰败的条件,对于它(指无产阶级——引者)是有些利些”的

① 《我对于几个问题的意见》(顽石),《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

② 《校内生活》第11期。

③ 《火花》第2卷第2期。

观点。说这段话“包含了浓厚的反动性”；“离开无产阶级革命，而要求国家统一，要求生产力发展，特别要求权力集中，这恰好是法西斯蒂的政纲！”“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肃清资本主义的障碍，而是肃清列尔士毒害无产阶级先锋队之昏乱的思想。”^①

是月 托派临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吸取大家意见，修改《政治决议草案》。刘仁静、史朝生表示另外起草“提纲”，不必修改“草案”。

月底 因意见分歧，陈其昌退出“提纲”起草工作。史朝生、胡文华、王树本起草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讨论提纲》，要求以“提纲”代替“草案”，遭临委扩大会议“拒绝”。

6月1日 刘仁静撰文反驳陈独秀对“经济复兴”论的批判，指责陈独秀是“小资产阶级政客戴着反对派的假面具，极盼望无产阶级受到刺激走上革命以拥护他们取得政权”。认为进行“肃清资本主义发展障碍的斗争”，“经济恢复，工人也相当的多些，肚子也吃得饱些，夺取政权的斗争更容易胜利。”说自“无产者社”成立以来，陈独秀的策略“没有一次不错误”；与资产阶级“共同行动”的主张是抹杀两个阶级之间的“鸿沟”，是“偷运过去的革命资产阶级之理论”^②。

是月 托派北方区委负责人刘家良调上海，任沪西区委书记，与史朝生、胡文华、王树本等人一起，进行反对陈其昌为首的临委和陈独秀的斗争。

8月1日 陈其昌撰文批评史朝生的“组织意见”“实际是捣乱组织的办法，无政府主义的办，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表现”。

① 《肃清列尔士毒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校内生活》第9期，1934年7月31日出版。

② 《关于经济复兴问题及其他》，《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

主张整顿组织“应该绝对排斥无计划的急进主义”，“应该有计划的持久的从政治图发展”，“偏重同志政治水平的提高，经过这种提高来整齐纪律，推动工作，并预备下次革命”。^①

8月12日 史朝生批驳陈其昌关于整顿组织的办法是“渺小的民族狭隘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②

9月22日 致函汪原放，告收到《独逸文法教程》，“极好，正合用”，又要《世界地理新字典》。^③

9月27日 致函汪原放，说托吴静如转上宣纸一条，请即送交章士钊，请其大笔一挥，觅便寄来；还说“拟择朋友中能书者四人，各书一幅，合为一小屏，朝夕瞻对，以释消愁”。章士钊此书，即此四幅之一。章的条幅如下：

夜郎流客意何如？犹记枫林入梦初。夙鄙诸生争蜀洛，那禁文网落潘、吴。议从刻本成奚在？煎到同根泣亦徒。留取心魂依苦县，眼中台鹿会相呼。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扞虱我谈兵。伯先京口长麦酒，子谷香山苦嗜饧。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博泉声。红蕖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根目尽迎。（佛罗伊德画一囚室，其人目送窗棂间，日光一线，生平梦想事件均浮动于中）

独秀兄近自江宁函索拙书，因便为长句写寄。世乱日亟，衣冠涂炭，如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奉怀君子，不尽于言。

士钊 甲戌初冬^④

10月10日 致函汪原放，告“文稿已动手，题为《道家概

① 《批评朝生同志的组织意见》，《校内生活》第11期。

② 《与反对派内部残余的官僚主义思想斗争——并答纪它同志的组织意见》，《校内生活》第11期。

③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64页。

④ 同上第171,172页。

论》。此一种稍冗长，一时不易写完，拟先写一短文，题名《老子考略》，写好即寄由兄处转行翁（即章士钊——引者），乞兄先告行翁，不知合用否？行翁收到拙稿，系售诸书局出版，或暂存行翁处以待价，请兄询明行翁示知”^①。

10月18日 陈其昌撰文批判“讨论提纲”“到处都是内容的错误”，“前后矛盾”，“顾此失彼”，“文字技术拙劣”，“不配代替草案”^②。

秋 潘兰珍按照陈独秀的旨意，由沪迁居南京，住段锡朋家，从此，每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到狱中照顾陈独秀的生活，并帮助吴静如做陈与上海托派临委的交通工作。

11月3日 致函汪原放，告托吴静如带上文稿一册，转交章士钊，“倘不能用，亦望示知，以便另写别稿”。又告拟在二、三年内的写书计划是：《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我的回忆录》。^③

11月18日 史朝生、胡文华、王树本撰文批驳陈其昌批评“提纲”的意见是“咬文嚼字和混乱错误”，坚持用“提纲”代替“草案”，并批判陈其昌和陈独秀主张的与胡汉民等“首先推翻蒋介石”的“联合战线”是“最大的机会主义幻想”^④。

11月25日 致函托派“临委”，称：“只要有接近群众的机会，不但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之运动应该参加，即反动的资产阶级机关（如基督教青年会）亦应该参加。”如果因为与福建人民政府“谈判合作”失败，遂盲目向左边跑到拒绝与干部派第三党的社会运动（并不是建立政权）合作，即是禁止同志参加孙夫人

①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69页。

② 纪它：《评〈国际国内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讨论提纲〉》，《校内生活》第12期，1984年12月11日出版。

③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69、170页。

④ 《关于“提纲”与“草案”——并答复对提纲的批评》，《校内生活》第12期。

的某种运动，这显然是一个错误。这种错误不用说是中了刘仁静反对任何形式共同行动之毒，这种危害于我们的运动，将不在机会主义之下。”^①

12月2日 尹宽致函陈独秀，抱怨“五、六年来，反对派尚停滞在小团体的状况中，尚未得着发展”，现在是“不仅还没有斗争的基础，并且还没有端正方向，还在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之中”。尤其是“一二八”事变及“福建事变”中所存的一些幻想遭到失败，完全陷于“消极状态”。表示自己不愿“加入现时争论的漩涡”，说现在的争论“实在太浪费了，急待结束”。要求陈独秀“舍弃那些以单个问题为中心的争论，而换一个方向来讨论问题”，即以“抗日”、“反战”为中心，讨论托派目前的政治任务，而不要纠缠那些普泛的口号，“成为‘民主’的改良主义者”。主张“本着我们联合战线的策略号召‘抗日’‘反战’的统一战线，以推进政治运动而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②。

12月18日 为亚东图书馆年关需款周转事，致函柏烈武，望设法借款。

12月28日 陈其昌致函陈独秀，汇报其与史朝生等人争论情况。

是月 刘家良为首的托派沪西区委要求临委就几个极严重的政治问题或原则问题必须马上作一个明确的解决。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反对‘与上层（无群众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建立反帝反战反蒋反国民党统一战线’思想”，认为这种“思想”是“机会主义”^③。

是年 赋诗《金粉泪五十六首》，揭露和讽刺国民党及其头

① 《雪衣来信论对宋庆龄史大林派集团的策略》，《校内生活》第13期。

② 《给雪衣同志的信》托派内部油印小册子。

③ 《我们目前必须确定的几个重要问题》，《校内生活》，第12期。

目蒋介石、汪精卫等独裁卖国，崇洋媚外，尊孔读经，复古倒退，寡廉鲜耻，腐败无能，苛捐杂税，侵吞灾款等种种丑行，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五十七岁

7月至8月 共产国际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

10月 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

1月 中国工农红军占领遵义，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的正确领导。

5月 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大批入关，在华北制造事端，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

7月 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出卖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主权的协定——“何梅协定”。

8月1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10月 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11月1日 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被刺。国民党内亲日派与英美派矛盾激化。此后，蒋介石接替汪精卫的“行政院长”职务，各部部长也代以蒋介石的亲信。

11月13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

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蒋抗日。

12月9日 北平数千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推动全国出现了抗日救国新高潮。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

1月2日 史朝生、刘家良等人背着陈其昌拟订并发出《临委紧要通告》^①，通知各支部十天内派出代表一人，出席“上海代表会议”，议程一、制定目前政治路线，以“提纲”为根据，要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放弃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集团成立“反战”“倒蒋”等联合战线的主张。二、准备一个新的基本纲领。三、发表筹备成立新党——“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宣言。四、改组“临委”。

1月5日 复函陈其昌、史朝生等，认为他们争论“太琐碎”，提议“停止争论”，立即召集代表大会来解决。说：“我认为草案和提纲都同样不高明”；尹宽起草的《政治决议案》也“太长”，“陈词滥调”，“毫无生气”。主张“草案”与“提纲”都不用，“由代大另行起草。我并且现在写了一个草案，贡献于代大”。规劝陈其昌对于史朝生等人指出的“不主张着重于基本路线的规定和教育，而着重于零碎的实际工作的倾向”，应“痛加反省和改正”。反驳刘仁静、史朝生在联合战线上的观点，申明不应反对一切联合，“联合战线乃是两个政治立场根本不同的政治

^① 《校内生活》第13期，1935年2月8日出版。

集团在某种政治上一时利害相同的共同行动，并不是谁投降谁，即谁接受谁的指导”。“至于整纪和清党，应该‘行之以渐’和‘去之太甚’，并且必须于代表大会后举行之，目前万不可操切!!!”^①

1月10日 完成《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案草案》^②，供托派“临委”起草新的政治决议案用。草案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实力精神都日益削弱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停留在被迫的零碎的防御之阶段”。西方帝国主义与日本妥协的结果，“南京政府必然逐步受日本帝国主义之支配”。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应当看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不是目前的现实问题，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在靠紧一切民主斗争”；“国民会议的口号，正是一切民主运动之反映及其总和”。认为“必须有不断的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才能够推翻国民党政权”，农民战争对于国民会议的斗争，“也只能放在次要地位”。

1月13日 托派支部代表七人举行“上海代表会议”（陈其昌等人弃权），史朝生、胡文华分别作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全体一致同意，并认为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关于“联合战线”的意见“乃史大林派机会主义思想之复活”，“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必须作“无情的斗争”——“作最后一次的谈话，假如他们重新考虑之后，放弃这种意见，我们是同志，否则，应立即开除出党”。会议决议改变全国领导机关名称为“中央委员会”，不复用“临委”名称。“中央”由十人组成（包括格拉斯），史朝生、胡文华、刘家良（书记）三人组成常委。

1月15日 接见由沪来探望的陈其昌，听取史朝生等人擅发《临委紧急通告》制造分裂的情况汇报，并写信给陈其昌、史朝

^① 《校内生活》第13期。

^② 《肃清机会主义》（托派小册子）。

生、尹宽，说“一切不乐观的现象殊令我不安！”责问《通告》中将“我的意见”和“非我的意见”混在一起，“是什么用意”。呼吁“一切须代大及国际解决！”“不宜草率决定，尤不可由少数人捣乱后，盗用组织权威来解决政治意见，尤不可采用开除个人这种滑稽手段”。“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如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①

1月19日 陈其昌发表《为目前组织纠纷事告全体同志书》②，揭穿史朝生等人背着他一星期内制造了《临委紧急通告》，是“非法的”，提出“联合战线”问题是个幌子，目的是为了开除不同意见的人，“取得领导机关”。“我不得不向全体同志声明：所有‘临委紧急通告’、‘上海代表大会’及其结果，我一概不能负责任。现在及今后，我将尽我全力免除无理由的组织分裂。”提议解决办法：一、绝对反对任何同志盗窃组织权威在目前用开除人的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二、另开上海全体代表大会解决纠纷，选举多数同意的领导机关。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问题。四、政治问题以国际答复作最后决定。

1月24日 王文元出狱后来上海，致函刘家良、史朝生托派“常委”，呼吁“在目前中国这样黑色的氛围中，我们这点快等于零的力量，应该要相当加以珍惜的”。提议将不同意见提交全体讨论，大会解决，“请国际作最后解决”，在解决前，“不要进行组织分裂和制裁”。③

1月25日 刘家良、史朝生为首的托派中央给陈独秀一封长信④，系统地列数批判陈独秀四大机会主义错误：“共同行

① 《校内生活》第13期。

②③ 《全体起来，制止无理的分裂组织!!!》（油印小册子，1935年2月6日）。

④ 《校内生活》第13期。

动”，放弃“保卫苏联”及“联合苏联”的口号；现在仍把“红军”看做“流寇土匪”；组织问题上“拉拢调和的中派主义立场”。指责说，如果这些错误不改正，“则许多机会主义的路线和分子将不断的藉你的‘权威’和藉你的这些错误发展起来”。表示不同意陈独秀解决组织问题的办法，“或者纠正错误，或者马上分裂，任何拖延的办法（如‘等国际来信’或‘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来解决），都是有害的形式主义！”

2月4日 托派“常委”发表通告《为撤销陈其昌商吉士（尹宽）党籍及要求其他同志表示最后态度事》^①，说中央委员会与陈其昌、尹宽作“最后谈话”，陈、尹表示“原来的政治主张完全正确的，一点不能更改”。因此决定将他俩人“开除”，并要求陈独秀、赵济、蒋振东等人表态。^②

2月5日 陈其昌撰文揭露格拉斯、史朝生、刘家良在“联合战线”问题上造谣，歪曲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的真实意见；阐明正确的“联合战线”策略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③。

2月初 胡适致函陈独秀，寄来陈的拼音文字稿，告稿费已付帐，要陈修改后交“商务”出版，并道及“商务”还要陈的其他著作。

2月11日 致函汪原放，要求校阅李季翻译的《马可波罗》，并关心亚东的经济状况，说“店股款事，谅必无望（我以为章、胡都无法），则只有自己努力，极力开源节流，以勉强支持此不景气时期。年关不知如何过去？好在全上海市面都不佳，即信用不好，也不算什么特别希奇，望勿以此愁坏身体！”^④

① 《校内生活》第13期。

② 陈独秀终因坚持原来的观点，反对开除陈其昌等人，也被刘家良、史朝生的托派中央开除了。

③ 《全体起来，制止无理的分裂组织!!!》。

④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65、167页。

2月14日 复函胡适,望向王云五(“商务出版社”总编)询明示知:“我拟写各书他们要么?……倘真要,我便真写。他们倘真要,望示以内容大致范围,明确能出版者。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①

2月18日 致函汪原放,为亚东改组事出主意:书店改组后,汪孟邹只任董事,推胡鉴初任经理,“我甚以此见为然”;“兄之借款主张,全是幻想,切勿再作此打算。股份公司亦不可能,不独招股不易,而且以书店历史关系,诸多窒碍难行也。唯一的办法,只二三好友,集资合办”。合资人,章士钊、黄钟、汪孟邹三人最相宜。若章与胡适能合作,胡亦应加入;“惟此事务必慎重,不可冒昧邀胡加入,是为至要”。还提议章、黄出任董事;速催汪孟邹来沪等。^②

3月 刘家良、史朝生、王耀华、胡文章和格拉斯在上海,刘仁静、伊罗生在北京^③。先后被捕。他们组成的托派“中央”从此消亡。格拉斯不久被保释后与陈其昌、尹宽等人合作,重整中国的托派活动。

8月8—13日 托洛茨基在挪威奥斯陆接见伊罗生,听取中国托派情况的汇报。对刘仁静在“共同行动”问题上说的“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托氏“绝不相信”,说:“共同行动,纯粹插话性的共同行动,一定得同向资产阶级投降、混合组织、或不为任何具体任务而建立一种永久组织的‘联合战线’——如法国的人民阵线——分开”。“刘仁静可怕地把不同意见夸大了。……我稍稍认识了一下,就已使我相信和陈独秀的分裂是不允许的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68页。

^②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67页。

^③ 刘仁静于1934年8月去北京,受雇于伊罗生,为伊收集中国大革命材料当翻译。

了”。陈独秀“有更多的经验”，“他能贡献于我们许多好的意见，……我们绝对需要留他在第四国际的总委员会中与我们合作”。^①

9月4日 尹宽撰文批评陈独秀起草的《现局势与我们的任务议决案草案》是“极端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心思想是在以民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在总路线上，它是代表右派，即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认为托派活动不应“靠紧”民主斗争，而应“靠紧”在“抵抗日帝”、“农民战争”、“加深国民党政权的危机”这些条件上。^②

夏 数次致函陈其昌等人，主张由陈其昌、赵济、王文元组成三人委员会，整顿托派组织，并力阻再和格拉斯合作，拒绝格拉斯到狱中来拜会表示和解的请求。

11月15日 尹宽、蒋振东等致函陈独秀，谈重组“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临委问题，批评陈其昌挟陈独秀“以自重”，“算旧帐”，要求原史朝生“中央”的成员“承认错误”等，以破坏重组工作。^③

11月17日 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临时委员会”起草《开除刘仁静党籍启事》^④。该《启事》经临委一年的核实后，稍加修改，发表在托派机关报上，改题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开除刘仁静党籍通告》^⑤。《启事》及《通告》称“刘仁静于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被捕之后，未能保持革命者坚决的态度，后入苏州反省院，更显出动摇的倾向”；批判刘在该反省院出版的半月刊上发表的《读资本论刍议》和《谈西洋史论》等文

① 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中国革命问题》第331页。

② 《肃清机会主义》，托派小册子。

③ 《给雪衣同志的信》，托派小册子。

④ 陈独秀手稿。

⑤ 《斗争》第14期，1936年12月15日出版。

章中宣称的如下观点：“现在民族复兴的途径只有靠阶级调和，一致对外”；“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幻想”；中国应该“节制私人资本，即是创造国家资本，即是为了有计划的发展中国实业——如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中所指示的——而创造国家资本，……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通告》说“此种理论完全自觉地为反革命的国民党服务，与本同盟的根本立场完全相反”。“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开除其党籍。”

11月18日 尹宽、蒋振东、王文元等八人发表《为成立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临时委员会的建议》，关于路线问题，影射陈独秀和刘仁静的观点，宣称：“我们战略的总路线是夺取政权”，“放弃了实际革命任务，无产阶级便自失其独立的政治地位。如此要求民主的国民会议或为经济复兴而斗争，便只有屈服于统治的资产阶级之下”^①。

12月 上海托派代表会议召开，选出陈其昌、尹宽、蒋振东、王文元、格拉斯为临时中央委员会。因陈其昌、王文元等不断解说格拉斯是“忠厚老实的同志”，陈独秀对与格拉斯的合作表示谅解。“临委”成立后，出版政治机关报《斗争》和理论机关报《火花》，并在北京、香港、山东、广西等地整顿或重建组织。

^① 《给雪衣同志的信》，托派小册子。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

五十八岁

5月 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7月 德意勾结武装干涉西班牙。10月 德意签订罗马——柏林轴心“协定书”。

8月19—24日 苏联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被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十六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5月31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成立，发表宣言，建议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战政权等。

8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共两党共同反日的统一战线。

12月12日 “西安事变”。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条件。

2月10日 上海托派组织中分裂出一支“极左派”，以“印刷工人工军、绸厂工人钟仪”等人签名，发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筹备宣言》，宣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她的分子应由百分之百的‘先进工人’构成”，“中国现时还没有共产党，真正的共产党还须待先进工人来创造。一九二七年

以前的共产党,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朱德、毛泽东的共产党,实际上是‘农民党’;一九二七年以后陈独秀所领导的左派共产党,实际上是‘立宪党’(即他们所唯一崇拜的“召集国民会议”)和‘马克思主义学会’。……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要把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东西打为粉碎”^①。

3月10日以“孔甲”为笔名,发表《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人们对民主主义,自来有不少的误解”;“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人类社会,自有政治的组织及其消灭,在此过程中,民主主义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各阶段的内容与形态”;“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化之一种动力”。在理论上,完成民主任务,“并不限定是那一阶级”。文章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应把完成民主任务放在肩上,批判托派中有人“企图把我们现时采用的国民会议口号,预先和解决民主任务及夺取政权分开”,把民主仅仅当作推翻军事独裁的一种手段,“取得政权后使用不着了”的观点,指出“我们采用民主主义的政纲与口号,是目的并不是手段。……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并不是抛弃民主主义,而是扩大民主主义,……在这一意义上,在现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民主主义势力的真正代表,我们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文章就此抨击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最后呼吁:“我们现在应该矫正了罢!”“矫正的要点是:一、不要把资产阶级狭小的形式的民主主义,当做历史上随着各阶级发展的民主主义之全内容!二、不要把民主主义当做是和社会主义不能并存的东西!三、不要把民主主义的要求当做仅仅是推翻资产阶

^① 这支托派中分裂出来的“极左派”,只几个“工人”,昙花一现,发了几张传单就烟消云散了。原来的托派以陈其昌为首,这时已改名叫“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级军事独裁的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①后来王文元回忆说，陈的这篇文章“表示出这位中国启蒙运动大师思想上的新转变，他在不断跃进后的倒退”；“我们看到了独秀的文章，没有一个人同意。他把民主主义看成为一个超历史超阶级的范畴，还原成一个抽象的观念了。……附在独秀那篇文章后面，我写了一些反对意见，一起在《火花》上登载。”^②濮清泉回忆陈独秀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当时陈在狱中与濮等人议论莫斯科审判“布托联盟”案件，陈认为人类历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贱视民主”，“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是违背马克思、列宁的学说的，变成了“官僚国家”，不应再称为“工人国家”^③。

4月25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向中国国民党、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党、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同盟、全国青帮、红帮、哥老会等各党、各派、各报馆、各军队、各工会、各农会、各商会、各学生会、各团体、各会社、各帮、各业全体同胞们提议：“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盗匪们的长驱直入，以反对汉奸卖国贼丧心病狂的无耻行为。”并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讨逆”；“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六条作为共同行动的纲领。表示“欢迎各党各派的中央与地方组织，能接受我们的提议，互派代表同我们与我们的地方组织共同协商具体进行办法，组织各党各派的中央的与地方的行动委员会，以创立中央的与地方的抗日的人民阵线，为上述的纲领的彻底实现而奋斗”^④。

① 《火花》第3卷第1期，1936年3月10日出版。

② 《双山回忆录》第209—210页。

③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④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137—139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5月6日 汪原放受茅盾之托到南京，约请陈独秀写一篇《五月二十一日》征文。陈独秀写了《中国的一日》，^①影射攻击共产国际和中共提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宣称“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若有人企图把所谓整个的世界这一抽象观念，来掩盖两个横断世界之存在，而和缓其斗争，这是反动的观点”。“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不同的横断世界及横断社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呼吁人们“不要做痴子，而受骗子的骗”。

春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解散。周扬根据党的主张，在上海文艺界中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表示拥护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补救”和“纠正”“国防文学”口号的不足，强调“新的口号”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批评中国托派“似乎糊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糊涂的昏虫”。他特别批评了“文艺家协会”的“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反对“轻易诬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的作风。7月7日，鲁迅得陈其昌（署名陈仲山）信及所赠近期《斗争》、《火花》主要内容攻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攻击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新政策”是“背叛”，吹嘘“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以图争取鲁迅对托派的同情和支持。鲁迅复函陈其昌时斥托派“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的

^①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88页。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生活书店1936年9月发行。

理论，“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颂扬“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①。

某日 得知陈其昌与鲁迅通信后，大发脾气，责问托派“临委”为什么对鲁迅发生幻想，并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②

春夏间 就托派分子黎彩莲去世，致函赵济：“……彩莲的死使我很悲伤。一生中我遭遇到这样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从来不曾如此难受过，也许是我老了……”^③

7月1日 撰《我们在时局中的任务》(笔名“虬儿”)^④，猛烈攻击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对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军阀、买办、官吏的“退让”，“而不是团结一致抗日救国”；是“奴隶选择主人”，做“亲英反日”的“工具”，而不是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

8月18—24日 莫斯科审判“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案，被告被指控“遵照外国资产阶级侦探机关指令”，“力求摧毁党和苏维埃国家，”“凶杀”基洛夫、高尔基等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处死刑。

① 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且介亭杂文末编》第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鲁迅1936年7月7日日记。鲁迅答信中说陈信是6月3日所写，复信是6月9日。据日记核查，可能日子搞错了。7月7日日记记载：“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有人把陈仲山误当陈仲甫，认为此信系陈独秀所写，不确。

② 参见《双山回忆录》，第207页。

③ 《双山回忆录》第278页。

④ 《火花》第3卷第3期。1936年6月25日出版。据郑超麟和濮清泉说，他们在托派内部刊物上，读到不少陈独秀署名“虬儿”的文章；句之瑜也将“虬儿”的文章，列入“独秀著作年表”。“虬”即“燕子”、“玄鸟”。相传“陈”姓第一代是殷商时代的胡公。周灭商后，封胡公于今河南淮阳一带，国号“陈”首都宛丘。传说商是契的子孙，而契是其母简狄吞燕卵而生的，即“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以一些姓陈的知识分子，常以燕、鸟为雅号。陈独秀取笔名为“虬儿”，亦如此而已。

12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即原陈其昌为首的托派临委)发表《为西安事变告民众书》(传单),称“卖国贼扣留了卖国贼头目蒋介石”是“军阀内哄”,攻击中国共产党支持张学良抗日“是要扩大军阀的内战”,号召“成立兵士委员会,打倒各方面的军阀!把蒋介石、张学良等逮捕,交给全国民众审判!”“打倒史(斯)大林党的革命叛徒,一切革命民众及贫农队伍集合到共产主义同盟的旗帜之下”,“打倒降敌害民的国民党,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解决一切国事!”

12月中旬 听到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消息后激动得“老泪纵横,痛哭流涕”,“把酒奠洒在地上”,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酌此一杯”。然后与濮德志等人一起痛饮了几杯,并认为“蒋介石这个独夫,此次难逃活命”。后来,蒋介石被放回南京,听到爆竹声,陈独秀又感到惘然,说:“看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象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从爆竹声中,可以听出,他有群众的基础。”^①

是年 应亚东图书馆汪孟邹之邀,推荐生活潦倒不堪的王文元去“亚东”编辑《民族革命家的小丛书》(此书未编成,另译编了两本书:《莫斯科审判的国际舆论》、《莫斯科审判的真相》)。

在狱中完成以下文字学著作(手稿),

甲戌随笔

卷一,甲戌随笔*

卷二,音韵文字杂志*

卷三,古史资料*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

^① 参见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 一、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
 - 二、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
 - 三、连语类编*
 - 四、荀子韵表及考释
 - 五、屈宋韵表及考释*
 - 六、晋吕静韵集目*
 - 七、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
 - 八、中国古史表*
- 实庵字说及其他
- 实庵字说
- 识字初阶*
- 干支为字母说
- 老子考略
- (带*者, 未见公开发表)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五十九岁

1月10日 托洛茨基移居墨西哥。

1月23—30日 苏联审判“反苏托派中心案”，被告皮达可夫、拉狄克十七人中、十五人被枪决。

秋 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矛盾进一步激化，德、日、意加紧备战，扩大侵略战争。

11月 意大利加入反共协定集团，至此，德日意法西斯侵略集团最终形成。

2月10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抗日救国五项国策，同时提出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2月15日至21日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挫败汪精卫等坚持“剿共”的主张，使全会最后通过一个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主张的决议案。

2月至8月 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多次国共

合作抗日的谈判。

7月7日 芦沟桥事变。30日,日军侵占北平、天津。11月10日,上海失陷。12月13日,南京失陷。

9月22日 国民党蒋介石被迫公布《中共中央为宣布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并于翌日发表谈话,承认中共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成立。

9月25日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1月16日 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荀子韵表及考释》。

2月21日 托派临委通过《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政治决议案^①,攻击中共“以抗日为借口,放弃了土地革命,放弃了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总之放弃了共产党所有的立场,以最可耻的态度屈膝于国民党蒋介石之前,‘求其联俄抗日’”;并提出“联合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参加一切群众的救国组织,无情地批评各该组织之爱国主义立场”,“反对背叛阶级的史大林党,建立第四国际的新党”等托派的“抗日纲领”。

3月1日 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实庵字说》(一)。

3月16日 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实庵字说》(二)。

4月1日 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实庵字说》(三)。从文字学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奴隶都是“家庭奴隶”,从而论证中国是“由亚细亚生产制而入封建社会”,宣传未经奴隶社会阶段的理论。

5月16日 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实庵字说》(四)。

6月1日 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老子考略》。

6月29日 汪原放去北平,受汪孟邹之托,过南京时到狱

^① 《斗争》第2卷第2期。

中探望陈独秀。二人谈了一天。汪因见陈常给人写字，也求赐小屏。后来陈给他写了两张：一是《古诗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一首；一是：“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落款是“独秀书于金陵”。①

7月1日 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实庵字说》(五)。

7月8日 致函《宇宙风》主编陶亢德，答复陶托汪孟邹约他写《自传》的问题，“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也久矣，只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②

某日 段锡朋邀蒋梦麟和杨亮功到监狱看望陈独秀。闲谈中，陈表示：“我现在虽然是有期徒刑，实际上是无期徒刑。我现在年事已高，那能等期满出狱呢？现在我真不愿出去，那有象这个地方清静安适。”段问他是否需要冬季衣服，他笑着说：“我先后收到送我的皮袍有十四件之多，正苦无法遣送呢。”③

7月20日 托派“临委”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告民众书》，抨击国民政府“七七”抗战是“欺骗民众，以遮掩自己的投降”。认为“谁如果要我们民众停止作独立的抗战活动，而统一到蒋介石领导下去进行抗日，那不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就是日帝

①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89页。

② 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古今》第8期，1942年10月1日出版。文中说：“使我得到独秀先生自传的是江孟邹先生。他为我写信到南京去作先容。”

③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18—19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杨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使。

国主义的奸细”。攻击中共及各救国团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扮演着这种走狗奸细的角色”；号召“打倒欺骗民众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等。

7月30日 致函陶亢德，告两章自传写就，“第一章拟为‘没有父亲的孩子’，第二章拟为‘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8月中旬，这两章《实庵自传》寄上海《宇宙风》杂志。

8月11日及9月3日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考约奥冈寓所，与格拉斯（中国托派临委成员）谈话，指示中国托派目前的口号是“打倒蒋介石的政策，准备真正的工农政府，即无产阶级专政”。要求中国托派“尽可能注意秘密”，预防“斯大林与蒋介石联盟”在一夜间被完全消灭。称：“如果盟约一签定，他们将杀死陈独秀；我们一定要为他发起一个运动，你（指格拉斯——引者）可以发起这个护陈运动”。①

8月15日 托派临委就“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事件，发表《告工人们战士们及一切劳苦群众书》，号召“武装保卫上海！发动全面抗战！”“要求国民党立即对日本帝国主义绝交！立即宣战！”“反对国民党御用的国民大会，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领导抗战并解决国事”等八项要求。

8月中旬 日机轰炸南京，第一模范监狱也被炸，陈独秀的监房屋顶坍塌，陈幸卧桌底无恙，见人还谈笑自若。原北大时陈独秀的学生陈钟凡（时为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去探望，见此情，遂与胡适、张柏龄等商量联名保释。国民党政府示意“只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释放”。陈独秀闻之大怒，说：“我宁愿炸死在狱中，实无过可悔”；并声明“不要人保”，“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②

① 《中国革命问题》第336页，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②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2年7月，未刊稿。

8月19日 汪精卫复函胡适,告已商蒋介石,“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①

8月21日 国民党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将陈独秀减刑”,称:“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终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该犯入监以来,已愈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盖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②

当日 国民政府发下陈独秀减刑的“指令”,称:“兹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八条,宣告将陈独秀原执行之有期徒刑八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此令。”并决定在报上“明令宣告”。^③

当日 司法院又训令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称:“国民政府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④

8月22日 《中央日报》刊登“国府明令,陈独秀减刑”。

致函陶亢德,关照两章自传中有两处增改,并告“日内即可出去”,“此间小报乱造谣言,请转告一切朋友勿信”^⑤。

8月23日 中午,出狱。^⑥由潘兰珍、陈松年等接出。国民党中统局处长丁默村也去接待,提议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陈独秀拒绝。暂住国民党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365页。

② 国民政府司法院档案呈字260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国民政府指令第1844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国民政府司法院档案,训字594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⑤ 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

⑥ 《申报》,1937年8月24日。

所所长及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家。

《大公报》发表短评：《陈独秀减刑》，谓：“当国家大危难之际，大家的思想和行动都已统一在一个情绪之下，对日抗战之外，再无其他问题。我们欢迎这位老斗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

8月下旬 罗汉到南京，拜访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李克农，请求帮助营救狱中的托派分子。叶、李“欣然允诺”。罗并提及“一·二八”时，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中央曾向中共中央提议“合作抗日”，未见答复，现以个人名义“旧事重提”，请“重新加以考虑”。叶剑英答应电告延安党中央，并请罗汉亲赴延安联系^①。

彭述之、罗世凡出狱后去上海，参加托派“临委”。濮德志去安庆。

8月29日 郑超麟出狱，到陈独秀处住宿一夜。二人就抗战问题发生争执，郑超麟不同意陈独秀列的对抗战的几条提纲，特别反对“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休战”这一条。陈独秀不同意郑超麟视中日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的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观点，及对中国方面采取“失败主义”的策略。郑超麟还从理论上实践上各方面反对中共的政策，攻击中共“会解散组织，全部加入国民党”，陈独秀说“不会的”，但也说了攻击中共的话。第二天，郑去安徽乡下养病。从此二人再未见面。^②

月底 与潘兰珍一起，移居陈钟凡家。因傅斯年家附近被炸，主人又避难他去。

托人向国民党中央统局负责人询问王文元的下落。叶剑英陪

^①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1938年4月24、25日；叶剑英、董必武、博古致《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1938年3月20日。

^②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1980年11月），未刊稿。

同罗汉到南京各个监狱寻找王文元，没有下落^①。

是月 第四国际执委会书记局作出《关于中日战争决议案》，攻击“史大林主义官僚们”“命令中国共产党抛弃一切革命图谋”，与中国资产阶级联盟，同谋“反革命的压迫”。指示中国托派的任务是“进行抗日战争，使得日本战败；爆发革命，又使得卖国而替帝国主义当走狗的国民党失败于无产阶级之手”，建立苏维埃，并“应出其全力建立一个强大的党”。口号是：“打倒国民党”，“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②

9月初 罗汉至西安，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联系去延安问题。因山洪毁路，汽车不通，决定由电报协商。

中共中央就陈独秀要求合作抗日问题，^③提出三项条件交于罗汉：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④罗汉表示不能代陈接受条件，愿代为转达。林伯渠望罗规劝陈独秀，说“陈在文化运动史上有不可磨灭之功绩，在党的历史上，亦有比他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王若飞也表示“因延安有事甚忙，否则可随同南下会晤独秀一次”。他“自信与独秀共事较久，深悉其倔强个性。但中央看重组织问题，亦系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决不容许第四国际

① 王文元说这事发生于九、十月间，似不对。罗汉九月初已离南京，陈独秀则在九月中离宁赴汉。

② 《中国革命问题》第372页。

③ 叶剑英等三人信中说这是陈“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的条件，而罗汉、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则说是“合作抗日”的条件。

④ 叶剑英等三人给《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1938年3月20日。

的或其有关系的份子掺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王若飞“极端希望独秀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的一切是是非非，都无需乎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①

9月中旬以前，陈独秀两次拜见叶剑英和博古，“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②，只是觉得党在未转变前的路线未免太左，既转变后的路线又未免太右一点；^③对托派问题不明确表示态度。

9月中旬（从八月底至九月中），在陈钟凡家住半月期间，各方人士前来探望慰问，有送赈仪的，一概不受，唯北大同学和旧友的赠送，酌受少许。周佛海等人举行所谓“低调谈话会”，散布抗战悲观妥协言论，并多次请陈独秀参加，交换政治意见，陈始终一言不发。

胡适、周佛海等人请陈独秀参加“国防参议会”；陈拒绝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后来，蒋介石还让其亲信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朱家骅拉拢陈独秀，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许以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甚至请陈出任劳动部长，皆遭拒绝。

胡适传话，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表示不去，说他生活很简单，不用去美国，也厌烦见生人。

陈钟凡见陈独秀上述表现，赠诗云：“荒荒人海里，聒目几天民？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陈独秀率笔和曰：

①③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② 叶剑英等三人给《新华日报》的信。

“莫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骋郊邑，兼之怨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①

某日 与傅孟真(斯年)谈论世界大势，傅很颓丧地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运命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运命！”陈独秀说：“不然，从历史上看，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②

在中英协会，与胡适之、傅孟真晤谈，傅向胡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乐观。”^③

9月9日 拒绝有人劝往上海重整托派的建议，由南京赴武昌。9月8日写给汪孟邹的信中说：“弟明日由此(即南京——引者)乘轮赴武昌，俟到彼处，再行奉告。”^④

9月14日 写信给汪孟邹说：“弟已抵汉，暂寓旅社，日内即移居武昌。”^⑤ 16日又写信给汪孟邹说：“弟于日前由南京来汉口，兹已租定寓所，来信望寄武昌城里双柏庙后街二十六号陈仲甫收可也。”^⑥

①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

②③ 参见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政论》第1卷，第13期，1938年6月5日出版。

④⑤⑥ 陈独秀致耕野(汪孟邹)的信。

9月15日 罗汉由西安返回南京，见叶剑英、博古，双方通报与延安与陈独秀接触联系的情况。博古嘱罗汉：恐中央三条件“会引起独秀反感”，“不妨口头传达。”^①

9月23日 托洛茨基致函墨西哥壁画家托派分子里维拉，批评在中国实行“革命的失败主义”的主张，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求解放的和进步的，工人团体都应积极参加。指示中国托派“一面在蒋介石的命令之下（因为，不幸，他在独立战争中掌握着政权）参加军事的斗争，一面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强调“必须用全力指出第四国际是站在中国方面反对日本的”，否则“格别乌（即苏联克格勃——引者）将要骂我们的中国朋友是‘失败主义者’，是日本密探。我们的中国朋友之中，最好的，以陈独秀为首的，也许会在国内和国际被人诬蔑，被人枪毙。”^②

9月25日 托洛茨基答记者问，认为中国托派参加抗战，“必须保持它们对蒋介石政府之完全的政治独立”；攻击中共第二次国共合作政策是“要把中国工人阶级运动在政治上交给蒋介石及国民党，这是一件更可怕的罪恶”。^③

10月1日 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孔子与中国》，认为“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

托派就罗汉在南京、西安与中共接洽合作抗日事发表紧要声明，攻击中共“联合战线”政策“是阶级合作”，“是民族解放战争的制动机”。声明托派与中共非但无“妥协之可能”，而且要“根

① 参见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② 《中国革命问题》第349页，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③ 同上书，第353页。

本粉碎它”。宣称，罗汉早已脱离托派组织关系，无代表托派“资格”，“其行动亦与本同盟毫无关系。”^①

罗汉应托派组织要求，致函彭述之，声明“五年以来自己事实上与组织脱离关系，且亦不悉组织之如何组织”，此次赴京及西安之行，“纯本朋友之谊”，援助老战士出狱，“并申述吾侪老友，最早即主张发动全国武装抗日之事实”；不应“与现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有缠夹不清之观测。”^②

10月6日 应华中大学学生抗战工作团邀请，在该校发表《抗战意义》的讲演，认为“此次对日战争，乃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是人类一种进步的战争”。主张“侵略国的社会主义者，固然应该起来反对其本国政府，而被侵略国的社会主义者，则应援助其本国政府，使之获得胜利”，“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抗战怠工，不尽他所能尽的力量，事实上是帮助了敌人，即是消极的无形的汉奸！”称“如果中国抗日战争得到胜利，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或者不必经过战争，而循外交途径，以次收回。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办法，然而绝对不是幻想”^③。

10月9日 接受《抗战》周刊记者访问，认为当前党政当局最迫切的是两件事：“募集公债和训练壮丁”。表示无意“自办刊物”，因为“现在各报纸杂志都肯登我的文字”，也无意到政府中“做官”，因为“怕被政府里的实际工作所捆住”。^④

10月10日 在《武汉日报》“双十节”增刊上发表《辛亥革命之回顾与前瞻》，赞扬孙中山关于满清推倒，革命尚未成功的

① 《斗争》，第2卷第9期，1937年10月2日出版。

② 罗汉致述之信手稿（1937年10月1日）。

③ 《武汉日报》1937年10月7日。

④ 《抗战》周刊第1卷第6期，1937年10月16日出版。

观点,指出:“我们在今日的抗日战争中,切切不可忘记了孙先生的教训,我们要认识中国的革命还未完成,……我们不要认为抗日就是革命,我们要深切认识抗日战争之目的,是在必须首先排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才能够建设民族独立的国家,以发展民族工业,以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之任务!”

10月15日 在汉口青年会大礼堂发表讲演《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到胜利》,宣称:“我们并不要求日本割地赔款,我们只要交还我们的主权,把在中国侵略去的交还我们,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胜利。”“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需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认为“胜利的因素”是:“第一,从国外得到大量军火之接济。第二,全国民众蜂涌起来,做到全国财力人力之动员。再加上政府军队的力量,这才能够保证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①

10月16日 罗汉偕董必武拜访陈独秀,转达中共中央“三项条件”。陈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②遂起草一信及抗战“七条纲领”,托罗汉带回南京交叶剑英、博古。博古表示,陈的抗战意见“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待周恩来、董必武赴武汉后,再与陈独秀交换意见。后来,周恩来在南京接待罗汉时表示,中国托派可分成几派,陈独秀和罗汉等人“是主张抗日的”,“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③

是日 在《宇宙风》上发表《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认为“此次抗日战争,其对象虽然仅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而其涵义及历史发展的前途,乃是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

① 《我的抗战意见》,华中图书公司,1938年3月出版。

② 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晚刊,1947年11月13日。

③ 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割,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不是两个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主张“此次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①

同期《宇宙风》刊登陈独秀自传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编辑后记中又说:“陈独秀先生除为本刊写自传(第五十期起登)外,还俯允经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

某日 对包惠僧谈到中共中央要求写“悔过书”时说: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

10月17日 参加北京大学“留鄂同学会”欢迎战区来鄂师友大会,并致答词,听取留日同学及华北同学的报告,与到会者一起摄影留念。

10月29日 刘仁静在上海致函李福仁和伊罗生,报告陈独秀在武汉发表的演说和谈话,说“全体同志对他(指陈独秀——引者)表示失望了”。刘仁静在信中还要求重新恢复自己与托派组织的关系,并请将此信转给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于次年6月25日致李福仁的信中表示:“至于刘仁静,我不愿给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势又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弄两面派手法。”^②

是月 撰《抗战中应有的纲领》^③,提出“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改组全国军队,直隶中央政府”;“迅速召

① 《宇宙风》,第49期,1937年10月16日出版。

②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3、74页。

③ 《我的抗战意见》。据陈独秀在10月6日的讲演及为编印《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一书的自序中所说,这本小册子中的五篇文章在10月初即着手编写。

集国民大会，集中全国抗战力量，主持和战大局”等十条纲领。

撰《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①，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认为中国抗战“军事上会一败涂地”，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抗战”；主张“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的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要求国民党政府“解除人民的痛苦，博得人民之欢心，使人民能够自愿的与政府合作抗战到底”。

11月1日 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

11月3日 复函陶亢德，答陶催逼续写自传的问题：“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出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讲词又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杂志登载长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此，即将来亦不能免。弗兰克林自传，即分三个时期，隔多年始完成者，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必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学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餬口者，无论兴之所至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寄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家往往不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率陈乞恕。”^②

某日 段锡朋与杨亮功商量，请杨写信给武汉大学校长王

① 《我的抗战意见》。据陈独秀在10月6日的讲演及为编印《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一书的自序中所说，这本小册子中的五篇文章在10月初即著手编写。

② 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

抚五，因陈独秀生活无着，建议由武大给陈独秀一种名义，每月津贴数百元，但不必让他教课。因为对陈这样的人，教育部不便写信，遂由私人传达此意。陈未接受，王又另行设法，亦未然^①。

11月20日 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报《解放》发表署名“冰”的时评：《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赞扬陈在讲演中视“抗战是一个革命的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的观点，“与中国的托洛茨基的主张已大有差别”，但批评其认为抗日“要发展工业”，“要发展科学”的观点，是朝着“五四”时代，思想还是“资产阶级的俘虏”。

11月21日 给上海托派临委成员陈其昌等人回信（陈独秀从10月14日至11月4日，收到陈其昌等七封信），表示“我对于史（即中共——引者）合作，在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同一工作的对象，不得不互相接触时，此时并没这样的条件。”批评他们与彭述之一样，“乱骂”中共和国民党，尤其是骂中共，“虽然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郑超麟则“走得更远”，“即把上次帝国主义间大战的理论，完全应用到今天，真是牛头不对马嘴”。认为他们与自己“非永久伴侣”；对于彭述之和尹宽，“即使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宣称：“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我绝对不怕孤立”^②。

① 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19页。杨在1929年曾在王抚五任安徽大学校长时代理校务，二人交谊极深。

②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3页。该书是“陈独秀遗著”，是陈独秀逝世后，何之瑜将其晚年未发表的论文和书信汇集刊行的。

上海托派临委书记刘家良致函李福仁，竭力抨击陈独秀：“陈独秀与某几个老同志认为：既然蒋介石与国民党在进行革命的反帝战争，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拥护政府作战到底。……我们的结论是：陈独秀及其附和者对中国资产阶级存在着强烈的幻想。……据我们的观察：这个机会主义者（一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是没有希望的了。与他决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①李福仁将此意转给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时，竟认为“陈独秀出狱是以政治上某种方式的投降来交换的”。

是日 发表《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②，认为“‘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在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这是我们胜利之最大的保障”。主张“有钱者能拿出十万万元现金，有力者能拿出一千万壮丁”。抨击把“有钱者出钱”变成“无钱者出钱”及强拉壮丁的做法。

发表《我对鲁迅之认识》，说“鲁迅对于他们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又胡说“他所反对的乃是对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死”^③。

11月28日 王文元出狱。

是月 在武汉大学讲演《怎样才能发动民众》^④，说抗战急需发动民众，“开战以来，无论政府党或在野党”，都“空喊发动群众”。主张要发动民众抗战，“第一，必须解除民众自身的痛苦”；“第二，必须让人民有经常的组织”；“第三，必须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

上海托派代表大会通过《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说国民党是以“应战”“作为达到妥协投降的目的手段”，

①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69页。

②③ 《宇宙风》第52期。

④ 《我的抗战意见》。

“必须不断地揭破，……并准备力量推翻它们”。攻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彻底投降”，“完全坠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国共合作是“依附于一派资产阶级以反对另一派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和压迫民众之天然工具”，“必须无情地打击”。托派临委曾把这所谓抗战政纲寄给陈独秀，陈未保存。王文元说：“大概是一怒之下，扔进字纸篓了”^①。

11月至12月 在《宇宙风》(第51、52、53期)上连续发表《实庵自传》，叙述了少年时期痛恶孔孟八股文，喜读《昭明文选》，控诉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叙述了自己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的过程。

11月29日 王明(当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委员，主席团成员)和康生回国，抵延安。

12月1日 托洛茨基复函李福仁，表示：“对于我们中国朋友的态度，尤其是对陈独秀的态度，我们应该避免作出鲁莽的判断”。象过去布尔什维克党经历过的那样，战争初期，特别是民族战争初期，总是给革命党造成最大的困难，“它的有资格的代表们发表了一些十分可疑的与模棱两可的宣言。后来逐渐地在群众变动的情绪压力下，他们才回返到革命路线上来。……我们不应该通过非常鲁莽与非常严厉的手续来和中国朋友们决裂。……如果他们现在跨错了一步，同时却不曾跟第四国际破裂，我们一定要用友好的与耐性的态度来批评他们”。对于李福仁“相信陈独秀如果没有某种方式政治上的投降人家不会放他出来”的说法，托洛茨基表示：“对此我不能这样确定”。他猜想可能蒋介石为了与斯大林结盟，去寻找一种平衡力量，而去

^① 《双山回忆录》第232页。

拉拢陈独秀。但托氏强调，这不过是“假设”。托氏还表示完全同意李福仁说的“斯大林派现在可能要暗杀陈独秀”的想法，说“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相信他最好能到美国或墨西哥来”；并强调：“这对陈独秀说是一个生死问题，对第四国际说则是一个有巨大政治意义的问题。至于他能参加(第四国际)大会所能带来的好处，那就更不必说了”。^①

12月4日《解放》(第26期)转载王明的文章《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称：“在现时内战停止和全民族武装保卫斗争开始的条件之下，……日寇侦探机关，必然更加设法安插自己的侦探、奸细、破坏者、暗杀、凶手和暗害者等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他们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12月9日至14日 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中央原决定的在三条件下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决定，王明“声色俱厉的表示反对”，说：“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有人在会上说“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即使不是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②会后，王明到武汉任长江局书记，

^①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63—69页。

^②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18—423页。王明：《中共五十年》第191页，现代史编刊社1982年版。

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擅自发表违背中央路线的讲话和文件，推行错误路线。

12月中旬 王文元来到武汉，在陈独秀家住下，陈向王出示在武汉的讲演稿和抗日纲领，斥责上海“临委”，“只会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表示今后他再不属于任何党派，只代表他个人。至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得在新斗争的分分合合中决定。坚决反对王文元在武汉创办刊物的提议，认为“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说“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抛弃，今后如果还想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必须采取新的方法，走新的途径”——“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反国（民党）而又不阿共（产党）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则积极跨进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王文元认为“寻求新的斗争方法是对的”，但不同意把托派政纲降低到“争自由与民主”，不赞成与各个“民主政派”联络的方针，也不同意他“抗战中不能引发革命”的悲观估计^①。

12月20日 发表《言和即为汉奸》，说：“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了”。“人民要政府抗战到底，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②。

① 《双山回忆录》第233、231页。

② 向愿编：《抗战文选》第3辑，战时出版社1937年版。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

六十岁

3月2—13日 苏联审判“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被告布哈林、李可夫等二十一人中，十八人被处死。

9月3日 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在巴黎正式宣告成立。大会通过了主要由托洛茨基起草的《过渡纲领》（全名为《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是其下属的一个支部。

9月 英、法、德、意在慕尼黑开会，缔结了出卖捷克的协定。

是年 托洛茨基为伊罗生著的《中国革命悲剧》作序，攻击中国国共合作政策，是“遵照着莫斯科命令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反动的与学究气的‘孙文主义’，加入了国民党，服从它的纪律。换句话说，它在对资产阶级屈服的道路上，走得比以前俄国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所走过的更远”。^①

3月29日至4月1日 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周恩来等参加，制定《抗战建国纲领》，成立国民参政会。《纲领》规定“三民主义及总理遗嘱”为抗战建国“最高准绳”。

5月 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以及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

^① 《中国革命问题》第353页，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思想。

10月21日 武汉失守。26日,广州失守。

12月29日 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投敌声明。

1月5日 周恩来在汉口举行的全国救国会聚餐会上演讲,驳斥“中国必亡”的汉奸理论,指出:“抗战的结果将是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光明。”

1月18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公开信”,驳斥托派在武汉《大美晚报》(1月4日)上发表的对于王明汉口谈话的声辩信,斥责托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国民党,以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日寇和汉奸亲日派的宣传“本质上没有丝毫的区别”。指出:“本党在同国民党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自已的独立的政治信念——共产主义和独立的组织的”。^①

1月13日 康生在《解放》周刊第29、30期上连续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诬称陈独秀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即成为每月领取三百元津贴的日本侦探,指责说:“然而,至今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这不能不是全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

1月 濮德志来到武汉,终日与陈独秀、王文元交换抗日问题意见。濮与王文元观点接近,赞同陈的“实干态度”,但不同意“降低政纲”,讥陈在汉口青年会的演讲为“可耻的灰色”。

带领王文元、濮德志与宋哲元部下一军官何基沣(曾参加“七七”抗战,时为120旅旅长,来汉口养伤,擢升为师长)接触,双方协定:王文元、濮德志、马××三人到何部做政治工作,在部队辖区内,“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藉此增强军队的

^① 武汉《大美晚报》,1938年1月27、28日。

力量，谋取抗日的胜利”。王文元提议此事须由上海托派临委核准，“通盘决定工作步骤及调派工作人员”；陈“反对”，“认为让我们几个人干好了，待有成绩与需要时，再向上海要工作人员”（此事后因何基沆接着被免职而作罢）。

与第三党、“救国会”等一些民主人士接触，“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想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不阿共，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目标”，与共产党争夺“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遭到王文元、濮德志的反对，二人拒绝代表陈独秀出席“四派会议”。后来罗汉携家逃难到武汉，与陈独秀住在一起。罗汉代表陈去出席了两次“四派会议”，也向陈独秀告退了。^①后来民主派盟友们，因受王明、康生诬蔑陈独秀为日本间谍的影响，割断了与陈的来往。

2月5日 托洛茨基致函李福仁，再次要求把陈独秀“中国这位老人设法弄到美国来。我觉得，他可以出国宣传，使外国工人运动赞助中国为理由，要求当局授权放洋”。还说：“如果苏联参加战争（这是颇有可能的），中国的局势会于二三个月内发生变化，到那时我们的所有同志会被消灭。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对他们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让陈独秀出来，无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同样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国际中可以起片山潜在莫斯科给第三国际所曾起过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陈独秀还能比片山潜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多好处”^②。

2月6日 托派中央在《大美晚报》上发表答复中共1月18日信件的公开信，申辩托派自“八一三”即改变“打倒国民党政府”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立场，并声明张慕陶和王公度都不是托派。

^① 《双山回忆录》，241—242页。

^②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1页。

2月11日 致函贺松生(即何之瑜),谓“决计入川”,解释不迁湖南的原因:“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免土匪侵害”。

某日 王文元等人建议陈独秀去香港,以便脱出国民党对他的严密监视;但陈不予考虑,主要理由是: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得不给我们的合法身分来作公开批评,一去香港便自动放弃这个身分了^①。

2月18日 为编印《我的抗战意见》作“自序”,说明本小册子除《抗日战争之意义》(在华中大学讲演)外,其他四篇都遭“暂缓登载”禁令而未曾发表,现刊印,作为“试验目前政治空气的寒暑表”。

2月20日 陕甘宁边区抗战后援会等群众团体在延安举行反托派大会,康生报告陈独秀等托派在中国之罪恶。

是月 规劝王文元不要回上海,说那儿的工作是“三个月活动,三整年长监”,没出路。王去意已定,陈约至多半年后,再到“大后方”来,“一起打开更有效的工作出路”^②。

3月5日 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报《解放》(第32期)发表《共产国际关于与法西斯主义的奸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要求“共产国际各支部须在会场上以及在报章上开展有系统的斗争,以反对法西斯走狗——托洛茨基主义,……要达到把这些当法西斯走狗的分子赶出工人运动的队伍以外”;“须使党的组织清洗出那些为阶级敌人所暗派到共产党内来捣乱的两面手腕的托洛茨基分子;如果那些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许多年来在工作中没有证明其真实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证明其真正忠实于党与工人阶级的事业,那就必须撤消其负责职位”。“共产国际

①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4页。

② 《双山回忆录》,第246页。

执委主席团，……要求各支部在党的各组织中，从党的高级机关（党的政治局与中央）起，至党的初级组织止，讨论并研究本决议；同时须顾及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并不是一时的政治运动，而是党的每个组织、每个共产党员的日常的经常的任务，而是每个器重自己队伍的完整与纯洁的工人组织之事业”。

是日 发表《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分析了英、美、法、苏、德、意、日各国在战争中都执行的是为了自身利益侵吞或牺牲中国的政策，认为“在这样各自利害不同的现状之下，简单化的两个对立的战争的集团，自然不易形成”；“所谓德意日侵略战线，或法西斯阵线，乃是似是而非的说法”；“英法美苏民主阵线，这更是虚乌之谈”。主张：“我们不能寄托幻想于国际，我们只有依靠自己，我们更应该拿改良政治向国民让步，来动员全国的财力和人力，再困苦支撑一年以上，以期待敌人的财政先我而崩溃”^①。

3月7日 汪孟邹将两章《实庵自传》由亚东图书馆出单行本。在《实庵自传刊者词》中说：“本集是《实庵自传》的初两章，然可以而窥见作者少年的环境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先为刊出不是无有意义的。现在独秀先生正在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已允许续成各章归我们刊印单行本，这当是读者所乐闻的。”

后来，汪一直催陈写完，他到四川后曾回信说，我正在写《小学识字课本》，这比《自传》更为重要，候此书写好再说。但《课本》未写完，他就去世了。

3月15日 傅汝霖、周佛海、王星拱、段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林庚白九人发表公开信，指责“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

^① 《政论》第1卷第5期。

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情理之外。……鄙人等现居武汉，与陈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①。

3月17日《新华日报》为九人公开信发表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说此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由别人来越俎代庖，均是无济于事”。并说：“陈独秀自从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以后，随着整个托派的堕落反动而走入完全反革命的道路”。

林庚白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声明，对自己参与签署的九人公开信表示对陈独秀的人格，“予以维护，原则上自可赞助”，但因措词“颇涉于共产党所指为托派者之语气”，要求修改未遂，故声明“本人于该函之内容，完全不能同意，应不负任何责任”。

《新华日报》发表评论《关于林庚白的来信》，赞杨林的声明，并指出：“当此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的时候，国民党同志不应把反对托派汉奸的斗争视作是‘共产党内部理论之争辩’，而应……视作是全国人民的责任，同时也是国民党同志的责任”。

3月18日张西曼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声明：说在九人公开信上签名时，曾要求“酌加修改”，但又申明他所以为陈独秀辩护是“因为在他出狱后，作过数度的访问。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和我所创中苏文化协会的伟大使命以及中苏两友邦联合肃清东方海盗的热烈期望中，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

《新华日报》发表短评：《再论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

^① 《大公报》、《武汉日报》，1938年3月15日。

致函《新华日报》^①，说出狱后在南京、武汉与叶剑英、博古接触过程中，“从未议及我是否汉奸问题，并且据罗汉说，他们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见”。宣称：“你们所关心的，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的问题”。“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见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由政府依法办理”。声明来武汉后“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未自办刊物”，不愿做“声明脱离托派”的“画蛇添足之事”。

3月19日 《新华日报》就张西曼声明，发表短评《不容含糊和小心上当》。

3月20日 《新华日报》发表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的公开信，叙述九、十月分别在南京和武汉与陈独秀及罗汉接触情况，说明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表示反对托派汉奸之理论及行动，及坦白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新华日报》发表短评：《关于陈独秀来信》，说陈的公开信“虽然表明了他已与托派汉奸没有组织关系；可是直到今天还是托派思想的俘虏，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不愿意坚决的反对托派汉奸的行动”。

3月28日 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及夫人池田幸子抵汉口，对记者谈话指出：中国抗战，乃为东亚之和平，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

是月 徐特立（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约何之瑜由长沙到武汉，调解由王明、康生的诬陷引起的陈独秀与党的纠纷。

4月8日 致函贺松生，批驳徐特立说的“事情是解决了的”

^① 《血路》第12期；《武汉日报》1937年3月19日。

说法,谓“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日”。批评中共(实际就是王明之流——引者)正在指使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污蔑;宣称:“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帐”。

4月17日 张国焘以祭黄帝陵为名只身投靠国民党(2日离延安,7日到武汉),发表书面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成为叛徒。

4月18日 中共中央作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4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说张在脱党前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期间,“曾见过陈独秀一次”,“在党外去寻找反党的同盟者”。

4月23日 致函贺松生,说:“张特立(张国焘——引者)到武汉事,你们想已在报上看见(今天的新华及大公),我并未遇见他,有人造谣,他已来见我,真可笑”。

4月24日 罗汉发表致剑英、博古、必武、伯渠、若飞、恩来公开信,叙述一九三七年八至十月份与剑英等“很融洽”的接洽情况,驳斥康生对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的诬陷。

4月25日 发表《抗战与建国》^①,称赞“近来新发现‘抗战建国’这一名词,可以说是有深思远虑的”;认为建立“什么形态的国家”,首先须明白“处在全世界历史发展之民主革命时代将完结而东方犹未完结的中国”,必须完成“民主任务”。宣称:“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完成国家独立(即收回以前所有丧失的主权)与统一,并且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便能够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素所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

是月 发表《抗战中的党派问题》^②,认为“在民族危急存亡

① 《政论》第1卷第9期。

② 《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5集,亚东图书馆发行。

今日”，“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批评“国共摩擦”，指出其原因是“两党对于联合方式，都未免鲁莽：一方面国民党未能抛弃招降的态度；一方面共产党在政治上事事迁就允诺，未能坦白的坚持自己抗战的政治主张，因此事后在政治态度上及宣传上引起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有言行不符的疑虑”。主张：一、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党派，都公开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采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二、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为一谈。

是月 发表《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①，批评国民党“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党派合作抗战的条件问题，这未免太过幻想了，而且对于各党派合作抗日是一种有毒害的幻想”！认为“能够使各党派合作团结的口号只有一个，即‘抗日救国’”。

4月底至6月 某日，由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受军统头目戴笠指使负责监护陈独秀与张国焘）介绍，与张国焘见面，此后，二人“密切往返”，有时参加蔡为二人设的便餐。席间，陈曾称赞张早年带领北大学生到上海“沿租界马路商店散发叫卖《新青年》”最为努力。^②

张国焘对包惠僧说，想再组织共产党，拉陈独秀来顶这块招牌，陈独秀没有理他。事后，陈对包惠僧说：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

5月15日 发表《“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③ 批驳“五

① 《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5集。

② 参见蔡孟坚：《悼念反共强人张国焘》，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1期，1969年1月。

③ 《政论》第1卷第11期。

‘四’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的见解，抨击“有些人虽然口中也曾说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实际上并没有认真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住这一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时代性，……所以才有拿农村苏维埃抵制国民会议运动的荒谬政策，所以才有超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所以才闹出‘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笑话，所以才有依靠农村攻取城市的错误路线，……这一大串头脚颠倒杂乱无章的政策”。

6月3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恢复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周恩来、毛泽东等二十六人国民党党籍毛、周、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以“国共两党虽在政治上已告合作，但组织上两党关系是否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之办法并未商定”，且事前更未通知与征求本党中央及各人意见，郑重声明不予承认^①。彭述之也发表拒绝声明^②，终使“决议”撤销。

6月5日 发表《我们断然有救》^③，就日本鹿地亘夫妇和堀田少尉反对日帝侵华言行，强调去年向傅孟真、胡适表示的观点，“只要我们几个人有自信力，不肯附和、屈服、投降于黑暗……，自信我们断然有救”。

6月14日 致函陈松年（已带领其妻及祖母由武汉抵宜昌——引者），嘱其去找国民党政府任职的史岳门，安排一条军火船去重庆。此函发出后，正准备乘包惠僧安排的差船入川，大姐一家来到汉口，姐弟三十年未见，相逢于“颠危”，悲欢交集，推迟入川。

6月15日 发表《国民党究竟决心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认为现在世界上有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德意的法西斯

① 《吴玉章自传》，《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② 《斗争》第3卷，第3期。

③ 《政论》第1卷，第13期。

制，英美法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多党制，“十分迫切”地要求“领导全国抗战建国的中国国民党”，“明确决定采用那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以昭告国人，以免曲解和误会”。^①

6月25日 托洛茨基致函已到上海的李福仁：“我非常关怀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算他。……陈独秀如到美国，能为中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很有效的宣传。他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老革命家、且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资格来进行这种宣传，对于美国工人所能发生的影响会比莫斯科的代理人们所能发生的要大到一千倍”。托洛茨基强调陈独秀“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要李“必须以任何代价把这个建议传递给他，甚至可以摘引我此信的片段，让他可以（并非正式地）给当局看”。对于陈独秀与中国托派组织的矛盾，托洛茨基表示：“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②。

7月2日 乘“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包的专轮入川，往重庆上石板街十五号川源公司。罗汉受北大同学会委托，负责照顾陈独秀生活。

某日 《新民报》、《新蜀报》的几位朋友——张恨水、张慧剑、周钦岳公宴陈独秀。

7月7日 撰《抗战一年》，认为：“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有价值的一年”；“以一个大力士竟不能击倒一个病夫”，中国是“虽败犹荣”。主张使抗战胜利迫切力行“四事”：尽量利用一切国家（即令是魔鬼国家）的援助；在野党口心如一的研究

① 《政论》第1卷，第14期。

②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3页。

政府抗战，获得胜利，“不应该有保存实力趁火打劫的企图”；解除人民痛苦；严惩官吏贪污^①。

7月14日 应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之邀，发表《抗战中川军之责任》的演讲。

7月16日 撰《民族野心》，散布托派观点，影射攻击中共。认为“中国自晚周封建崩溃以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社会延长了二千年”；这是“两个社会（即封建与资本主义社会——引者）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没有资本主义的工业，自然也没有集中的前进的产业工人”，而“农民的特性是守旧，散漫和无知；商人的特性是奸诈和无知；这两种落后的特性合并起来，便形成了双料落后的士大夫群，无知而又无耻”。说“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隔岸观火，商人大做其经济的汉奸”。如果“跟着以最前进政党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中国永远还是农民无知，商人无耻，士大夫无知而又无耻的中国”^②。

7月21日 撰《论游击队》，影射攻击中共农村包围城市及游击战争的理论，说对于游击队，“可以毁的多过可以誉的”。“正当的游击队”，“必与正规军配合起来，才能起较大的作用”，而“在民众之外在民众之上向民众征发军器粮食的游击队，……往往为社会国家之累”，“被人骂为‘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亡国的游击队’”；“幻想专靠游击队来保护国家，便是天大的错误”。强调现在是“城市支配农村”，“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事，……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城市，

^① 《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

^② 《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

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算是亡了国”^①。

7月28日 撰《说老实话》^②。

是月 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资本主义在中国》，批驳中国社会“还是封建或半封建”的提法，认为“观察各国的经济，要估计是那一种经济成份属领导地位，来确定它是那一种社会，没有什么一半一半”，中国“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属领导地位”。但又强调“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之余地”。“在目前，过渡时期，我们宁可忍受资本主义的罪恶，来代替封建军阀的罪恶”。强调社会主义在中国，无论在经济上（工业不发达）和政治上（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都未“成熟”。“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③

某日 接到任卓宣汇来的二百元，当即退回^④。

8月1日 为暹罗《华侨日报》作《敬告侨胞》，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国家的公仆，公仆不良，主人有权利起来赶走他们！”表示：“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不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愤怒；然而我过去不曾自暴自弃和自杀，将来也不会自暴自弃和自杀，但愿与海内外志同道合的人们携着手共同奋斗到底！”

8月2日 撰《你们当真反对资本主义吗？》^⑤认为“现代的

① 《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

② 《告日本社会主义者》，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

③ 《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

④ 任卓宣：《我与陈独秀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任原是中共旅欧支部及湖南省委负责人，后被捕叛变充当国民党特务；全国解放时去台湾。陈独秀在重庆时，任知其生活拮据，故寄助他二百元。

⑤ 《告日本社会主义者》，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

经济制度只有两个：一是资本主义制度，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第三个。”攻击说：“小资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又厌恶害怕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于是乃提出‘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说法”。

8月3日 应同乡及日本留学时的同窗好友（医生）邓初（又名邓仲纯）之邀，移居江津。但遭邓妻“闭门谢客”，欲返重庆，碍有行李之累，又得老友方孝远招待，始在东门城内“郭家公馆”赁得三间闷热的西屋住下。

致函陈钟凡，说：“抚五与我至好，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①

8月5日 发表《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②。

8月8日 撰《我们为什么而战？》^③再次攻击中共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断，及对于他抗日为了“发展工业”的批评，强调中国“应该是‘为民族工业而战’”，并说“此次战争，不但是中日两国都因为发展工业而战争，而且两方面都因为工业有了发展才至于推动战争”。“如果中国的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谈，还是封建或半封建，则对于日本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致命的冲突，对日抗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

8月9日 致函陈松年，告江津安居“之难”嘱示如何在重庆安排姐姐一家、罗汉夫妇等人住宿和生活。

8月13日 撰《八一三》^④，批判“不抵抗”政策，主张对日帝“只有死里求生与之一拚”。“我们并不奢望能够打死这暴发

① 抚五即王星拱，曾是《新青年》编委，时为武汉大学校长。在武汉时，陈钟凡曾向王提议聘陈独秀去武大教书。

② 《政论》第1卷，第19期。

③ 《告日本社会主义者》。

④ 《告日本社会主义者》，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

户，只要拚得他无可奈何，不得不对我们稍微客气的说和，我们便算是胜利了”。中国要吸取教训，进行“根本改革”，经过两三个五年计划，我们便可以由破落世家变成复兴世家”。

8月21日 撰《告日本社会主义者》，谴责日本山川、佐野、铃木等人“由社会主义转向爱国主义”，指出：“被压迫民族的爱国运动是进步的，……压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是反动的”。认为“中国的解放，必须脱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制”，但目前必须首先“抗日”，“如果有人教导我们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我们只有认为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①。

8月24日 撰《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主张“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认为“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②。

8月25日 朱德为纪念八路军成立一周年，发表《告国民书》，指出：一年来八路军与日军交战六百余次，毙伤日军三万四千余人，俘虏二千人，驳斥说八路军“游而不击，领饷不作战”的诬蔑之词。

9月29日至11月6日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分别由刘少奇和周恩来领导。

10月12日 撰《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蒂》，是因为“法西斯的统制，是要停止人们思想之自由”。讥讽《新华日报》不要在别人是“暴行”“横行”“钳制”“封锁”“颠倒是非”“淆乱黑白”，在

① 《告日本社会主义者》，亚东图书馆，1938年版。

② 《政论》第1卷，第23期。

自己便是政治斗争的“正当手段”。^①

10月21日 汪孟邹遵照中国托派依据托洛茨基建议提出的请求，致函已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请他帮助陈独秀赴美^②，说“仲甫于七月二日由汉到渝，每月至少两次与我通讯，现住离渝百二十里之江津东门内郭家公馆，小轮船四、五小时可达。日撰文二、三篇，归《时事新报》发表，每篇送三、四十元，以维生活之需。乃近得他来信，说胃病复发，血压高之老病亦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他今年已六十高龄，使弟十分悬虑，未能去怀。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他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因他体气素强，诸事乐观之故。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虞。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之。如幸谓然，即请斟酌分别进行，感甚祷甚。”^③

据王文元后来回忆，托派的意思是望能为陈独秀在美国大学里谋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让他赴美讲学。信去后，胡适连回信都不曾写一封。^④

10月28日 托派发表《为武汉广州失陷告全国民众书》，抨击国民党“藉‘应战’以达到它与帝国主义妥协的目的”。攻击中共“奴颜婢膝地向国民党投降”，“帮助了国民党政府欺骗政策的顺利进行”。胡说武汉广州等大半个中国的沦陷是“国民党和史大林党的反动政策之分工合作（所谓国共合作）所造成的后果”。呼吁民众“自动地组织和武装起来积极参加抗战”，“召集

① 《政论》第1卷，第29期。

②④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4页。胡适于1938年9月17日被任命为驻美大使，10月就任。此前，他即在美作非正式外交工作。

③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381页。

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尤其要立刻脱离史大林党的恶毒欺骗”。

11月 上海托派临委通过《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指责陈独秀“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自‘八一三’以来所发表的一切文字，正由这一立场出发，因此一贯地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精神”。“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所坚决拥护并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背叛了组织，叛变了自己”。认为他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他自出狱后希图无条件地保持自己的‘公开的地位’”。最后提醒陈独秀，“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首先必得考虑他所幻想的‘公开地位’，进而考虑他近来全部思想错误的根源，否则他的错误将跟着时间前进至于不可收拾”。在《意见》“附言”中又说：“我们希望同志 D. S.（陈独秀在托派内的化名）将站在革命的利益上来互相讨论和批评，以便最后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①

^① 《保卫马克思主义》（托派临委刊行的油印小册子），卷1。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

六十一岁

8月 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9月3日 英国对德宣战。法国对德宣战。欧战正式爆发。

11月 苏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11月底至次年春 芬兰反动当局在英美法挑唆下，向苏联发动军事进攻，遭到失败。

12月 因苏芬战争，英美法操纵国联“开除”苏联。

1月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从此，政策重点由“抗日”转为“反共”。

1月16日 张君勱发表《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叫嚣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①。

7月7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0月4日 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科学地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

^① 《抗战与文化》第3卷，第2期。

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10月25日 叶青发表《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①,攻击“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说“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一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

12月 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阐述了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及前途等。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毛泽东说:“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社会主义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②

1月初 迁居邓仲纯开设的“延年医院”(江津城内黄荆街83号)后宅,与邓氏夫妇同院。

与去年年底绕道香港到江津来的上海托派临委陈其昌交换意见,阅看带来的托洛茨基去年6月25日给李福仁的信及邀他赴美的建议,还有上海托派临委作出的《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表示拒绝赴美国,因为一来身体已很不好,二来想国民党

① 《抗战与文化》第3卷,第9期。

②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在下一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有更新更具体的创造性的发展,即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前途,从而有力地批驳了陈独秀、托派及张君勱、叶青等反动理论。

正式准他出国赴美,成功机会可说绝对没有。^①对于他与上海托派的分歧问题,他表示绝不让步,当即复函托洛茨基,强烈谴责中国托派组织建立以来的“极左”错误,哀叹“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象现在这样衰萎”“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建议中国托派今后的工作方针是:“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否则,“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②这封信由陈其昌带到上海,托李福仁转寄托洛茨基。

1月9日 托派临委作出《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驳斥陈独秀致托洛茨基信中加给他们的“极左派”罪名,称:抗战以来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与托同志最近关于中日战争所发表的许多文件的意见相符”。^③

1月20日 托派临委致函国民党五中全会,指出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一年多来的失败,在于“没有积极发动民众”等四条教训,提出“立即取消军事独裁,解散婢妾式的国民参政会,立即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等四点挽救目前危机的办法,批判

①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4页。

②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4页。

③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

国民党“一贯地坚持‘国共合作’式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损人利己’的而绝对有害于抗战有害于民族利益的政策”。建议：一、“政府立即开放民众运动”；二、“在上述条件下，我们准备和你们，和一切工会，一切抗日团体，及共产党以至其他党派共同合作发动民众，武装民众，组织民众，总而言之，在一切抗日群众活动及军事活动中，我们一致行动。”^①

2月16日 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

2月23日 托洛茨基复函上海托派临委成员李福仁，夸奖李写的中国托派积极参加(?)反日斗争的报告，就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胜利原因，攻击“中国的土地革命在斯大林派的支持下给国民党停止了”；询问：“陈独秀的近况如何？他在干什么？他的思想如何？”^②

3月11日 托洛茨基复函李福仁，答陈独秀一月的信说：“我很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严斥是否正确。”对于陈独秀仍忠于托派事业的思想感情及其提出的工作方针，托氏表示：“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托氏再次提出要陈到美国去，甚至没有国民党政府的许可^③。

托洛茨基这封信寄到上海后，托派临委又写了一个《临委给

① 托派散发的传单。

②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4—75页。

③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8页。

国际的报告——关于 D. S. 同志问题》^①，猛烈抨击“D. S. 同志自出狱后便一贯在政治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在组织上采取取消主义的观点。”认为陈独秀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已经离开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及社会主义的信心已根本动摇。他之屡屡郑重‘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族民主斗争’，并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上来提出这个问题。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发展已接近了‘阶段论’的学说。”“我们不可否认的声明：D. S. 同志与我们之间在抗战过程中有根本不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向孟什维克机会主义乖离的路线，一条是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路线。”“假如他仍坚执成见，把我们视为‘极左派’以保留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则我们始终是无法接近无法合作的。”报告被迫同意陈独秀“留在第四国际内，是很有意义的”，“更希望他能到美国去。”抱怨临委中“极少数的老同志（指陈其昌、王文元等——引者）往往以道德的感情的观点来回避这一斗争”，辩护陈独秀“并未离开我们的立场”。

3月16日 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续)。

3月22日 (二月初二日寅时)养母谢氏去世。

5月5日 复函杨鹏升^②，告遭母丧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还谓：“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为遵“丧制”，“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

①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

② 杨鹏升，名泰筮，四川渠县人。国民党高级军官(非蒋介石嫡系)，曾任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议兼办公厅主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高参、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中将顾问等职。1937年陈独秀在武汉时，与杨鹏升相识，从此二人交往甚密。杨在经济上给陈有所资助。

后”。

罗汉在重庆大轰炸中身亡，北大同学会继托何之瑜照顾陈独秀的生活。何在江津第九中学教书。

春 将《小学识字教本》“序”寄给陈钟凡，并在信上说：“此书出，非难者必多。书中解说亦难免无错误，而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形、声、义合一，此中国文字之特征也。各大学文字学科，往往形、声、义三人分教，是为大谬。欲通中国文字学，必去六书之说，所谓指事，会意，形声，皆合体象形，声皆有义，义托于形，形声义不可分也。”并说计划“吾书三千字”，“明知此事甚难，然非此无由通识中国之文字也”；“上篇解释字根及半字根……不及五百字，下篇为此五百字所结合。上篇已成半数以上，暑期前拟上下篇全部完成，在暑期或可开班教授一次试验之。”^①

上半年 周恩来、朱蕴山先后到“延年医院”拜访陈独秀，劝陈去延安。陈拒绝，对朱说，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还说，他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②。当时党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因为他毕竟当过几届总书记^③。

某日 蒋介石派胡宗南和戴笠带上礼物到江津白沙镇，微服访问陈独秀。这是由于张国焘向蒋介石建议，派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的抗战言论编辑成册，以扩大对付延安的宣传效果。他们去时，还带了去年三月由傅汝霖、段锡朋等人

① 《陈仲甫先生印象记》。陈钟凡在此文中说：“虽尚未读到全书，其以形声义一贯解释文字的方法，可谓缜密，是为文字学上有价值之著作。”

② 《黄理文谈陈独秀》；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朱说，那时王明问题已经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对陈是宽容的；但陈的思想还停留在抗战初期受王明排挤打击的状态中。

③ 吴亮平谈话记录（唐宝林访问整理，1983年6月21日），未刊稿。

在《大公报》上为陈独秀的所谓“汉奸”事件辩护启事的剪报，认为这是提供陈大骂延安的最好材料。陈与他们见面后，便问是不是蒋先生关照要来的。胡、戴答是。陈即表示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胡宗南在回答陈询问来意时，一面出示带去的剪报资料，一面挑拨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老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天特来求教，请陈老谈谈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陈独秀默思良久，慢吞吞地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而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大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戴笠将陈独秀的谈话记录呈报蒋介石，蒋阅后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①

^① 沈醉、文强：《戴笠其人》第207—21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7月 因城内天热,再加潘兰珍与邓仲纯妻不睦,在江津富绅邓蝉秋、邓燮康叔侄的帮助下,迁居江津大西门外三十多里的鹤山坪施家大院(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家)。通讯处仍在“黄荆街83号”。

是月 致函汪孟邹,表示欲东下,想去重开芜湖科学图书馆。

8月 因清朝进士杨鲁承遗族(儿媳杨彭氏)之请,迁居杨鲁承旧居石墙院,一面帮助整理杨的文字学遗著手稿,一面专心写作《小学识字教本》。

10月19日 复函杨鹏升,告“承转寄某先生所赠陆百圆,如数收到”。

12月 就苏德、苏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莫斯科审判托洛茨基布哈林集团,苏芬战争等事件,作诗《告少年》,咒骂斯大林如古代传说中的大厉疫鬼“伯强”,“旁行越郡国,势若吞舟鲸。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有口不得言,伏地传其声。”“云雨翻复手,信义鸿毛轻。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自诩“哲人间世出,吐词律以诚。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嘱望后生少年:“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

12月30日 复函杨鹏升,告日内拟往重庆就医,或住渝二三星期,并寄《告少年》一篇。

是年 国民党教育部所属国立编译馆向陈独秀约编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书稿,并预支稿费五千元^①。据翌年1月31日

^① 参见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为请陈独秀续编学生用中国文字说明书稿,请教育部预支五千元稿费的呈文(1940年5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及 1941 年 2 月 25 日汪孟邹致胡适的信所述，此书稿即《小学识字教本》。此稿的写作是在狱中未完成的《识字初阶》稿基础上进行的。原计划这年夏天完成，因养母去世、书稿被窃等原因，一直未完成。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

六十二岁

6月 希特勒军队攻陷巴黎，法国政府投降。

8月20日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寓所被砍重伤，次日死去。

9月2日 英美签订协议。美国加强对英国的军事援助，英国给予美国在大西洋西部英属若干岛屿上建筑基地和驻留武装的权利。

9月27日 德日意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条约。

1月 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未结束之时，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完成。但民主革命有新旧之分。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它的前途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再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批判了将“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到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的“空想”。

1月31日 复函杨鹏升，告“一病十月，未能写作，颇为烦

闷”；关于医药费，“曾与编译馆约购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友好贫如我），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并说明月初未赴渝的原因。

2月9日 致函杨鹏升，告“已于六日由江津起身来渝，住宽仁医院二号病室。某日，施复亮和高语罕前来探望，给施写一单条，大意是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自己病在医院，无能为力，望大家共同努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2月20日 离渝返江津，住黄荆街83号。因病稍轻，根治需静养，渝嚣烦，不可久居。

2月26日 致函杨鹏升，告“顷接行严兄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恶乎可……”。

3月2日 给“西流”（即濮德志）一信，并请转寄上海王文元等人^①，批判托派临委“把列宁一九一四年大战的理论与口号应用于中日战争，而忘记了被压迫民族的反帝特质。无论他唱如何左的高调，只能有助于日本”。认为“一切理论与口号都有其时间性与空间性，是不能随便抄袭的。”主张“反对希特勒，便不应同时打倒希特勒的敌人”^②。

3月5日 蔡子民逝世香港。

3月24日 发表《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③

^① 当时濮德志在云南，陈独秀晚年因病，体力不支，不少致濮及上海托派内容相同的信，烦请濮转寄或抄寄。

^②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9页。

^③ 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

4月7日 函告杨鹏升，“顷又得三月二十日手教，并信笺信封^①，屡承厚赐，何以报之。”对蔡元培逝世，表示：“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

4月24日 给“西流”信，并请转寄上海王文元等人，认为：一、在此次大战结束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无实现之可能。二、现在德俄两国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要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柏乌政治。他根据以上见解，认为不但在英法美国内反对战争是反动的，即令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民族斗争一脱离世界斗争的利益，便不能不是反动的。^②

某日 又给西流一信，并请转抄寄王文元等人，说“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就中国而论，若英法胜了，“当然恢复东西旧秩序，其影响于中国国内政治，也可想而知，我们能做比此更美丽的梦吗？”并申言：“兄与我在数年前都已认为死狗是全世界罪恶之魁首。”^③

5月 返鹤山坪，因“城中天气渐热”。

第四国际召开紧急大会，通过托洛茨基起草的《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宣言^④，攻击“克里姆林宫又将中国共产党置于蒋介石差遣之下，以此消灭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创造力”。

① 此时陈用的信纸印有“独秀用笺”字样，信封印有“仲甫手缄”字样。

②③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0—32页。

④ 《中国革命问题》第369页，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5月5日 在《实庵自传》原稿上写一短跋：“此稿写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至二十五日中，时居南京第一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

5月13日 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为请陈独秀续编学生用的中国文字说明一书，报请教育部再预支给陈稿酬五千元。次日，教育部长陈立夫批示：“前稿已否交来？照发。”最后决定此款拟在本年度高等教育救济费项下动支^①。

6月12日 复函杨鹏升，说“尊函云‘恩来昨日来蓉’，不知是否周恩来。兄曾与彼接谈否？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然亦为群小劫持，不能自拔也。彼等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无理取闹！”^②

是月 托派临委作出《对陈独秀来信的决议》^③。批判陈独秀在致西流三封信中的思想。“公开站在民主的英法帝国主义方面，反对革命的‘失败主义’，反对‘以国内战争去转变帝国主义战争’，……明显地完全承袭了过去史大林‘以民主阵线反对法西斯阵线’之荒谬立场，这在本质上是英法帝国主义的狭隘爱国主义思想，是普列汉诺夫、格德和亨得曼在第一次大战中所表现的极端可耻的机会主义之再版”。“我们最后希望独秀同志对此加以慎重的考虑，我们准备继续与独秀同志讨论。但在考虑和讨论时，我们希望独秀同志不要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向外发表，以免引起我们中间的严重纠纷。”

大姐吴陈氏在江津上游油溪镇（距江津40余华里）因脑溢

①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档案，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前稿”即“教师用”稿。实际在陈去世前，教师用稿未完成，“学生用”稿并未着手。

② 陈独秀一直把王明、康生诬陷其是“每月领取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事件，误认为是整个党中央所为。

③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

血病逝，享年 69 岁。

7 月初 托洛茨基为郑超麟和王凡西合译的《俄国革命史》作“自序”，称“毫不妥协地反对与资产阶级合作政策”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攻击中共的“国共合作”政策。

7 月 31 日 接读王文元（连根）来信及上海托派发行的刊物《破晓》^①后，复函王文元，批判王文元、郑超麟“对实际的历史事变发展闭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公式”，斥责他们：“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第二是不懂得法西斯和英法美帝国主义者阶级作用不同”（英法美的帝国主义统治能容忍无产阶级的组织宣传至某种限度）；“第三是不懂得‘中间斗争’的重要性，……只好静候着最后斗争从天下降”。第四是幻想“英法失败后革命起来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统治之假定”。认为他们“反对民主国的英美”，“不攻击法西斯”，“拥护苏联”——这三个政纲合起来，必和斯大林妥协，“第三第四国际理应合并了”^②。

8 月 2 日 寓所失窃。

8 月 3 日 复函杨鹏升，告昨“窃去衣被等十余样。惟失去兄在武昌所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未出版书之草稿，甚为可惜也！”“此间已势不可居，拟九月初赴渝治病，在渝南岸至多住一个月，即拟移居赤水或江安县城居住。”又谓：“弟对大局素不敢乐观，近益情见势绌，倘一旦不支，成渝水陆大道，必为

① 德苏协定及苏芬战争后，第四国际及各国支部内部发生争论，组织分裂，有的认为苏联国家性质已蜕变，有的如托洛茨基则坚持只要财产国有制度，未被取消，则其本质仍是工人的国家——“堕落的工人国家”。上海托派临委王文元、郑超麟、彭述之、刘家良等在托派刊物《破晓》上，撰文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声明不管苏联如何与如何卷入战争，我们仍旧要保卫苏联。”陈则反对此观点。

②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 33—34 页。

敌人及汉奸所据，乡间又属土匪世界，无军队或秘密会党势力，亦不能生存，兄为川人岂无大碍，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命耳！”

9月 在病中花了二十余日给西流写了一封长信，并请其抄寄王文元(守一)、赵济等。批驳王文元、郑超麟、陈其昌、濮德志来信及《破晓》杂志上关于大战与革命、独裁与民主问题上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攻击“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莫斯科、柏林、罗马是“三个反动堡垒”，号召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连系起来”；主张目前应保护英法美的资产阶级民主，说：“我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

10月19日 函告杨鹏升，“谷物之暴涨，则全属人为。封锁时代又加以奸商横行，此事无法解决也”。“弟病无大痛苦，惟不能用脑，写作稍久，头部即感觉胀痛，耳轰亦加剧了。”

秋 王文元提出中国抗战已属帝国主义大战的一部分，失去了进步性，得到楼国华、陈其昌以及一开始就认为中国抗战无进步性的郑超麟的支持。彭述之则认为“不管中国抗战如何与帝国主义战争相结合，其进步性仍旧不变。刘家良起先支持王文元立场。李福仁以“第四国际太平洋书记处”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决议，支持彭述之的观点，于是刘家良也转向彭，中国托派开始了新的分裂。

11月16日 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中国古史表》。

11月28日 完成《小学识字教本》上篇，并作序，售予国立编译馆。据郑玉汝说，编译馆曾将该稿油印五十册，分赠学术界

人士。1971年，台北语文研究中心，校订再版，改名《文字新诠》，梁实秋作序但无作者自序，也不记作者是谁。

是月 移居江津城中——黄荆街83号，因“山中天寒，盗风又大炽”。

是年 根据《史记》“王帝纪”重订“古史系统表”，并将此表寄陈钟凡征求意见。钟凡回信商榷，认为此表并无考古学上的根据，难成定论。独秀“依然固执己见”^①。

^①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

1941年(民国三十年 辛巳)

六十三岁

6月22日 德军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十月,德军包围莫斯科。

7月 苏英签订对德战争共同协定。

12月7日 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8日 英美对日宣战,接着国民党政府也对日宣战。

6月23日 毛泽东就苏德战争爆发撰文指出: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①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中国人民积极打击日本侵略者,支援苏联。

9月1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指出了从六

^① 《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4页。

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并决定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组织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

12月8日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发表宣言，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了”。

是月至次年1月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召开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会后，在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的领导下，西南党组织对各民主党派、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地方实力派，以及文教、工商等各界人士，进行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有效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壮大了抗日民主力量，提高了我党在国统区的威望。

1月10日 托派中央常委通过《关于D.S.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①，猛烈抨击陈独秀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歌颂资产阶级民主和否认在这次大战中有发生任何革命运动的可能的观点，宣布：“独秀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意见，对于民主与专政及苏联等问题的意见，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独秀完全放弃他的荒谬的意见，就是他离开第四国际，离开革命，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

1月16日 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禹治九河考》。

2月8日 彭述之、刘家良背着楼国华，以托派中央常委名

^①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

义，向各基层发信，准备召开大会，确定托派新的抗战纲领。

2月23日 彭述之、刘家良又背着楼国华、陈其昌，以托派中央临委的名义，向全国各地地方组织各支部发出“通告”，要求正式讨论“抗战性质是否已经变化，如何变化？我们的基本策略目前应否改变，如何改变？”“此次世界大战以至日美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抑或民主反法西斯战争？中国的民族革命以及过去三年来的资产阶级军事抗战是否有进步性？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抗日战争或一般的反帝战争中是否应该采取‘失败主义’？”等问题，并限制在四月底讨论结束。^①

2月25日 汪孟邹致函胡适，告独秀近况：“记得二十八年春（即1939年春——引者）曾有一信托友人带香港由航空邮呈，是为仲甫兄病事，迄未得复信，不知已收到否？”“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高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是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阻，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可虑，还要带病工作，近著《小学识字课本》，售稿于国立编译馆，以资生活，亦太难矣”^②。

是月 郑超麟撰《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等文章，认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阶级分化和斗争，“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个人群为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暂时忘记其阶级利益”。在中国，“所谓‘国民’，所谓‘人民’，所谓‘大众’，……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无产阶级、农民、城乡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他们重视各自阶级的利益过于中华民族的利益”。所以，“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带着反动的

① 《火花》第3卷第5期。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514页。

性质”，“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绝不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之间分出优劣来”。指出：“非分化和破坏中国正规军队，非彻底提出阶级斗争口号，不能成功并不能爆发第三次革命。”“我们第一步应当破坏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中国的需要。”“‘先安内而后攘外’，蒋介石这话说得比中国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高明……。”“让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起来！这个大旗将为中国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点。”

3月5日 就何之瑜任教的江津第九中学出现国民党密探事，复函何之瑜，嘱“不必谨慎过度”，“即使是侦探也不要紧，他们愿探的三件事：（一）我们与干部派（指中共——引者）有无关系；（二）我们自己有无小组织；（三）有无反对政府的秘密行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听什么呢？”

3月15日 致函郑学稼，并附五千元支票一张，嘱其面还张国焘^①，说“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

3月23日 复函杨鹏升，收到其“千元汇票一纸”，问作何用。因为杨“信中未示此款作何用”。^②

4月16日 彭述之、刘家良控制的托派中央，将陈独秀关于抗战问题的几封信和郑超麟、王文元、彭述之、刘家良的争论文章，汇成《校内生活》和《火花》第3卷第5期合刊出版，发到基层。

① 此款原是国民党当局“知陈（独秀）穷困”由朱家骅赠陈，遭拒；旋托张国焘转赠。张见又拒，叹：“仲甫先生，总是如此。”参见郑学稼：《陈独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② 信中还提到陈为杨题大字联。杨等当时叫陈题字，写文，都为了借此向陈提供生活费，否则陈是无功不受禄的。

6月26日 托派中央临委决定七月十二日召开代表大会。

7月2日及8月11日 郑超麟、楼国华、陈其昌、王文元联名发表《给大会代表同志的信》、《我们对现局势的基本态度》和《我们的组织意见》，宣称：托派组织中存在着两种路线，一种是以他们为代表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即革命的国际主义路线”，“失败主义”路线；另一种是以彭述之、刘家良起草的大会决议案为代表，“半史大林主义的，本质上是民族爱国主义的路线”，即“保卫主义”路线，“阶级合作政策的一个变种”。认为现在客观上已提出了“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号召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反对我们内部的‘保卫主义’理论”的斗争，组织托派新党。

7月12日 楼国华（托派中央三人常委之一）和陈其昌（托派四人临委之一）联合发表对大会的声明，说二月以来五个月中，以临委和临常委名义之行动而为我们所未闻者，我们一概不能代为负责。

7月13日 托派（“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彭述之、刘家良的操纵下召开，郑超麟、王文元未被通知而被排除在大会之外，楼国华、陈其昌则抵制大会。大会通过宣言，就希特勒进攻苏联，呼吁中国工农“保卫苏联”，“立即起来参加和扩大抗日战争”。攻击斯大林“向‘民主帝国主义’讨饶”，攻击国民党“把中国抗战完全出卖给美帝国主义”，中共“尽了帮凶的作用”；宣布：“我们一贯的革命立场：无条件保卫苏联，转变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为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召集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①。大会选出彭、刘、李（福仁）、蒋振东、毛鸿鉴为新中委。楼国华、陈

① 《斗争》第5卷第5期。

其昌被排挤出托派中央，郑超麟、王文元被排挤出《斗争》报编委，并被拒绝继续讨论政治问题的要求。于是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楼国华等另出本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从此中国托派再次正式分裂成两派：彭述之等为“多数派”，又称“《斗争》(报)派”；郑超麟等为“少数派”，又称“国际主义派”(到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两派又分别独立建党，前者称“中国革命共产党”，后者称“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

是月 托派中央作出《对最近党内争论之决议》，系统地总结批判陈独秀、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在抗战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断言战争“必然以革命而终止”，“中共必然分裂”，一切革命分子都将加入“第四国际”。

在屈原祭日，送何之瑜、台静农、魏建功等东归，聚饮大醉作诗纪念：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
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8月6日 复函杨鹏升，收到“省行千元兑票一纸”，示谢，并谓：“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

夏 复函陈钟凡，赞同其应广州中山大学许志澄之邀去该校任教，并附《春日忆广州》绝句一首：

江南目尽飞鸿远，隐约罗浮海外山；
曾记盈盈春水阔，好华开满荔枝湾。

钟凡和之：

瓜艇吟魂荡艇囊，苍梧极目万重山；
梦余犹味鱼生粥，惆怅西江水一湾。

后来得知陈钟凡因许志澄去职，南行不果，陈独秀又去函，劝其有机会赴上海沪江大学任教，理由是上海离陈钟凡故乡(盐城)较近，可照料眷属。当时广州和上海都已在日本侵略者的统

治下，所以陈钟凡认为独秀“对战局终抱悲观”，出此下策，拒之；表示“宁愿与国土共存亡，不甘心至敌人铁蹄下去讨生活”，仍留成都。

10月4日 复函杨鹏升，告“函转某先生赐款六百元，已由省行寄到，既经兄代为接收，何敢言辞，即希代向某先生致谢。某先生是谁？尚希示之！昔在汉口，刘辅承先生闻弟将入蜀，曾托弟之友人送弟川资五百元，存之书篋中入蜀时始用之，今后亦将于赴蓉时动用某先生所赐也”。又告：“被窃衣物大半追回，惟兄赐刻篆章及抽稿则去如黄鹤矣！”

11月28日 撰《我的根本意见》^①，并油印寄发上海托派及其他友好，说现在是反动局势，没有革命局势，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和“二十余年苏俄教训”，认为“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任何“独裁制”都是“领袖独裁”，都是“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战争，只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才能胜利，“孤立的民族战争，无论由何阶级领导，不是完全失败，便是更换主人”。

12月1日 致函郑学稼，并赠《我的根本意见》油印件。函中说：“近接到一些托派文件，见解颇荒谬，故写一文驳斥之，特油印给几位相好朋友看看。兄阅毕望给李麦兄一阅。”^② 12月14日郑学稼复函陈独秀，谓：马克思主义都来自李嘉图、黑格尔、费尔巴哈。列宁发挥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独裁是受普鲁东的影响，都没有何种新的创见。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只

①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3页。有材料把该文撰写时间定为1940年，不确。据当时陈致郑学稼等人的信判断，应是1941年。

② 《民主与统一》第7期。

能应用于沙俄”^①。

12月7日 复函××，嘲笑上海托派代表大会分什么“少数派”，“多数派”，指出“他们自以为是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其实布尔什维克并非马恩主义，乃是俄国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布郎基主义，德国此时的纳粹主义即旧的普鲁士与新的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将继续为文说明布尔什维克的横暴、欺诈等罪恶，有机会即公开发表，以兄好学深思，想亦能分别布尔什维克与马恩之不同也”^②。

12月23日 复函郑学稼，对郑说的“布尔塞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表示“拍掌大悦”。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乃用科学的态度，并非依任何教派的观点。我自己则已经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东与布尔塞维克之混合物。”表示“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③。

冬 以诗代笺向欧阳竟无大师借阅《武荣碑》字帖：

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羨武荣碑^④。

① 《民主与统一》第7期。

②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1。

③ 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④ 《欧阳竟无大师纪念专刊》1943年5月；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晚报》1947年11月22日。

欧阳竟无，名渐，字竟无，江西宜黄人，佛学大师。1918年与章太炎等在南京设立支那内学院；抗战时期逃难四川，在江津重建支那内学院，其间和陈独秀交往甚多，陈常偕高语罕到他处谈文赏艺。陈去世时，曾赠金50元，并索回武荣碑及文字学书数种。1943年死于江津。

贯休，本姓姜，字德隐，婺州兰溪（今属浙江）人，五代时名僧，能诗善画，是著名“姜体书法家”。曾于唐天复年间入蜀，有“一瓶一钵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来”的诗句，这里，陈以贯休自喻。

是年 整理《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和《连语类编》，交北京大学出版，以答北大同学会月赠三百元的生活费用。后来，北大不能出版，遂自己油印《古》著若干册，分赠友好，并请魏建功作序^①。

^① 《何之瑜致胡适的信》（1948年1月7日），《胡适来往书信集》（下），第306页。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

六十四岁

1月 苏、美、英、中等二十六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国家的联合宣言，保证互相援助，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

2月 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即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各个时期的路线是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1月9日 函告杨鹏升，因“川中生活不支”，欲迁居贵阳，“以彼处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

1月19日 复函胡秋原(H)、孙洪伊(S)等，回答“H等希望我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的问题，说：“近作根本意见，亦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都包括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联二十余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自来之论，喜根据历史现在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

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实是如此。”^①同时给何之瑜一信，附其给 S 和 H 的信，望何转寄，并说：“H 等希望我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陶孟和也是如此）乃彼辈一向之偏见，不足为异。我辈最好与之讨论实际问题（历史的及现状的），使之无可逃遁，不必牵涉抽象的理论及主义的圈子，免得缠夹不清也。”^②

1月31日 郑学稼致函陈独秀，劝陈续写《实庵自传》。2月20日，陈复函：“弟之《自传》真不能不写，但写也不能出版，如之奈何？”^③

2月12日 函告杨鹏升，“贵阳之行已决计作罢，终以病体不胜此跋涉也。”

2月19日 郑超麟致函陈独秀，评论陈的《我的根本意见》一文，说：“有许多条，在文字上说，我都可以完全同意的，尤其最初五条和最后四条。但有一个根本点，我和你不相同，就是：有无革命起来干涉战争。”宣称：“即使没有一个党，即使没有人自觉地去准备革命，革命仍旧是要来的，而且就在这个战争之中到来。……现在我们正处在（俄国）一九一五——一九一六那样的时代。”“我们现在的问题并非是在资产阶级这二个统治形式之中（即“民主”与“独裁”）选择一个较好的，而是根本不要这两个形式，因为战争向我们提出了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任务了。”对于苏联，“我们有权利希望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会产生‘斯大林’，因为第二次革命高潮将成功于好几个先进国家。”^④

①②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41—42页。原信只署1月19日，未署何年。有的材料断为1941年1月19日，不确。与当时陈致其他人的信及《我的根本意见》联系起来看，应是1942年1月19日。

③ 郑学稼《办青年杂志前陈独秀生活的片断》，台湾《传记文学》第13卷第4期，1963年8月31日。

④ 《国际主义者》，第3期。郑致陈函未及发出，陈即病逝。

3月21日 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认为“每次大战都只不过是前次大战继续延长”，“此次大战不外三种结果：一是英美和德日不分胜负而议和，二是胜利属于英美，三是胜利属于德日。第一种结果之可能性最少，……第二种和第三种以何者最大呢？以现状观之，自然是德日占优势。”“战争的结果，真正独立不受他人支配者，只能有两个领导国之对立，美德之对立，其他民族国家都不得不在同盟或全面合作等名义之下，分别隶于这两个领导国所领导的集团圈内。”苏俄早已离开社会主义，而隶属于英美。指责在这次大战中弱小民族有独立的机会，以及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是“梦想”。对于中国，“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为殖民地。”

是月 撰《再论世界大势》，认为此次大战如果胜利属于希特勒，美洲的希特勒将起而代罗斯福，下次世界大战将不是民主与纳粹战争，而是两派法西斯蒂集团之火并，民主自由将丧失数百年，“则将来法西斯专政会和以前的专制一样，普遍的发展，而且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① 本文是《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的续篇，前篇发表后，遭各方非议，故本文拟刊登时，被国民党宣传部以“顾虑对苏外交”，禁止刊登。

3月29日 国民党江津县党部召开大会，某人发表演说，借着陈独秀在《大公报》上只发表了一半的文章，大骂陈是“反革命”。陈以为此事是高语罕所策动，对高恨得要死。

4月2日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给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公函，根据四川新闻检查处呈送成都《新新新

^①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13—17页。

闻》缓登稿——陈独秀著《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请核示一事，称该文“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提议电飭各新闻检查处室“注意检扣”。3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复函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答应照办，并“通令各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一体注意检扣。”^①

4月5日 复函杨鹏升，告杨赠的信纸二百信封一百收到，示谢。谓“前次移黔之计，主要为川省地势拔海较高，于贱恙不宜，非为生活所迫”。又谓：“前两函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更觉惭怍无状，以后务乞不再如此。”“前敬题大联”，来函云收到，“殆伪造此言，以慰我耳”。

春 完成《古阴阳入互用例表》，油印数本，征询陈钟凡等人。此表将说文、至篇、广韵、集韵所收文字，依类录入，见古阴阳入三声之互相通转。陈钟凡复函认为“古韵非一成不变之物。周秦与汉魏，未必同符，随唐以后，变化益繁；欲范以定型，恐难符合。”陈独秀答：“此仆一人之见，各方异议，容将来作一总答复。”

5月8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李心清文章《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批判陈独秀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全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认战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是“汉奸理论”，反映了“陈独秀的汉奸本质”。指出“正是反法西斯战局的紧急关头，而一部分民族立场不坚定的人为法西斯的宣传所吓倒，因而悲观动摇的情绪和倒行逆施的行为逐渐增强起来，正是这些人需要陈独秀的‘理论’”。文章责问，这样违背“抗战到底的国策”，违背“三民主义”的文章，“为什么堂堂的大公报能为之刊载呢？为什么堂堂的检查官能为之通

^① 国民党军委新检局档案新指字第8452号公函。

过呢？”

5月12日 因服用变质之蚕豆花泡茶（治高血压病）而中毒，腹胀不适。

5月13日 撰《被压迫民族之前途》，认为：“在今天，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非依赖先进国家不可”；“它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①

致函何之瑜，称《被压迫民族之前途》是《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和《再论世界大势》三篇文章的“结论”，更是画龙点睛了^②。

友人过访，食四季豆烧肉过量，夜不成寐，午夜呕吐大作。

5月17日 两次昏厥，冷汗如注。

5月18日 遣人请来陈松年及邓仲纯探视，同时函请重庆周伦、曾定天医师来诊（周、曾二人因忙未来，寄来医药）。

5月22日 三次昏厥，注射强心剂苏醒。

5月23日 请江津西医邹邦柱、唐熙尧上山诊视，灌肠，大便秘通。

5月25日 约何之瑜至榻前，“略有所嘱”。

5月27日 晚九时四十分逝世，临终嘱夫人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③。

①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18—22页。

② 《给Y的信》，《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42页。

③ 何之瑜：《陈独秀病逝始末记》。潘兰珍旋进入朱蘊山、吉明甫等人在重庆附近办的农场工作，差能自给。

6月1日 安葬于四川江津大西门外鼎山麓之康庄。衣衾棺木与墓地安葬等身后大事，均承邓瞻秋、邓燮康全力帮助。1947年6月，遵陈独秀遗嘱由三子陈松年迁墓回乡——安庆市郊北关入土。

后 记

本书1982年11月完成初稿，其中前言及1879—1920年5月部分，由林茂生编写；1920年6月—1942年部分，由唐宝林编写。后来，1983年至1987年的几次修改，包括对全书材料的增补、订正、考核、文字的统一、人物注释及对疑歧问题的考证和最后定稿，均由唐宝林承担。

在收集资料和编写年谱的过程中，得到了李新、史洛明以及陈独秀之子陈松年的热情帮助和支持，还参考了一些同志协作编写的《陈独秀研究资料》的初稿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多位同志对初稿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或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出版上给予的支持，更使我们感激。郝盛潮同志不仅是本书的责任编辑，还提供了若干重要史料。

编 者

一九八七年四月